

出版说明

《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二、三卷）是根据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写计划，在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和兰州军区、军区政治部首长的领导下编纂的，是继《第一野战军战史》、《第一野战军战例选编》、《第一野战军战史图片集》后的第4部（套）书。本书是在编写战史、战例等书的过程中，将收集到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选择、整理、考证、注释后汇编而成的，以帮助读者阅读战史、战例时参考，并为党史、军战史研究及教学工作提供参考和佐证。

《文献》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五省的作战轨迹为主线，围绕战役战斗的发展顺序，选编重要文电，并兼顾建军、训练、政治工作及后勤保障、支前等方面的文电，主要是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自1947年起至1949年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与第一野战军、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宗逊等领导之间和野战军领导与各兵团、军（纵队）之间往来电报及野战军等领导的讲话、报告、总结等；为了顾及历史的连续

性，上限与下限各延伸一段，有重点地选编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到1947年前、1949年至1953年10月前的有关重要电报；《文献》还收入部分有关全局性的和其他战区与西北战事有关的文电。共收入781份，120.3万字，编为3册。第1、第2册主要是电报，第3册为领导人讲话、报告、会议决议、决定及总结等，均以时间顺序编排。大多数文电为第一次发表。

本书选编的文电以馆藏历史文献为依据，保持了文件的原貌。明显错字改正的用〔 〕标出，脱漏字用[]标出，无法辨认的字、缺字用□代替。为了使全书风格统一便于读者查阅，文电中地支代月字和韵目代日字均认真核对改为数字；原件无标点符号的均加了标点符号；地县名系繁体字、古僻字的，改用现地名表示；文电标题按要求统一了格式，需要说明的地方作了题注和简要注释。书稿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发表的文电，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批准。选用解放军档案馆的馆藏文电，经解放军档案馆同意。

本书的编纂，初期工作是由刘继福、潘士杰、罗芳进行的；1996年第一野战军战史办公室机构调整后，由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组织完成。主要编纂人员马肇钧、潘士杰、李玉泰。《文献》由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审定，并请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

历史研究部有关专家进行了审阅。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解放军档案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兰州军区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谨表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本书编排上定会有不当之处，错误与不足在所难免，欢迎原第一野战军的老首长、老同志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0年8月

目 录

- 彭德怀在保卫延安、保卫边区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 (1)
- 亲密军民关系, 展开群众战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彭德怀 习仲勋 徐立清 (4)
- 习仲勋在真武洞祝捷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 (7)
-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目前敌占区工作和敌军工作的指
 示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10)
- 贺龙在绥德分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 (17)
- 中共中央对西北野战军前委《关于在蒋管区作战中几
 个问题的决定》的批示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 (31)
- 附: 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关于在蒋管区作战中几
 个问题的决定 (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32)
- 西北野战军独立第一旅政治部关于阶级教育经验总结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5)
- 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 彭德怀 (42)

- 毛泽东在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 (46)
- 贺龙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 (59)
-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毛泽东 (64)
- 中共中央关于严格执行《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给西北局、晋绥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 (71)
- 附：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
（一九四八年一月） (72)
- 贺龙在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要点）（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 (81)
- 春季攻势总结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彭德怀 (92)
- 贺龙在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要点）（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101)
- 彭德怀在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闭幕时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 (114)
- 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参谋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 (121)
- 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指示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 (124)
- 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关于执行中央报告制度指令的决定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128)

- 一九四七年冬季整军报告（摘要）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彭德怀（131）
- 刘景范在西北野战军纵旅供给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141）
- 民运工作要坚持正确地执行政策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 彭德怀（155）
- 新区地方工作报告大纲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 张德生（161）
- 关于作战方针和军队建设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彭德怀（169）
- 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三次扩大会议报告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181）
- 中央军委关于西北野战军前委执行报告制度办法的通
报（一九四八年十月九日）……………（184）
- 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夏季整军向总政治部、军委的
报告（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186）
- 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关于扩大会后执行报告制度情形
的报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194）
-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转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处
理俘虏军官经验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197）
- 关于敌兵力分布及我军战术问题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彭德怀（203）
- 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关于冬季群众工作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207）

- 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的传达报告（节录）
-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贺 龙（210）
- 关于新式整军运动经验（一九四八年）……………甘泗淇（233）
- 一九四八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
-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彭德怀（248）
- 关于一九四九年西北的形势与任务
-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彭德怀（258）
- 关于接管城市工作
-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习仲勋（270）
- 第一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总决议
-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通过）……………（279）
- 第一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地方群众工作决议
-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通过）……………（282）
- 第一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关于提高自觉纪律的决
- 定（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通过）……………（285）
- 加紧战斗，迎接胜利年
-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贺 龙（288）
- 关于冬季军事教育总结
-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张宗逊 阎揆要（293）
- 去冬农村群众工作基本总结
-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张德生（297）
- 彭德怀等关于与华北兄弟兵团会师的指示
-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308）
- 第十九兵团政治部关于进军大西北的政治工作要点
-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311）

- 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春季攻势作战总结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 (315)
- 张宗逊关于四个月工作情况向毛泽东主席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 (324)
-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入城注意事项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 (328)
-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关于聚歼胡马两军的政治动员令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332)
- 张宗逊在第十八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335)
-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一野战军政治部通令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341)
- 对西北军区地方部队建军计划的意见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贺 龙 (344)
-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向甘肃进军中对新区群众宣传
工作指示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354)
-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对西北回民及国民党军的宣传
口号 (一九四九年七月) (358)
- 关中新区的工作方向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习仲勋 (361)
-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全歼残匪解放西北边疆的政治
动员令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 (368)
- 王震在第一兵团党委会上的讲话大纲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 (371)
- 贺龙在西北军区会议上的讲话

-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76)
- 西北军区关于建军会议给中央军委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 (385)
-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关于继续前进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政治动员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二日) (393)
- 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兰州扩大会议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395)
- 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一月七日) 彭德怀 (402)
- 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 彭德怀 (408)
- 西北军区关于现有兵力及军队生产等情况向毛泽东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日) (415)
-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议
(节录) (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通过) (420)
- 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习仲勋 (422)
- 西北地区的土改工作
(一九五二年五月四日) 习仲勋 (432)
- 在西北军区剿匪会议上的总结 (摘录)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廖汉生 (436)

彭德怀在保卫延安、保卫边区 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

同志们！我到延安四年了，今天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很抱歉。

今天我们开一个动员大会。胡宗南^①已调了十七个旅、三十五个团来进攻边区，进攻延安。敌人侵犯合水、庆阳，已被我们打出去了。

洛川、宜川这方面，敌人集中了十三个旅，要准备进攻延安，我们也要把他打出去！蒋介石、胡宗南调动大军打我们的边区，破坏和平，我们为了和平就要消灭他，不消灭他就不能和平。我们农民要分土地，土地没有分好的地方还要继续分，敌人来了也要分，因为地分了，敌人纵然来了也抢不走。要给我们的儿子孙子成家立业，我们的子子孙孙要种地，我们农民不种地就没有饭吃。胡宗南的进攻就是来破坏我们分地，使我们农民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他是保护大地主、保护反革命的，所以我们要彻底粉碎胡宗南的进攻，把他打出去！

蒋介石要实行独裁，我们要民主，把中国变成大家的。为

着民主，也要打跨他的进攻，不取消蒋介石的独裁，中国就没有民主。

国民党蒋介石要卖国，第一个卖国贼是汪精卫，把中国卖给日本；现在又出了一个卖国贼蒋介石，他要把中国卖给美国帝国主义。我们要中华民族独立，就要取消蒋介石的卖国专政；我们要和平，就要消灭蒋介石的进攻军队，要粉碎蒋军进攻；我们要民主，就要反对他的独裁。不消灭蒋介石的进攻军队，这些事情都得不到的。

问题在于能不能消灭他的进攻军队。

我看能消灭它。有人要问我：你有什么证据，证据在哪里？这自然是有证据的。

一九三五年的事情就是证据。当时陕北刘志丹⁽²⁾只不过三千人，后来来了一个徐海东⁽³⁾，也不过三千人，最后中央红军开到陕北也只是七千人，共计不超过一万五千人。可是，那时候的敌人有多少呢？据我记得的，那时敌人有一百零一个团三十万人。今天胡宗南却只有三十五个团。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可就不同了。边区那时只有三四十万人，五个县，现在我们是大大得多了。大家想一想，看我是不是扯谎？没有扯谎，这是事实。当时红军总共不超过一万五千人，国共兵力是二十与一之比。可是今天，胡宗南却只是三十五个团，我们比那时的一万五千人就多得多了。我们能打胜吗？是一定能够打胜的。当时我们在南线过黄河到山西，后来又回渡黄河到西线，都是无一不胜。打得东北军⁽⁴⁾讲了和，去抗日；打得阎锡山⁽⁵⁾心惊胆跳，在太原坐不稳；打得马鸿逵⁽⁶⁾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兵败山城堡；最后，蒋介石也在临潼受

到了教训。

现在已过了十一年了，恐怕不能这样来比。现在我们已消灭了蒋介石六十几个旅，俘了一百一十几个将官。我们所有的解放区，华北、东北、苏北早都起来消灭敌人的进攻了。我们要继续努力，再消灭他六十个旅，再捉他一百一二十个将官，把进攻者一起捉来。这样子就会实现和平民主，中华民族就会独立，农民就会有土地。

十一年前我们打胜仗，现在我们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

胡宗南的三十五个团有很大可能就被消灭在这里。

消灭他三十五个团后，那时恐怕我们要打到西安去了。消灭他三十五个团，他西安就没有兵力，我们还不到西安去吗？这可能不可能？我看很可能。只要看大家努力，努力大，早一点；努力小，迟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是可能的！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 (2) 刘志丹，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一九三六年任红二十八军军长时在山西三交镇作战中牺牲。
- (3) 徐海东，当时任红二十五军军长。
- (4) 东北军，即国民党军张学良所统辖的军队。一九三五年被蒋介石调到陕甘进攻红军。
- (5)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 (6)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亲密军民关系 展开群众战^{〔1〕}

彭德怀 习仲勋 徐立清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胡宗南^{〔2〕}集中全部力量，打进边区侵占延安，后又集十个旅于三月三十日侵占延川，急求与我主力决战。扑空后，或继续侵犯清涧、绥德，或暂图巩固延川、延长，打通永坪至延安公路，准备北犯条件，或继续集结强大优势兵力寻求我主力决战。我采取诱敌深入，扰疲与分散敌人，利用根据地条件，寻找敌之过失，各个歼敌主力，才能收复失地，保卫边区，发展西北。只有此方针才是积极的。应动员党政军民团体积极拥护这一方针，立即进行各种战斗部署，立即动员与组织人民拿起土枪、梭标、手榴弹、地雷杀敌和袭击敌人，封锁敌人消息，扰敌人，捉敌探与掉队落伍的。在预计敌可到之处，进行坚壁清野，埋藏粮食，增敌困难，饿敌肚皮，饱自己肚皮，这是达到战胜敌人最有效办法之一。要人民自己的生命财产不被敌人抢掠与杀害，或减轻此种损害，必须对敌组织警戒线，实行村与村、区与区互相联防，互通情报，规定警报讯号。讨论如何保护老小妇女避敌办法，讨论本乡本村民兵如何掩护群众转移，发挥人民群众的阶级友爱，互相

帮助，互相救济，特别是对于避难出来的群众。发挥军民团结互助、军民合作，才能战胜敌人。在地方方面，要领导人民拥护军队，带路、救护伤病员、筹备粮草、挑水煮饭、洗补衣服，减少军队疲劳，用一切办法帮助军队提高杀敌勇气。当地党政民干部要去找军队负责人，特别要去找军队政治部主任，共同商讨关于作战各项有关问题，了解本军情形，告诉地方情形。军队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要使军队每到一处找不到人民，也找不到地方党，甚至找不到地方干部。今后如有此种情况，地方党的负责干部要受到处分。在军队方面，要特别强调爱护人民利益，对人民的一针一线不得损害。要组织纪律检查制度，每一伙食单位要有纪律检查组，每班要有纪律值班员。连首长每日须有简短纪律生活讲评，营首长三至五天，团首长七至十天，旅首长半月须有一次讲评，坚决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严守纪律的连队或个人表扬之，坏的批评之，违犯纪律严重者应处罚之。各连队每到一地，召开军民联欢会，进行社会调查，军政首长、特别是政治机关要找地方干部谈话。最近，有些部队利用群众逃跑及坚壁清野，将鸡鸭猪羊杀光，翻箱倒柜，挖窖，牵牛赶驴，打人骂人，乱拉向导，吃粮用草不打条子，吃菜烧柴不开钱等现象异常严重。这将引起人民怨恨我军，必须立即停止，不容许再有上述现象发生。过去已发生的应立即纠正与赔偿损失，向部队进行教育。坚壁清野是为着发动群众对敌斗争。如群众因长期和平生活，一时混乱而遗留鸡鸭及其他牲畜粮物时，军队有责保护。特别是政治机关更有责任立即寻找地方党、政府、群众团体，掩护和帮助人民隐蔽，不使遗落敌手。只有

这样才能团结群众。如敌情紧张，无法进行上述工作以致遗落敌手时，群众亦将原谅人民军队，增强对敌仇恨；如敌人未来而我们破坏群众财物，反会引起群众对我们的怨恨。军队中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要善于接近地方党同志、政府和人民团体干部，以至每一个劳动人民。总之，军民亲密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基础，团结愈好，胜利愈快。相信军队与地方全体同志一定能克服各种不良现象，一定能进一步亲密军民关系，一定能战胜敌人。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 〔1〕这是彭德怀、习仲勋、徐立清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给西北野战军各部队并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 〔2〕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习仲勋在真武洞捷祝大会上的讲话^{〔1〕}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

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争到现在不过两个月，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除了消灭胡宗南^{〔2〕}的三个旅之外，边区各地的人民自卫斗争、游击战争都大大小小地得到许多胜利。今天的祝捷大会，就是我们两个月胜利的总结大会。这两个月的胜利是全体指战员的功劳，是全边区人民的功劳，是全边区军民共同努力取得的。

胡宗南进攻边区，妄想很快地就把边区侵占掉，把边区一百六十万人民踩在脚底下。他这个妄想已经被我们这两个月的坚决斗争打跨了，这两个月的胜利证明我们陕甘宁边区完全有力量粉碎胡宗南的进攻，有力量消灭胡宗南。

卖国头子蒋介石在进攻解放区到处失败之后，企图最后挣扎，便把胡宗南这最后一宝搬出来打陕甘宁边区。但是并不能吓倒我们，我们是吓不倒的，只是越发证明他们就要很快的崩溃，很快的完蛋。胡宗南匪军侵入边区，破坏了边区的和平生活，使边区人民遭到空前的磨难。胡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为，他们完全像禽兽一样。经过胡军蹂躏的地方，一片凄惨，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我们一定要很

快地讨还这笔血债，消灭胡宗南！全边区人民紧张地动员起来，参加到游击队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去，拿起枪杆、炸弹，去和胡宗南斗争，直至彻底消灭他。拿出过去创建陕甘宁边区的精神来，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边区，保卫边区自由幸福的生活！

今天这个大会完全揭穿了两个月来敌人的造谣。他们说什么“中共中央走了，西北局走了，边区政府也走了。”这只是敌人说梦话。边区人民离不开他们的民主政府，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和边区人民已经是血肉相连。边区的党和政府统统始终在这里和边区人民共同奋斗。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仍然在边区领导着我们。我们有着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我们更加信心百倍，更加勇气百倍，一定把胡宗南的军队消灭干净。

边区部队同志们！更加提高勇敢精神，更加提高作战技术，更加严整纪律，紧密团结群众，继续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歼灭敌人！从蒋介石军队中解放出来的士兵同志们！你们都是中国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我们热烈欢迎你们参加人民解放军，热烈欢迎你们和边区人民打成一片，手携手地共同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游击队民兵同志们！更加广大地开展敌人侧后游击战争，更加积极地袭击敌人，围困敌人，坚持和敌人斗争，保卫自己的土地、牛羊和家庭，配合主力军歼灭敌人！后方工作的同志们！要更加紧张地工作、生产，更好地完成每一个人承担的任务，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农民们！加紧春耕，抢耕抢种，多打粮食！工人们！加紧生产，多造军火，多造手榴弹、地雷！前后方一致努力，为消灭胡宗

南而奋斗！全边区的青年壮年！踊跃参加军队。劳动英雄吴满有自愿报名参军，他确实是我们边区的英雄，是边区人民的模范。全边区人民都要向吴满有看齐，劳动英雄变成保卫边区的英雄、参战英雄、民兵英雄、歼击敌人英雄、战斗英雄！边区共产党员们！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紧紧地团结人民，坚定地带领人民去和敌人斗争。

消灭胡宗南！

保卫边区！

西北人民解放军万岁！

边区自卫战争胜利万岁！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习仲勋文集》刊印

注释：

〔1〕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西北野战军主动撤出延安后，在四十五天时间内，接连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四千余人。五月十四日，边区军民五万余人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这是习仲勋在大会上的讲话。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目前 敌占区工作和敌军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为了配合主力军作战，彻底消灭蒋胡匪军，保卫边区，解放整个西北，敌占区工作和敌军工作，已成为我们党重要任务之一，各级党委和军队政治部必须充分的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必须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与检查，并要做出成绩。只要我们对敌占区工作进行得好，把敌军瓦解的愈多，则我们的胜利就愈有保证，胜利的时间也就会缩短。

一、敌占区工作

目前敌占区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地区：一是城镇据点及其附近，一是据点间的广大农村。前一种地区，敌驻兵防守，已进行或正进行着种种反动措施：如登记“良民”，编制保甲（有秘密保甲与公开保甲），悬赏告密，强迫自首，并以小恩小惠进行欺骗怀柔，逐渐展开其反动统治的魔掌；而反动地主流氓坏蛋及一部分叛徒，则助敌为虐，无所不至。引敌捕我干部，掘我物资，投任伪职，欺压群众，气焰甚为高涨。在后一种地区，大部都有我游击队的活动，小股敌人不敢到据

点十里以外；保甲组织大部还未建立起来，地主坏人虽已逐渐抬头，有的且已公开与敌联络，但多数还不敢公开的做坏事。这种地区，群众回去的更多。必须指出，今后敌人可能派兵“清乡”，我们的游击区在某些地带可能暂时缩小，但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和我们游击战争的开展，敌绝不可能做到面的控制；而我们对于敌人的“清乡”活动，事先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以求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上述两种地区的划分，只是大概的，特别在一些游击战争尚未很好发动起来的地区，则敌人就非常猖狂，小股敌军（甚至一个班）还敢深入到离据点几十里的农村活动；而反动分子，也就很活跃（如三边的某些地区），但敌占据点和广大乡村，敌人统治力的伸展，仍然有极大的区别。

根据上述两种地区，我们的工作应有不同的方针与布置：

在城镇据点及其附近，我们的方针主要应该是隐蔽的地下活动和合法斗争；而在广大乡村，则应以坚持游击战争为主，适当的配合以两面政策的合法斗争。

在以上方针下，各级党委应即根据西北局组织部的指示，进行敌占区党的整理与党员、干部的审查工作，把异己分子清洗出去；赤色党员和干部，原则上应一律参加当地和附近的游击队，进行敌占区党与群众的工作（公开的积极分子亦应吸收参加游击队），以单线关系和三几人的小组形式，来改编敌占区党的组织，使之适合敌占区环境和地下斗争的要求；并应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技术的教育和气节教育，防止一切可能的破坏。

在目前敌占区城镇据点及其附近的工作，主要依靠隐蔽

在原地的灰色党员和积极分子来进行的。这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可以和群众在一起办理登记，宣誓领取良民证等一套手续，以便取得合法地位、掩护工作；逃出敌占区的群众多有因生活困难，自动回去或要求回去的。实际上要群众长期不回去，是不可能的。与其让群众自动盲目的溜走，不如我们有计划的组织愿意回去的群众回去，其中并配备以少数灰色党员和不公开的积极分子，以普通群众面目出现进行地下斗争。各级党应把回家的群众看作目前开展敌占区（特别是城镇据点）工作的重要桥梁，必须对回家群众做充分的工作。

各级党委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经常布置进行如下工作：

（一）侦察敌情。

（二）监视打击坏人，分化胁从分子。

在敌占城镇据点内，应用群众的力量，采用各种方式，限制或打击坏人的行动（如用游击队名义警告，亲友劝告，或发动群众控告其贪赃枉法，奸淫、赌博、吸鸦片等）。对一般胁从者和被迫自首分子，以及一般伪保甲人员，则应晓以大义，动以利害，争取其利用业已取得之合法地位，为我方工作，将功折罪。在广大农村中，我游击队能达到者，对于坏人则应坚决打击，一般的主犯都应交付群众公审处置，胁从分子亦应给以应得的处罚，同时应进行教育。

（三）摧毁敌保甲伪组织或控制保甲，以建立两面政权。

在我游击队能达到的地区，对于敌人保甲及其他伪组织应予摧毁；城镇据点及其附近，我游击队不易打击时，可布置力量，钻进并控制敌人的保甲伪组织，对敌采取两面政策

掩护我们的工作，保护群众利益。对反动分子控制之保甲，则应以合法方式发动群众打击之，使其在群众中不能起或少起反动作用。

（四）随时揭破敌人的欺骗怀柔办法，教育群众对敌不幻想，不上当，不说实话，宣传时事，展开耳话运动，以坚定群众的胜利希望。

（五）发动秘密党员和广大群众进行敌军士兵工作，帮助他们开小差（指路、带路、化装等）。

各地委县委应对敌占区的情况和敌人的各种反动措施，随时进行研究，决定对策，指导下达工作，并向上反映。

二、敌军工作

敌军工作在目前有其特别重大的意义。

现侵入边区的敌军，大体上有下列四类：（一）胡宗南嫡系，这是敌军主力。（二）地方杂牌军，如邓、左⁽¹⁾二十二军，及宁马、青马⁽²⁾部队。（三）已为胡宗南吞并之杂牌军，如原属高桂滋之八十四旅及十二旅的一个团。（四）陕西“民众自卫队”，由陕西各县国民编成，大部分是纯洁农民，少部地痞、流氓、兵痞，担任运输扣架等夫子工作。无论其为何种敌军，应一律采取瓦解方针，应发动普遍的宣传攻势，做好俘虏工作。用一切可能的关系和方法，抓住每一个有利的时机，进行敌军工作，并利用各敌军不同的特点与矛盾，提出具体的口号，以达削弱、瓦解、分化之目的，促成敌军普遍的厌战和更多的逃跑。奖励背枪过来，争取哗变起义。

敌军内部本来矛盾就很多（如中央与杂牌、官长与士兵、

政工与军官、军校生与行伍出身者、此地人与彼地人等），士兵大部分是抓来的壮丁，现开到边区，水土不服，忍饥受饿，爬山越岭，夜晚露宿，修筑工事，疲劳害病，更遭我不断打击，士气已十分低落，再加以我区群众和我俘虏政策的影响，敌军逃亡就相当严重（如我×旅在十天中即收容敌逃兵六百余人。××独立营在短短期间即收容敌之逃兵一百余人。甚至胡系二十四旅的谍报队从西安到瓦窑堡，一路上就逃跑了一半）。俘虏兵的转变和进步更是非常的快。青化砭战斗的俘虏兵，参加我军，在羊马河战斗时，就已成为勇敢的战士，甚至担任班、排长之职。凡此皆说明我们今天进行敌军工作的客观有利条件。过去胡军在国民党区驻扎，其管理较严，我们不易接近，当时对胡军工作，是比较困难一些。但此次进入边区后，接近我区群众；再加敌军官的管理和反动教育又绝不能和平常一样的严密和经常，故一般士兵就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和影响；不仅一般士兵容易瓦解，即一般中下级军官，亦因士兵逃亡严重，困难日增，感觉前途渺茫，情绪低落，也是可以进行工作的。凡此皆说明，在今天进行胡军工作确是良好的时机。我们应紧紧的抓住这一时机，多方的进行工作。

至于像“陕西民众自卫队”，大部系纯洁农民，被敌胁迫开进边区，担任劳役，疲劳冻馁，有家归不得，且有补入正规军的顾虑，是更容易瓦解的，我们应注意进行工作。为了瓦解敌军，我们认为目前应进行如下的工作：

（一）加强对敌军的宣传。根据一般士兵的厌战情绪，各地委和旅政治部应经常印制大量的宣传品，用各种办法发到敌军中，或是张贴到敌军经过的地方。同时，我军一切部队

（包括游击队在内），应利用作战机会，对敌军进行喊话宣传；发动敌占区的群众，向敌军士兵展开耳语运动。宣传内容：着重蒋、胡专制卖国、扩大内战的罪恶，敌军必败、我军必胜的道理；我军在各战场上的胜利；被俘敌军官兵的进步言论与生活以及我不杀俘虏、优待俘虏的政策等。宣传敌军快逃脱苦海，到我区我军中来，愿回家者发给路费，愿留住者分给土地窑洞，愿革命者欢迎参加人民解放军，拖枪过来者给奖。各地委和各旅政治部并应针对各个敌军的特点与内部情形，进行具体的文字和口头的宣传。宣传品力求简短，具体，亲切，生动，易记、易带、易传。

（二）认真的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关心俘虏生活，抬运和医治伤俘，加强俘虏的教育与争取工作，反对乱搜腰包和个别损害俘虏兵的现象。

（三）利用俘虏逃兵进行敌军工作，从俘虏中（经过短期教育的）遣散一部分回去，向敌军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动员一部分表现好、转变快的俘虏逃兵进前线喊话，或给敌军中的亲友捎话带信，并利用其关系进行瓦解工作。派遣有胆识的俘虏逃兵，实行归队，或打入另部敌军，组织拖枪逃跑或小股哗变。对零星捕获之敌军掉队士兵及伙马夫等杂兵，可予以短时间的突击教育，发给路费，立即放回，令其归队，向敌军士兵进行耳语宣传（时间短，敌军官就不致怀疑）。现时敌逃兵虽多，但带枪的殊不多见，可能是怕被敌人追捕回去后枪毙，或怕我游击队、群众发生误会，致遭受危险。应针对此点进行一些具体的工作：如对带枪过来的逃兵悬赏给奖，和事先教育说服我民兵、游击队更好的保护带枪的逃兵。

为了做好俘虏逃兵工作并利用俘虏逃兵进行敌军工作，军队的政治部，应即加强，并应即时检讨，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的工作。

(四) 动员敌占区秘密党员、积极份子及广大群众，自然的结交敌军士兵，相机进行宣传与瓦解工作，如敌军官兵家在我区者，应利用其家属进行工作。

(五) 立即调查我们在敌军中口有的党员和力量，设法接头联系，藉以了解敌情，并指导其活动。有些敌军（如二十四旅及已为我消灭之一三五旅）曾在陕南俘虏了我五师的一部分战士补入他们的军队。应设法了解，进行工作，欢迎他们乘机起义，回到党的怀抱里来。

目前我们对敌军的工作，着重其下层（班、排、士兵），但对中上层军官的工作依然不要放松，过去已有联系的某些中上层统战关系，应继续进行争取，并应设法开辟新的中上层关系。

为了有系统的进行敌占区工作与敌军工作，各地委、县委应指定专人，在地委、县委的切实领导下，负责布置与推动这一工作，并即时检查督促执行情形，随时反映上来。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综合册》刊印

注释：

〔1〕 邓、左，指邓宝珊、左协中。

〔2〕 宁马、青马，指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

贺龙在绥德分区县委书记 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

同志们，这次把你们县委书记请来，已由仲勋⁽¹⁾同志传达了中央会议的精神。这个会议已开了几天，大家要我讲话，今天我讲下面几个问题。

一、战争问题

战争已打了一年零一个月了⁽²⁾。这个战争是国内解放战争，是无产阶级同地主阶级打的阶级战争。在这一年零一个月当中，我们消灭敌人一百多万（其中正规军七十几万，杂牌军三十多万，捉住敌人将官一百多）。这个胜利是空前的，是大革命时期没有过的。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一共是四百五十万人（其中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万人口，晋绥三百万），这里还有解放军官团一千多人，包括一些中将、少将。在东北、冀鲁豫的俘虏军官也很多。冀鲁豫在一月当中，干净利落地歼灭敌人九个半旅和四个师部，这在我军战史上也是没有的。在苏北七战七捷⁽³⁾，我们只有三万五千人，而敌人有几十万人。第一、二、三、四仗，我军都是三万五千人，一直到第七仗，也不过四万五千人，兵虽不多，但连打胜仗。在

陕甘宁边区，开始我们不过六个旅几万人，敌人则有几十个旅，敌人没有捉到我们一个团长，没有打死我们一个旅长，而我们则捉到和打死了他们的团长、旅长。我们胜利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毛主席讲的：小米加步枪这个“无敌将军”。小米是群众，步枪是军队。在中药中，起调和作用的是甘草，我们边区的部队只能当甘草，敌人几十个旅，我们只有几个旅，我们靠什么战胜敌人？就是靠一百五十万人民群众。敌人虽然占了我们不少地方，但我们还有一百多万人民。在青化砭战役⁽⁴⁾中，我们摆下那个口袋阵，等了两天，让敌人钻进去，再从它屁股后边打，主要依靠群众封锁消息，如果被敌人知道，他绝不会叫一个旅一个团来，那次战斗结束，敌我伤亡是二十比一。所以，有了群众，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我山东地区的部队白天不好转移，就在晚上转移，我们封锁了敌人，使其得不到我军的消息，但敌人却封锁不住我们，我们能得到敌人的消息。这就是群众的力量，群众给我们筑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群众就会不拥护我们，那么，我们在陕甘宁边区、山东、晋冀鲁豫任何解放区的战斗都不可能胜利，所以我们万万不能脱离群众。

我们对赢得战争的胜利要有信心。蒋介石虽然还有二百四十多万军队，还有飞机，但这并不可怕。飞机炸不死很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空军对德国那样的大轰炸，一出动飞机就是几百架，但德国人并没被炸死多少。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我们已消灭了他一百多万，他的正规军减少了七十多万，而我军却增加了几十万。我们部队的数量上增多了，质量上也提高了。在战争开始时，我们只有几十万部队，

打了不久就增加到二百万。我们仅打了一年，就消灭敌人一百多万，再打一年，我想再消灭他百把个旅是有把握的，那时候我军就更加强大了。比如我们东北的部队发展就很快，数量上已超过了蒋介石的部队，质量上也比他们强百倍。我军的武器装备也不比敌人的差，后勤保障也很好，据说一个战士每月能吃到十来斤肉。华东野战军的部队也很多，仅正规野战军就有九个纵队，一个炮兵纵队三个旅，他们一打起仗来就是几十万人。蒋介石有两个美械化的快速纵队被我们消灭了：一个被消灭在冀鲁豫，一个被消灭在山东⁽⁵⁾。我们用蒋介石部队的美械装备了自己，所以我华东、晋冀鲁豫部队的装备也不差于敌人。晋南陈赓的部队发展也很快。我军仅训练整顿了八个月就转入反攻，把蒋介石打得翻不过身来。现在东北地区、晋冀鲁豫地区的战争主动权已转到了我们手中。山东再打一些胜仗，主动权也就要转到我们这方面了。晋察冀的部队也不少，部队的质量高，装备也比蒋介石的漂亮，他们每个士兵都有皮衣、皮鞋穿，粮食也没有问题，战斗力强，仗打得很好，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也已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大家在延安过了好多年的和平生活，每星期还有一到两次舞会，这次敌人一打都给打掉了。我觉得这一仗打得好，它打掉了我们的和平观念，暴露出了我们内部的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使大家团结一心去消灭胡宗南。这次我从河东到河西的时候，听见好多人讲：“陈纵队⁽⁶⁾要过河了，陈纵队一来，就能把胡宗南消灭了。”把消灭胡宗南的任务完全寄托在陈纵队身上了。假如陈纵队过了河，但没有打好，那么，大家都灰心了？所以，我们应该把消灭胡宗南的任务，由自己承

担起来。大家都知道，陈纵队原来也只有几个旅，是在战争中慢慢扩大的。我们边区的几个旅，打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等几个胜仗以后，部队也比以前扩大了很多，装备也比以前好得多了。过去我们用的是掷弹筒，现在有了六〇炮；过去我们军队中没有俘虏兵，现在俘虏兵占了百分之八十。我们利用蒋介石、胡宗南训练好的兵，去打蒋介石和胡宗南。同时，我们与胡宗南经过四个月的作战，已了解了他的作战方法，积累了不少经验，今后的仗就更加好打了，对消灭胡宗南也更有信心了。我坚信，胡宗南一定会被我们消灭。所以，大家决不要把消灭胡宗南的希望寄托在陈纵队身上。如果陈纵队不过河，我们是不是就不打胡宗南，不要陕北了呢？不，我们还要消灭胡宗南，不但要陕甘宁边区，而且还要解放大西北。

陈纵队近十万人虽然还是要过河来，但它不在我们家里打，而是要打到敌人的家里去⁽⁷⁾，为的是不打烂我们自己的盆盆罐罐，不用也不吃自己的东西，而要打烂敌人的盆盆罐罐，吃他们的东西。刘伯承、邓小平带十几万军队到豫北⁽⁸⁾，我们这两支大军打出去，就会把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打破。他如果重新部署，我们就能把它的尾巴拖住，使出去的部队站住脚，这样我们就能在无定河边、大理河边、咸榆公路上到处都可以打。如胡宗南调八九个旅出去，由于它在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减少，他的“清剿”守备政策就会变化。这样，我们可以到他家里打，他有的是仓库，我们拿来吃他的粮食，我们的困难解决了，边区也发展了，我们的盆盆罐罐也保住了。

为了打破胡宗南的进攻计划，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改

变敌我力量的对比，这次我们要进行有计划的诱敌深入。再过几天，敌人可能就会漫山遍野的来，老百姓看见可能要恐慌，就是干部看见了，革命意志薄弱一点的人，有的可能会变节。所以如果敌人来了，我们要教育群众不要惊慌，有的可以撤到黄河以东去，有的到吴堡地区暂避，待我军粉碎敌人进攻后再回来。

二、搞好支援前线工作

军队在前方打天下，我们在后方应该做好支援前线的工作。我们的部队要打出去，发展边区，还要打太原、西安、宁夏、青海、兰州等城市。只有把太原打下，才能解决重工业问题。山西有很多的煤炭，太原有很厚的铁矿，把太原拿下来后，我们的工人、机器、原料都有了。我们要解放大西北，还要解放西南、两广、两湖、云贵、闽、蜀和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全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而我们现在只有一万万多人，还有三万万多人等待我们去解放，我们不是只要陕北，而是要天下，要全中国。同志们！现在这个解放战争不是今天明天可以结束的，只有把蒋介石的军队消灭了，全中国解放了，才能停止。现在，那些撤出延安的人，天天说哪一天才能回去呀！请同志们向大家讲明，哪一天消灭了进犯的胡宗南军队，哪一天就回延安。

军队负责在前方打仗，我们后方机关及群众应做好支前工作。如果前线没有粮食、衣服、手榴弹、炮弹、子弹等，怎样打仗呢？抗勤动员的人力、物力很大，除常备运输队外，警备区还临时动员毛驴八千头、担架一千五百副、粮食几万石。这样多的人力、物力，如果不能很好的支配和使用，就会造

成很大的浪费，人民也无法负担。当前我们遇到的就是物力、人力问题。再过两个月，我们就没有饭吃了，有的群众现在就已无米吃了，只能吃苦菜和糠。现在我们动员群众的人力、畜力没有计划，动员数量太多，造成了浪费。今后，一方面要把我们后方机关的人力、牲口很好组织起来，服务于野战军。另一方面，在动员群众的人力、物力时，要加强计划性，比如在一个战斗中伤亡多少，需多少担架，就动员多少，不允许浪费。不能像现在这样，你要五十副，他要七十副，班、排、连、营、机关和部队都要带路的。专署一动员，就是一千多头牲口。军队自己也到地方上随便拉牲口，造成了人力、物力很大的浪费。有的部队在一个地方拉了老百姓的牲口还没退还，到另一个地方又拉群众的牲口。这样就把群众的牲口拉完了。现在部队上报缺额也很大，有的旅上报缺六千人，而实际只缺五千人，虚报了一千人。有的部队用米换麦子，叫老百姓推面，浪费了很多粮食，有的部队把很多华达呢扯了做绑带。在双湖峪，我亲眼看见有十几包棉花堆在一个潮湿的窑洞里，如果时间长了，就会变质。从上述种种现象可以看出，我们的浪费是很大的，其中浪费的粮食就达几万石，可以供我们吃几个月。像这样的动员人力、使用物力，群众是负担不起的。如果我们不注意节省使用人力、物力，就会没有饭吃，仗就打不下去，就没有办法战胜蒋介石，没有办法消灭胡宗南。由于今年天旱，估计只能收四五成。农民才得到土地，如果加重他们的负担，生产情绪就会降低。为此，我们后方机关，第一、要发动群众参加生产，把群众组织起来纺纱、织布、做军衣。今年冬天，我们要做十三万套棉衣，十

二万双鞋子，光靠我们的被服厂没有办法完成。我们应该把家属以及后方没有事做的人都组织起来，让他们缝衣服、钉扣子、做鞋子等。总之，在后方不分男女，都要组织他们参加生产，以减轻群众负担，节省财政开支。第二、要注意节约。我们的吃粮标准、穿衣、做工作，都要向群众看齐。我们的吃粮标准要重新规定，不一定一天要吃两顿干饭，一顿稀饭。穿衣，我们公家人每年发一套棉衣、两套军衣，群众要好几年才缝一套棉衣，我们应向他们看齐，旧棉衣、旧棉鞋还能穿者，就不要领新的；帽子不必每年发一顶，两三年有一顶也够用。我们提倡个人节约，公共节约，把节约下来的东西用到前方，让战士们吃饱穿暖，多打几个漂亮仗。第三、要稳定金融。对金融问题，在同志们中有争论、有意见，我也是有意见的一个。我认为，金融问题首先要反对几个错误观点：一要反对法币观点；二要反对贸易观点；三要反对现洋观点。不反掉这几个东西，我们的财政方针就不能实现。皖南事变后，毛主席就提出把“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作为我们的财政方针。最近，毛主席又讲自力更生问题。河东⁽⁹⁾存在的金融问题是：第一现洋，第二农币，第三法币，以现洋来作预算，而对自己发行的农币，政府的经建局则不收。经建局局长不要自己的农币，这是什么思想？我们从一九四〇年起，直到一九四三年才反倒这类人，以后就用了自己的农币。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都是一百七十元农币换一块现洋，拿现洋买农币买不到，因为那时候发行农币的数量很小。现在，农币跟着法币跑，法币涨农币也涨，法币跌农币也跌，这种金融方针是为三百万人民吗？所以，河东的金融

主要是自己给搞乱了，连发行农币的机关自己也不使用农币。一九四六年，银行没有经过晋绥分局的批准，突然大量的发行农币，结果引起了金融波动，这完全是自己造成的。有些反革命、地主把土地卖了，搞小商店，搞金融投机。我们的金融一部分操纵在地主手里，一部分操纵在金融反革命手里。他们的贸易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少数人，结果好多合作社被他们搞垮了。有些地主、富农变成了商人，有少数还钻进了我们的金融机关进行破坏。

河西的金融主要是克服法币和白洋观点，否则，金融就不会稳定，边币就不能独占市场。现在我们许多同志思想上都相信法币，不相信我们的边币。有些机关专做金子、法币买卖，结果把边币搞垮了。边币发行的数目看起来很吓人，但只要五十万白洋就可以收回来了。由于金融不断的波动，过去一千元可以买到的东西，现在需几百万元、几千万元，卖东西的人拿到的钞票看起来比过去多，而实际上赔了本，这样就把群众搞光了，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要解决边区的金融问题，必须要以边币为本位币，把棉花、布及其它产品掌握在手里，群众要棉花给棉花，要布给布，这样金融就很难波动。晋察冀为维持他们的金融，开始是两块冀币⁽¹⁰⁾换一块法币，后来变为一块冀币换两块法币。他们是用党、政、军的力量，大家一齐起来维持冀币，打垮法币。他们银行的金子只买进不卖出，而陕甘宁边区是卖出不买进。晋冀鲁豫把法币收起来，秘密地运到天津、上海、北平去买金子，结果搞得敌人的金融经常波动，他们今天还在

这样做。在他们那个几千万人口的根据地中，找不到外来货，即使原来有少数外来货，现在也正在发动群众用边区的东西代替。但在陕甘宁边区就不同了，去年门户大开放，自由买卖，大量买进外货，搞得难民工厂缩小了，肥皂厂也将要倒闭了。所以，要稳定金融，就必须克服法币观点，要有正确的贸易政策。过去陕甘宁边区的贸易政策是错误的，在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使老百姓运盐亏了本，许多合作社垮台了，有八千多牲口的运输力垮台了。

河东的贸易、金融是怎样稳定下来的呢？

(1) 开了一个生产供给会议，统一了金融、贸易。党、政、军各个机关商店一律交给财政处，小公交大公，只剩下油坊、酒坊、盐店、菜园子等，但只能维持原有资本，不许把商店的资本加入，如有加入者即没收。领的经费，除油、盐外，大公家每天每人发一百五十元农币。此外吃菜自己种，吃肉自己喂猪。这样，就能使商店停止金融投机和商业投机。

(2) 清理了经济反革命。首先在临县、兴县等几个县中捉了一些，现在还在清理。如警备司令部四十七个经理中，就有一部分与不法地主和特务有关系。过去，河东在金融上打了败仗，但找不到敌人。在生产供给会议之后，才找到了经济反革命是少数地主、富农、奸商、特务分子捣乱，现在已捉了一些。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妇联生产科长，她用妇联的钱赚了三千五百元白洋。对已捉起来的那些人，他们过去拿了我们多少钱，现在要拿回来，即使不能全部拿回来，也要拿回来一部分。不但要让他们吐出钱来，有的要交当地叫群众批斗，有的应交保安处判刑，有的够枪毙条件的就要枪毙。

(3) 征收营业税。过去营业税只能收七八万块钱。这次首先在兴县开始，一个市镇就征收了好几万元。对分区，开始让征三万，他们就打电报来哇哇叫，后来他们把小商、市民发动起来，大家开会讨论，你应征多少，他应征多少，大家决定，结果有的分区征了十七万元。

(4) 斗地主。把地主一斗，他们就拿出了现洋、法币、金子、银子。

通过这样几种办法，金融就稳定了。在以前金融波动时，一万八千元农币换一块现洋。在采取了上面几种措施后，用七八千元农币就能换一块现洋，以后农币价值还要提高。

总起来看，河东、河西的商店，只有西北局的商店比较好，有一部分机关、部队的商店中存在着抽烟、赌博等坏现象，必须很好整顿。首先是整党、整政，然后整军队。党、政整好了，再整军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在我们开生产供给会议时，军队的同志讲：“我们不合法，没有钱，没有权，没有家业。”而地方的同志说：“军队人多，钱多，又有枪杆子，无法无天。”所以，只有按上面所说的办法去整顿，才能把党、政、军办的商店整顿好，把经济反革命肃清，稳定金融，保持社会秩序和群众生活的安定。

三、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我们不但要用正规军与敌人打正规战，还要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但是，现在我们有些游击队的战士，都是动员来的，由上级发给枪支、经费、衣服、粮食等等，比如延属分区已经发了两千支枪了。像这种游击队，昨天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今天把衣服一穿，枪一背，

就变成了游击队，因为他们不是在斗争中由群众自觉组织起来的，而是与群众很少联系的“官办游击队”，所以他们向老百姓要白面吃，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对这种游击队，我是反对的。我认为，在土地革命中，游击队和民兵要吸收那些敢于与敌人、地主撕破脸皮；自己拿起刀、矛、手榴弹与敌人斗争的觉悟了的群众，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扩大，这样的游击队才有用。他们可以去搞胡宗南的运输线，用敌人的武器装备、服装来装备自己，用敌人的粮食来保证自己供给。自己用不了的，就发给群众。这样，既团结发动了群众，又打击了敌人。游击队不在正面打，专门在敌人后面打他的运输线，搞他的仓库，使敌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而我们既有饭吃，又有衣穿，还能得到武器弹药。这样，我们的游击队在与敌人斗争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由游击队变成正规军。这样的游击队，是与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所以也是打不垮的。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民兵和自卫队，我们党还必须派干部和民兵打成一片，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慢慢的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开始用民间的旧式武器，然后再用步枪、手榴弹、地雷装备他们，很好进行训练，特别是教会他们如何搞地雷战。河西的地雷不少，但没有埋好。要使游击队和民兵学会地雷战，要有战术眼光。比如地雷埋在什么地方，哪里是敌人必经之地，在哪里埋雷？怎样不使敌人发现？如何使他一踩上就跑不了？把敌人搞得草木皆兵。为此，我们要到河东调一批有经验的民兵来，帮助河西开训练班，并带着河西的民兵打仗，这样搞起来的民兵就和老虎一样。民兵组织起来后，要带头搞好生产，带头搞坚壁清野，带

头打仗，他们能把敌人搞得日夜不得安宁。东社民兵只有几支枪，晚上把地雷一直埋到敌人碉堡门前，由枪法好的民兵用枪瞄着敌人的碉堡门，打得敌人抬不起头，两个星期就把敌人挤跑了。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和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对正规军有很大的帮助。晋西北曾经缩小到只有七十万人口，以后搞武工队，发动民兵搞地雷战，把敌人挤出去，根据地又扩大到二百万人口。太行也曾只有六十万人口，后来他们组织民兵、自卫队，开展自卫战，把敌人挤出去，发展到了三千万人口。光晋冀鲁豫民兵背的枪就有二十万支。冀东民兵的步枪、机枪、炮都是新的。每一个根据地民兵、自卫队都有不少的枪，陕甘宁边区民兵的枪也不少，只要使敌人吃不上，穿不上，就是对正规军最好的配合。

我们在对敌斗争中，要提倡气节，反对投降。这次胡宗南向我们边区进攻时，三边、陇东都有不少人向敌人投降和叛变自首。一个人活一百岁总要死，今天死或明天死，反正都是要死，但死的意义不同。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表现在战场与法场上。在战场上，要勇敢杀敌，拼一个你死我活。在法场上，要杀要斩听便，在临死前的几秒钟还要喊“共产党万岁！”这才是我们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但是，三边、陇东却有这样一批党员，有的是很早跑出去了，敌人来后，号召共产党员自首，他们又跑回来，便争先恐后的去自首，办理自首手续。像这些共产党员完全失掉了党员的气节。我们有像弼时同志那样的很多党的领袖，在法庭上同敌人英勇斗争，无论敌人用什么酷刑，他们连一句口供都没有。敌人对弼时同志用了电刑，他还是没有一句口供。毛主席讲：“我们

这一辈子打不倒蒋介石，由儿子接着打。”我们反对投降主义，为此，不仅要教育党员保持革命气节，而且要教育群众也要有革命气节。我们反对逃跑主义，当敌人来到时，我们就要发动群众和敌人斗争，斗争的办法，就是毛主席早在中央苏区就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个字。

关于扩兵问题，据几个县的报告，采用了三个办法：第一是党员干部带头，第二是个人号召，第三是党员、干部都参军，使群众也不得不参军。我认为，这种扩军办法，不是真正的走群众路线，没有把全体男女老幼发动起来，没有从政治上激发起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所以虽然扩了三千名新兵，但是不能把他们编散，一编散就要开小差。而山东一个命令就有十几万人参军。为什么这样容易呢？就是因为他们家中都得到了土地。所以，扩大军队一定要做好阶级教育，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解决好军属的土地与生产问题。

四、关于晋绥与陕甘宁边区的统一问题（略）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贺龙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1〕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2〕指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以来，到一九四七年八月共一年零一个月。

〔3〕七战七捷，即苏中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十八个团共三万余人，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的一个半月内，在泰兴、

如皋、海安、邵伯一带，连续作战七次，均获得胜利，歼敌六个旅五个交警大队，共五万余人。

- 〔4〕青化砭战役，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新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七团等部，在陕北青化砭地区以伏击的形式，歼敌整编第三十一旅近三千人。
- 〔5〕指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在豫北地区被歼灭的第一快速纵队和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日在鲁南地区被歼灭的第一快速纵队。
- 〔6〕陈纵队，即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简称“陈纵队”或“陈谢纵队”。
- 〔7〕指中共中央决定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西渡黄河去陕北作战，后因形势发生变化，中央又决定陈谢大军挺进豫西，打到蒋管区去，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粟裕大军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
- 〔8〕指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在鲁西强渡黄河，八月七日开始挺进大别山，从而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 〔9〕河东，指黄河以东的晋绥地区。
- 〔10〕冀币，指晋察冀边区政府发行的货币。

中共中央对西北野战军前委 《关于在蒋管区作战中几个 问题的决定》的批示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

彭⁽¹⁾：

(一)同意你们所拟在蒋管区作战中几个问题的决定，同时将邯郸局开展新区工作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决定摘告你们参考，望一并发下讨论。

(二)这次进到蒋区作战，须特别注意部队群众纪律问题，望在出去前利用休息时间，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部队中进行一次普遍的教育。

中 央
九月一日

附：

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关于 在蒋管区作战中几个问题的决定

（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自我军歼灭三十六师后，西北人民爱国自卫战争业已开展〔始〕进入反攻阶段。本野战军即将出蒋管区去作战。为了战胜敌人解放西北，前委对蒋管区消灭敌人中几个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筹措粮秣资财，除战场缴获外，采用接收、没收、征发、借募四种办法：

（甲）接收官办之工厂、仓库、堆栈、公司、商店、银行及税收、交通、卫生等机关全部资财。

（乙）没收战争罪犯、官僚资本、贪官污吏、反动头子、恶霸全部财产。

（丙）对豪绅地主及群众痛恨之高利贷者，采用征发诉苦向其征用粮草、棉布、车马、现金等物，发动群众彻底与之清算。

（丁）在财粮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可酌情向一般的财主进

行借募，但以不引起一般工商业家恐慌为原则。无论没收与征收之财物，必须至少抽出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粮食、衣物等，分给当地贫苦群众。进行以上工作，必须经旅以上党委讨论决定，交政委、主任执行；进城时由前委指定专人组织委员会执行之。

（二）锄奸问题，根据严肃谨慎原则，由部队保卫部逮捕职业特务、反动分子及罪大恶极之叛徒恶霸。逮捕与处决人犯，如非紧急情况，应经旅以上党委会议讨论决定，交政治部执行；恶霸应交当地群众公审处理。对于普通国民党员，应与其反动头子、职业特务分别对待，可用各种妥善办法公开其面目，侦察其行动，改造其思想，如无反革命活动不得逮捕。至于一般民主人士、普通职员、文教人员、青年学生，均应争取团结不得留难。

（三）建立政权问题，对保甲机构原则上应彻底摧毁，建立新的民主政权；但若新的政权尚未建立，暂时可利用保甲与某些人员；如有条件时，应积极建立各级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民主政权，吸收贫雇中农及其他民主人士参加工作，并在农村中组织秘密贫农团体作为临时民主政权之骨干。

（四）对地方武装问题，鉴于陕西蒋管区地方中间分子（西北军退役军人）及民间武装问题，故对于地主恶霸反动分子掌握之保警队、自卫队、游击队及其他名义之反动武装，应予彻底歼灭外，对于一般中间分子掌握之自卫队及非法武装，如无反共行为应争取之与我合作反胡^[2]，并采取各种妥善办法逐渐改造之。真正掌握在群众手中的民间枪支，可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由当地群众领袖或派可靠干部，组织游击队，开

展蒋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但须严格审查其成份，防止枪支落到坏人手中。

(五) 建立地方党问题，在没有地方秘密党的地区，各级政治机关、民运部及工作队，应负责在发动群众斗争过程中，个别的、慎重的发展地方秘密党员（着重贫雇农），建立精干有力的地方党的组织。等部队转移时，转交附近分区和党的领导机关接收，并与其他秘密党组织分开管理。

(六) 发动群众问题，上述各项工作均须与发动群众密切联系并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去进行，故凡我军所到之处不论时间久暂，均应认真进行群众工作，宣传我党我军政策主张，严格注意群众纪律。根据当时当地情况，发动群众诉苦、清算、分粮、分地、检举特务、支援战争，在群众自愿原则下（不强迫），领导群众平毁碉堡工事。大量吸收青年农民知识分子、专门人才参加我军。

前委此草稿请审阅电示，在时间许可时，拟开一次扩大会专门讨论。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刊印

注释：

[1] 彭，即彭德怀。

[2] 胡，即胡宗南。

西北野战军独立第一旅政治部 关于阶级教育经验总结⁽¹⁾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们部队的三查⁽²⁾运动，是从解决剥削关系问题开始。经过诉苦，进行三查，最后审查党员征收新党员而告一段落。机关干部则是从检查领导，检查工作与三查结合起来进行。

几天的教育结果，经过了班、排、连、营以至六个连的军人大会的争论，大部分连队已经解决了剥削关系问题，开始进入了回忆诉苦运动，小部分连队关于剥削问题的争论也即将解决，机关干部则是小部分已经开始了典型斗争，大部分仍还是开始暴露的阶段，在这一工作过程中据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部分材料，已获得如下的经验：

一、运动是采取了不同形式开始的，有的单位是在讲解了土地法大纲以后，座谈开始的，有的是从本单位发生的对土改不同看法开始的，有的是直接出讨论题“穷人为甚么穷？富人为甚么富？”开始的，更有的则是在驻地看到了穷人富人不同的生活，讨论“为甚么穷人吃糠，老财吃大烟？”开始的。事实证明以上几种方法都是成功的。有的单位（如二团二营，三团二连）则是开始上课，副政教、副政指讲“阶级的来

源”与“阶级划分”，讨论时，领导上又不注意启发诱导，瞎子摸鱼，结果是空在名词上打圈子，浪费了时间，思想展不开，问题弄不清，走了弯路。也有的先上课讲清“富人是剥削穷人富的，穷人是受地主老财剥削穷的”的道理以后，再让大家讨论（三团三连），都说是地主老财剥削人，接着便诉起苦来，这种诉苦发现了很多不真实的，看不出谁是真正受过苦，谁是地主立场的人。

二、在漫谈座谈当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甚至很多的封建迷信流传下来的玄话、鬼话及地主立场反革命的论调，如有的说，地主不剥削人，地主有良心，地主命好，穷人是命不好，穷人剥削老财，八路军剥削国民党，八路军是土匪等等。这时领导上一定不要怕空气不好，也不要怕解决不了，事实已经证明那些玄话、鬼话以及地主老财、反革命理论，都不是真理，他毫无物质基础，最经不起追问，一问就垮，更经不起劳动人民切身经历事实的回击。只要领导上坚持发动群众发展争论有啥说啥的群众路线的原则，不管你是甚么人，觉悟了的基本群众是敢于为真理而奋斗的，他们追问的非常有劲，他们也最能讲道理，比干部的道理深刻好多倍，而经过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以后，问题才终归胜利解决（二团一营经过班、排会三天，连大会一大半，全营大会两整天的争论，一团九连时间较少，也用了班排会两天、连大会三天。凡争论热烈的单位，饭也不吃，冷也不觉，非把问题闹清不干）。三团八连的第×班，在讨论当中，谁发言对，班长马上表扬“某人正确”，“某人进步了”，结果大家都说好听的了，真正的坏思想便不讲了。二团二营机炮连，副连长

每天作结论讲话，后来便没争论了，经验证明没有争论就是问题没有解决。

三、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了下列几种方法和内容：

（一）多讲事实，尤其是提倡讲切身经验，主张正面意见的人尤其是贫苦农民一讲就是诉苦，这种被剥削的实际最感动人。而主张反面的人，往往是言语支离，甚而讲些玄话、鬼话，这种歪道理最怕追问，一追问就垮。如有的说，老财是会计划。一追问，是会计划剥削穷人。有的说，老财是命好，铁条变成了金条。一追问，他说，原来是金条生了锈像铁的。再一追问，金子不会生锈，他只好承认是说谎话了。有的说，祖父作清官，人家送给一驮银子发了财不是剥削。一追问，穷人会不会送这多银子？不会的，老财送给的，为甚么老财会送给？结果是替老财办了好事，又追替老财办了什么好事？一直追到底。等等，这样例子很多。开始为了暴露，曾禁止当面追问，后来发展起来了，你不要他追，都不行了，一直逼得下不来台。这样，你一句，我一句，没有追不垮的歪道理。解放区翻身农民的切身经历，是解决命运观点的有力内容，“过去我吃糠受苦，一天挣不了半碗米。革命后，分了二十垧地，一头耕牛，生活有了保障。从前是我，现在也是我，这是命吗？”一问的没话说。对劳动可以起家的观点（如有的说，老财是劳动来的，他讲出了例子），也追问他，怎样劳动，怎样起的家？什么时候雇了人？雇了长工是不是剥削人？详细一追，结果，虽然是劳动人民出身，但是他一成地主，他就变成了剥削人的人。

（二）对当长工、放羊、学徒等，是不是被剥削的问题，

则是用算帐的办法，先弄清某个老财种多少地？自己参加劳动不？参加几个人？雇几个长工？每年收多少粮？平均每个劳动力收多少粮？再减去每人的工资、伙食、种子、肥料、农具等，还平均每个劳动力得多少粮？再与所实得工资相比较，多余的粮，便是地主所不劳而获，也就是剥削。这时会有人说：“地主出地，应该多得”，但又有人会问：“地主的地，没有受苦人去劳动，看他长不长庄稼？地主离了受苦的人，饿也饿死他狗日的”。有的单位，战士们不懂得剥削二字的意义，战士们说：“反正是穷人吃亏”，这样更容易使战士们接受。

（三）诉苦是最有力的内容。一团九连战士卢维成，三辈子长工（米脂人），讨论几天剥削关系，他总是糊里糊涂，“反正是自己命不好”，后来，该连又连续的发展了两天的诉苦，他醒悟了，诉起了他三辈子的苦处，并且还是积极提意见。在全连挤地主思想的一团二营全营大会上，战士的诉苦，都是全场寂然，半数以上的人泣不成声。三团一连大会上，争论剥削关系时，某战士诉起苦来，诉到卖姐姐、母亲自杀的时候，自己大哭了起来，全场也跟着大哭，诉苦激起了所有贫苦人民的仇恨。而诉苦（挖穷根）又与打倒蒋介石（挖蒋根）紧密的结合了起来。在大会上，战士们自动的喊出：“打倒蒋介石”、“土地回老家”等口号（一团九连）。

（四）地主出身的同志，在大会上，控诉自己家庭如何剥削人的罪恶行为，也成为运动中的教育内容之一。二团一营，全营争论剥削问题的大会上，某同志讲了自己地主家庭如何剥削一家中农，一直使这个中农破产的详细事实，都是相当动人的实际。

总之，以上几种主要方法，都是在整个运动中，贯串着联结着的。不是单单采用某一种方法，可以把问题解决的比较圆满的。今天这一剥削关系解决到什么程度呢？二团二连大会以后，各班又开会“复查”了一下，原来主张反面意见的共二十二人，在会议上，都表示了放弃自己原来意见。回到班里，战士们又追问，“你到底怎样转变的？”结果，还有四个人讲不出什么道理来。从此可以看出，今后不断的阶级教育，仍然是如何的重要了。

四、在各单位的大会争论中，争论越发展，坏分子的典型人物则越加明显的暴露在群众面前。多数是在斗倒这个典型坏分子的胜利声中，结束了大会。如二团一营六个连的大会，斗倒了恶霸出身的×××（战士）。该团三营开大会，斗倒了地主恶霸流氓×××（排长）。一团二营大会，一次斗倒了地主出身的×××（战士），再次斗倒了恶霸出身的部队中也是恶霸的×××（副排长）。三团一连斗倒了地主破坏分子×××（战士）。旅直卫生部，则正在斗争地主出身部队恶霸分子×××（医务科长）等。在这些斗争中，更加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明确了阶级立场，教育了群众，对今后三查运动在群众中作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准备。但也有的单位，当坏分子还在群众面前张牙舞爪发威而群众已开始向他反击的时候，领导上表示了犹犹豫豫、畏首畏尾，没有站稳坚定的立场，向坏蛋分子投降，宣布停止了大会（如二团三营）。散会以后，坏分子侯玉才继续活动，而营领导则麻木不仁，未作工作，也未发动斗争。后经团坚决纠正，又费了时间，又多做了工作，才在两个营的军人大会上以两天的斗争，斗倒了

这个恶霸流氓分子。这个经验说明，领导上必须站稳立场，坚持一切由群众处理的方针。否则，是打击群众、阻挠群众运动的开展。而实质上，则又是给坏蛋分子作了掩护。二团一营斗争×××，全场要求捆起来。而领导上反倒向群众讲情，不捆，交保释放，也是错误的。

五、运动中的核心组织，是逐渐形成的。群众中，一有了争论，便很自然的分成两派，或者三派，各派的人也很自然靠拢到一起了。在争论中，各派之中的人物，常是变换的。有的是开始说富人剥削穷人的，但后来听了有人说是命运，而又转到命运那边去的。有的开始站到正面，而在讨论中，又发现他一满是反面理论而又被清出去，变到反面那边去的。也有的在争论中放弃了反面理论，而投降（战士们叫投降）正面来的，也有的变动几次的（三团八连争论中，有十几个人，两边摇摆，都是中农以上的成份）。但最后，便可以看到谁是反面中的领导人物，而谁是正面中最有立场最明确最坚定斗争最勇敢贫苦出身的人物，也便最受到群众的拥护。这样，便很自然的形成了核心。而这种领袖人物，往往是领导上所预先不知道的。或者是以前老老实实，不爱说话的人，而在这斗争中，而成为最好，最突出的积极骨干（一团二营的李树仁等）。而领导上所认为的积极分子，则又往往是不可靠的，投机取巧的分子（如二团二营黄品清等）。这当然说明了我们过去工作中的阶级路线不明确与工作不深入。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只有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骨干，才是真正的骨干，而我们所要的核心骨干，就是这种真正的骨干。三团八连，一开始便公开提出组织“农民委员会”来评判争论的问题，这种

作法是不妥当的，结果是失败了。

附记：因材料有限，了解的还不够全面。尽就所知，提供以上数点，以作参考。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 这个总结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很好”。下发到各部队。
- (2) 三查，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1〕}

彭德怀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

一、九个月作战的一般总结

边区经过九个月的战争，部队争取了两个月休整。从消灭三十六师后，基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我们是怎样打胜敌人的？全边区一百五十万人口，到后来敌人将全部县城占去，只剩下约二十万人口了，养活这样多的军队，还解决了棉被棉衣（比胡宗南^{〔2〕}解决得早），没有饿死人（虽然生活很苦）。这是由于人民的积极拥护，指战员的英勇，前后方同志的努力，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

当敌人进攻延安时，是六个整编师，另一个旅。最高时期是三四个旅，二十余万人。而我野战军起初是二万一二千人。与敌人野战军为十比一，敌地方军与我地方军也是十比一。装备物资情况，当时我教导旅平均每支枪二十五至五十发子弹，三千多人。新四旅平均每支枪一二十发子弹，三千多人。二纵队开始二千二百人，后来到八千人，是一个主力，平均子弹三十发。一纵队就没有几颗子弹，只有手榴弹。部队的训练也比敌人差。至现在，我们部队将近壮大了两倍，

共六万一千人。

敌人进攻延安，我军在延安以南抗击了五天，一纵队将敌人主力引向安塞、高桥方向，使敌发生错觉。果然，敌人以为我们在安塞、保安方向，集中五个旅向安塞扑了一个大空。而我主力则在青化砭，后将一纵队亦调到青化砭，一仗消灭了敌三十一旅旅部及一个团，得了俘虏补充，缴子弹三十几万发。当三十一旅进入我埋伏圈时，仅离我军阵地千把米，但他不知道，因为没有群众向他报告。打了三十一旅，敌知道了我们在东面，便将主力从安塞转向东，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东，乃扑向延川、延长，又扑了空。于是以为我们在清涧地区，又向清涧扑了一空。又以为我们在瓦窑堡、永坪地区，再次扑了空。而我们实际在蟠龙附近地区。当敌由瓦窑堡转至永坪，这时我们想消灭十二旅及刘戡总部，因为我们太急躁，故未打好。稍后，敌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南下，我们埋伏在羊马河（离瓦窑堡三十余里），一仗将其全歼。此一胜利提高了大家的胜利信心。有人向我说：“开始时说边区能打败敌人取得胜利，我不相信。羊马河一仗，我相信胜利是可能的了”。

此后敌人又以为我们向东转了，故以九个半旅赶到绥德，想把我们撵到黄河以东。就在此时，我们又打了蟠龙一次胜仗，歼敌正规军地方军共七千余人，解决了大问题，单衣、子弹、粮食都得了补充。为什么敌人总不知道我们的位置呢？这是群众问题。

打了蟠龙后休息了十三天，即打陇东。这里上下都犯了轻敌的错误。三路分兵，合水一仗我们伤亡一二千，三五九

旅旅长负伤，打了一个消耗仗。环县战斗消灭了八十一师，缴获了六十万发子弹（这仅据已报告材料，大部还埋伏着）。此时敌人估计我们要出关中，结果我们打三边，⁽³⁾没有打到马家正规军。八月便打榆林，目的在将敌人拖到北面，以便陈赓⁽⁴⁾出兵黄河以南，打到秦川（可惜他停止于洛阳、潼关之间而未及时打到西安附近。若打到了潼关以西，则胡军从北面向南增援都来不及。后来迟了，胡宗南都部署好了）。敌人主力此时均集中于无定河沿岸，捉到我们掉队的伤员一问，都说我们到了河东。到八月二十日沙家店歼灭了三十六师。接着追击，岔口一仗，开始以为敌人只有一个旅，结果越打越多，打出来五个旅。二纵队又想一口吞，生怕敌人跑了，把敌人出路一堵，结果啃不动，只好放开一个缺口，让他跑掉。如果此次实行各个击破，则刘戡、董钊⁽⁵⁾都可能活捉。

十月打了清涧后应该休整南下，但犯了一个错误，去打榆林。这时我们估计：马军不会怎样积极增援，胡军来不及；以后又没有什么机会来打；打开了又可以得很多东西。这样一想，便以为大概可如意而得。但事情往往不如你所算（此时二纵队不应撤到河东，如果二纵也参加，则此次马军亦可全部消灭）。大军在沙漠地区，饭没得吃，下面叫苦，于是就只好下决心。但是在战术上说，两次榆林也都可打开。打了清涧后，有群众问我们，他说：“你们为什么北上打榆林，不去打延安呢？”这是群众的远见。

二、经过这几个月作战的几点认识

（一）指挥者对敌、我、民情及地形要熟悉。了解敌人的一般情形是容易的，了解其具体情形就不容易。了解我情也

是一样。敌情、我情、地形是下决心的根据，如果不了解这些，就根据任务来下决心。譬如佯攻，是要使敌人迷惑，以为我是真攻，但是我们的部队不了解，常常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这就明明告诉敌人，你是在佯攻。这就不会完成任务。

（二）要善于根据敌人之企图来诱惑敌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譬如敌人是希望我们过河东的，我们就将敌人引到榆林、米脂，以便陈赓出击。并在敌迷惑之中歼灭敌人。

（三）要善于各个击破敌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不要想一口吞。我们善于战役上的包围，而不善于战术上的包围，元大滩的经验就是如此。

（四）兵不要太大（就是说相当的大就可），只要齐心（榆林战役一个团长不齐心就没有打开）；要练得好，用得法。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出版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 〔1〕 本文是彭德怀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 〔3〕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 〔4〕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 〔5〕 刘戡、董钊，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和整编第一军军长。

毛泽东在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 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

同志们：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向中央会议作的那个报告^{〔1〕}里，曾经这样说过：“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可能呢？今天我就讲讲这个问题。

革命要不要胜利？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在我们共产党开始组织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存在。到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和蒋介石合作北伐，那时要不要胜利这个问题发生了。但是，那时犯了错误，共产党还幼稚，党的领导上有投降主义，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迁就国民党，投降农村的地主、富农、土豪劣绅和城市的大资产阶级，特别是不要军队，这就丧失了夺取胜利的可能性。后来实行土地革命，跟国民党打了十年。开始我们是游击队，很小，只能消灭敌人几个团，搞几个县。那时在几个县胜利的问题是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但全国胜利还比较渺茫。抗日战争的时候，

我们提出争取全国胜利，提出经过持久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组织人民大众的力量把它打倒。日本投降以后，新的问题就来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内战。蒋介石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他要打内战还会慢一点，美帝国主义一积极支持，内战很快就打起来了。北伐是内战，土地革命战争也是内战，抗日战争胜利后打蒋介石又是内战，来了三次革命的内战。现在的内战跟前两次不同。北伐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封建势力，结果蒋介石夺取了胜利果实，失败的是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挫折，来了一个长征。前两次内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的斗争比较孤立，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非常孤立。抗日战争本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现在的内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革命胜利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了。在座的大多数同志，经历过从大革命到今天的四个革命时期，大家想一想，在这四个时期中，哪一个时期对于胜利的前途看得最清楚？那就是现在这个时期。

现在，要不要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过去，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土地革命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但也没有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这次是不是能胜利？现在这个问题还存在着，有些人对消灭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心还没有下。但是，我们领导机关，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我们的高级干部，大多数的党员，对这个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我在去年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中曾说要经过长

期的战争，现在看来，战胜敌人的时间不会太长了。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去年三月以前，我们说能够胜利，是根据其他解放区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经验，那时我们陕甘宁边区还没有打起来，胡宗南⁽²⁾还没有进攻陕北。现在，全国的解放战争已经打了十八个月，陕甘宁边区也打了十个月，消灭了那么多的敌军，我们能打胜这一点，便看得更清楚了。第一年我们平均每月消灭敌人正规军八个旅，第二年前半年的战绩增加到平均每月消灭九个旅，以我们至少平均每月消灭八个旅来计算，一年可以消灭敌人正规军九十六个旅。敌人这些被消灭的部队第一次打垮了可以补充，第二次打垮了还可以补充，第三次第四次就不好补充了。我们将敌人总是这么消灭下去，打个三四年就差不多了，胜利的把握很大。同志们回去后，要向未到会的同志讲清楚为什么这一次比过去那三次胜利的把握大，因为现在这个时期跟过去那三个时期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情况不同，人民解放军的情况跟红军也不同。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还不是这一点。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为什么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和以后各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至于具体纲领，解放军宣言讲了八条⁽³⁾，我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又讲了八条⁽⁴⁾，彭副司令的报告讲了九条⁽⁵⁾，但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没有打倒，社会主义没有到来以前，总的纲领就只能是这一条，没有第二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

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我们讲能够胜利，就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现在有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人民解放军身上。最近看到外面的报刊如《观察》杂志上有文章这样说：“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心中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6]傅斯年^[7]到过延安，他骂宋子文^[8]，在文章中说：世界上出了怪事，哪有资本家拥护共产党？硬是宋子文搞的。宋子文是封建买办阶级的一个代表。去年春天有个人写文章，说：现在全国人民对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秋天这个人又写文章，说蒋介石和中国现政府业已失去民心，如在太阳底下的影子。周副主席^[9]到上海，很多资本家请他吃饭。我们丢了张家口，有资本家掉了眼泪，共产党的张家口竟然跟资本家的眼泪发生了关系。对这些资本家，还有像西安大华纱厂的资本家，我们把他们放在中产阶级范围内，要跟他们合作。他们跟帝国主义联系很少或者没有联系，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区别，并且受着官僚资本的压迫，现在中间阶层有许多人找不到出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内战打了一年半，蒋介石已完全陷入孤立，这是在抗战以前、抗战中间甚至抗战胜利后一个时期内都没有过的事情。那末，蒋介石的孤立是不是等于我们的胜利？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要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了？我看不能这样讲。

蒋介石孤立，是因为他代表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压迫人民的。有人说共产党是蒋介石逼出来的，“消灭了一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十个共产党；消灭了十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一百个共产党”，结果弄得人人离心，个个厌恶，共产党越来越大。这是一方面的真理。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真理，就是我们政策的正确。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我们的俘虏政策完全成功。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士兵，一个不杀，其中大部分可以参加我们的部队，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国民党军官，经过改造可以为我们所用。蒋介石搞关门主义，我们放回去的国民党军官他也不敢用。我们比他胆大，对他的军官，一部分大胆地用，大部分放回去。放的时候和他订个条件，要他出去做工作，只要做一点工作，对我们就有帮助。比如打宜川时，有个被俘的军官在广播中对国民党军讲话，说他可以“保证缴枪不杀”。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很注意听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广播威信大得很。可见，俘虏政策很重要。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为什么要消灭地主阶级？因为它代表的是反动的生产关系。政治上打倒蒋介石，目的就是为着在经济上摧毁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

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在农村就是解放农民，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平分土地，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使农民放心大胆好好生产，改进农作方法。在城市，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要收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在法律上的名称就叫所有权。对于私有权，先破坏一部分，即破坏地主阶级的私有权变成农民的私有权，破坏四大家族的私有权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但废除地主阶级的私有权，并不等于连他的人也不要了。地主和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全国共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社会的劳动力，是一种财富。我们分一份土地、财产给他，让他参加生产劳动，他能抬担架，能生产粮食，还能缴公粮，对国家有利。至于选举权，农民在几年之内是不愿意给他的，那末是不是永世不给了？不是的，开始先不给，过些年后经过劳动改造变成了农民就可以给了。现在工业不发达，将来工业发达了，工人从哪里来？还不是从农村来。农村劳动力多了抽到城市做工，要有几百万人到城市去。三千六百万人改造后是很大的一批劳动力，快等于一个小国家的人口了。我们对封建剥削要非常恨，但地主本人还是劳动力，经过改造过几年还有选举权。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会出乱了，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地主有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之分，还有反动的和开明的之分，我们应当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打人杀人的问题，这里也讲一下。我们共产党不主张打人，人长两只手是用来做工的，不是打人的。打人是封建野蛮的行为。丈夫打老婆，工头打工人，教员打学生，官长打士兵，上级军官打下级军官，都是野蛮的做法。农村里斗地

主，打人也是不好的，不要提倡。在斗地主的时候，农民气愤得很，上去打他一下，我们如果马上出来说“你不能打人”，这会给群众泼冷水。群众气愤时打了一下不要紧，但我们不提倡打人。这样说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我们的口号叫废除肉刑，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也要有灵活性。比如，破除迷信是我们的原则，但是陕北现在还经常有庙会，很多人去参加庙会，我们的秧歌队也去。群众迷信神灵，我们不能强迫群众不迷信。还有陕北政策规定废除买卖婚姻，但是现在买卖婚姻还很多。这些都需要逐步地来改造。

杀人是越少越好。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杀。解放军宣言上讲对于蒋方人员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第一是首恶者必办，要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第二是胁从者不问；第三是准许将功折罪；第四是立功者受奖。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样，要杀的人就少了。反革命特务也不用杀那样多。杀几个特务人家就不再搞特务了？他还是要搞。我们来个以毒攻毒，使这些国民党训练了多年的“技术”人员为我所用。你过去整了共产党，今天你要帮我做事，把蒋介石打垮了，就算将功折罪。这次把王实味杀了大为可惜，他是一个坏人⁽¹⁹⁾，但他还会写文章。那末是不是一个不杀？一个不杀不能当作法律方针。那些罪大恶极的、群众非常痛恨的可以杀。至于一般地主、富农分子，俘虏军官，则另行处置。现在八万俘虏军官，二百万俘虏士兵，我们杀他一个没有？没有杀一个。八万军官造反没有？没有造反。妨碍了革命战争没有？没有妨碍。相反，对我们还有帮助。对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如学生、教员、律师、医生、工程师等要慎重对待。这些人过去给资产阶级

服务，现在受革命运动影响，经过教育，可以给我们做事。我们这样做了，胜利就有了保障；如果不这样做，即没有把全民族绝大多数人都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胜利就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全国胜利以后怎么办？那时还要不要统一战线？是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下一个命令不要统一战线了？不是的，那时的问题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能巩固。

同志们，我们去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个是打仗，一个是整训，后方工作也搞得好。河东河西统一起来了^[11]，大家有把握打胜仗，前方缴获了很多东西，后方接济了充足的粮食和炮弹。这些使我们很满意，中央开会^[12]，对全国各解放区作战成绩估计了一下，已消灭敌人一百六十几万，包括你们的胜利在内。对西北野战军来说，后方的确出力很大。经费问题曾经非常困难。在去年八月半时就说镇川堡以北没有粮食了，想去胡宗南那里“借粮”，结果我们并没有去“借”，而是贺龙^[13]同志搞来五万石粮食，从八月半一直吃到十二月，军队总是有粮吃。总的说来，在彭德怀、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共产党有了军队，有了政权，困难就可以解决。现在要打到外线去，你们可以对后方工作放心，对前方领导放心，中央也放心，这主要是由于有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的领导，有前委的领导。你们这么多干部有这个信心，不管地主怎么造反，我们都不怕。

你们部队经过两个月整训，从农民那里学会了诉苦运动，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如果我们两百万军队都通过诉苦

运动团结起来，就没有打不败蒋介石的道理。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依靠贫雇农，紧紧地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中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不杀俘虏官兵，这个天下我们就可以得到。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有了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是很硬的道理。

那末，我们是不是可以轻视敌人呢？不能。我在那个报告中讲了，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它的强大是表面的、暂时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样地援助蒋介石。对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总的方面我们应该轻视他们，但对具体的敌人就不能轻视，如果轻视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原则性有两个，对总的敌人我们是轻视的，对具体的敌人不能轻视。我记得我在红大⁽¹⁾讲过这个道理。当时有个同志说：“你讲了这么多道理，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来，没有那么多道理，就是一冲。”我跟这个同志讲，你有你的道理，你的一“冲”是对的，但是，你只有一“冲”就不对了，要再加一“冲”，变成两“冲”。勇敢是一“冲”，智谋又是一“冲”，有勇无谋只是一“冲”，智勇双全才是两“冲”。现在再举例来说，消灭地主阶级是一“冲”，给地主个人分地又是一“冲”。打倒国民党是一“冲”，对国民党的职员不能打倒又是一“冲”。战略上我们必须轻视敌人，这是一“冲”。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他们矛盾很多，问题很多。美国有危机，在外部苏联反对它，在内部人民反对它。蒋介石那里人心不齐，军心不齐。美国援助蒋介石我们不怕，胡宗南有二十万人我们不怕。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不能轻敌，这又是一“冲”。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战斗中要一个阵地

一个阵地地夺取。总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这次前委扩大会的决议^[5]很好，但要准备将来会修改。前年的《五四指示》，我们去年九月做了修改，提出平分土地的政策^[6]。前年要提出平分土地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那时还不能下决心平分土地。从实际情况看，那时不下决心去年九月下决心比较好。西安事变时我们放了蒋介石，现在又提出打倒蒋介石，这不但不矛盾，而且只有这样做才不致脱离群众。那时对蒋介石一定要放，不放，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我们放了他，先打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结果我们扩大了解放区，壮了解放军，然后进到平分土地。日寇投降前两年，太行地区有的地方分了地，他们打来电报问要不要纠正？我们告诉他们，人家分了就分了，不要纠正。那时部分地区可以分地，但不能当作全国的政策来实行。抗日时期我们跟蒋介石合作，实行减租减息，这回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相比，是不是退了一步？是退了一步。抗战胜利后我们仍然退了一步。退一步的目的是什么？是准备前进。为什么我们退出延安？退出延安是准备打到西安。退一步，进两步、三步。在我们思想中、工作中，退一步的政策是主动采取的。在抗战开始时退一步，不是承认蒋介石不应该打倒，土地不应该分，而是因为日本打进中国来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错误。现在要平分土地是正确的，农民有这个要求，但是同志们要注意纠正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如果我们思想中、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要随时准备修正，这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理要坚持，有时真理不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和了解，我们也要反“潮流”。不论是错误是缺点，

哪怕是很小的，我们都要准备修正。

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的机会。党校闲话很多，我们让他讲，这叫合法的闲话（军队里叫作怪话）。闲话有两种，一种是好人讲的，一种是坏人讲的。如果是好人讲的，说明你这个领导在工作上很可能有问题。我们讲党要听闲话就是这个道理，注意收集不同的意见。意见一致了就不会发生不团结现象，不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意见而又得不到解决。我们需要像拣破铜烂铁一样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经过熔化，准备修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错误。过去有个同志犯了严重错误，听见隔壁房子里有人讲他的闲话，便一晚上睡不着觉，跑到我那里去。我告诉他，你的错误相当大，精神上要有准备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讲你的闲话，而是几百个人讲，你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并且依旧照常工作，以后就不会有人讲你了。过了几个月以后，果然人家就不讲他了。这个同志现在牺牲了。工作中间犯错误，哪一个人会没有呢？犯了错误就要改正，叫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准备收集不同的意见，并且已经有了决议，不同的意见公开地讲出来，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正确路线的领导之下也会有缺点错误，如黄河之水滚滚而流中间还会有几个小泡，我们多收集各种意见，认清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刊印

注释：

- 〔1〕指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 〔2〕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 〔3〕指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宣布的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 〔4〕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共分八个部分。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 〔5〕似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一九四八年一月主持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中所说的九条。
- 〔6〕见储安平《评薄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载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出版的《观察》杂志第三卷第九期。
- 〔7〕傅斯年，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九四五年七月曾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
- 〔8〕宋子文，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一九四七年九月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
- 〔9〕周副主席，指周恩来。
- 〔10〕王实味，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中，发表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受到批判并被开除党籍，同年底因“反革命托派”等问题被关押。一九四六年对他的问题作出结论，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地处决。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 〔11〕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和黄河以东的晋绥边区的工作，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 〔12〕 指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
- 〔13〕 贺龙，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 〔14〕 红大，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在陕北瓦窑堡创办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 〔15〕 指一九四八年一月通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
- 〔16〕 中共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坚决支持广大农民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一指示，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作了重要的改变。

贺龙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参谋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

一、十个月来军事工作的成绩

敌人向陕甘宁边区进攻时⁽¹⁾，我们只有六个旅，以后增至十个旅，而敌人有三十多个旅。我们有些纵队原只有一万多人，而伤亡就达九千多人，完全换了一个底子，但战斗力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边区去年虽然遭到旱灾、水灾、兵灾，但还是全力支援战争。人力上，有二三万人参军；财力、物力上，要负担十多万野战军的吃饭穿衣，老百姓自己吃糠吃菜，拿出粮食给军队吃。所以，没有老百姓的支援，西北党的领导，野战军的英勇作战，要打败胡宗南，使他被迫转入防御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今年再打好一点，就可以收复延安、咸阳和榆林。

二、对敌斗争

战争一开始，西北局就制订了正确的方针，而五个军分区的执行情况则各不相同，其中执行得好的要算关中分区，军事工作做得特别好，地区扩大了，军队也扩大了。保二团、保三团都是关中出来的，上下团结一致，军民血肉相连，总不

脱离关中地区。陇东分区则要差一些，军队不敢打仗，部队发展不大。三边^[2]分区执行得更差，由于军事斗争不力，自己的部队不仅无多大发展，反而受到了损失。延属分区无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已发展到几千人，后来随着主力部队到该地区活动，对地方部队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绥德分区的四、六团与独立营是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现该分区司令部与党、政在工作上协同比较差。

目前各地区对敌斗争的情况是：

陇东分区的部队至今还钻山林，特别怕青马^[3]，不敢下平川，也不想办法去消灭敌人，以改变敌我形势。

关中分区作得比较好，军队和老百姓都敢于打敌人。

三边分区的部队也不敢下平川。敌人敢于袭击我们，打我们的游击，连敌人的清乡队都不怕我们。这说明该分区的部队脱离群众，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所以敌人可以得到我们的情况，而我们却得不到敌人的情况，对此该分区应当很好检讨，吸取教训。

延属分区的部队是采取“顶牛”战术，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一套可行的办法。我们的游击队没有主动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袭击敌人孤立据点，采用吃得了我就吃，吃不了我就走的战术，积小胜为大胜，所以比较被动。

绥德分区领导之间不团结，部队的纪律很差，给三、五万法币就释放一个地主，到一个地方就向老百姓要白面吃，把守渡口要钱。延属分区独立营剥削水手，脱离群众，打仗却不积极。现在政治上、军事上比较有一套的只有关中分区。边沿区很多地方的老百姓还未发动起来，民兵自卫队也没有组

织起来。不发动群众，就不会有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我们的游击队和正规军就是孤立的。

三、建军问题

绥德分区司令部只是带了四、六团打仗，其他都不管，这怎么行！以后应该肯定党的统一领导，军分区司令部应是地委的军事部，地委应利用这个部作军事工作，过去对这一点没有搞清楚，做得不够好。有些军分区的司令员因手中有队伍，对地委的决定，与自己有利的就执行，不利就不干。还有个别人争权夺利。

分区司令部只有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才能进行建党和建军。要使党纯洁，也必须首先发动群众，建政亦是如此。有些村庄没有一个参军的，只有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我们的队伍才能补充好兵，群众不发动起来，则一切工作都无群众基础，就不可能做好。

分区司令部应做好民兵的组织和训练工作，教会他们如何爆破，如何破坏交通等等。民兵没有组织起来，我们的正规军和游击队是孤立的。此外，分区司令部还应做好维持社会治安工作，对特务、非法走私和其他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活动都要管。

现在分区司令部对侦察、担架、兵站运输等工作都没有管，站在一边看戏，今后应把这些工作管起来。

我们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来建军，肃清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要把我军建设成一支无产阶级的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并在思想上、战术上不断提高他们。要发扬政治、经济民主。有些部队只在开支部会的时候有点民主，这很不够。今后我们

要大大的发扬政治民主，野战部队在这次“三查”中，由于发扬了政治民主，查出了混入我军的敌军官、特务和异己分子等。发扬经济民主，主要是经济要公开，每月公布一次帐目，并由党支部领导去抓。经济不公开，会造成贪污腐化，从而腐蚀了我们一些干部。今后，每个月每个伙食单位的帐目要总结公布。司务长是连长生活管理上的助手，这个工作很重要，应当派各方面能力比较强的同志去做。

现在部队中的民主是有限制的，而在苏维埃初期⁽¹⁾，民主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对各种工作都要检讨，命令也要讨论，甚至连长都可以选举。因为当时红军中有不少从旧军队来的军官，这样做对改造旧军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到苏维埃中期，这些做法被取消了。那时党的工作也很活跃、很民主，在党内无所谓首长，开小组会时，对首长可以质问，而今天就不敢批评首长了。首长在行政上是领导，在党内是一名普通党员，同样应当服从小组长、支部领导。在党的会议上应当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如果一个班长被选为支部书记，那么连长、指导员应当尊重他，要向党支部报告工作，受支部领导。过去我们党的工作一般化，今后应当根据不同部门、不同工作和业务性质，有针对性的去做，这样才能做到点子上，党的力量才能充分发挥。

最后，对机要部门和通信部门提两点要求：机要部门要特别注意机要工作的保密，对机要技术要不断提高；通信部门也要为完成各项保密任务，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贺龙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 (1)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嫡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二十个旅，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的十二个旅，榆林邓宝珊的二个旅，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西北野战军在给敌以沉重打击后，于三月十九日主动撤离延安。
- (2) 三边，即陕北的定边、靖边、安边县，简称“三边”，有时把三边分区也简称为“三边”。当时的三边分区还辖吴旗、盐池县。
- (3) 青马，指青海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 (4) 苏维埃初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苏维埃政权和中国工农红军初创的时期。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 新式整军运动^{〔1〕}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评西北人民解放军最近一次大捷称：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发言人说：这次西北人民解放军突然包围宜川敌军一个旅，胡宗南^{〔2〕}令其二十九军军长刘戡^{〔3〕}，率领两个整编师的四个旅，即整编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编九十师之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约二万四千余人。由洛川、宜君一线向宜川驰援，于二十八日到达宜川西南地区。西北人民解放军发起歼灭战，经过二十九日至三月一日三十小时的战斗，即将该部援军全部歼灭，无一漏网。计生俘一万八千余人，毙伤五千余人，刘戡本人和九十师师长严明等人，亦被击毙。接着于三日攻克宜川，又歼守敌整编七十六师的二十四旅五千余人。此役共歼敌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三万人。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

发言人分析西北战场的形势说：胡宗南直接指挥的所谓“中央军”二十八个旅中，有八个旅属于三个主力师，即整编第一师、整编三十六师和整编九十师，其中整编第一师之第一旅，前年九月在晋南浮山被我歼灭一次，其一六七旅主力，去年五月在陕北蟠龙镇被我歼灭一次，整编三十六师之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于去年八月在陕北米脂沙家店被我歼灭一次，这次整编九十师又被全歼，剩下的胡军主力，就只有整编第一师的七十八旅和整编三十六师的二十八旅，还没有受到过歼灭。因此，整个胡宗南军队，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精锐骨干了。经过此次宜川歼灭战，胡宗南过去直接指挥的正规兵力二十八个旅，现在只剩下二十三个旅，这二十三个旅分布在下列地区：晋南临汾一个旅，已成死棋；陕豫边境和洛阳、潼关线有九个旅，对付我陈、谢⁽⁴⁷⁾野战军；陕南有一个旅，任汉中一带守备。此外，分布在潼关到宝鸡、咸阳到延安“丁”字形交通线上的有十二个旅。其中三个是“后调旅”⁽⁵³⁾，全系新兵；被我军全歼新近补充起来的有两个旅；曾被我军给以歼灭性打击的有两个旅，受我军打击较少的五个旅。可以想见，这些部队不但很弱，而且极大部分分任守备。胡军以外还有邓宝珊⁽⁶⁾两个旅防守榆林；宁夏马鸿逵⁽⁷⁾和青海马步芳⁽⁸⁾的九个旅分布在三边和陇东。以上胡、邓、马各部，全部正规军包括过去被歼一次至两次但又补充起来的部队在内，目前总共三十四旅。

以上是就西北敌军态势而言。再说所谓“丁”字形交通线上受我军打击较少的五个旅，其中两个旅困守延安，三个旅在大关中；其他多数是新补充的部队，少数是受过歼灭性

打击的部队。这就是说，整个大关中特别是甘肃方面，敌军异常空虚，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攻势。这种形势，势必牵动蒋军在南线的一部分部署，首先是牵动其豫陕边境对付我陈、谢野战军的战署。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力地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

发言人说：我刘邓、陈粟、⁽⁹⁾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¹⁰⁾。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¹¹⁾。我晋察冀、山东、苏北和晋冀鲁豫各路野战军，都在去年英勇作战大量歼敌⁽¹²⁾之后，完成了冬季整训，不日又将展开春季攻势作战⁽¹³⁾。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¹⁴⁾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

发言人着重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¹⁵⁾。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

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改，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发言人说：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不但在西北方面实行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中都已实行，或者正在实行着。这种整军运动，是在作战的间隙中进行的，并不妨碍作战。这种整军运动，同我党正确地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同我党缩小打击面，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坚决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群众的正确方针相结合，同我党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坚决地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样就必然会使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无敌于天下。任凭蒋介石匪帮及其主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面前如何拚命挣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注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这时西北战场国民党军的进攻已被粉碎，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进攻。这篇评论分析了西北战场的形势，也扼要地介绍了全国其他战场的概况。这篇评论的更重要方面，是在着重地说明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意义。
-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 〔3〕 刘戡，原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在宜川战役中自毙。
- 〔4〕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
- 〔5〕 “后调旅”，指国民党军队中那些在战场上被人民解放军大部歼灭后，其残余部分调到后方补充而不改变番号的旅。
- 〔6〕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
- 〔7〕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 〔8〕 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 〔9〕 刘邓、陈粟，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陈赓、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
- 〔10〕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六个纵队，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起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先后建立了鄂豫、皖西、桐柏、江汉等根据地。陈毅、粟裕指挥的主力部队，在打破了国民党军对山东重点进攻后，一九四七年八月挺进鲁西南，九月下旬进军豫皖苏边区，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陈赓、谢富治指挥的两个纵队和一个军，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经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建立了豫陕鄂、陕南等根据地。截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底，转战中原的三路大军共歼敌二十余万人，胜利地完成了开创中原新解放区的

战略任务。

- (11)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野战军主力，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四平街至大石桥的中长路沿线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路沿线，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连续作战九十天，歼灭国民党军十五万六千余人（其中营口守敌一个师起义），攻克敌军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四平街和其他城市共十八座及重镇多处，吉林守敌弃城逃往长春。这样，就使敌军在东北的占领区，缩小到只占东北面积的百分之二左右，东北敌军占据的长春、沈阳、锦州等城市陷于孤立。
- (12)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三个纵队和军区部队，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初至十一月中旬，先后举行了大清河北、清风店和石家庄等战役，共歼敌四万六千余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连成一片。华东野战军所属四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在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二月间，在内线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内线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等指挥下，进行了胶东战役，歼敌六万三千余人，收复了十余座县城，改变了整个山东战场的局面。在苏北，华东野战军一部，在一九四七年八月至十二月间先后进行了盐（城）东（台）、李（堡）、栢（茶）、盐（城）南等战役，共歼敌二万四千余人，收复了苏北广大地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协同西北野战军一部攻克运城，歼敌一万三千余人，使临汾守敌陷于孤立。
- (13) 一九四八年春季，人民解放军各路野战军，在冬季整训之后，相继发起了春季攻势。晋察冀野战军以及晋冀鲁豫野战军和晋绥军区各一部，在三月至五月间，先后进行了察南绥东战役、临汾战役，共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收复了广大地区。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各一部，在三月八日至六月三日，先后发起了洛阳战役、宋河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共歼敌五万六千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中原防御体系，发展和巩固了中原解放区。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于三月十一日至五月八日，先后进行了胶济路西段战役和胶济路中段战役，共歼敌八万四千余人。至此，山东省除济南、青岛、烟台、临沂和津浦

路济南至徐州段沿线的部分城镇外，全部解放。苏北兵团在三月间胜利地进行了益林战役，歼敌七千余人。

- 〔14〕十大军事原则，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第三节。
- 〔15〕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是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的陕甘宁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所组成的。一九四七年春，彭德怀、习仲勋领导的参加陕北作战的西北野战部队，为两个纵队又两个旅，共二万七千余人。同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决定正式命名为西北野战军。到一九四八年春，部队增加到五个纵队，七万五千余人，经过一年作战的锻炼和一九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初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以后，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和部队的战斗力，也空前提高。这样，就为一九四八年三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继宜川大捷之后，西北野战军于四月中旬发起西府（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战役，挺进泾水渭水间的广大地区，截断西兰公路，并且在四月二十一日收复延安。

中共中央关于严格执行《西北人民 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给 西北局、晋绥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

西北局，晋绥分局并告西北前委：

现我西北野战军正胜利南进，许多地区及某些城市，正被我与将被我解放，因此，放在西北及河东地方党、地方干部及地方部队面前的将是广大新区及城市工作的开展。你们必须通知各地方党、各地方部队，特别是关中、延属、陇东、黄龙及河东九、十分区各地委，将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县区乡党的干部中、地方兵团、游击队中广为印发讨论，务使每一地方干部每一地方战士都能懂得党在新区和城市中的正确政策，而不致执行起来重复过去的许多错误。各地方党各地方部队进入新区及城市工作时，必须依据这一决定办事，如有违犯，前后方军政机关均有权进行干涉或停止其活动，并须追究责任。

中 央

三月十一日

附：

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

（一九四八年一月）

我军在陕甘宁边区经过八个月的内线作战，基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造成了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扩大解放区的有利条件，还争取了冬季两个月的整训。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在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之下，在前后方同志一致的努力奋斗之下，在友邻区配合之下，特别是在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与人民积极拥护之下所完成的。今后，我军即将打到蒋管区去。也只有打到蒋管区去，才能利用其人力物力，达到彻底消灭蒋胡^{〔1〕}等匪帮，解放大西北之目的。为此，特根据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对于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作出决定：

（一）我军进入蒋管区有两个基本任务：一个是大量消灭敌人；一个是建立根据地。我们对于两者均应作长期打算，不要看得太容易。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我们必须根据土地法大纲，彻底平分土地。在这一问题上，有任何的犹豫动摇，束手束脚，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但在执行这个

方针时，我们就必须根据敌我力量变化的情形，人民群众觉悟的程度，经过细心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一点一点地积蓄自己的力量，才能逐渐完成此项艰巨任务。过于性急，是不能完成任务的。我们在新占领区，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群众自卫武装（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及脱离生产的地方游击队），建立党，直到建立政权，平分土地，如果能够在一年内做完做好上述工作，就是很快与很大的成绩。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不要粗心大意，损害同盟者的利益，打乱自己阵营，否则就不能建立根据地。为了顺利的建立根据地，必须注意下列步骤：（1）各纵队须准备一定数目的群众工作干部，给以政策教育，我军所到之处，经过这些干部，用通俗言语，广泛宣传土地法大纲、人民解放军宣言及毛主席近著之《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同时，我军必须从没收地主反动分子的财物中分发一部分给劳苦群众。这些都是应当普遍推行的。除此以外，我们应当分为两种地区，采用不同的策略。第一种地区，是我军大量消灭了敌人，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基本变化，敌人以后不易再来占领，即再来也不可能久占的地区。在此种地区内，除分发财物外，应当进到发动群众诉苦清算斗恶霸的阶段。在这些斗争中，首先吸收雇贫农分子，组织贫农小组，由几个贫农小组成立贫农团，选举贫农团委员会，然后成立包括中农在内的村区农会，进到建立政权分配土地的阶段。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吸收积极正派的贫雇农分子入党，建立党的支部。但是即使在这种地区，党的下层组织暂时亦不宜公开。第二种地区，是那里的敌人虽被击溃或消灭数次，被迫暂时退

却，但是敌我力量对比尚未基本改变，还须反复战斗，消灭更多敌人，才能为我长期占领。在此种地区，我们的策略是只作一般的宣传及分发财物，进行某些秘密的群众组织，如雇贫农小组，工人学生小组，而不要冒险地发动群众进到建立政权分配土地的阶段。如果因为当地反动势力很强大，群众因分财物而可能遭到打击时，即分发财物工作亦须做得适当，不要使群众因此受到反动派的报复打击。(2) 武装农民(民兵及游击队)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如果农民群众没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分得的土地和财物是不巩固的。但武装农民的工作不宜做得过早，必须在劳苦群众得到实际利益，阶级觉悟已经提高之时给以武装，并须确实掌握在党员雇农及进步的中农手中，才能掌握稳固，不致发生叛变行为。(3) 在应当建立政权的地区，又分两种情况。在我党有相当地下工作基础的地区，应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即临时政府)。此种委员会，由群众大会产生。在无我党地下工作的地区，或者工作极其微弱的地区，则由军队委任临时县区长，成立临时县区政府。不论民众大会选举的或军队委任的临时政府，均应颁布进步法令，给劳苦群众以翻身的合法权利，以利发动群众斗争，逐步地进到建立正式政权的阶段。

(二) 由于胡马⁽²⁾匪军在数量方面及技术补给方面现时仍较我军为优，我军进入敌占区后，必须坚持毛主席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中所指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灵活地坚决执行，达到各个歼灭敌人正规部队，强大自己之目的。同时必须坚决消灭反动地主武装，建立人民自卫武装，建立有力的武装工作队。为达此目的，应从野战军主力中抽出小部队到地方去，

作为成立地方独立营、独立团的骨干。对于某些反胡的灰色武装，应争取其继续反胡，或守善意中立，扩大反胡统一战线。对于此种武装，一般的不给名义，不扩大其政治影响。如其同意人民解放军宣言，愿受节制，则可逐渐的改造之。

（三）对于宗教迷信会帮等组织，在不反对我们土地改革及我军行动的原则下，应当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或使他们站在善意中立地位，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逐渐分化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孤立其上层头子。如果是反对土地改革与我军行动者，则按情节轻重，给以必要的打击，或以其他适当方法处理之。主要的原则，亦是打击其领导者，夺取其群众。对于宗祠、庙宇、教堂、清真寺、民间医院、公共场所、名胜古迹、学校等，必须让其保存，不得破坏。对于学生、教职员及一般知识分子，必须加以保护。其中个别的显著的坏分子，为学生群众所痛恨者，应按多数学生意见处理之。在估计我军不能久占的城市中，此种措施宜暂缓进行，以免学生吃亏。对回人生活习惯，必须尊重。

（四）我军所到之处，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国民党的政府，均为不合法，宣布一律取消。其中贪官污吏、豪绅、恶霸、特务分子，为人民深切痛恨者，应组织人民临时法庭，公审严处。其中作恶不很多，人民不十分痛恨者，采取宽大政策，令其登记，声明不再依附反动国民党作恶，即可释放。对于一般尚无恶迹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政府公务人员，一律从宽免究。那些对于我党现行政策表示真心赞同，在人民中确无恶迹之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政府公务员、退役军人及民主人士，愿意与我们合作者，经过考察证实后，可以酌

给适当工作。

(五) 对于工商业，必须保护其营业，不得有任何没收物资及捉人等破坏行为。如有破坏工商业行为者，必须追究责任，按律惩办。即使是官僚资本经营的工商业，或恶霸反动分子经营的工商业，应当没收，在该地已成为巩固区时，亦应由民主政府接管经营，或转交人民合作社经营，一概不得破坏。军队一般的不应向工商业资产阶级筹款。只有在十分不得已时，才可向大资本家酌量劝募，并须先得前委批准。

(六) 军队给养，一般地应向地主阶级征发及夺取敌人仓库解决。必要时，向富农征借。为了使征发征借合理起见，在情况许可下，应先进行调查，召集负担户义征，并向劳动群众公布，以免负担户在军队移动后向贫民摊派。为了保证我军物资供给，顺利的进行长期战争起见，一切征发、征借、缴获、劝募，均须归公，按照供给标准分配，反对贪污浪费。为了统一全军供给制度，适应调剂，审核预决算，建立财政公开制度之目的，野战军组织财政经济委员会，每纵以一至二人，野司一级以张宗逊、甘泗淇、刘景范^[3]三同志参加，张为书记。纵队以下，可斟酌情形，仿此办理。

(七) 我军政治工作，必须采用新方式。这些新方式即是：(1) 发动解放兵自动诉苦，子弟兵讲过去痛苦及翻身情形，老战士讲人民解放军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为什么要遵守群众纪律，反复展开讨论。有计划的经常进行社会调查，做群众工作，分析阶级（搞通剥削关系）。这些，都是士兵群众提高阶级觉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办法。(2) 建立纪律值班制度，连队中各班以及伙马夫班，机关中的各部门，每日均

须有值班员。这些值班员，应是战士与伙马夫轮流充当，领导定期开纪律检讨会，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程度。发动群众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遵守纪律问题上，对于个人与连队，好的给予表扬，坏的给予适当的批评或处分，任何人均无例外。(3) 部队中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互助小组，特别是战斗小组，以及记功、记过、查功、查过、庆功大会与民主评判等项制度，并使这些制度互相结合起来，是很好的。以上这些，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民主作风与群众路线。这种民主作风与群众路线，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它使我军指战员之间，新老兵之间，解放战士与子弟兵之间，过去存在着的许多隔阂，现在被阶级友爱所代替了。它使我军在生活艰苦，吃洋芋、高粱、黑豆、豆皮充饥时，亦无怨言。它使我们的指战员自动学习的情绪大大提高。指战员们对于学习土地法大纲，兴趣很高。对于练习四大技术，许多连队战士在夜间瞒着干部，自动练习。许多解放战士寄信回家，将土地法大纲套在信封内，要家中不再送租，不再还债。他们在信里说，打倒蒋贼回家分田翻身的日子快到了。由此可见，打倒蒋贼的胜利信心，在部队中是大大提高了。在查功、查过、查斗志、查阶级、民主评判的运动中，发现了干部中若干堕落贪污、生活腐化的分子及怕死的分子。同时，又从群众中发现不少的优秀分子，可以充当干部。这种放手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必须坚持下去。过去存在过的单纯以政治工作人员做政治工作，使部队缺乏生气的现象，现在已基本不存在了。但在保卫工作部门，仍有若干同志，保持过去的旧观点，强调其特殊性、技术性、神秘性，固步自封，因而使自

自己的工作缺乏生气。他们的错误，就是忽视了保卫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不了解应当从参加一般的党的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中，从人们的思想上、言论上，而主要地是从人们的行动上去发现阶级异己分子，或可能的反革命分子，然后再加以严正的考察。他们也不了解只有提高指战员群众的政治觉悟与警惕性，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才易暴露。在此次三查或五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查纪律、查经济）的群众运动中所发现的不少的阶级异己分子及某些反动分子，均为战士群众举发，就是明显的证据。

（八）必须善于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训练。这里应当注意：（1）部队中射击、投弹、土工、刺杀等项技术教育，是主要的。班排连等项战术动作，炮工兵的技术战术教练，亦必须注意进行。营以上各兵种的合同战术，尤其是步兵作战的指挥方面，应当切实演习，并利用实战，进行深入的检讨，找出胜利与不利的原因，从批判中总结经验。这样，不仅可以防止在胜利时的轻敌与骄傲自大，防止在不利时的气馁，而且可以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与战术上的创造性。只有虚心学习的态度，才会不断的进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2）在干部教育方面，采取各级轮训班的办法。团级轮训班长、副班长。旅级轮训排长、连长。纵队轮训营长、副营长。每次时间不要长，三至五天即可。课目不要多，一至两个即够。例如在一次训练中，只训练射击要领与射击指挥，在另一次训练土工作业，在第三次训练班排进攻。如此反复轮训，比较办大规模的学校，进步为快。（3）严格军事管理。建立各级指挥员轮流值班（值班勤务另行规定）制度，外出时必须按

级请假、销假，早晚点名，队前讲话，按时操作，按时起居，反对一切散漫习气。

（九）八年抗日民族战争中，实行减租政策、三三制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在这一长期过程中，我军混进了一批地主富农分子，加上一九四七年补入大批解放兵，因而在我们部队中，混进了若干特务分子及反动军官，他们甚至当了干部。在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势力的政策下，不应再吸收地主富农当兵。目前我军许多连队，党的支部甚弱，甚至无支部者。我们应当依靠贫雇农，紧紧团结中农，采取座谈会的方式，进行诉苦，进行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明白地划清阶级界线，并将少数坏人清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纯洁我们的队伍，保证执行党的现行政策。此次诉苦与三查运动，得到了不少的收获。有的纵队作的比较深入，有的纵队尚未普及，有的纵队尚未发动起来。今后各纵队，均应继续普及与深入这一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必须注意吸收贫苦积极分子入党，加强党的支部工作，使支部成为今后的领导核心。战士群众举发出来的若干坏干部，应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理。战士群众推荐之替补干部，应经上级军政机关审核，认为合格者，准予委任。战士对干部有意见，准予批评。其严重者，准予进行思想斗争。但不得打人、捆人，不得侮辱干部的人格。干部对战士所说的真理，必须承认，自己有错，必须改正，并不得对战士有任何报复行为。在三查运动中查出的地主富农分子，应分别处理：（1）虽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经过了严格考验，证实其工作过去表现好，现在仍表现好者，这是很好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继续留任

原职，不应再以地主富农看待他。(2) 地主富农出身，过去表现不好，尤其在土地改革中，其地主富农观点与立场仍未放弃，虽在此次三查中表面上愿意放弃，但其思想并未完全解决者。这类人，若是直接带兵的干部，要调换其工作，并继续提高其思想与注视其行动。(3) 地主富农出身的投机分子与两面派分子，应按其情节轻重，或留队教育改造或清洗出队。若是在部队中造成了罪恶的反动分子，应交军法处，组织群众法庭，公审判罪。(4) 有组织的反革命特务分子，交上级保卫机关处理。(5) 以后地主富农成份，不得参加人民解放军。但对革命知识分子，经证明可靠者，仍应表示欢迎，我军不得排斥有用的革命知识分子。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刊印

注释：

(1) 蒋，指蒋介石。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2) 马，指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均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3) 张宗逊、甘泗洪、刘景范，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和后勤司令员。

贺龙在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党委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

三纵队^①从河东到河西，中央及野战军司令部给的任务，你们都完成了，而且打得很好，我很满意。你们二个旅只过来了两个旅，二旅过四岁，五旅只有两岁，五旅是小兄弟。你们的胜利不小，我们这里缴获敌人的坦克、榴弹炮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三纵队的领导坚强。我说这个话既算是鼓励，但也是实际情况。

部队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是最要紧的。二、五旅的干部来自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五湖四海，有一方面军的、二方面军的、陕北的和地方来的知识分子了。由于各部队的历史不同，思想作风也不同，要好好研究各个兵团的历史与不同特点，很好培养和树立起无产阶级的思想。现在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军阀主义，是军队建设的障碍，必须坚决克服。

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要开展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批评。过去，不但自我批评没有很好做到，而且也不能进行相互批评，批评了就冒火。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搞好思想建设的好武器，如不能很好运用这个武器，那就不能搞好团

结。有的领导同志之间，关系已恶劣到相互不说话的的地步，因而使工作受到损失。这是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所以必须很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哪怕痛得吃不好饭，睡不着觉，要痛下决心去改，去掉个人主义、英雄主义，不经过痛苦斗争是不行的。一定要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开展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批评，树立起正派的思想作风。三纵队的思想作风总的看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歪风邪气，必须引起大家重视。同志们要向纵队的领导学习，光达⁽²⁾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干部，朱明⁽³⁾同志是农村无产阶级老干部，志远⁽⁴⁾同志是单独做了很多工作的。这些同志思想作风正派，政治修养、军事素养都好。光达同志有很多东西还没用出来，同志们应该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小资产阶级思想、地主和富农的思想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必须坚决克服。三纵队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比较明显，如上级向有的旅调枪、调干部硬是不愿调，认为这是我的，这是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表现。有很多同志虽然没有公开暴露出来，但这种思想是存在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思想，在我们的部队中都有反映。我们要发扬好思想，铲除坏思想，树立正派的思想作风。三纵队要用两年时间来抓部队的思想建设。我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整风，就是为了树立正派的思想作风，有很多结论毛主席就没有作，思想弄通了不作结论也没什么，陈独秀、李立三倒做了不少的结论，但是错误的。应该认识到要树立起一个正派的思想作风是很不容易的，要作出很大的努力。

必须认真掌握政策，特别是要很好执行城市政策、工商

业政策。打朔县⁽⁵⁾时，有的部队执行政策很差，搞了十几家天主教堂和二百多家与阎锡山没有关系的老百姓，甚至把打马掌的工具、理发匠的剪子都拿了，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后来你们在宣川战役⁽⁶⁾和洛川战斗⁽⁷⁾中加强了纪律性，群众对你们的印象不坏。在四十天的围攻中，你们虽然还有些缺点，但由于同敌人两者一对照，敌人把你们的缺点给掩盖了，虽然群众对我们的部队反映不错，但是还要警惕。比如部队再困难也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没有吃的，要买了再吃；没有烧的，也要买了再烧。不能搜俘虏的腰包，否则对我们争取俘虏会增加困难。我们对俘虏的政策：一个是争取，一个是释放。如果搜了他们的腰包，释放后就会在社会上造成很坏影响，今后争取俘虏也就会更加困难。

还要严格组织纪律。有的部队不够自觉，组织纪律性差，违犯了战场纪律。如在清涧廖昂战斗⁽⁸⁾中，战斗还没有结束，有的部队不是积极的去消灭敌人，而是先去拉牲口、拿东西。对俘虏政策执行得也不好。由此看来，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政策教育，团级干部要抓紧，但我们党的各项政策主要是靠班、排、连去贯彻执行，特别班、排、连，支书、支委、小组长要搞好，使 they 要懂得各项政策，执行政策。我们教育的重心应放在连队，连长有百余名群众，营长才二十来个群众，团级干部最多就是马夫、警卫员、通信员等。打朔县高家堡时，由于部队少数指战员政治觉悟不高，所以对城市和工商业政策执行很差。为此，必须使每个同志都明白，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队伍，人民的队伍，说一句话，解决一个问题，每一个行动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

我们要以革命的武装去消灭武装的反革命——蒋介石反动政权。建设革命武装靠什么思想来建设？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建设。从部队中发生的自伤的现象来看，证明我们对部队的教育是不够的，值得我们干部很好警惕。我们的干部比山东、晋察冀老得多，他们那里老干部很少，在座的同志比陈毅^[9]那里的干部老得多。他过去有三千名老干部，三分之一在江北，三分之二在江南，但他们的部队发展很快，是因为教育抓得紧。我们的部队为什么发展得慢？提拔干部不大胆是重要原因之一，没有将那种狭小的圈子打破，今后要大胆的提拔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对教育接受很快，很有朝气。

要把反逃亡、反自伤作为部队的经常工作。这就要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要巩固部队，反对逃亡和自伤，就要巩固战士们的心，要用积极的方法——思想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懂得革命的道理。

部队应该胜不骄败不馁，你们在这方面就做得不够好，胜利了就高兴，受了一点挫折，碰了点小的钉子就受不了。如果这次你们捉了几千名俘虏，大家一定会很高兴，话也就少了。这一点表明你们这支部队比较脆弱，不是那样顽强。如果你们第一把党的工作，第二把政治工作，第三把供给工作，第四把卫生工作都做好了，那就有了坚强的无产阶级思想，顽强的斗争意志，有优良的技术战术，有很好的物质保障。这样，你们这支部队的脆弱性就会减少，变得十分的顽强。

练兵要硬练苦练，对作战的战术技术要研究，特别是攻坚战，要很好的研究学习。这次在洛白公路上的这一仗^[10]，既是伏击战，也是野战，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但是有美中不

足，有缺点，干部不够顽强，希望各级干部要虚心地检讨，认真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怪张三李四，互相埋怨。本来这次延安、洛川的敌人是败兵，我们是胜利之师，两个旅相隔也不远，可以取得战术联系，伏击是完全可以成功的，主要是干部的军事素养、政治水平不高。五旅那天占领的地形是很好的，如果以一个营钳制南面之敌，全力扫清北面的敌人，然后再向南扫。二旅那天晚上撤走时，如果派些小部队出扰，使敌人不能休息，增加他的疲劳，这样就能使史家河、山岭上的敌人得不到休息。你们应该认真总结这些教训，今后再遇到此种情况就能打好了。

要充分发扬民主，很好的走群众路线，实行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到杨家沟去，就了解河东的情况。到了河东沿路找农民谈话⁽¹¹⁾，找各工作团及各军政首长向他汇报。他又派乔木⁽¹²⁾同志去专门搜集情况。他感到还不够，又找分局同志⁽¹³⁾谈，才做的报告⁽¹⁴⁾。整理出来以后，发给大家看，征求意见，再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对报告补充修改，再发给大家看，就这样反复几次，他说可以印发。他坐车到了岢岚，在半路上，又打电话告诉我说：“慢些发，等工委同志看后再发。”毛主席的民主作风就是这样的，从农民到高级干部、中央委员，反复了解了情况，所以毛主席报告以后，干部们都反映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如果二、五旅的干部都像毛主席这样做的话，都有这种民主作风，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工作是一定会做好的。只有充分地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实行高度的集中，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大家就能坚决的执行。如果有谁不执行，那就是党性不纯，命令不准违抗，必须坚决

执行，违抗命令就是党性不纯，是不能允许的。如果命令有缺点，一面要坚决执行，一面可向上级报告，如果上级不采纳，有错误由上级负责。对个别领导的缺点错误，要批评帮助，不要袒护，但又必须看到他们的优点和长处。这样才能做到对敌狠，对己和，团结一致去战胜敌人。对内和这一点三纵队过去做得不够，同级关系、军党关系、军政关系、特别是军民关系等都不够。傅作义教育他的部下对老百姓要如何称呼，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能这样做，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最先进的军队，军民是鱼水关系，应该做得更好。

我们的母亲只有一个，就是共产党；我们的奋斗目标也只有一个，就是反帝反封建。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人民勤务员，很好的为人民服务。对毛主席大家都是拥护的，但为什么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违反毛主席思想，违反毛主席为我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这主要是我们的思想上有毛病。

我们官兵关系，总的讲还是好的，但是还有缺点。我们对党、对群众、对同志要讲道理，做到对内和，对敌狠。对同志要养成谦虚谨慎，感到自己很不够，要很虚心；对老百姓要尊重。对同志、群众讲野蛮，要不得。这样搞，部队就会变色，红色会变成白色。发生了问题，先不要讲群众，首先，检讨自己。对党政发生了问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首先批评军队。旅、团之间首先责备自己，然后交换意见，不团结是双方的问题。旅、纵队之间发生了问题，要站在纵队党委会的立场上解决问题。如你站在旅的立场上，还有那两个旅怎么办？特别是执行任务、分配任务，要站在纵队党委

会的立场上。团、旅间就要站在旅的立场解决团的问题，不要站在团的小圈子内。这样对内和才能搞得差不多。

官兵团结，特别提出干部要为兵服务。现在后方积极生产，一只手为群众服务，一只手为兵服务。军队干部更要为兵服务。三纵经济是公开的，分配也是公道的。党、政、供、卫机关要为兵服务，后方同样也要为兵服务。

上下级之间，旅团之间，纵队之间，搞好团结首先自己吃点亏。团与团、旅与旅、纵队与纵队是否做到了，没有的。宜川为抢俘虏打死人。在作战上，自己旅完成了任务，援助了兄弟旅没有？不但不去支援，还说风凉话，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兄弟部队的伤亡也就是你自己的伤亡。过去有这样一句话，“打仗要亲兄弟，出征还要父子兵。”我们只有一个妈妈，我们都是亲兄弟，吃点亏怕什么，特别是分配东西，要吃得亏。二旅是三个指头合起来即变成一个拳头，五旅也变成一个拳头，五个纵队变成一个拳头，一定能战胜敌人，所以互相尊重是最要紧的。

功过问题，要有功不居，有过不避。一个战斗胜利，自己背上了包袱，认为胜利都是我的，英雄是我的。我们的干部在打胜仗后，必须认识到，功劳一是党的，二是广大群众的，三是干部战士的，四是军政首长，要功中求过，有多少功，有多少过。这样同级、下级都服气了，互相之间也就会团结了。现在，我们查功是自己的，过是人家的，上下推，自己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¹⁵⁾，这是很不好的。毛主席在七大结论说，中国没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带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要养成有过不避的良好作风，只要很好的

努力，是能够建立的。

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主要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与领导问题。政治委员应该主动的去团结军事领导，工作应该主动去抓，不抓是你的责任。军事领导也应该尊重党委、尊重政治委员。否则就不是党员的态度。军事指挥上，领导同志应该很好的虚心地接受下级的意见，把自己的指挥很好的检查一下，提高一步，这点是很要紧的。

今后三纵队的党委，特别五旅、二旅的党委，内部要加强团结，党委是团结领导的中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党员对党不准抱任何不好的态度，否则对党的工作、对党的利益、对党的威信、对当前消灭蒋介石、赢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都是有害的。因此，党员对党应当绝对服从。

关于连队的党支部，过去在选举支部书记时，不管政治指导员称职与否都是他。今后党的支部一定要开党员大会，用无记名的投票选举支部委员。如连长、政指被选为支委，应该自觉的尊重选举的支书，如他能力不够，应该设法帮助他，有了工作先民主讨论，然后集中，作出决定，分工负责，交连长、政指去执行，支部来保证。在未决定前，支书领导讨论决定。在行政上，支书受连长、指导员的领导。在党内，连长、指导员受支书的领导。党委会也是一样，一切工作要由党委会讨论，讨论后党委会集中做出决定，然后分工负责。在执行中，党委书记有权督促检查，各部门不断地向党委会反映情况，汇报执行的情况，有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召集会议解决。常委会要经常不断地开会解决问题，指导工作。在党委会上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有保留的意见向党委会声

明，但要少数服从多数，做出的决议要坚决执行，不准打折扣，保留的意见可向上请示。

提高部队战术技术的任务放在光达同志身上，你学的东西没有用出来。要把宜洛战斗的经验总结出来，通过上课教育干部。光达同志有大革命的经验，有内战的经验，有抗日战争的经验，还有苏联红军的经验，由你召集大家来研究。我们的干部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战术素养比较差，军语也讲不上来。但我们的干部政治质量高，实战经验多，可惜没有系统地把经验整理出来。所以，提高干部军事理论的任务，光达同志要担负起来。

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二、五旅如何培养？两个旅都有自己的特长，各个兵团都有特长，如五团就愿攻坚，不愿野战。要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就要按部队的性质培养，但是能攻坚，也要学习野战，其他团既要学野战，也要学攻坚，有意识的培养，不断地进步。只要这样，优良作风才能保持。

政治工作也要进步。诉苦也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发现新东西，研究创造新的东西，诉苦、三查要不断地向前发展。政治工作不够活跃，如果活跃起来，部队的管理教育就好搞了，对部队的巩固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的会是团结的会，在会上，同志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缺点要确实改正，这对三纵队的党委，二、五旅党委的建设，有很大的利益。同志们对个别领导的批评，不会减低他们的威信，反而会提高威信。三纵队党委应该有决心和信心，团结一致，多打胜仗。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贺龙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 〔1〕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下旬，晋绥野战军的番号取消，所属部队分别编为第一、二、三纵队。其中第一纵队辖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调陕甘宁边区担任保卫延安的任务。一九四七年三月，第二纵队（辖第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西渡黄河，归彭德怀指挥。八月初，第二纵队（辖独立第二、三、五旅）机关率二、五旅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建制，独立第三旅仍留在山西作战。
- 〔2〕光达，即许光达，当时任第三纵队司令员。
- 〔3〕朱明，当时任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
- 〔4〕志远，即孙志远，当时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
- 〔5〕指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军在晋北战役中，打下朔县城后，有些部队违反了群众纪律。
- 〔6〕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三日，西北野战军发动宜川战役，集中第一、二、二、四、六纵队，在宜川城和瓦子街地区歼敌二万九千四百余人。
- 〔7〕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至四月十二日，西北野战军发动黄龙山麓战役，以第一、二、三、四、六纵队，在洛川、黄陵、宜君、韩城等地与敌作战，歼敌三千余人。
- 〔8〕廖昂，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这里是指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至十一日，西北野战军发动以歼击整编第七十六师为目的的延清战役，以第一、三纵队和新编第四旅、教导旅，在延长、延川、清涧地区歼敌八千余人，生俘廖昂。
- 〔9〕陈毅，当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共指挥十余个纵队。这里主要是说，华东部队的干部虽然没有晋绥地区的老，因能大胆重用新干部，所以部队发展很快。
- 〔10〕指在黄龙山麓战役中，第三纵队担任伏击任务，由于内部协同没搞好，未能取得预期的战果。

- (11) 在西北战场我军转入进攻的形势下，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陕北，进入山西临县。
- (1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新华通讯社兼《人民日报》社社长。
- (13) 分局同志，指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等。
- (14) 报告，指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一九九一年版第四卷。
- (15) 布尔什维克，俄文的译音，意即多数派。后来逐步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

春季攻势总结⁽¹⁾

彭德怀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从二月十一日我军南下发动春季攻势以来，经过了连续三个月的行军作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缺点和某些错误，特别是此次麟宝战役后一阶段，尤其值得我们研究检讨，以便吸取经验教训，继续获得新的胜利。

第一，春季攻势的概况及检讨

春季攻势第一阶段——宜川地区首告大捷，并乘胜扩展攻势。

我军春季攻势开始即取得了宜川地区的大胜。三月一日，首在宜川西南歼灭胡⁽²⁾军一个军部、两个师部、四个整编旅，继于三月三日再克宜川，全歼守敌一个旅。两役共歼敌二万九千多人。我军获得以不足二十个人消灭一个敌人的辉煌胜利，这是西北人民解放军空前的歼敌记录。

宜川战役胜利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三查与练兵的直接结果。去年冬季两个月部队中所展开的三查运动（即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大大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与积极性，涌现和提拔了大批新的干部，增强了全体指战

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在这个基础上所展开的练兵运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瓦子街战斗中，我军冒大雪严寒和道路泥泞之苦，将胡军最精锐的主力之一整编九十师等部彻底全部歼灭。我三五八旅七一四团顽强战斗，与敌反复冲杀数十次，部队虽伤亡达数百人，但仍能确保夺取之阵地，坚持战斗至最后胜利。这是值得全军学习的。

我军所进行的三查运动，是执行毛主席的整军思想，继承红军古田会议精神，在土改中以诉苦的方法，放手的群众路线与民主作风，是我军新的整军方式。正如总部发言人评宜川大捷中所指出的：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将使我军无敌于天下。事实证明，三查运动进行得好的部队战斗力就强，反之，则弱。一纵三五八旅余秋里⁽³⁾同志能深入群众，反映群众意见，具体解决问题，在这个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仗也就打得更好些。因此，以诉苦与三查方法进行的整军运动必须坚持和普及。同时也看出部队在行军作战后的适当休整是很必要的，它是获得新的胜利的准备。

其次是我们战役指导上仍有个别缺点（如粮食无准备），敌人则犯了大错招致覆灭。当时我军包围宜川，并等待打援。敌援军如从牛武、英旺救援，则我军不易将其全部歼灭；若敌背靠石堡沿鸡蛋崙稳步前进，我亦难于全歼该敌。但由于敌人过低估计我军力量，胆敢沿洛宜公路轻率冒进，并按照我们的计划行至瓦子街以东王家湾、任家湾地区内，终为预占有利地形、准备完善的我军消灭干净。在战争指导上，我们应使自己不犯错误，而促使敌人犯错误，最好方法是隐蔽自己实力，使敌估计不足，较易获得胜利。

宜川西南大胜后的一日，我军一、二、四纵队即乘胜南进，于三月六日至十日五天内，连克石堡、黄陵、宜君、白水等四座城镇；又于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三天内，连克韩城、合阳、澄城三座县城。三、六两纵队于三日攻克宜川城，休息两天后亦迅速向西挺进，直逼洛川，于九日将该城包围。南进我军采奔袭方式，将白水、澄城敌反动地方武装全部消灭，将合阳的大部消灭。而一、四两纵在协同进攻宜君时，四纵警三旅竟让敌保安团跑掉。野司命令穷追残敌，但该部只派一连兵力，追赶十余里即折回，致该敌大部漏网。此种行为乃是战斗意志薄弱的表现。

围攻洛川方面，我军开始对敌情不明。经过两次攻击，从战俘口中始了解守敌有三个团共六七千人，以后又因连续降雪十日，敌乘机增修工事，道路泥泞，攻击不利。洛川不下，延安即无法光复，不仅无弹药，亦无粮食。胡宗南已将裴昌会⁽⁴⁾兵团调集富平、铜川、耀县。我前委为此提出围城打援与向西南行动两方案。我军西越咸延路，拟歼援敌两旅后西进。但较胡宗南狡猾之裴昌会到宜君后迟迟不进，静观我之行动。我以打援不成，遂决心西进。四月十三日我军集结马栏，十四日开会讨论西进部署，十五日传达，十六日即出发，故战役准备仓促。因犹豫于打援与围攻洛川城为时达一周，妨碍了向西府⁽⁵⁾进军的实际准备，这是此次战役的过失之一。

春季攻势第二阶段——麟宝战役⁽⁶⁾，收复延安，夺取洛川，巩固黄龙区，粉碎胡、马夹击。我军向西府进攻的战役企图：第一步是建立麟游山、千山山脉根据地，并从外线的进攻中达到收复延安，夺取洛川，巩固黄龙新解放区的目的。

第二步即是依靠麟、千山脉根据地北出平凉、固原，速达收复陇东，逼退三边⁽⁷⁾之敌。

在此企图下，我军分左右两翼（左翼为二、四两纵队，右翼为一、六两纵队），自马栏向泾渭两河间蒋占区挺进。我军突然出现于泾渭沃野，腰斩西兰公路、西宝公路及陇海铁路，连克旬邑（十七日）、永寿（十八日）、彬县（十九日）、长武、麟游（二十日）、扶风、灵台（二十二日）、凤翔（二十三日）、岐山（二十四日）、宝鸡（二十七日）、千阳（二十八日）及崇信（五月三日）等十二座城市，歼敌整七十六师师部、整一四四旅之新四十团、青年军二〇三师一旅第三团、陕保十九团、二十一团等部及旬、彬、永、麟等县反动地主武装全部，扶、风、长等县反动地主武装之半数，摧毁了胡宗南后方麟宝地区的政治组织，破坏了胡的供给基地仓库。由于西线我军胜利，便使北线延安、洛川之敌先后于二十一、二十五日仓皇弃城而逃，延安、洛川两城照预定计划为我军收复与解放。

在此次攻势中，各纵队均积极作战。第一纵队于二十三日冒大雨泥路，一昼夜强行军一百三四十里。为了歼灭麟游、凤翔反动民团，二十六日复强渡深水过胸的千阳河，协同行动积极的二纵合取宝鸡，胜利完成了任务。但攻势之初，四纵队作战不力，警一旅在常宁镇与敌民团和平共居数小时未曾发觉。警三旅在监军镇第一次放过二〇三师一旅三团（在常宁镇被二纵队所消灭），第二次又使二〇三师后续部队逃回乾县。该部于敌退走后二十四小时始发觉。二〇三师未能全歼，致乾县不克。即未能造成对西安之直接威胁形势，迷惑

敌之注意力，以便于我军主力西进和夺取宝鸡城丰富物资。

我军于二十七日晨四时克宝鸡城，至十四时才全部占领。此时，敌援兵正沿西宝公路两侧急驰来援，当即命令二纵独六旅抗击沿陇海铁路来援之敌，四纵队一面休息一面抗击沿扶风、岐山公路来援之敌，以掩护我们处理宝鸡物资。二十七日下午三时接到四纵队的电报，称敌援军已至岐山、扶风间之益店。二十八日该敌突然进至凤翔东南十余里。谁料我四纵队擅自将阻击任务改为追击，实际上既未阻又未追，也不报告。我军陷入被动，撤出宝鸡。

我军北撤后，原计划以二、四两纵队攻荔镇，一、六两纵队攻肖金镇，然后北上镇原、孟坝，包围庆阳、西峰之敌。但因六纵轻敌，教导旅进至屯字镇后陷入马军^[8]之包围。此时，我既定计划又告破坏，遂不得不急调一、四纵队救援解围，图以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屯字镇之敌。事出意料，这天一纵运动迟缓，马军又增，尾追我军之胡军将至。我又不得不改变计划，令教导旅轻装突围，又令四纵布置纵深阻击，同时并侦察肖金镇情况。但四纵又违命连夜撤退，使我军通往西南的隘路有陷于被敌切断的可能，将造成我军严重的危境。我四纵队一再贻误军机，影响战局特重，不得不予严重警告，提醒他们不再重犯错误。后来，到宁县良平镇的抗击战就打得很好。

到了公和塬，我命一纵队一面休息，一面准备三、四天粮食，以便我军埋伏于驮田镇大山边，待四纵队将敌诱到时，四起歼敌一两个团，即可打击敌人嚣张的气焰。但二纵队未加请示，私自移走。我们的粮食没有准备，边区粮食困难。敌

人要是继续追赶，我们退到延安也不会安全，就非退过黄河去。究竟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形，应该搞清楚。

麟宝战役的经过情况大体就是如此。这次战役胜利的方面是完成了一半任务，即光复延安，夺取洛川，巩固黄龙分区，了解了麟宝地区地理民情、政治经济情况，并歼灭了胡军及当地反动团队；以及我军纪律严明，在群众中散布了深刻的影响，将利于麟千山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并准备了我军建立泾渭两河间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但是，此次战役未能完成建立麟千根据地及收复陇东、收复三边的任务。这是因为我们在战役指导上犯了若干错误和缺点，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第一，是我对胡、马两军密切配合与马军实力认识不足（青马有正规军骑兵五个团，步兵四个团），对胡宗南可集中的兵力估计过低（此次共集中十三个旅），对粤军六十五师行动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第二，战役配合有很大缺点，个别纵队部署不当，不完全明了敌情，亦不完全明了我情。我军不能与陕南配合，由陕南牵制敌军四五个旅，即可站住脚。我左翼兵团配置应以二纵当先锋，四纵殿后。我对四纵在十年和平中战斗意志不够认识不足。如将二纵放在前面，歼灭来援之敌青年军二〇三师，乘胜夺取乾县，造成攻取西安的姿态，则对我军麟千攻势完全有利。

此次攻势，总的说来我们是正确的，且获得了胜利。但由于我们犯了上面的错误和缺点，同时敌人在战略战术上有了改变，因此使我们遭到了不必要的损失，增加了疲倦，把新的战役推迟了一两个月，同时增加了黄龙群众数万石粮食的负担。

第二，西北战局继续胜利发展

今后的西北战争形势，是我军一定继续胜利发展。此次麟宝战役，我军某些部分稍受挫折，暴露了弱点，取得了教训，这是取得下一个战役胜利的开始，是取得消灭马步芳军胜利的开始。如果我们先消灭青马八十二师，将甘肃全局打开，就会使胡宗南更陷孤立。再消灭胡军三个至五个旅，胡敌即将全部转入守势。在今年夏末秋初，我们将再度转入攻势，在秋天、冬天，我们将有更大的发展，更大的胜利。我们具备着胜利的条件，我们有着强大的野战军，有蒋区人民的拥护，地方党组织的协助。我们不怕暴露弱点，而勇于改正。我们有着正确的军事政策、社会政策、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只要我们团结千千万万人民去执行正确的政策，则反胡的统一战线更广泛，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目前敌扬言要再度占领延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敌人的兵力势将分散，重蹈覆辙，被我歼灭。但敌人占领合阳、韩城则有可能。如果陕南我军能够歼灭敌三十一旅，占领商县、洛南、山阳等县，从渭北吸引和牵制胡军四个旅，则我军可先向东府进攻，消灭胡军一两个旅，然后再回头打马步芳，进击陇东，歼灭青马八十二师，收复三边，继而出陇南，吸引并歼灭胡军。

消灭马军八十二师从革命的报复主义说是需要的，从建立麟千山脉根据地，歼灭胡军解放西北来说更需要。

在十年内战期间，四方面军在转向西北途中，曾吃过马步芳的亏。去年四纵队在宁县也吃了他的亏。这次趁我军疲劳，全力对付胡军之时，又占了我们一些小便宜，青马军便

小人得志，大吹大擂。但是，马军是脱离群众的封建的野蛮迷信的军队，他们奸淫掠夺，激起群众反对；他们缺乏科学头脑，只凭蛮横强悍作战，我们一定能够把他们消灭。

我们提议消灭马军八十二师为下个战役的方针。如果大家同意，就把它作为我们此次整训的目标。我们应立即全体动员，以有进无退的精神，以必胜的信念进行一切战斗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马军八十二师！

为着要消灭青马八十二师，我们要好好研究敌情，现就其两个特点说明一下：

其一，青马每个连队中有阿訇一人，宗教色彩很浓厚。干部以马家亲族为骨干，士兵中有汉人，但占多少比例尚不了解。该部野蛮强悍。在长期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下，民族成见较深，盛传有杀死汉人四五名即可升天之说。士兵在战斗中负伤后有自杀不当俘虏者。

其二，青马军的编制是步骑各半，在西北高原作战颇适宜。我退，骑兵即追，我停止，步兵即掩护。增援快，机动性大，骑兵战术较熟练，学日本人的骑兵战术原则，但无新的发挥，冲锋时持密集队形，勇敢但又落后。由于过去未曾遭过我之致命打击，现在很骄傲。又因部队干部之亲族关系，故一部被围，另部必救，且敢于分散来援。射击技术熟练，善打冷枪，但其他兵器之知识及攻坚爆炸等技术均差，不如胡军。

明了青马军的特点，针对其特点，研究对付的战术，我们就一定能够消灭敌人。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 〔1〕 本文是彭德怀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在陕西洛川县土基镇召开的西北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 〔3〕 余秋里，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员。
- 〔4〕 裴昌会，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
- 〔5〕 西府，指陕西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
- 〔6〕 麟宝战役，即西府战役。麟宝，指陕西麟游、宝鸡。
- 〔7〕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靖边、安边。
- 〔8〕 马军，泛指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所辖部队。此处指马步芳整编第八十二师，亦称青马。

贺龙在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二次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

（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我同意彭总^{〔2〕}报告中讲的三点。今天我谈下面四个问题。

一、后方情况介绍

河东、河西去年一年做了些什么工作？第一是支援前线。第二是整党、土改。第三是金融贸易，财政供给。

首先，我讲讲人力、物力问题。全边区总共四百余万人，我们动员的情况是：河东最低在百分之五以上，最高超过百分之十四，平均超过百分之七。我们估计九分区有很多女人，曾想将复员军人安置到该分区，但到中阳一看，好多村庄看不见一个青年的女人和少年，阎锡山把壮丁和青年妇女都带走了。蒲城等地空窑洞就有一万八千多个，群众生活很苦。去年，我们共动员了三万人参加野战军，五万人参加地方军。陕甘宁边区动员了两万青年参军，其中延属分区超过了规定数目，绥德分区完成了任务，陇东分区没有完成。此外，还有很多脱离生产服军勤的。在警备区范围内还可以看到青年，到了青化砭就看不到青年了，大部分土地都荒着没人种。这说明，我们边区的人力已经枯竭。在前年和去年打仗，后方还

可以供得上。现在除匪灾外，又遭于灾，仅警各区受灾人口

的错误，有的经过争论，才慢慢地把有些农民被划高了的成份往下划了。为什么把划高的成份往下划时就那么困难呢？关键是涉及到退东西的问题，贫雇农不愿意把已分到手的东西再拿出来，特别是对退土地，中农认为拿走了他们的好地，就是挖了他的眼珠，而贫农得到了好地就不愿意退出来。最后，还是经过各方面的调剂才算解决了。

关于工商业政策问题，毛主席在碛口、三交亲自作了调查研究。他到兴县问我们是不是能够退出来？我们认为，有三千石粮食就能退。退赔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步，退还小摊贩的东西，这得到一些干部的同意。第二步，退第二等商人的东西，又得到干部们的同意。最后，退大商人的。直到毛主席过兴县，经过了一个说服教育和解释过程，最后才把干部的思想搞通了。这次毛主席在晋绥讲话时，用群众的话做了总结说：“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⁴⁾

我们在去年的土改中，虽然犯了“左”的错误，但由于把富农多余的粮食都拿了出来，还挖了地主的浮财几百万元白银，其中用一百多万买了粮食，支援北线的绥远；又用几十万元给贫农团、摊贩买粮食，救济了老百姓，因此，就使很多群众没有饿死，今年就有人开垦荒地了，三、九、十分区的灾荒也解决了。只是神木的领导对榆林地区的粮食估计过高，所以灾荒仍比较严重。

第三、战勤任务繁重。去年一年，河东的抗勤任务就超过抗战八年的总和。在榆林作战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全部动员背粮，仅临县，三个月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

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省运来的。晋南也有万数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如果不是经过土改和整党，要完成这样繁重的战勤任务，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土改和整党中，把一部分坏干部整掉了，培养了八到十万的新干部、新党员，他们不脱离群众。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在义合开了一次会议，主要是反右，但没注意防“左”，这一祸水流到了农村，犯了“左”的错误，死了一些人。但反右是否收到了成效？今天尚无材料证明。义合会议对土地情况是不了解的，所以在老区也来了个平分，结果搞“左”了，但时间很短，很快就纠正了。边区的土地问题，除三边、陇东尚未完全解决外，总的说已经解决了。一九四八年的营业税也免了，所以群众支援前线十分踊跃，今年已做了几十万双军鞋，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支援前线。如刘家川附近林主席住的村子里，有一个农民，家中虽然只剩下一斗粮食，他也要拿出来支援前线，因为他希望解放军打下榆林后就可以收复延安，他相信公家一定能解决他们的困难。河西的灾情很重，但河东还有粮食，只要我们组织力量运过来，就可以减轻河西的饥荒。

现在，后勤部门的工作中，河东与河西不够协调。联防军后勤部是新成立的机构，工作仅敢于发电报、写信和批条子，不会去很好的协同河东与河西的关系，因此，对支援前方就增加了困难。卫生部工作也存在宗派观念。晋绥军区、西北野司、联防军各有一摊，互不协调。如联防军第四医院没有X光机，而河东晋绥军区卫生部却放着几架X光机不用，这样给诊治伤病员增加了很多困难。

由于后勤工作不协调，对军工生产也有影响。现在一颗八二迫击炮弹需要一千五百多斤粮食。照我们边区的情况，一个中农全年的生产收入只能用来生产半个八二迫击炮弹。按我们目前军工生产的能力，如找到一百五十万斤硝，在六月份我们可以生产山炮弹五百发，七月份还可以增加。我们有四个手榴弹厂，只要有原料，组织得好，今年可以保障我们野战军的作战需要。这些工厂是延安主动放弃以后搬过河东的。我们几千名职工努力工作，对支援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后勤工作不协调，影响了军工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

另外，对战争动员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战士到了前线就开小差。据边区统计，共有六千人开小差回了家。现在联司以张参谋长⁽⁵⁾为首，已组织归队委员会，分区进行工作，六、七、八三个月可以让开小差人员归队集中，如把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减少野战军兵力上的困难。为了更好的支援前线，做好后方工作，我想开过这个会之后，在延安还要开几天会，检讨后勤各部门的工作，使河东与河西的工作更好协调起来。

关于部队今后的供给问题，我认为，只要把工作做好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我们边区已发展到六百五十万人，粮食、棉花问题可以自己解决。晋西南人人都会纺纱，新绛县手工业有七十二项，布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代县、运城的盐也是很大的收入，三边的盐池也可以发展，白水、瓦窑堡的煤、河东右玉南山和左云东山的煤产量都很大，晋南的煤能供晋南几十万人用，五寨、宁武一带有大森林可以利用。我们现在自己办的火柴厂很好，可以不用外来的火柴并能出口。总之，

我们的收入还是很大的，而且在大片新解放区还没有人去作税收工作。所以，只要把财经工作做得好，吃饭、穿衣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同时，组织好运输也非常重要。现在晋察冀有几十万斤棉花，还没有运过来，如果把河东与河西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会人人提高，那时估计可以抽出一万八千多名劳动力来从事运输工作。

二、对西府战役^[5]的检讨

这几天，大家对西府战役的检讨很好，但是据我了解，同志们在会议上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出来。有的同志对党、对同志没有如实反映问题。有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但相互批评不够。纵队与纵队之间，旅与旅之间有意见。但当面都不讲，表面上看很和睦，而在背后又相互议论，这是很不好的现象，这对我们解放大西北是没有好处的。有的领导说，他们的部队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而事实上没有做到，但没有同志出来批评。中国有句俗语说：“瞒病者必死。”我看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还没有把脸皮扯破，没有把存在的问题都揭露出来，所以也就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比如对打瓦子街捉俘虏问题，某纵队对某纵队就有意见，但在这次会议上，某纵队不公开提出来，某纵队自己也不讲，既然相互有意见，为什么不公开放到桌面上呢？再如三五九旅一个团长为抢俘虏被人打伤了，某旅有个班长为了抢枪，就上起刺刀来杀人。对这种事情，这些部队的领导为什么不讲呢？如果现在不很好检查，那么将来还会犯错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彼此间应该做到亲如兄弟，团结友爱。但我们有些部队，不但未能做到这一点，还要相互打。有的打仗时打滑头仗，做假报告，

对这种情况，这些部队的领导要负责。

在杨家沟会议^[7]上，毛主席指出：对整个的敌人可以轻视，而对具体敌人不可轻视。在这次西府战役中，四纵队就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你们不是把两个旅的力量集中起来，而是分散使用，这就是轻视敌人。如果你们集中兵力过了泾河，就能歼灭更多敌人，有力的支援友军，使敌人无法抽兵，我军就能占领宝鸡一星期，这就对我们非常有利。

关于军事问题，我问过毛主席，他说：只要把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中关于军事问题的几条原则^[8]研究好了，就能解决问题。冬季休整以后，大家劲头很大，打第一仗，就消灭敌人五个旅，因为准备工作做得好，有歼灭敌人的把握，做到了毛主席说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攻打洛川时，由于那里地形很险要，我们准备工作做得又不够，所以把握不大。打洛川，一方面影响了六纵、三纵的休整；另一方面，我们伤亡了二千多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原准备围洛川打援，但敌人不北进，使我们没有饭吃，逼得我们非走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出西南。这一行动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被动的。因为敌人集中了十几个旅，只要它变化队形，就可沿公路与我军平行前进，我军则需要爬山、渡河。我们在马栏山也是没有饭吃，故只有往西南行动。

在上次前委扩大会上，与会干部都表示了态度，就应该保障战役任务的完成。我们的军队是有政治觉悟的军队，而且离根据地也不远。我们的作战对象，是没落阶级的队伍，所以，只要我们指挥员指挥得好，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比如在我军渡过泾河之初，利用敌人尚未集结，先扫清散敌，扩

大我之占领区，把敌人逼到咸阳、三原以东，这样，我们就可以争取几天时间，这一着做好了，就可以挽回被动局面。在岐山对抗时，我们有五个团，兵力不算少，但由于我们队形拉得很长，兵力分散，所以就不可能抗击强大的敌人。如果我们集中力量，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先占领屯字镇有利地形，进行顽强阻击，加之敌人十几个旅的兵力不是密集进攻，而是比较分散，我们只要打掉它一个团，它也要停一停，这样就可以打败它的进攻，争取二三天时间休息，再作好打的准备，这就有可能改变被动局面。但这仗没有打好，所以应该检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在军阀混战时代，湖南郭炳珍的两万多人，被几十万四川军队打败，只剩下八千多人，退到了湖北某地，在河滩上睡觉。他手下好多军官问他怎么办？他都不答理，只有一个军官说：“服从命令。”于是郭起身重整队伍，问部队的官兵是愿死还是想活，如果想活就只有打，他率部队回头一个夜袭，一直杀到川军的指挥部，打败了三十多万敌人，收复了成都。其基本原因，就是部队服从命令和注意了对战术的研究。

关于四纵存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由主要领导负责。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以后，我就有这样的感觉，纵队的主要领导对干部有些偏。如有的干部明明毛病很多，但该纵队主要领导几次来电报要这个干部，而他对积极的青年干部则认为没有经验，不能很好使用。在这次战役中，纵队主要领导对部队分散兵力，不执行命令也是知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他自讲的阶级意识不强外，我认为，这几年边区的和平生活环境对他起了副作用，他对有严重缺点的

干部没有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结果使他们犯了更大的错误，弄到了撤职的地步。这些同志的本质还是好的，如果纵队领导能及时对他们批评帮助，本来是可以挽救和改造过来的。所以，四纵的问题，应由主要领导负责。

还有某纵队的问题，纵队领导在发言中说了很多原因，我认为，这些客观原因虽然都能算是理由，但是，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在那里筹粮，这就是命令，就应该坚决执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不执行命令就是错误的。我认为，有的纵队有不愿打仗，只想走的思想。但你们应该懂得，我们只有打垮了敌人，才有可能安安稳稳的走。本来某纵在打了宝鸡后伤亡不大，又有弹药，为什么不能再打？根据上述情况，我觉得我们有的部队还不是十分顽强。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但在实现这个决心时，某些干部出了毛病。所以，这仗总的来说虽然打胜了，但有美中不足。我军西南行动虽然是被动的，增加了部队伤亡和减员，但也获得了敌人不少武器、弹药，缴获了坦克、汽车等，而且收复了延安和洛川，特别是收复延安，对全国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某纵队在伏击敌人时，由于兵力少，加上指挥上有毛病，否则会打得更好一些。

总之，这次战役行动，如下面能很好实现彭总的决心，会打得更好。四纵队的基层干部和战士都是子弟兵，他们的质量比哪一个纵队都强，把这支部队带成现在这个样子，应由纵队领导负责。所以，我提议高级干部要好好学习和研究毛主席关于军事的那十条原则。

三、关于整军问题

彭总所提的方案，我完全同意。整军的目的是为了组织

我们的力量，检讨经验教训，所以这次批评×纵队犯右的错误时，要同时注意防“左”。

首先，在组织上，对于干部称职的就用，不称职的就撤职或调动，×纵队就需要这样做。

其次，关于补充问题，最困难的是征新兵。在晋西北已征到五千人、石家庄有八千人，估计还可以动员归队二千人，拟六、七两个月补充到部队。另外，还可到各医院动员一至二千伤愈的老战士、机枪班长等回部队充当骨干，这是野战军的一部分力量，以上总共能动员二万多人补充部队。此外，对六纵队的武器补充问题，也要很快解决。

第三，整顿机关工作。整个边区司令部的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原因是大多数是文参谋，没有一个参谋头。所以，我提议在整训期间，对司令部的工作要很好整顿一下，要实行分工负责：一科要负担起一科的工作，二科要负担起二科的工作。我觉得二科的战略战役侦察没有做起来，甚至连战术侦察也没有担负起来。在战斗中，电台很重要，我们骑兵侦察力量很小，主要靠电台，特别是离开根据地到蒋管区作战，没有电台或电台联络不好，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第四，做好打出去的准备。野战军是一定要打出去的，所以现在就应该注意作好打到蒋管区去的各项准备工作。据我估计，前总的后勤工作也不是做得那样好，一定有缺点，比如前后方的协调就做得不太好，因此，在整训中对后勤工作也要好好进行检讨，特别是对运输队要很好进行整顿，因为违犯纪律的主要是运输队。在休整中，需要召开一个后勤会议，使前后方后勤工作衔接起来。如果后勤工作做得好，保

障部队的供给，这是对前方最大的帮助，也是后方的中心工作。现在野战军有奖罚条例，做到了奖罚分明，对后勤工作也要这样做。

现在后方军干校有九百多名学员，为了使他们的训练不与前方的作战脱节，而能适应前方作战的需要，我建议前方政治工作材料和各纵队整训中的材料，都送给军干校一份，以便学员了解前方的情况，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训练。

在两个月的整训中，对各部门的工作都要进行整顿，以便两个月后打出去时部队在战术和技术上都有提高，能适应打马打胡⁹⁷的需要。打马需要骑兵，打胡也同样需要骑兵，所以，练兵的时候一定要苦练，还要加强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战时主要是看能灵活用兵，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所以在平时就要教育和培养战士都能各自为战。练兵是要舍得皮肉之苦的，要把部队练得能攻能守，既能打攻坚战，又能打野战。

第五、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部队整训以后往西南行动时，群众纪律有所进步，但进步不算大，各级领导还没有把组织纪律性提高到阶级觉悟的高度，建立在阶级自觉的基础上。如在围洛川时，一纵队在秦关镇时群众纪律最好，但九旅¹⁰⁰的群众纪律还不是自觉的，而是带有命令性质。三纵队的纪律也比较好，某纵队的纪律就比较差，群众有意见。所以，我们各级干部要教育部队遵守群众纪律，并把它建立在高度的阶级觉悟基础上。我军的政治影响，就是我军的政治生命，为维护我军的政治声誉，必须加强对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之能自觉地遵守群众纪律，

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更为重要。三五九旅、二旅在整训以后，组织纪律性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第六，注意节省弹药。打仗时，各部队要注意节省弹药，这是件很重要的事，否则我们打仗是打不起的。比如攻临汾时，主要是冀晋、冀鲁豫供给的弹药，所以才能打。对我们的困难，我也曾向毛主席报告过，毛主席说：困难可以解决，一个办法是找蒋介石解决；再一个办法是划地区，从这两个方面，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现在战争中虽然缴获大，但还是要教育部队注意节省，节省弹药的主要方法是提高炮兵的射击技术，不放空炮。如果我们不注意节约，打下两个省以后，弹药供给困难还是没法解决。对上面讲的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和节省弹药这两件事，请各级党委开会后认真讨论，并采取有效的措施。

第七，加强各部队之间的团结。各部队之间要注意搞好团结。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在这次会议上，从有的部队暴露出来的问题看，由于当前兵员不足，所以他们打仗的目的是为捉俘虏，抢物资、武器、弹药，这是造成部队之间不团结的重要原因。此外，在战斗中打滑头仗，也是引起不团结的原因之一。对此，各纵队党委要好好的检讨。今后，俘虏应先交前总组织的解放旅训练，尔后再补充到各纵队。

四、关于中央指示新解放区的减租减息问题

弼时^[11]同志在前委扩大会上已提到打击面应缩小。实行减租减息，主要是为了缩小打击面，这是个策略问题。这样，便于争取和团结一切积极因素，争取大多数人与我们合作，孤

立极少数反动派，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贺龙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 〔1〕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起，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确定部队整训计划和对西北国民党军的作战方针。这是贺龙在会上的讲话。
- 〔2〕彭总，即彭德怀。
- 〔3〕〔7〕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对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政策、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纲领性说明。从会议开始到一九四八年春，中央用很大精力来纠正党内出现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
- 〔4〕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 〔5〕张参谋长，指张经武，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参谋长。
- 〔6〕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二日，西北野战军发动了西府战役，第一、二、三、四、六共五个纵队参战，在西府、陇东、洛川地区与敌作战，歼敌近二万二千人。“西府”，指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西府战役，有时亦称“麟宝战役”。
- 〔8〕指“十大军事原则”，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 〔9〕马，指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分别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 〔10〕九旅，即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
- 〔11〕弼时，即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秘书长。

彭德怀在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 第二次扩大会议闭幕时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王维舟⁽¹⁾诸同志的讲话，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启示，将使全军在思想领导上，掌握组织原则上，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提高一步。在八天会议中，同志们的意见和我在开幕时的报告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再就以下几个问题作一些补充：

（一）在三月一日消灭胡⁽²⁾部刘戡⁽³⁾援军，三月三日夺取宜川城消灭二十四旅后，继续扩大战果，解放黄陵、宜君、黄龙、白水、韩城、合阳、澄城，收复富县、甘泉，开辟了黄龙区大块新解放区。为了巩固后方，巩固新解放区，攻夺洛川，准备收复延安的部署和计划，在当时是必要的，是正确的。但洛川城周地形特殊险要，有利于敌防御，短期难以攻下。且胡军集九个旅来援，徘徊宜君，不进不退，援军不好打。继续攻洛与待机打援，又因粮食极困难而不可能。因此决定大踏步前进，攻敌要害宝鸡，调退洛川、延安守敌，以达到巩固后方，巩固新解放区，这一行动方针也是正确的。在西府⁽⁴⁾战役中，消灭了大量敌人，摧毁了敌人西北供给基地宝

鸡城；我三纵队在猛力追击延安、洛川守敌南逃途中，也取得了很大战果。但向西府行动前，因粮食困难，时间仓促（前委四月十四日在马栏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十五日传达，十六日出动，十七日晨攻占旬邑城及职田镇等），一切必要准备不充分（如必需的民工担架均无准备）。特别是没有将行动方针及可能遇到的困难深入传达和讨论，使每个指战员、工作人员有必要的准备，因此在西府的行动中，特别在陇东行动中，暴露的弱点就更多了。在四纵队党委会中，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影响到四纵队内部不团结，斗志不坚强，当时前委会并未深刻了解。对胡军能集结十二个旅援宝鸡，六十五师行动积极估计不足。对马军^[5]之实力亦估计过小（原先只知两旅四个团，另一独五团，最后才发现马军在去年合水战斗后，增加了四个团，共有九个团）。特别是对胡马两军积极密切配合认识不深刻。其实胡马两军配合，久已成为事实。去年六月我进行陇东战役时，胡军积极增援；二次打榆林时，宁马^[6]亦倾巢来援；这次西府与陇东战役，胡马两军积极密切配合，已经是第三次了。经过三次教训，才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这就是认识落后于客观事实。重复这样错误认识的原因：一是缺乏深刻检讨过去的教训，一是由于敌大我小，主观上总想利用敌阵营中若干矛盾。事实上久已证明，胡马两军在反共反人民这个基本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看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如发现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不相符合时，就要及时修正，否则就会犯错误。以上所述，出动前准备不充分，个别纵队内部情况了解不深刻，对敌人估计不足等三项，战役领导机关与战役直接指导者应负责任，也就是我个

人应负更多的责任。

(二) 四纵队负责同志采取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 已影响其内部团结, 以致邪气抬头, 正气受到压制, 发展到不执行命令, 几次丧失有利战机, 放弃与放走可能与应该消灭的敌人; 擅自放弃沿扶风、岐山、凤翔公路阻击迟滞敌人西进任务, 让敌人毫无顾忌的长驱直进, 使宝鸡缴获堆积如山的军用资财不能抢运, 使野战军主力陷入被动, 使二纵队独六旅受到侧敌侧水的严重威胁 (南侧渭河, 北侧扶岐公路强大敌人的威胁)。擅自放弃重大的任务, 而事先不请示, 也不通知友邻部队。虽经警告后, 但在陇东屯字镇向东转移时, 令其担任向屯字镇警戒掩护任务, 而又擅自撤至肖金镇以东, 离开指定任务的地点约百里, 使新四旅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像在屯字镇不执行命令的警三旅旅长, 反而平日受到所谓聪明的鼓励。试问: 这样不执行命令, 对人民解放事业不负责任, 平日对同志敷衍, 拉拉扯扯, 替自己抬轿子的老同志、老干部就是好人, 压制正气, 抬高邪气, 玩弄手段, 替个人打算的“聪明”, 究竟有什么用处?! 其结果是损害人民利益与党的利益, 害了同志, 也必然害了自己。我们所称谓的聪明, 应当是维护人民利益, 坚持党的原则, 有正确的思想领导, 有确切的工作效率, 在任何困难面前不屈服, 而能克服困难。总之, 此次四纵队领导机关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大家应当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来检讨自己, 检查各个部门, 才有用处。没有暴露问题的部队及部门, 并不等于没有问题, 可能问题就在你说没问题时酝酿生长着, 这是应当经常警惕的。

四纵队并不是每个同志都有问题，都不执行命令，都害怕敌人，如果有这样认识的同志那就是错误的。四纵队有很多好的同志，有不少英勇事迹。四纵队暴露与存在着的问题，正如纵队负责同志三次反省所述：本质上是缺乏阶级责任心，考虑问题不从全局出发，从个人得失出发，局部安危出发，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认为这样反省是很深刻的。因为小资产阶级，不属于无产阶级范畴，而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若不经严格的改造，则与服从共产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相当数量，是值得注意的。把它作为意识形态来看，小资产阶级特别突出的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愿意受组织的约束，在严重关头摇摆不定，在行动中考虑问题总是多从个人得失出发，照顾自己小集团出发；而照顾全局，是要在不损害其个人利益与其小集团利益下，才是自然的，否则是不自然的、勉强的，甚至是对立的。处在严重关头时，尤以自然的流露，以至违犯纪律，损害革命利益在所不顾。为了克服这些现象，特别是某些干部中存在着个人打算、小集团观点，必须提高其觉悟程度，破坏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学习劳动人民的正气和坚决勇敢、自我牺牲的精神。如独立五旅班长杨世德同志，被敌燃烧弹将其眉毛头发烧光，脸皮烧黑，身负重伤，连长、指导员及班内战士催促其下火线，杨同志考虑敌人正在反冲锋，班内无人指挥，坚决不下火线。有些同志为着完成爆炸任务，身绑炸药，爬至敌人碉堡面前，自身与敌碉堡同时粉碎。这类英雄事迹，不止一次，而是无数次；不是强迫命令，而是完全出于自愿自动的行为。这些

战斗英雄们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英勇的光荣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是万世师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这样高尚的政治觉悟，英勇行为，与小资产者的个人打算，小集团打算，是没有任何相同点的。特别是身为负责的干部，如有个人打算，能不惭愧？同时，战争是流血的斗争，要求各级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有丝毫疏忽。战役、战斗前须有确切的计划，周详的准备，严格的检查。切戒粗率行为。有些同志常爱说：“不能完成任务，你杀我的头。”这虽然也表示愿为人民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决心，但仅仅只有这样勇敢的决心是不够的，而必须在勇敢的决心上考虑到如何完成战斗任务。粗率的行为可能招致战斗中不必要的损失，那时真正杀掉你的头，又如何能抵偿损失呢？这样的同志应十分警惕。

（三）有同志说：在实际工作中要反对官僚主义。的确，官僚主义不仅存在，而且在某些部分还相当严重，必须坚决反对。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办法，是要走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深入下层，深入连队，反映群众意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总结群众中新的经验，贯彻与普及之。在日常工作中要求准确，反对借故拖延，反对借口“不要急躁”、“待考虑考虑”，敷衍塞责，这就是官僚主义。这与决定政策、决定工作方针，要细心谨慎，反复思考，反对急躁，没有任何共同点。

（四）六纵队在西府、陇东战役中虽然受了挫，但他们的行动是积极的，给青马军以严重的杀伤。六纵队的领导同志在照顾全局上是对的，缺点是把敌人看得太呆板了，当情况

变化时，缺乏灵活处理。一纵队在西府战役是坚决勇敢迅速的，但在配合六纵队夹击屯字镇外围之敌时，走错路，耽搁了时间是其缺点。二纵队在西府与陇东都保持了高度战斗积极性，自瓦子街战斗后，群众纪律、城市政策均有了进步。

（五）我们全军有战胜与彻底消灭胡、马两军的高度信心，这是很好的。很多同志讲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军队，这句话也是很对的。从历史来看，我们的确是不可战胜的。但这句话不能抽象的了解。所谓不可战胜的军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是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第二是要有正确的军事路线，第三是要有机警灵活的指挥，第四是必须团结一致，紧紧依靠人民。以上四者密切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才是不可战胜的军队。我们这些条件是具备的。第一、第二两条，我们有了英明的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的领导，只要我们细心研究中央文件，特别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指示^{〔7〕}，就可保证不犯路线错误。第三条，我们有了二十余年革命战争经验，只要我们不骄傲，不轻敌，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机警灵活的指挥就有了保障。第四条，我们已有了去冬整军的经验，只要继续提高全军的阶级觉悟，继续提高群众纪律，保持全军团结一致，军民团结一致，提倡艰苦奋斗与实事求是的作风，提倡干部为战士服务，全军为人民服务，提高军事技术、战术，我们就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军队，而且一定能战胜敌人，歼灭敌人。

注释

- (1) 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贺龙、习仲勋、王维舟，当时分别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 (3) 刘戡，原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在宜川战役中自毙。
- (4) 西府，指陕西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
- (5) 马军，指青海马步芳整编第八十二师。
- (6) 宁马，指宁夏马鸿逵部。
- (7)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参谋长 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

军队的组成成份主要的是士兵。其余的是指挥员、政工人员、后勤人员，都是为士兵而设立的，换句话说，都是为士兵服务的。干部为士兵服务，军队为人民服务。在我们革命队伍中，每个干部能够真正作到一切为士兵服务，才算是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切脱离了为士兵服务的思想，如个人打算、名誉地位等，都必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为士兵服务与否，是我们看问题与处理问题的尺度，一切真理是建筑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上。人的腐化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的，如贪污享乐等。另一种是精神的，如闹名誉地位、自以为是等。第一种事实很明显，这里不谈。有第二种腐化思想的人，他可以阳奉阴违，可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可以欺瞒哄。他经常以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去度量别人。他总以为别人和他一样的虚伪、不忠实。不愿意看见广大群众的热忱爽直和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这两种腐化思想，都是为个人打算、脱离群众，谈不上丝毫为士兵、为人民服务的韵味。

部队的指挥机构由司令机关、政治机关和后勤机关三个

部门组成。在反动军队内，表面上只有司令部、后勤部两个部门，而没有政治机关。可是他们也有政治工作。他们的政治工作就是反动的欺骗宣传。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部门是互相关联的，缺少一个军队就不能存在。譬如，司令部说要作战，假如没有粮食吃，就不能打仗。没有政治动员，仗就打不好，甚至遭到失败。整军训练也是一样，司令机关是指挥机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有司令机关就有参谋和参谋工作。参谋工作中有一部分技术工作。有一些参谋同志轻视技术工作，不愿意作技术工作，主要是不明了技术工作的内容。技术工作占整个工作中的大部。譬如练兵以技术为主，领导练兵要领导技术。指挥作战一定要看地形、绘图，计算敌我兵力和计算自己弹药等。了解情况是领导工作的基本任务，但其中大部是技术工作。所以技术工作与领导工作之间没有鸿沟之隔。不愿作技术工作的人只有不作工作。

参谋长的工作是了解情况，军队建设，了解下级指挥员的指挥能力，教育干部，检查部队执行任务的情形。他与首长最接近，首长企图和整个情况也知道的最清楚，参谋长应当把了解的情况和首长的意图，经常及时的通知政治机关和后勤机关，使整个工作协调。同时又将了解部队的一切情况向首长反映和建议，帮助首长下决心。参谋长要有思想的去计划工作，指导工作，使司令部的工作富有组织性（科学的分工和周密的制度），经常总结各部门的工作经验，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与能力。我们军队工作缺乏这一套东西，但我们正向这方面摸索中。因为我们同群众接近，故我们是进步的。我们应尊重别人和自己的经验，只要我们作得好，是可

以缩短摸索过程的。参谋长对司令部所有干部应经常进行教育，举凡是战术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过去和现在机关中缺乏学习空气，今后应当造成和连队一样的浓厚的学习空气。司令部缺乏干部或干部不称职的问题，应当检讨自己的工作。不称职的干部可以逐渐教育提高他的能力，自己称职也就会带动别人称职。事实上也没有毫无能力的干部。缺乏干部就要个别的提拔和培养，把参谋处变作一个学校。光等干部只有埋怨上级，结果干部还是不能解决，工作仍然作不好。只有自己积极培养教育干部，帮助干部进步，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在座的各位同志有今天的能力与职位，那个不是在别人培养教育下才得到的呢。

参谋长在自己的分工中应抓住重点，重点就是军队建设。平常减少一些繁琐事情。繁琐与疲劳往往引起人的心情不安发脾气。抓住重点，建立制度是减少繁琐事务的关键。

总之，一切为兵士服务，为人民服务。我们人民军队是个政治集团，每个人都是政治战士，为的是推翻旧社会旧制度，脱离了政治目的就不成为革命战士。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指示^{〔1〕}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

（一）我军经过一九四七年冬季整训，一九四八年进行春季攻势，在宜川与西府战役中，均大量消灭了敌人，收复了延安，开拓了黄龙新解放区。无论作战方针，部队本身工作，新区政策的掌握，均执行了中央和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正确指示，也证明了去冬整军方法与杨家沟前委扩大会议^{〔2〕}的决定是正确的。

（二）根据西北战局现状，胡匪经我历次歼灭及歼灭性的打击，已处于被动（某些进攻从战局来看，只是一种攻势防御），奠定了我军全部消灭胡马^{〔3〕}两匪军，解放大西北的强固基础。但敌人数量至今仍占优势，加以胡马两匪军积极配合，防线缩短，机动兵团高度集中。因此，我军目前作战方针，仍是集中兵力继续各个歼灭胡马匪军，扩大新的解放区。作战对象，过去主要是胡匪，今后则应是胡马两匪并重，不仅要继续准备歼灭胡匪的各项工作，而且要研究马匪特点，准备歼灭马匪的各项工作。

（三）根据我进军西府的经验，广大人民（包括回民）对

我军表示无限的热爱、亲切与拥护，即地主阶级除个别逃跑表示反对外，一般的地主均善意表现暂时中立，而工商业者则表示拥护我军。多数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申明自动脱离反动组织保警队、自卫队，不少部分自动缴械投诚（黄龙区两千余枪、麟游区一千余枪）。人民对保甲制度是痛恨的，但甲长多数不是坏人，保长有好有坏，乡长多数是坏人，亦有少数好人。对于上述各项人员，采取分别对待与处理是完全正确的。在征粮政策上，有计划的向地主征发（留下相等于中农口粮），必要时对富农征借其多余部分三分之二，购买其多余部分三分之一，证明这种征粮办法也是行得通的。今后进至新解放区，根据中央指示，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酌量调剂种子、吃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有步骤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种策略的改变将加速人民解放战争更快的向前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在部队中应普遍的进行教育，讨论中央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公布的土改与整党指示，使全体指战员深刻了解这一策略意义，将加速全国胜利与全国范围内的更早分配土地。

（四）经过战争的考验，证明我军指战员，具备了优良的政治品质与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产生了无数的战斗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创造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完成了并将继续完成着一切光荣的艰巨任务。以往的斗争成绩固然显著，但弱点还是相当多的，特别在意外紧张情况下常易暴露出来，表现在某些政治上的脆弱、革命责任心不坚强的个别分子，甚至发展到不执行命令或者不坚决执行，以致妨害争取更大的胜利，甚至招致不必要的损失。或者胜利之后，骄傲自满，妨

碍进步；或者受挫之后，表现气馁，夸大敌人，降低自己胜利的信心。这些现象都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现，哪怕是微小的都应立即克服。为此胜利之后，尤其大胜利之后，应注意检讨缺点，哪怕是微小缺点，都要认真检讨，如果因胜利掩盖了自己的缺点，也就蕴藏着新的危险性。同时应细心的总结好的经验，并坚持贯彻与普及之。而受挫折时，常易夸大敌人，故应认真的具体分析主客观原因（着重的检讨主观原因），反对相互埋怨。同时在部队中严格的进行民主的评功查过的群众运动，只有正确的领导这样的运动，才能真正达到分清是非，赏罚分明。发扬正气，发现好的新干部，大胆提拔这些新干部，吸收新党员，提高干部的党员的政治觉悟。经过群众严格审查推荐干部与党员的办法，在部队中应继续采用（因为去冬整训时，群众推荐出近千个干部，数千个党员，绝大多数是坚决勇敢称职的优秀分子）。继续放手走群众路线，发扬群众创造性，贯彻到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经济工作各方面去，这种整军方式，反复证明是最有效的办法。但军队本身是高度集中的组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是为了增加对敌斗争的顽强性，是为了提高战斗力。命令是统一全军行动与统一战斗意志的，服从命令就是服从人民利益，服从革命战争胜利，把执行命令提到自觉的高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此将增加不可估量的战斗力。

（五）关于军事建设，我们必须善于利用一切时间，使练兵习武成为经常性的群众运动。首先必须确定全军中人人皆兵，人人皆练的观点。每人都要学会使用自己的武器，使全军成为一个整体的战斗单位，提高战术技术（军事指挥员重

点放在提高战术，战士重点放在技术），反复讨论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使军事实际经验与理论结合起来。现在我军机关庞大，骡马过多，后勤机构亦甚笨重，妨碍战斗行动，应力求精简，老弱送后方安置，各纵队应成立辎重营连，注意爱护畜力教育，并须学会使用步枪、手榴弹，使各辎重部队有自卫能力。

（六）为了提高干部领导能力，加强工作效能，团以上干部必须利用战斗间隙时间，进行下列文件的学习：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培养干部，忠诚与老实，领导者的工作方法，对新鲜事物的感觉是布尔什维克的高贵品质，作为最近团以上高级干部学习教材。各级党委，应组织与领导这一学习，在学习中反省自己，检讨本部队中实际工作，改善我们的领导方法。

西北野战军前委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中共中央军委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复电彭德怀及西北野战军前委，同意西北野战军前委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指示的决定，并将此件转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前委参考。
- 〔2〕指西北野战军前委一九四八年一月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
- 〔3〕胡马，指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关于执行 中央报告制度指令的决定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前委一致认为中央及军委关于报告制度的指令完全正确，并决以认真负责态度在今后实践中坚决执行。

二、前委自解放战争以来，虽关于战役方针、政策问题向中央作过一般的报告，但无论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政策掌握、后勤工作，均未曾作过系统的总结报告。主要的原因是长期游击战争，分割局面，交通不便情况下生长的。某些同志在这长期单独工作环境中，养成听报告而无向上级向中央作报告的习惯，最重要的对报告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刻，没有实际情况分析与综合的报告，使上级和中央无法了解下边具体情况。其实质是拒绝领导，也就是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破坏党的统一行动与集中领导，如果继续下去将造成重大的罪过。

三、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不仅是下级对上级应尽的职责，而且权衡领导是否正确的准绳。因为如果该报告内容不是空洞无物，则必然是发现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收集了经验，并经过了深思熟虑，而总结了这些经验，这

不仅对上级提供了真实情况的报告，使能通盘筹划，给以及时的指示，而且使领导者本身在体会经验教训中提高了自己思想，改造了作风，并以之教育部署，使群众中创造出来的新经验，能很快的普及全军，这就是实际的反对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

四、我野战军在一年多来战争中，出现了无数的战斗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在广大群众无限革命热情与激励下，创造了丰富的战斗与工作经验，但领导机关并未能及时的发现与总结起来报告中央，并在部队中加以普及与提高，结果一般的群众性的工作方式方法是下层较熟练，进步较快；而上层则较生疏，进步较慢。凡能深入群众，并能锐敏的接受与归纳群众经验的干部及机关，则进步很快；而墨守成规甚至摆老资格者，则进步甚慢。如不彻底纠正，则不仅对中央作不出完备的报告，且将严重的阻碍部队的进步。

五、前委认为今后要做到及时的总结工作，向上报告向下普及，在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要进行认真的清算，才能及时的发现问题，正视与分析问题，严肃的态度处理问题。官僚主义常使我们看不见问题，即看见了问题也是马马虎虎不了了之对待问题。为此，在执行报告制度中，必须首先进行严格的工作检查制度，实行各部门在集中领导下的具体分工负责，以免报告流为形式。从前委起，必须抽出时间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整理材料，整理经验。同时责成各纵、旅党委及各级军政机关，根据中央及军委这一指令深刻的检讨，今后务须按时将军事政治工作，执行政策，各个战役分别的及时的向前委作工作报告，以便

前委向中央及时报告，是为至要。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一九四七年冬季整军报告（摘要）^{〔1〕}

彭德怀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未进行诉苦与三查^{〔2〕}运动前，西北野战军内部各种思想状况。有些人说：哪里不是当兵，哪里都是吃粮，当兵吃粮的只要吃得好穿得暖就行了。这一部分人多半是脱离生产多年的兵贩子。有些人说：打内战是不应该的，其责任国民党蒋介石要负，共产党也要负，只要能和平，宁愿少吃一碗饭。这种无条件的和平主义思想，初补入部队中的俘虏兵占相当大的数目，解放区内的农民兵士也有极少数同情者。另有一些人对于人民解放军宣言、土地法大纲，采取消极态度。这些人说：宣言大纲都很好，可是战争这样残酷，活一天算一天，分了土地有什么用呢？这样认识的人其中多数是俘虏兵，但亦有极少数的老战士与某些个别干部的同情。另有一部分人对土地法大纲与人民解放军宣言拥护，希望战争迅速胜利，好回家分地。军队中的群众纪律很坏，牵牲口、拉夫、打人甚至有个别强奸者，普遍不爱惜公物与民物。上述这些庞杂的思想与严重的破坏群众纪律，严重的妨害军民团结与军队内部应有的团结，妨害进步与战斗力应有的提高。在青

化砭战斗时（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即发现了严重的破坏群众纪律，打鸡杀猪，买东西少给钱甚至不给钱者。青化砭战斗胜利后大整纪律，蟠龙战斗胜利后又整纪律。到陇东战役时（六月）为烤干粮损坏群众几百口锅，踏死青苗、马啃树皮仍然是普遍现象，在环县战斗胜利后又整纪律一星期。三边战役后，又有十天休整，严肃纪律仍列为重要课程。榆林战役后，至沙家店消灭三十六师时，纪律很坏，在柏树塬牵过群众毛驴三十余头，并有强奸者，枪毙了一个十九岁的侦察员（这是整纪律的一个讽刺）。经常念着加强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实际上收效甚微，其基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民主作风与真正的群众路线。只有经过诉苦与三查运动后，上述严重的恶劣现象基本上不存在了，部队中的气象焕然一新，部队战斗力，共产党在部队的威信大大提高。这就是说明群众路线与民主作风的整军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继续发扬群众的创造性。

（二）三查（有四查五查者）运动前的思想准备，就是普遍发动挖穷根与彻底挖蒋根。挖穷根的目的就是在思想上解决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打倒地主富农思想与立场，建立明确的为土地而战的意志。挖蒋根的目的就是要清洗对蒋介石的一切幻想，建立彻底打倒蒋介石的思想。在上述思想准备基础上再行转入三查运动，以达到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的目的。各部采取的方法是不同的，有的是从讲解土地法大纲开始的，有的是组织座谈会开始的，有的直接提出问题讨论为什么有穷富开始的。一般的是经过酝酿，从漫谈与争论中找出典型，进行诉苦与发动诉苦运动，又从诉苦中找出问题，展开讨论。

这样反复的来解决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问题，这种方法一般说是成功的。如于德水说：“我是河南人，家五口，租地四十亩，种三年，第四年父病，欠租还不起，父亲将我送铁厂拉风箱，每天半斤铁做工钱，年底算帐给铁不给钱，说了许多好话，当时铁价每斤三毛钱，折作每斤二毛钱，将钱买一点肉与油，腊月二十八日回家过年，当日我就被拉壮丁当了兵。正月初三日父亲去看我，因衣服破烂不准进去。过了三天碰上我出来解手才将我父亲接进去。父亲拿出自带的糠窝窝来啃，我看了非常伤心，马上跑到司务长处说明父亲来看我，请求给他一点饭吃。司务长态度很不好，说：各有各的饭钱，要吃饭拿钱来，我说家很穷没有钱，司务长说谁要你穷的，以后讲了许多好话才给了一碗饭。父亲吃完这碗饭放碗不放筷子，我知道父亲没有吃饱，又去找司务长哀求了半碗饭，父亲见只有半碗饭，知道没有了，吃完后只得将筷子放下。”诉到这里，于德水放声大哭，同时引起李福林同志哭，以致全场都哭起来了！大家见于德水哭得很难过，劝他不要讲了，他说我还要讲，国民党那里穷人是吃不开的，解放军这里就不同，我被俘时就看到家属来了好好招待。于德水边哭边说，我们穷人多，我们穷人团结起来才能翻身，才能报仇，我一个人不行，要大家起来才行。指导员即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了“苦从何处来”？请大家想想。略停一会即有张学成说：我给地主做了三年长工，每年工资议定分二批，三月给一批，四月给第二批，如果这样给工钱可买一石八斗米，但老财迟到五月给第一批钱，六月给第二批钱，结果只买到七斗米，老财剥削了我一石一斗米去了。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指导员

又启发大家说，除了这些剥削是否还有其他剥削？高大明就问张学成说：一年你给地主种多少地？张说：地主雇两个长工，一年种一百四十垧地。高又问每年能生产多少粮食？张说每垧地可收五斗。大家计算每年能收七十石粮，每人生产三十五石粗粮，折合十七石五斗细粮。有人提出种籽，有人提出牛工、工具及工钱等，经人家精细计算后，认为地主净得五石七斗细粮，再加上迟给工钱剥削一石一斗，每年白白的给地主劳动六石八斗。过去认为穷是命苦，现在才知道是老财剥削穷的。指导员又向大家提出粮食究竟是哪里来的？土地自己不会长粮食，老财吃的粮还不是剥削了穷人劳动的血汗，老财剩下的粮食又买地，又雇长工，如此越剥削越富了。于是有人说，河里的水不值钱，我要担上山来就值钱了，你要买我的水喝，这不是水值钱，而是我的劳动力值钱。有人说土地是人民的，不劳动即不能生产粮食，还不是一块荒地，种了才有收成，这是因为我种地出了劳动力才值钱的（才有价值的意思）。生产出来的粮食又交给地主，这就是剥削（上面诉苦材料是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六团通讯队）。在整个诉苦运动中，各阶层均有不同的表现，一般地主富农成份不愿意别人诉苦，中农诉苦只说受压迫多，剥削难有具体事实。在这里看出七一六团通讯队指导员是正确的了解思想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通过群众自己的思想才能提高其觉悟，也就是正确的掌握了群众路线与民主讨论的方针，具体指导与通过群众结合。尤其是善于在酝酿过程中发现典型，运用典型推动全面进行诉苦运动，达到了挖穷根坚定斗志，也达到了挖蒋根打倒蒋介石的思想教育。这证明他所采取的方式是

从实际出发的，收效是很大的。另一种方式是从抽象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如二团某营教导员，当接到上级指示，诉苦运动必须经过酝酿，然后才发动诉苦，他（营教导员）说战士不懂得阶级，怎能懂得剥削关系？故采取上大课办法，讲阶级怎样产生，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讲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结果不是诉苦大会，而是开了一个哑巴大会，战士一样解不开，白费了时间。又如四团三营花费了不少时间，调查典型，虽找到了一个典型，但没有经过群众酝酿，突然发动诉苦，战士毫无思想准备，典型又不是从当时的群众中产生的，而是从外面搬来的，结果也未发动起群众诉苦热潮。总之在诉苦运动中，内容是很丰富的，方式好的多，坏的亦不少，上述不过举其一例。

（二）三查运动的目的是要继续纯洁思想，纯洁组织，加强工作效率，提高战斗力。在深入的诉苦运动中，大体的划清阶级与敌我界线，帮助三查运动打下了思想上的相当基础，这是三查运动前的重要步骤。但诉苦运动尚未涉及各方面的具体事物与具体的人，去冬经验证明，三查运动一经发起，必然广泛而复杂的接触与联系许多问题。领导机关提出三查是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而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后，自动的查工作、查经济、查纪律、查领导以及查支部与党员的作用，形成了党内党外，从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经过这个斗争解决一连串的问题，检举暗藏的奸细分子和不可改造的兵痞流氓分子，批评历来斗志不强和地主富农出身而未放弃其地主立场的干部；撤换了一批干部，其中有团营长各一，连级较多。经统计，检举了前方及后方留守处

不少贪污事件。许多干部过去爱打人骂人，以致违犯群众纪律，工作不积极，被群众审查尖锐批评后，改变了态度，一般的工作更加积极，作战更加坚决勇敢。特别是能接受群众批评、态度诚恳的干部，更加取得战士爱护。过去解放兵、子弟兵间不团结的现象，经过诉苦与三查，被阶级友爱所代替了。在三查运动中，解放兵有被补选为三查委员者（当时三查委员会群众极重视，某个伙食单位有反复选举至四五次者，提出委员标准是三要三不要。三要是：要负责，要虚心，要坦白；三不要是：不要怕麻烦，不要怕得罪人，不要说假话）。党的威信在部队中大大提高了，群众认为入党是无尚光荣的，有希望自己努力工作立功入党者；有的在作战时，一连数次负伤不下火线，要求在火线上入党者；有的将自己名字写在口袋里，要求不幸牺牲后追认为党员者。事实说明，大胆把干部把党员交给群众审查，不会降低干部与党员在群众中的信仰，反而取得了群众更加亲热的拥护，这在全野战军中得到普遍的反复的证明。但当群众审查党员与干部时，应在干部中、在党内进行深入的解释，号召每个党员与干部要经得起群众审查，要普遍的在党内外解释共产党干部与人民事业的关系，入党的条件，解除党员与干部的顾虑，增加群众对党与干部的正确认识，作为审党审干的标准。经过诉苦、三查、审党、审干后，部队学习情绪、遵守纪律大大提高，过去的讲怪话、自由主义现象现在很少看到，甚至看不到。许多干部感觉现在兵好带了。过去长期存在着军事工作干部与政治工作干部相互争时间，以致闹成不团结者；现在一致认为政治思想搞不好，其他一切工作也搞不好。现在练兵习武，

大家认为先须有深入的政治动员，因此开始时都是政治工作人员（指挥员战士），在练兵习武时，人人皆兵，个个皆练，大家就成了军事工作者（这是指工作有重点和合拍而言），军政干部就更加团结了。

（四）三查运动中的缺点：1. 严重的是三查运动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纵队与纵队，旅与旅均不平衡，上下也不完全一致，有的表现上动下不动。原因是干部领导未与群众结合，也就是群众路线在具体的执行中，酝酿、启发、商讨一套办法不熟习。也有表现下动上不动者，其原因多半是其直接领导干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不愿全面展开三查运动，怕暴露自己的毛病，或顾虑今后的工作威信等。纵队与纵队比较，一纵队诉苦与三查运动，做得比较普遍深入，从上至下，司、政、供、卫各部门到连队所有人员均无例外的参加了这一运动；二、三、六纵队次之，四纵队又次之，野战军直属队最落后。三查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另一原因，是前委缺乏具体领导与及时的经验总结，交流各纵经验，以便缩短不平衡现象。诉苦与三查运动深入的部队马上表现出新的气象，问题少，进步快。凡属这一运动不够深入的部队或部门，就表现问题多，不安心工作，野战司令部就是一个具体例子。在一九四八年七月民主大会以前，不少的人不安心工作，甚至个别的企图开小差。七月民主大会以后，不安心工作的安心了，不积极工作的积极了，想开小差的不开差了。有个政治协理员，他的工作态度以前是很恶劣的，经过七月民主大会所有人员（伙夫马夫运输勤务在内）的尖锐批评，他的工作态度亦有改变，群众对他的认识与关系亦有改善，对他的工作信仰并未降低，

反而有若干提高。2. 三查运动中有某些过火的行为，隐藏在部队中的恶霸地主、俘虏军官、组织叛变的奸细分子以及严重贪污分子，一经查出即行捆（也有捆错了的）、吊、打，以致打死人，甚至有个别逼供信的错误。虽时间很短，共有几天即行纠正，但造成某些部队中的恐怖，使真正的奸细不易除根，被打死的奸细罪恶也未充分暴露，不易教育群众。另一种压制民主现象，如批评某些干部时就变脸说：“三查运动时民主权力是你们（指士兵）的，这是暂时的，三查以后权力是我们（指干部）的”。这表现某些部队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与群众路线还很差，阻碍了发动群众与部队的进步。领导者必须清醒的注意到上述偏向，在群众未发动起来时，应替群众撑腰，解除群众的各种顾虑（主要是怕干部报复），使群众敢于讲出自己的内心话。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时，应爱护群众热情，只有领导群众说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更提高觉悟，才能积极的起来查斗志、查工作、查纪律。至于检举出的罪恶分子，应交上级政治机关；检查出的不称职干部，应建议上级处理。

（五）诉苦与三查运动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所获得的的成绩是：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部队团结，提高了群众纪律，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提高了群众热情，发扬了群众创造性（过五关式的瞄准检查法，反光的瞄准镜，不改装的迫击炮抵近平射，挖坑道不响而快的办法，拔地雷的各种新办法，以及使用手雷枪榴炮等），提高了部队战斗力。部队中的管理教育方式，亦有重大改善，各种互助小组，即战斗中的三人小组，平日军事、政治、文化

学习小组和行组（行军中身体强帮助身体弱的）等起了重大作用。这些成绩、这些经验是值得宝贵的。但这决不是什么都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相反的，我们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或者只是解决的开始。如：无政府状态在西北野战中是存在的，我们还有许多工作缺乏条理化，没有及时的总结（也不会总结）和按级报告。各级领导机关（前委、纵委、旅委）大多数同志还是依据自己经验办事，缺乏马列主义初步修养，因此缺乏预见，小胜骄傲，受挫气馁，且一再重复。在工作作风上：一方面，经常表现急躁，另一方面又表现缓慢。在维持部队纪律方面：打大胜仗因骄傲易犯纪律，受挫时情绪低落易犯纪律，过度疲劳、粮食等困难时易犯纪律，在这些时间各级干部对维持纪律应当特别注意，却往往在这些时候松懈疏忽起来。战斗频繁且残酷，伤亡大，部队新老成份变化大且快，今年我们已补充两万以上俘虏兵就是事实。如不注意随时提高他们的觉悟，去冬三查运动及今夏（六、七两月）四评运动所获的成绩可能破坏，而且已有破坏，回到黄龙时就发现有打人的事情。四评运动除二纵有初步总结报告外，其他各纵还无报告。在二纵四评总结中看出：评斗志、评政策、评纪律、评工作，基本的是在三查运动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特别在评功、评过、记功、记过、奖功、罚过上更加细致；对民主作风与群众路线在二纵中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发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从领导重点来说，三查运动着重于暴露坏的，联系到表扬好的，四评运动是着重于表扬好的，联系到暴露坏的。四评运动总结报告须今年冬季整训才有时间，请准予推迟。其中不妥之

处请指示。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 (1) 这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报告摘要。
- (2) 三查，指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刘景范^[1]在西北野战军纵旅供给 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

这次会开得很好，在会议上彭副总司令、张副司令、白部长^[2]关于野战军的供给工作中许多重要的思想问题、政策、方针，给我们作了明确的指示。大会上黄部长^[3]的报告和许多同志的发言，都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上，虚心的检讨我们执行政策和日常业务的缺点与错误，并求得改正。这样，使我们在短短的七天会议中，不仅是把同志们提高了一步，而且已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现在我就以下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西北野战军的供给问题，在陕甘宁晋绥人民以人力物力的积极支援与中央关心、华北帮助以及后方前方同志们的一致努力，使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不仅收复了边区绝大部分失地，而且解放了黄龙，巩固了晋南，使我们有了六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块根据地和人力物力较丰富的晋南及黄龙两地区，作为支持战争的主要基础。同时野战军经过去冬的三查运动^[4]，除部队的阶级觉悟大大地提高，战斗力大大地加强外。同时更能执行政策，严守纪律，这样不仅博得新区广大

人民的热烈拥护，积极支援，且使今年一、二月间，前委扩大会议、联勤会议及野战军财委扩大会议决定的新区筹粮筹款政策、统筹统支方针、供给工作上之基本制度（供给标准）等之贯彻，获得成绩。基于以上条件，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之供给工作较过去有了进步，首先是部队的粮食衣服得到了保证。

粮食自进入新区后，由二月十五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八十天中，在黄龙、西府两地区，执行了夺取敌人仓库并向地富征发征借的政策，在宜川、洛川两战役中，因部队相当集中，敌仓过少，地主粮亦少，军粮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一部分粮食是借买中农的，同时在宜、洛、关中亦支用了老边区一部分粮食，解决了军粮问题。这一时期部队共用粮食六万三千五百六十一石（以麦计算），其中用陕甘宁晋绥粮七千零五十九石，占百分之十一点一；新区筹粮五万六千五百零二石，占百分之八十八点九；在新筹粮中，夺取敌人仓库粮食一万九千六百二十八石，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征发地主粮食一万零九百七十石，占十九点四；征借富农粮食一万八千四百零七石，占百分之三十二点六；预借中农粮食三千五百九十一石，占百分之六点三；购买粮食三千九百零四石，占百分之七。部队从西府转入黄龙后，黄龙已无存粮，再采取上述政策，筹粮亦不可能。但依据中央合理负担的政策、指示，仍可筹一部分粮食。由五月十六日到八月十五日止，九十六天中，共用粮七万四千四百七十九石，其中黄龙分区筹供了五万九千五百八十三石，占百分之八十；晋绥转运供给了一万四千八百九十六石，占百分之二十。这样部队粮食供

给，除瓦子街战役，在梢山地区部队高度集中的情况下，部队和医院缺乏粮食外，一般的均未发生困难。经费、被服、弹药等，一九四八年夏季前共领了单衣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套，八月底前共领了军鞋三十三万一千七百一十五双，按每人发两套单衣，两月发鞋子一双的规定，均大体按时发到。经费三月至五月，领后方一千一百二十四亿多元，尚差不到百分之十，六、七两月份经费到八月底继续领到了六百五十余亿，占百分之九十强，领后方春夏季各种装备布（被子、绑腿、米袋、干粮袋、炸弹包）一百八十五万四千六百余方尺。炮弹按规定应发之数亦大体按时发到部队，这是在我们新区供给工作尚无经验与西北目前灾荒严重、财政困难、交通落后、大兵团作战的情况下能够如此也算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各部队，由于过去生产自给、分筹分支所产生的各自为政的收支政策和不统一的供给制度，现已初步走上了家务归公，缴获交公，按统一的供给标准，开支经费、粮食等，使我们供给工作开始走上正规。同时在新区坚决的采取使用农币，以敌币土产回笼的方针，大大的提高了农币信用，不仅部队所到之处，农币能畅运，且在某些地区，部队走后群众仍暗运农币，在新区农币由实际上比价一比一（牌价一比三）提到一比八十至一百，这样使物价在稳定的情况下慢涨，直接起了保证供给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工作上的成绩。

但这些成绩是不能使我们满足的，因为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如在执行新区征发征借政策中，为急求需要，许多地方在征发粮食中有意无意的把中农提升为富农，影响农民情绪，个别地方征发地富的作坊、牲畜，影

响工商业发展。某些部队缴获不能完全归公，亦有缴获处理和欠妥（宝鸡缴到布匹单衣），影响部队的团结。部队对建立各项供给制度，未采取严肃态度，认真执行，因而各种收支报销的会计、审计、预决算制度均不健全，个别部队由去年三月到现在帐目不能结算，特别是粮食支出普遍无帐，某些首长不按制度开支经费和随意批发等，这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不仅形成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如这次会议中所反映浪费材料是惊人的），若不引起警惕，发展下去，将造成严重罪过。在经费供给方面，三月至五月曾领到百分之九十强，但只有百分之四十农币，周转筹码不足，发生了困难。六、七月份经费，八月底不能发齐，八月份经费到现在分毫未发，严重的影响战士生活。在被服装备缝制上、各种装备与各种弹药器材的补给上，亦无周密计划与检查，除许多不能按规定补给外，三月至八月标准规定之装备（被子、绑带、米袋、子弹袋、炸弹包）应发布五百二十六万五千余方尺，除领尚差百分之六十四点八，且有些不能用、不适用或不耐用者。这些除浪费了许多物质外，往往转运误时，领取落空，影响供给，浪费了人畜力。以上的错误与缺点，主要原因是：

（一）在长期分散的小兵团作战环境下，所产生的游击主义习气，缺乏长期的、全面的、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系统的军队供给工作建设的观念。因此，在一切后勤供给工作的计划、布置进行和一切工作制度的建立，都带着严重的游击主义习气。（二）由于供给工作的繁杂、具体，许多办供给工作的同志，忙于应付日常的具体工作，忽略了在理论上的修养与政治上、业务上学习提高自己，因而在工

作中普遍的存在着严重的经验主义。（三）在执行具体任务时，缺乏认真负责的去精确计算，具体布置，严格检查。这样官僚主义的态度，使我们工作中遭到了很多损失。（四）不以连队供给工作为中心，致战士生活上许多可能解决的困难，不能得到解决，引起普遍对供给机关的不满，脱离了群众，这实际上就是没有□□□□的。若不警惕，将形成供给工作中的重大错误。（五）部队干部对政策观念的模糊。只急求解决困难，不重视检查研究，了解情况，学习政策，掌握政策，因此在征发政策中犯了某些错误。（六）对新区的情况不了解，对以战养战的口号，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无具体分析，认为一到新区，一切困难都能在缴获敌人的与没收官僚资本及地主阶级的物质中得到解决，盲目的乐观，忽略了事先准备，因此在经费与装备等问题上，到六月以后接济不上，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以上的缺点，主要是野供负责，特别是我个人应更多负责，但旅以上的供给机关亦有责任。

二、根据目前的情况，在财政政策上必须实行统筹统支，才有可能逐渐达到全面的保证供给，战胜敌人。否则，将愈见混乱，困难愈多，阻碍与影响胜利。因此，统筹统支是目前决不能动摇的政策。为真正贯彻这一政策，必须做到：一方面，收入全部归公，一切战场缴获，新区之接收，征借等所得之经费、粮食、武器、弹药、物资、器材均应全部交给大公，旧存的家务亦应全部移交后方。为此野战军在目前的情况下，从思想上、行动上彻底反对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与盲目的乐观思想，同时一切财政开支、供给标准、审计工作都在保证战争胜利的前提下，照顾

全局、照顾群众、为人民服务、为战士服务的精神下，有重点的调整支出，并严格的执行会计、审计、预决算、移交等制度，奖励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上述观点，应在全党全军干部中，尤其在供给干部中，经常的反复的进行教育，求得认识一致，努力执行。另一方面，必须适当的解决物质供给，在物质供给上，除经费、被服、装备、器材等主要由后方筹供外，粮食主要靠部队就地筹供。这次大会已讨论修改了供给标准，经费后方已在努力的设法，将八月份的经费于九月十五日前发齐，九月以后的经费亦尽量按月发齐，各种装备与器材，后方正在全面筹划、购置，按标准供给，但要求结实耐用为原则，有计划的购置，但我们决不丝毫的忽视西北战场的困难，以后仍会有许多困难到来，因此我们决不能放松进行开源与节流的工作。在开源方面，应尽一切努力在战场上收缴敌人的一切武器、弹药、物资、经费、器材等以及在新区接收敌人的银行、工厂、矿场很好的管理，进行生产、税收等，帮助新区群众生产，以此收入补助政府的财政开支，同时认真的执行奖惩条例，反对贪污浪费，开展节约运动。像我们这样的庞大支出机关，做好节约工作，实际上就是为人民减轻了负担，为大公增加了收入。再一方面，必须执行供给标准、分支程序，会计、审计、预决算、移交收支公布等制度。没有这些制度，统筹统支根本不能实现，没有这种制度，要消灭贪污、浪费，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都是空谈。

标准规定与分发程序：在日前困难的情况下，标准规定首先要求吃饭穿衣和作战有直接关系之各种开支得到适当的保证，这次大会对于供给标准的考虑修改以及金额标准和市

价相对的平衡等决定，均按照以上的原则。至于分发程序应有轻重缓急，今后一切开支审计机关与供给机关应视其重要程度，先解决战士的生活和备战开支，其他如招待、慰劳、奖励、演戏、送礼等费尽量节省，以至不支。

会计制度：真正的收支统一，必须建立会计上的满收满付，一切收入和支出（不论粮食、经费、被服、装备、器材等），都应从帐簿上公开的表现出收支数目，克服现在某些部分存在着的支出帐和收入帐分立，只公开上面发给的收入和支出，自己收入和不按制度的支出打埋伏以及粮食收支无帐、重财轻粮的观点。同时会计业务必须独立，会计员按会计制度记帐，若不违背会计制度和贪污舞弊，任何人不得干涉其业务，这样才能看出帐簿上的真实情况。同时，预决算及表报必须按期进行，移交制度要严格建立。这次大会拟订的野战军军用会计暂行办法草案很好，应作基本通过，责成野供⁽⁵⁾酌情修改并交野战军首长审查颁布执行。

审计制度：在目前我们供给制度仍存在着某些混乱的情况下，要能做到真正的支付合理，按制度办事，审计工作之建立成为关键。目前的重点，在连队主要是审查粮食，在机关主要是审查经费，这两项审计工作做好，将使我们的浪费大部分可以消除。为要作好此两项，首先要加强初审工作，即是连队和机关各伙食单位的第一道审计工作，要认真的审查预算，凡一切不合规定的预算，绝不能成立。同时要认真的审查决算上的原始单据，除一切不合规定的开支不准报销外，应特别注意单据本身的弊病等，防止贪污。为此，必须加强团、旅、纵、野总审计的组织（特别是团的审计室），使其有

能力深入各伙食单位进行工作。

为适合目前野战军的供给制度，审计机构应建立四级四审制，野总财经委员会成立审计处，纵、旅、团财经委员会成立审计室，直接归财委会书记领导，办理日常审计工作。野战军的各级审计机关，是各级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关，它代表财经委员会（即代表战士）监督其收入、接收、征收是否正当（是否合乎政策），支出是否合理（是否合乎开支标准与制度），向财委会提出报告，由财委核决，这是他总的权限。必要时财委会可授一定的权限，处理日常审核工作。各级财经委员会审计权限的划分：团为初审，旅、纵均为复审，野总为决审（因部队运动，距西北审委会较远，暂以决算权授之）。核准权限：纵、旅、团只限于预备费内之开支，野总除预备费开支外，全军临时费亦属之。实行经济民主制度，坚决反对首长或财经供给机关包办的制度，这是实现上述制度和消除贪污浪费的保证。为此除取消首长批发权，一切核批皆归审计机关外，由野战军总部起到连队伙食单位止，一切经费、粮秣、被服、装备等收支帐目，须按月向下一级公布，向上一级报告（连队向全连队军人公布），并由财经委员会组织讨论，如发现收支之弊端，则组织民主检举。

三、粮食（草）供给：部队拨草靠后方远距离转运，耗费民力，困难多端，因此主要靠部队就地筹供。筹粮政策根据中央实行合理负担的指示，野战军在新区（政权未建立之区）除应坚决的夺取敌人的粮食草料供给外，不足者采取向地主、富农、富裕中农预借解决。对各阶层预借粮草的标准：（一）对地主如系大中地主，除留其生活费用需要外借其所余

全部。如系小地主，除生活费用需要外，借所余三分之二。地主如在政治上是恶霸需罚粮罚款者，须经纵队以上党委批准。地主如在政治上开明可酌情照顾。（二）富农除必须留给生活和再生产的费用外，借其所余者三分之二。（三）中农（只限于富裕中农）除留给足够的生活和再生产的费用外，借其所余三分之一，但对中农所借之粮草决不能超过国民党政府所征之正粮与附加粮总合的三分之二（即轻三分之一）。总之以乡为单位预借面最高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

预借粮草只能是政权未建立期间的临时办法，政权建立后需由政府按合理负担的征粮条例进行征收粮（草），但上项之预借粮（草）应由政府在征粮中偿还。

在预借粮草的地区，必须向群众（包括各阶层）深入的宣传我们合理负担政策和预借意义、标准等，避免群众（包括各阶层）怀疑或恐慌，逃避负担。同时要具体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预借户的经济状况，切实按中央分析阶级办法，发动群众以乡或村为单位，组织评议会，评定阶级或应征数目，但评议需有领导，防止发生偏向。

为保证全军军食，筹粮工作也必须统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制度的进行，野、纵、旅供应将军队所到地区之产粮情况，各阶层存粮情况以及行政区划等，须进行预先调查，求得一般的了解。作战命令下达后，应即将各部队筹粮地区具体划定，按各地区粮食情况，给予筹粮任务。根据过去经验，在划分地区时，以旧行政区或村庄划为宜。地区确定后，得严格遵守，不许自由更改，预借了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粮食，均须开给收据（暂改为征发征借证为预借

证)。部队转移时，所余粮食均要如数交给地方政府，取得收据向野供报销。关于粮食供给办法，作为基本通过，责成野供修改，并交野战军首长审查颁布实行。

四、连队供给工作：要检查供给部工作有无成绩，首先检查连队供给工作的好坏，若全团连队供给工作很好，团供给处就是百分之百的有成绩，好了一半就是百分之五十的成绩。各旅、纵、野供都是一样。这是检查供给工作的标准，也就是检查供给部门士兵观点的标准。因此，以后每个供给部门应该面向连队，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战士身上，切实做好战士的一切供给工作。根据一纵队八个连队的调查材料看，凡是连队首长和经委会能认真检查、监督，实行经济民主，利用休息时间组织劳动力磨面、砍柴以及管理，排长负责，吃苦耐劳，为战士服务，并能团结战士，团结伙夫，有计划的走远处买便宜东西，有计划的调剂菜饭，粮食经费都有帐，按标准开支，生活较好，战士情绪很好，四团六连在这方面是个典型。因此，在上次休整时全连八十二人，均每日吃各种菜七十一斤（平均每人十四两一），共花钱六十五万四千元（油盐在内），每日按规定领取伙食七十七万四千九百元，除支尚余十二万元。全月余三百六十二万多元，解决了每人一斤肉钱。该连吃面是战士自己磨，每斗麦比群众磨多推面二斤，上级号召每人每日节约一两半面的任务，他们顺利的完成了，像这样的连队应该奖励，特别是该连的管理排长，大家应向他学习。凡连首长与经委会不负责任，经济不民主，管理排长消极怠工，甚至贪污浪费，战士生活很坏，情绪不好。如四团九连，在休整期间经常断菜吃，油盐上面发多吃多，发

少吃少，还吃了几次包谷，管理排长不负责，没有伙食帐。杀了猪，连部先拿二斤肉吃了，排长提意见，连长在军人大会上给了排长批评，引起战士不满，以后谁也不提意见。五团十连，六月份每人每天吃菜五两二钱，吃油四钱，肉吃的很少，还常吃生饭，管理排长贪污公款，买菜，买马鞍子，共贪污了二十八万农币，像这样的连队，应该严厉批评，管理排长应受纪律处分。

根据以上经验，连队必须认真实行经济民主，本单位之一切供给标准与经费、粮秣、被服、装备之颁发情况以及各种财经制度，均须公开的向全体战士公布，并组织其反复讨论，一切开支受其监督检查，发挥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克服其困难。特别是连队经委会，应由全连队民主选举产生，受连队全体军人大会监督进行工作，连队之伙食帐及经委会工作每月终向全连队报告，发动战士检查讨论，订出下月的计划，交经委会执行。

团供给处和机关供给处或管理科，要认真的加强连队供给工作的领导，帮助连队经委会及管理排长建立各种供给制度与日常工作，并制订工作计划，督促实行，必要时旅、纵、野供均可分别的直接帮助做好一个连队的供给工作。为克服连队管理排长记帐的困难，规定连文书兼会计，改司务长为管理排长，提高其权限。

重视培养连队的供给人员，组织管理排长、会计、伙夫班长、伙夫、挑夫等学习，提高他们政治文化与业务知识，按期的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奖励模范，纠正缺点，提高工作能力，提高积极性与责任心。只有把连队供给人员提高，使

他们能认真负担，刻苦耐劳，为战士生活奋斗，是做好连队供给工作的基础。同时也只有把连队供给人员（包括马夫、伙夫、挑夫在内）当作供给干部的泉源去栽培他们，提高他们，不断的提升他们，才能真正的解决供给干部缺少困难。

五、严格的纠正经验主义与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后勤部门与供给部门，有些好干部，能刻苦耐劳，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并积极负责的处理各项具体业务，这些同志中有些是没有经验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如野卫的马兴会同志和四团六连的管理排长，他们的工作方法是科学的，工作作风是认真负责的，我们应该很好的向他们学习。但现在干部中不安心的情绪普遍的存在着，认为干这一行工作是受气，是没前途等，其主要原因是后勤部门与供给部门，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和条件的困难，由上而下只注意进行具体工作，不在政治上、业务技术上提高干部，因此许多干部养成经验主义，由于用经验主义态度对工作，势必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经过几次碰壁后，又灰心丧气，要求离开，否则即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应付工作，在日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在供给机关中相当普遍，也相当严重。不仅我自己有这样的错误，也还有不少的同志有这样的错误，因此日前应彻底纠正这些偏向，提高工作效率，成为供给工作做好的保证。如何纠正：

1. 彻底反对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就是墨守自己的狭小、零碎的经验，不看时间、地点、条件，机械的搬用，不会把自己的经验与古今中外各方面的普遍经验，特别是群众性创造的普遍经验，有联系的集中起来，在一般理论原则的指导

下，总结这些经验，提高为理论，使之成为后勤工作、供给工作的指南。因此，做了十几年的供给工作，一无所得，不仅自己不能提高工作，也毫无成就。这是我们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要反对经验主义，就要尽量的抽出时间，认真的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及中央的许多重要的理论文件，同时要重视政治与业务的学习。特别是把自己各项工作的经验与各方面普遍的经验有联系的集中起来，总结成为条文，作为指导工作的原则。这方面我希望各级供给机关在今年年底前把自己的工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总结一次。

2. 彻底的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有各种形态，不管是哪一种形态，它的危害，首先是它束缚了群众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把群众的力量不能发挥出来，正像彭德怀同志在前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的确官僚主义不仅存在，而且某些部门还相当严重，必须坚决反对的。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要办法是走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深入下层，深入连队，反映群众的意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总结群众新的经验，贯彻与普及之。在日常工作中要求准确，反对借故拖延，反对借口不急躁，待考虑考虑，敷衍塞责，这都是官僚主义。”他这一段话很深刻，我们做供给工作的同志，应该当做“座右铭”，深刻的反省，彻底的纠正自己的官僚主义。

3. 加强供给干部的政治业务教育，提高干部。供给机关干部借口忙，借口分散等不重视学习的偏向，应严格的纠正。实际上凡是做工作的人，谁不忙？现在后勤机关与供给机关的学习，的确落后于军政机关的干部，这样长期下去，不进则退，前途确实危险。因此领导者，必须重视其督促、组织

领导他们学习党的文件以及政策业务。学习的办法，除组织阅读讨论有关上述问题的文件外，注意领导他们的自修，如粮秣人员、会计出纳人员、保管人员，因业务不同，领导只要帮他们借文件报纸，并指定其时间阅读，可能时即召集其开讨论会或轮流学习等，除学习文件外，经常有计划的组织干部研究业务，总结工作经验。总之领导者要注意，想许多办法，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与业务知识，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保证，为此如有政委者，政委应特别负责做这一工作，如无政委，应指定专人做这一工作。

根据档案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十二辑)刊印

注释：

- [1] 刘景范，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
- [2] 彭副总司令、张副司令、白部长，指彭德怀、张宗逊、白如冰，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后勤部部长。
- [3] 黄部长，指黄静波，当时任西北野战军供给部部长。
- [4] 三查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者在地方的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上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 [5] 野供，指西北野战军供给部。

民运工作要坚持正确地执行政策^{〔1〕}

彭德怀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

民运工作会议开得很好，提供了很多好的材料和意见，解决了一些新的问题，总结了六个月新区工作经验。这些经验证明了前委根据中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指示^{〔2〕}所决定的各项具体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前委扩大会议指出：“我军进入蒋管区，有两个基本任务，一个是大量消灭敌人，一个是扩大新解放区。”从三月一日瓦子街战斗至八月十日壶梯山战斗止，共消灭敌人约八个半旅。这个数目在全国来说是不大的，但从一个地区来说还不算小。在扩大解放区问题上，我们有了黄龙分区六十至六十五万人口的新解放区。根据大量消灭敌人与扩大新解放区这两条基本任务来看，我们是有成绩的，但成绩是不够的。原因是我们在这一时期中仍有某些错误和缺点，否则可能多消灭敌人，新区还会大一些。

一九四八年一月前委扩大会议，是根据中央十二月指示，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召开的。因此，当时某些战略区过分强调贫雇农利益，忽视和打击某些中农利益的“左”的现象和影响

被拒绝了，但仍有少数富裕中农提高为富农，把富农提高为地主者。这是执行上的偏差，而不是前委扩大会本身的偏差。这教训了我们，任何正确的政策，必须注意掌握与检查。对国民党、三青团、地主武装、宗教团体等分别处理是正确的，保护学校和工商业政策也博得了西北各地的好评。处决罪犯方面，自进入新区以来，只在黄龙区杀了一个人（伪白水县长）。社会秩序也比较稳定。多年来没有断过土匪的黄龙山，现在没有成股土匪了。这在六月十九日前委总结春季攻势时已指出，我们是执行了中央政策的，各项具体政策比较稳当，故必须坚持。而且在整军问题上继续了“古田会议”精神，抓住了“整风运动”中打通思想，“领导方法决定”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心环节，实行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地土地改革中以诉苦运动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办法，以及在放手走群众路线，坚持民主作风的领导原则下，打破了以前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旧的公式。这就是军委誉之为新式整军，其实也就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坚持与继续。

半年来，我们的民运工作是有成绩的，在黄龙区执行政策上还是比较稳当的，没有大的乱来。但是，在具体工作上我们还有缺点，在个别地方是有错误的。张德生^{〔3〕}同志已经讲过，我不全部重述。这里只重复讲一讲某些缺点和个别错误，虽然大体说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不能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正视自己的每一缺点与错误。正因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特别警惕少犯或不犯。为什么不可避免？这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多的干部，政治觉悟、工作经验、成熟的程度都不同，环境复杂，稍一不慎，就不免犯错误。究

竟是不是一定不可免？不是的！多数是可以免的（如把富裕中农提高为富农，把富农提高为地主），就是要认真的进行调查研究。如调查国民党、三青团在这一块地区有多少，这是需要的，但仅是一个概括的数目字的了解是不够的。必须更具体的了解每个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的作恶情形如何？是否为群众普遍痛恨？还只是痛恨那些国民党、三青团中某些人？痛恨的程度又如何？那些国民党、三青团分子虽为群众痛恨，而群众斗争的决心又怎样？群众有了决心向那些人作斗争，是群众中相当多数有了决心，还是极少数积极分子有了决心？要有了这样很具体的调查研究，才能决定我们的对策。如经过调查研究，有一百个国民党员，其中十个是群众普遍痛恨的，不但群众中积极分子要斗他们，而且群众中多数分子也要斗他们。这种酝酿准备就成熟了，就可开群众大会斗争了。我们才把群众要斗的坏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拿到群众大会去，让他们向群众坦白自己的罪恶，使群众从听、看和亲身体会中了解到国民党罪恶行为。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才能从政治上打垮国民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像某工作队在洛川的洛安府开群众大会，要一个加入国民党的学生娃娃，在大会上坦白。那个娃娃说：“我以后再不做坏事了！”群众说：“这娃娃过去也没有做过坏事啊！”这样不仅没有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反而替国民党作了宣传。国民党这个机构是腐烂透顶的，反革命的，一点也不应有其他怀疑。而其中组成分子，就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坏。所以不能把概括的东西，当作完全具体的东西来看。实际工作中产生的缺点和错误，其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调查研究，也就是缺乏对具体事物的认真

分析，今后我们应特别注意。

其次，关于减租减息问题与平分土地问题。一个贫苦农民分了土地，要两三年才能完全翻身。分地的头一年真正的赤贫户，还要政府帮助，才能进行生产。当然无力向政府担负起一定的财政负担，支援战争。如把战争的财政负担，加在刚分地的贫农、中农身上，对贫苦农民是没好处的，而中农也是负担不起的。如过分勉强地加重了中农负担，于农业生产及支援战争均不利。不如把平分土地准备时间延长一些，进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其次是富农多负担，中农少负担，部分贫农轻微负担（中农、贫农在合理负担中应比对国民党负担时为轻），赤贫户不负担。这样做实际对农民有利。合理负担可以使地主挖自己的底财，暂时和缓地主尖锐的对抗。在实行减租减息时，比平分土地斗争比较稍微温和一些，因此社会的动荡也比较小一些，这于迅速发展革命战争是有利的。平分土地要发动与组织群众，培养当地掌握政策的干部，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均须相当长的准备时期。从某个解放的地区局部来看，可能似乎推迟了平分上地的时间，而从全局平分土地实际工作来看，是需要一定准备的过程的，对革命战争的发展是有利的。缩短革命战争的胜利过程，也就是加速提早全国平分上地的过程。但中共中央对于平分土地所提出之三个条件如果成熟时，即应进行平分土地，而不应以财政负担为借口推迟平分土地。这个道理先在部队中普遍讨论，使全军有一定的认识，在农民群众中应进行口头解释。

今后到新区筹粮，是分阶级负担好？还是分阶层负担好呢？应该分阶级。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才怕分阶级，我们不

怕分清阶级。如把阶级讲清楚了，负担应由地主阶级多出，一般农民才能拥护我们，否则易被地主操纵、恐吓，模糊劳动人民的认识，是于我们不利的。

最后，有些同志不安心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可能很多，但基本的我认为可能只有下面三种：第一是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不稳，革命的人生观还没有确切的确定，总想出风头，总以为自己是大材小用，结果是做哪些工作都不适合他的口味。这就是思想上有个人主义打算，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纯净思想与决心。第二是狭隘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很艰难，没有了解别人的工作也是艰难的。这样的同志总是强调环境特殊，自己伟大，被老资格的包袱压得疲惫不堪，当然也就不会安心工作。第三是没有找到工作的规律，事务主义，无头绪，不去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做甚算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毫无条理，结果做不好事情，兴趣不高。如果你找到了自己工作的规律，你也会很自然的有兴趣做了。综上所述：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这是基本的）；不摆老资格，有虚心学习态度；善于总结工作经验。三者联系起来就会安心工作了。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出版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1) 这是彭德怀在陕西合阳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召开的民运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 十二月指示，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陕

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3〕张德生，当时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新区地方工作报告大纲^[1]

张德生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

甲、我军自进军蒋管区后，不但消灭了大量敌人，并配合地方党进行了以下各项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肃清反动地方武装，整顿地方游击队，摧毁反动组织，建立民主政权，筹借粮食草料，动员担架车辆，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守法的文化宗教团体，救济城镇贫民，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在这些工作中，一般的说，没有发生严重的破坏党的政策行为，因而基本上巩固了黄龙分区，增加了开展泾渭地区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

我军所到之处，不但广大劳动人民对我热烈欢迎和拥护，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对我现行政策表示赞同，就是中小地主和一般富农以及普通公、教、保、甲、党、团人员也多表示不满蒋胡^[2]，欢迎我们或守善意中立。

这一切说明了我党社会基础是空前扩大了，建立广泛的反胡统一战线以及争取敌对阵营里的动摇分子与我暂时同路或中立是完全可能的，证明今年一月前委根据中央去年十二月指示所决定的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步骤，其基本上是

正确的。

乙、在半年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虽然多数是个别现象，但都值得我们深刻警惕。

一、对环境估计上，把麟游等县当时作为可以巩固区布置工作，是不够谨慎的，结果敌情转化，使当地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缺乏必要准备，形成一时混乱。

二、在征发征借粮食中，相当普遍的发生错定成份，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当作富农对待，个别单位甚至不管成份，只搞粮食，侵犯了一些贫农，有的误筹了地主、富农、商店、作坊的粮食，有的对富农的再生产照顾不够。

三、在城市工作中，对社会秩序注意不够，几家商店被贫民所抢。在宝鸡，不分公私银行，一律查封和没收邮局包裹中之磁碗、被面，在凤翔乱拿教堂咖啡、罐头，普遍发生机关人员乱拿反动机关公务人员私人衣物现象。

四、在领导群众斗争的问题上，一方面表现有急躁情绪，一方面却忽视群众日常经济的、政治的要求。

五、在建政时，个别地方有排斥中农现象，有些地方没有发动群众，使乡村政权为环保甲人员、地痞、流氓等所掌握。

产生以上错误和缺点，最主要的是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往往根据自己狭隘的经验，未能从新区各种具体情况出发办事，因此必须在思想上克服粗枝大叶作风，否则党中央任何正确指示都将无法贯彻执行。

丙、根据当前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

革命”和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民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为了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必须“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以及中央对于新区工作的指示，提几项具体意见如下：

一、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

巩固区：这类地区的首要任务是安定秩序，肃清反动武装，解散反动组织，建立人民统治，支援解放战争；然后再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工作。

这类地区，又应分为内地区与接敌区。内地区应彻底摧毁保甲组织，选举村长，建立村政权，乡一级临时政权，采用推选或指派办法，成立解放委员会。村乡政权应掌握在贫雇农和中农、手工业工人、贫苦知识分子手里，严防地主、富农及其他坏分子窃取政权。县以上政权机关，除工人农民外，应注意吸收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与开明绅士参加。在开始一个短时期内，为使战勤动员不受影响，亦可临时利用某些比较好的保甲长，但必须加强领导，使其尽可能作到办事民主讨论，负担穷人少出。至接敌区在各种工作布置上，基本应和游击区一样。

游击区：这类地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游击战争，宣传政策，保丁保粮，建立秘密群众组织。至于其他的社会改革工作，应适合于游击战争的环境，不能急躁粗率。

这类地区的反动乡保组织应予摧毁，并尽量建立亲我两面政权和游击政权。

暂时经过的农村或暂时占领的城市：这类地区的中心任

务是扩大我党我军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应急于实行社会改革，并尽可能的少逮捕不没收。

这种地区，对保甲组织，一般的不摧毁，争取为我作事，特别反动的例外。

上述不同地区的区别，不能完全决定于我们主观愿望，而要根据客观现实环境。

二、目前在新区应实行减租减息及酌量调剂种籽食粮的社会政策。关于这一策略阶段延长的理由，不但应在党内和部队中反复进行教育，并应向农民解释清楚，暂时不在新区平分土地，而实行减租减息，并不是根本取消平分土地，而正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更早的实行平分土地。但只要具备了平分土地的三个条件（见中央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指示），便可以并且应当实行平分土地。

三、今后筹粮政策，一律改为预借，取消征发征借办法。首先依靠缴获敌粮解决；不足时，向大中地主预借；再不足时，向小地主预借；还不足时，向富农预借；在万不得已时，才向富裕中农预借，一般中农以下，均不能预借。若遇特殊情况军粮发生困难时，则由野战军统一筹划解决之。在根据地稍具规模时，即按合理负担正式征收公粮。无论预借或正式征粮，重要的是发动群众进行有领导的民主评议。

四、对于反动地方武装，应坚决消灭之，对溃散部分加以政治争取瓦解之，以便彻底肃清。但对于地主武装，应分别进行工作，并应善于抓紧有利时机与利用适当关系。对于缴械者从宽处理，有功者酌情奖励，顽强抵抗者坚决消灭，罪大恶极为人民所深切痛恨者组织人民法庭公审严办，被迫起

义者坚决改造，前来投靠我军之进步武装，除帮助改造其部队外，对于领导人，尤须教育提高，量材使用，不可排斥抛弃。

至于民间散枪应一律登记，原则上交政府收存（军队不要去搞），但在执行时应有步骤的谨慎处理，切不可操之过急，尤须严禁游击队乱逼枪、弹。

五、对蒋方人员仍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即首恶者办，胁从不问，有功奖励。分别对待不能决定于少数人的好恶，而要根据本人真实情况和多数群众的意见。对蒋党团员开始时暂勿登记，以免引起恐慌。保卫工作的重点应放在特务分子身上，这需要依靠发动群众与专门侦察相结合。特别是打入敌人内部侦察更为重要。

六、在新解放城市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民族工商业与维持城市治安，为此在进城前，部队中必须进行深入的政策纪律教育和组织工作的充分准备，进城时必须组织一个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例如城工委）掌握城市政策，统一领导城市工作；战斗结束后，除按城市大小留下足够的警戒部队外，其余部队一律撤出城外，并须严肃部队纪律，进行安民与必要的救济工作，限制游击队及部队机关闲杂人员进城。采购要有组织的统一进行。

七、逮捕只限于一切持枪抵抗的反动分子、真正的破坏分子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魁。没收只限于真正的官僚资本和真正反革命罪魁的财产（如属工商业性质者，没收后转移民主政府接管，成为国家财产继续经营），并须经过纵队党委会讨论决定，报告前委批准后方得没收。除此以外，一切公

私财产，一切守法的民间工商业者，守法的文化宗教团体和一切的公共事业机关，一切的公共建筑名胜古迹，均必须切实保护。

八、新区的一切工作，均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把一切工作和反恶霸反特务反贪污等经济的政治的大的小的各种各样的群众斗争联系起来。在发动群众过程中，应不断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逐渐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以及群众的具体要求，决定斗争的策略步骤，提出斗争的口号，干部决不应当命令群众或代替包办；在发动群众过程中，并应注意采取适当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如在农村应以农会为主，吸收全体农民参加（禁止富农参加），建立贫雇农领导骨干（农会委员会中保证有三分之二的贫雇农），以便提高群众的组织力量。

丁、渭北⁽³⁾新区有我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这在开展游击战争方面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增加了我军作战的有利条件，但大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严重问题，主要是缺乏政策教育，思想混乱，于是就产生了破坏政策、破坏纪律、脱离群众等现象。因此各纵、旅必须派出得力干部帮助各地游击队进行教育和改造，并应把这一工作看成野战军的重要责任之一。

戊、干部问题是决定新区一切成败的关键，是党的政策能否在新区贯彻的关键。

所有干部都要认真研究党在新区的各项政策，反对对党的政策漠不关心的态度。新区工作干部必须建立新的适合于新区的工作作风，这就是一切从新区实际情况出发，密切联系新区群众，真正全心全意为新区群众服务的作风。

对于本地干部要大量提拔，并继续不断从群众运动中吸收培养真正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特别是应当注意大批的争取新区青年知识分子，技术人才参加各项建设工作。所有新提拔起来的干部，必须加强其思想与政策教育。各纵、旅应派出懂得政策的干部，帮助地方党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

从老区派到新区工作的干部，必须团结培养当地地下党的及游击队的干部，把与当地下部的关系看成是与当地群众的关系问题；本地干部也要虚心向外来下部学习，互相学习，做好新区工作。

己、进入新区后，我全军比较注意做群众工作，但是没有都能坚持下来，还有些同志在做群众工作中，其出发点也不完全都很正确，有的是为了向群众要东西。殊不知群众工作是我军三大任务之一，全军同志均有进出宣传、谈话、访苦做群众工作的任务，我军不做好群众工作，即无法取得战争胜利；同时做群众工作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解决部队的需要，而是真正为了广大群众的翻身解放。

各纵、旅、团的工作队和各连队的民运小组还应进行比较深入细密的群众工作。为与地方党密切配合加强领导，在休整期间，团以上政治机关，应派人参加所在地区县、区党委的领导。能如此，新区的地方工作，一定能够很好的开展起来。

注释：

- 〔1〕这是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在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 〔2〕蒋胡，蒋，指蒋介石。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 〔3〕渭北，指陕西关中东部渭河以北地区。

关于作战方针和军队建设^{〔1〕}

彭德怀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关于军事问题。军事问题分作战方针与内部建设两个部分。现分别说明如下：

一 目前作战方针

今年是继续消灭胡^{〔2〕}军的一年，是这次会中大家都同意的。打马^{〔3〕}军因条件不便，如路远、无兵补充（可能捉一些俘虏，但不会多）。打马军，胡军一定去援；但我打胡军，马军不一定来援，这种矛盾可供我利用。又，在这个地区作战，我军火及粮食供给均比较便利。而主要的，是打胡军有可能。

我打三十六师后，歼其两个旅。现胡军六十五师调富平；二十七师要调来，但仍在陕南不能来；十三师要来，也有一部分调到潼关去了。敌已转入完全被动防御。我打哪个地方好，今天不能完全肯定，待此会后，与各纵司令员在一起来研究确定。现敌十七师、三十八师及三十六师残部守大荔一线。我的方案是打十七师或十七师的一个旅，把西南的敌第一师、六十五师，甚至六十一旅及九十四旅等部队吸引到东

面，然后我抽出部队由关中打淳化，渡泾河，取永寿及礼泉，又可消灭一部分敌人，调敌向西去救援。我在东面又可打一下，我可打蒲城、大荔，能取到贤镇、美塬镇、铜川、朝邑^{〔4〕}及蒲城、白水、铜川、富平的中间地区，以缩小敌占区。如此打三下，能消灭敌四个旅，取得粮食就可过冬了。我在河东有粮十万石，已吃二万多石，还余七万多石；在黄龙还有粮四万石，在关中有二万石，共为十三万石，够我军四个月吃粮（每月需二万多石）。打一个地方，争取三五万石粮就能支持到明年二月，那时天暖我军就又可行动了。我们在冬季进行攻势不一定有利，因为我军冬季装备差，冬季作战物资耗费大，伤兵需要棉被等问题难解决。故我军应利用时间作战，到冬季即进行整训。现在还有二十几天的时间作战，以后天冷即需发棉衣了。

二 我军成分与组成机构问题

我军是由解放区子弟与解放兵两种成分组成的。过去我们没有把这问题弄清楚，曾产生不重视及不信任解放兵的倾向。青化砭作战后，我军提出争取解放兵的重要性，这问题才被注意了。去年十一月召开教育会议，曾提出反对不信任及怀疑解放兵、轻视解放兵的观点。我们以什么根据来这样提问题呢？基本的问题就是要从阶级上去分析。不从阶级上去分析，在打胜仗时，解放兵出了力就会夸奖得了不得，到解放兵开小差或发生问题时，又会丧气得了不得。这就不能有一个正确的见解。从阶级观点上来分析解放兵，看他们是劳动人民，还是地主、资本家，或者是其他成分。一般地说，

解放兵多数是劳动人民，只有极少数是学生，如青年军。可以说解放兵约百分之九十的数目都是贫苦农民。他们不过是武装了的、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民，他们在政治上受过若干反动教育的影响，在生活上也受过若干影响，如欺压群众，打人骂人及耍赌等。从社会现状来看，蒋管区的残酷的封建剥削、收租及高利贷、苛捐重税的制度，使农民无法生活，他们又没有钱来买了顶替，于是大批的被抓被捆去当兵。对于大地主、官僚资本家及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他们是直接身受者。帝国主义与大地主、官僚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使许多农民沦于破产或无法生活的境地，所以他们的痛苦最深，觉悟容易提高，革命性强，容易改造。

从历史上看，中国工农红军开始时是靠招兵及捕捉俘虏来补充的。在有了根据地后，才由根据地的农民来作补充。过去我们部队中俘虏占了很大的比例，究竟是起了好作用，还是起了坏作用呢？应当说，对革命是起了好作用的，在我军中起了很大作用。去年报纸登载说我军使用解放兵是没有阶级观点，是忘了本，这叫什么马克思主义？难道解放区的农民有阶级，蒋管区的农民就没有阶级了吗？这真是扁担吹火，一窍不通。

我们在过去建立游击队时期，兵源的补充大都是吸收社会上的游民，就是已破产的或将要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工人群众。这些群众成为两个不同阶级的后备军。一是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使这些人沦于破产，他们又招募这些人当兵，成为他们统治农民及其他广大群众的工具。同时又防止了这些人在社会上捣乱秩序，破坏私有制度。另外就是他们

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无产阶级吸收他们与改造他们，使之坚决参加革命斗争，为推翻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而奋斗。游击队一开始就要求成分纯洁，只是理论上存在，事实上绝不是那样一回事。这些成分复杂的人到游击队以后就是领导问题，要不断教育、改造。事实证明不能改造的是少数。经过这种反复的改造和提高，游击队逐渐扩大，建立了根据地，以后才能增加兵源的补充。所以在游击队中的工作着重在改造而不在洗刷。同时要注意吸收一些好成分，主力部队再抽派一些政治觉悟高的干部去帮助建党及建立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政策教育，开展思想斗争。在游击队开创时，纯洁的群众不很多，因其不多，所以就特别宝贵。

国民党军队在一九三七年前是雇佣兵制，薪饷较高，吸收了已破产的或将破产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其他群众及流氓等。一九三八年起，国民党实行征兵制，拉夫及强征了很多参加生产的农民群众去当兵，只有少数是脱离生产很久的流氓。而且薪饷低，每月发的钱不够买鞋，不够抽旱烟，在政治上还要挨打挨骂，受的是法西斯的统治。蒋军士兵不但在政治地位上不如我们的士兵，在生活待遇上亦不如我们的战士。

如果我们从阶级观点来分析，我们就一定要说：解放兵可要而不可怕。诚然，解放兵有开小差的，因为他在国民党军干过，在那里有些熟人，一遇困难时，他就想到过去的熟人，这是旧意识的反映。只要我们能注意及时加以教育，就能改正他们的落后思想，他们就会变得很好。假如领导注意不够，就会有开小差的，这是不足为奇的。正如解放区子弟

兵有开小差的，也不是为奇怪。须知解放区农民分了土地，政治上也完全得到解放，他们有一种想法就是想回家去把地种好。我们必须认识这样一个问题，要把翻身的子弟兵在政治认识上提高一步，应当使他们了解，只有把大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卖国独裁统治推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以后，他们的胜利果实才有保障，才是巩固的，否则是不巩固的。我们要用很多办法从政治上来提高他们的热情，提高他们的觉悟。记得今年春季从延长出发时，有些人对子弟兵也有过错觉，以为他们诉苦条条是道，到出发时就走了。这同样也是不正确的见解，同样都是我们要从领导上来仔细分析的。我们要加强对子弟兵的教育，同样也要加强对解放兵的教育，以求巩固和深入。解放兵所在家乡，土地未分配，剥削未取消，社会制度未改变，他们回去还是照样受压迫，照样要被抓去当兵。他们明白了这一切后，就不会开小差了。他们只有依靠解放军，只有参加解放军，一直打回家去改变旧世界。我们现在进行的民主革命就是农民革命，就是土地革命。领导者的任务就在于如何提高解放兵的觉悟。我们要从阶级观点上去作具体分析，要研究解放兵的思想动态，他们有什么动态，是否发生动摇，我们怎样去改造和提高他们。这点对子弟兵及老战士都应如此。我们不能从表面上偶然的现象来作出不正确的结论。

军队的机构问题。军队是由司、政、后勤、卫生各部门组成的。有些干部争论哪种部门的工作重要，有地位，哪种部门的工作不重要，无地位，这是不对的。机关既然存在，干部既然热心的在做工作，都是重要的，都是有地位的。但要

具体的去衡量谁重要谁不重要，就要看时间、地点与一定的条件，笼统的说重要不重要，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的。林伯渠^[5]主席在延安边府开会，则林主席是重要的；林主席在路上，则汽车夫是重要的。行军作战，则司令部就是重要的；执行政策进行思想教育，则政治机关是重要的；搞粮食、供给、被服，后勤部就很重要；有了伤兵要治病，则卫生部很重要。说首长重要，其实首长要逐级的分，有部分的首长与全体的首长。首长的作用只是起机器房发动机的作用。行军作战下命令，各部分都动，这就是发动机作用。打仗部署都是各项工作合成的。首长的作用是计划了，还要督促检查。我们的一切机构，一切干部是为战士服务的，战士是部队的组成部分。六月十九日前委指示即提出：我们要提倡为战士服务的作风。我们打一个胜仗，是集中全军的体力、智力与人民的一切努力才能打胜的，绝不是几个首长打胜的。打了胜仗，指挥在一定的时间上起作用，但起作用是应该的。煮饭的把饭煮好不也是应该的吗？伙夫把饭没有煮好，你要骂；但仗没有打好，别人就说不得。有功白居，有过人家，这都是要不得的。今天战争要胜利，一定要团结群众，而且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至于旧的“兵对兵、将对将”的说法，那只是舞台上的表演，不能够很多人上场，只举几个代表而已。孙子兵法就曾说，要与士兵共艰苦。关羽说，张飞可以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有此之勇，那末只要有几个张飞就可以打平天下，又何必要有许多兵？可见兵是重要的。打胜仗是全体的努力制胜的。后勤部门同志说，工作多，开会少，看不到报，政治上不开展，只束缚在经济上，反过来

说我们是清高的。这是怪我们作首长的不負責任。作首长的就像发动机一样，要加油，要吃饭，供给部门不搞饭，首长就会什么也办不成。这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三 我军还存在的一个严重弱点

这就是贺龙^[6]同志在六月会议中提出的，即我军还脆弱，并已写在六月十九日的指示中的。贺龙同志这个意见提得很好。从战术与技术的学理上看，我们的修养还很差。就从政治上来看，我们也是很差的。我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即曾指出：在前委、纵委、旅委的领导干部中，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修养也不够，这是许多同志表示同意的，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学习。我军是一个新班子，都不很成熟。没有一个能突出地成熟地进行马列主义科学分析，这就需要大家互相学习。我们已成立一个军事编审委员会，愿意参加的还可以参加。政治工作也有个组织。我们要加强马列主义及马列主义在中国已具体化了的、中国革命经验已总结成条文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我军需在前方成立流动图书馆，把中央指示要读的书籍搜集几百本。另外，军事的书籍除在前方搜集外，在后方也帮助搜集一些。这个图书馆在打仗时就放在后面。今年冬季我们将准备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政治干部学习的地方，抽调从连一级到纵队一级的军政干部来学习。今天我们不学习战术及技术学理，我们是不容易提高战术、技术的。

四 夏季整训

两天时间的报告，二纵队作的书面报告，阎^[7]参谋长作的

夏季军事学习总结，我都同意。我军夏季的三评或四评运动，就是去年二查整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我是同意的。主要表现在群众路线与民主作风比过去更明确，奖功惩过比过去进步。军队中的民主制度是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已确定了的，古田决议解决了中国建军、建党的许多问题，如反对唯心论，提倡实事求是，反对肉刑等，都是已解决了的。一九四三年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明确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去年我军整训中诉苦运动与群众运动的开展，是把群众路线保持和发挥了。对此一问题，前委起了批准作用。起带头作用的是三五八旅，又以七一四团为最突出。领导的批准作用也很重要。古田决议案当时没有在全国红军中普遍引起注意，基本原因是那时教条主义占领导地位的中央没有批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被限制在极小的部分，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停止。那时已确定党委制，取消首长制。主张民主讨论的制度都是已确定了的，当时军队中有前委，各师团有党委。一九四四年，军队里有了首长制，各团设总支委。首长制代替党委制，对军队的损失是很大的，它阻碍党的水准的提高。我军在去年一年里，发扬了这种民主制度，使我军大大提高了一步，我自己也提高了一步。在给毛主席的报告中我写了这一段。去年我军组成后，军队工作就是整顿纪律。打沙家店后仍然有拉牲口及强奸事件，这可以说是对我军整顿纪律的一个讽刺。这不是民主搞坏的。经过三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民主制度还不普遍化，还不巩固。三查运动后，纪律提高。有些同志说民主不好，在哲学上说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想方法。不管三查也好，三评也

好，如说我军是新式整军运动的创造者，都会背上包袱。压上包袱就会使自己疲惫不堪。我们应从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只是给新式整军运动充实和增加了内容。我在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这是我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就是因为采取了放手的民主和群众路线的方针。

实行民主，有些人怕走上极端民主化，这也是不必要的想法。民主是有领导的，是为的把真理搞清楚，是为的发扬正气、坚持正气，批评那些坏的。我党是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的，社会存在的各种思想都要反映到党内来。我们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排斥这些坏思想，来开展斗争，客客气气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种思想斗争是要发动群众，是要有领导的。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站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内。有些干部以退为进，向组织提出不愿干。请问：你请假向谁请？这些都是没有全党观念，只有雇佣观念。说起政治路线，口称完全拥护，但是就要提出请假。这种无原则的事情到现在是否完全解决了呢？没有的。在机关之间，各纵各旅之间，这种不平衡的现象是很严重的。

在民主运动中，我们主要是用表扬的方法来启发和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来发扬全军的自动性和积极性。独四旅在三评中奖了五百八十八人，罚了四百一十八人。对这问题，我有点不大放心。发扬党内民主是在于提高觉悟弄通思想，如处罚太多，其结果就会使民主运动停止，使群众把民主认为是可怕的东西，以后群众的积极性就难发扬起来。我们以表扬积极的来发扬正气，批评那些不积极的来压倒邪气。对违犯纪律的要严格批评，但不要轻易使用组织纪律制裁。我觉

得为提倡积极性，对记了一次过的，在这次记了两小功，不但不应把他的功来抵消他的过，相反，可以取消他过去记的过，以发扬积极性。还有的确是烂得一塌糊涂的，为扭转风气需要严一下，但要迅速抓紧进行思想教育。去年我军开始和胡军作战时，因我军系由各单位新组成，思想不一致，我在每个命令上都附署一句“不得违误”。但在羊马河作战后，部队的信心建立起来了，所以就不要再这一句话了，如用这一句话，就会妨碍大家的机动性和积极性。这些问题，领导人在时间和分寸上都要掌握好。

耐心的说理斗争是很需要的。土基会议⁽⁸⁾我对四纵的问题那样凶，为的是四纵的自由主义相当严重，用猛火一烧，以提起他的警惕。我们高级干部中应讲原则，理论根据，不看面儿。不得已的处罚是需要的。但不要滥用群众压力，滥处罚。不要把自由主义看成民主。相反，因为不民主才产生自由主义。讲民主就是要去掉自由主义，去掉坏风气，发扬好的。

五 打胜仗

军队情绪高是战胜敌人打胜仗的根本条件，但不应把这看成是唯一的条件。士气高，还要看战斗准备、计划、部署及战术、技术的配合，才能打胜仗。情绪高、士气高时就容易疏忽大意，领导人要仔细检查，不要疏忽。领导人要有全盘工作计划，要有步骤地去进行，要从局部开始。一个战役、一个战斗是全盘的，都要先从消灭敌人一个地碉及一个排一个连开始。接近了前沿才能发展到纵深，部队是不能不经前沿就可飞进纵深

去的。所以作战时不能只看全面而忽视局部。但在作工作计划时应以全局为主，不应先考虑局部而延误全盘计划。而在工作时就应以局部为主，只有有计划地突破点，突破局部，然后才能扩大到面，到取得全局的胜利。去年十二月前委决议就提出说：要一个一个地夺取阵地，要一点一点地积蓄力量。要解放大西北，就要先从一个村、一个乡做起，然后才能扩大到东府、西府^[9]，到全陕西。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几百架飞机都毫不可怕，但只要是有一架飞机飞临我的头上，一个伏地碉，几个敌人在我面前，就得注意。我打不下这个拦在面前的伏地碉，就不能继续进攻去消灭全部的敌人。梁周村战斗士气很高，领导上粗心大意，不看地形，不作具体部署，结果就打不下来。独二旅的领导人曾说：我们的战士似泰山，准把它压碎。但结果就没有压碎，因为我们的战士并不是“泰山”，而是肉。这就是因为情绪高而疏忽所造成的结果。

打仗要详细的侦察。从局部开始，这个问题虽简单，但常常被忽视。计划的检查、快与慢均须很好的结合。计划了，会开过，方针也定了，但是不检查，工作常常流产。挖坑道要快，但到装药时就不要着急，就要慢一些，要检查距离及装药的情况，才能炸中。否则，就容易炸到城里或炸到城外，这是要求快反而慢了。进攻出发要快一些，但到冲锋出发地以前就要慢一点，要先看地形，选择道路，检查武器。否则，像攻梁周村时部队到冲锋出发地停留很久，伤亡很大，要快反而慢了。所以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领导上也要注意运用得适当。作战时，指挥员要抓紧时机。指挥是高度的艺术，要看出现在的慢就是将来的快，在快时更要有适当的停顿以保持将来再快。

只要有一个时机,我们决不能放弃。特别在追击敌人时,我们更要不顾疲劳。被追击的敌人,他是失败的,我是胜利的。敌人企图摆脱包围,企图摆脱追击,以图转入防御和反攻。我军使敌不能转入防御而歼灭之,则将使我军少付若干代价,故应尽一切力量追击。我平行追击敌人,我疲劳,敌人则更疲劳。我放弃辎重,我可收回;敌丢弃辎重,则成为我的胜利品。故追击中的时机更为重要。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彭德怀在陕西合阳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讲话的第四部分。

〔2〕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3〕马,指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均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4〕朝邑,旧县名,一九五八年撤销,并入陕西大荔县。

〔5〕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6〕贺龙,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

〔7〕阎,指阎揆要,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

〔8〕指一九四八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西北野战军在洛川县上基镇召开的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

〔9〕东府,指今陕西渭南地区一带。西府,指陕西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

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三次 扩大会议报告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中央军委：

第三次前委扩大会议开了十一天，二十三日开幕⁽¹⁾。到有团长、政委以上共一百三十七人，讨论了以下五个问题：

(一)以三天的时间展开讨论了中央八月十四日及九月四日两电⁽²⁾及其有关上述文件。一致认为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这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已经给我党造成不少损失，特别是去冬十月至十一月某些区域自行提出所谓贫雇农打天下，贫雇农坐天下，村村点火，家家冒烟。这些极端冒险主义与盲动主义口号，严重的破坏党中央的政策，虽经中央去腊⁽³⁾纠正，但已经影响到蒋管区某些人士对我党一贯正确政策怀疑；某些解放区内已遭到不应有的损失。西北野战军中在财经方面仍存在着相当普遍的本位主义，在战斗中缴获以多报少，妨碍统筹统支。中央二月规定的报告制度未认真讨论着手执行，某些纵队根本未执行报告制度。上述严重现象，若不引起高度严重警惕，坚决克服，将妨害或推迟全国胜利，即是全国胜利了，亦难巩固。因此，中央八月十四日与九月四日指示

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大会一致拥护中央指示，今后各级各旅每两月向上级、前委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并须报告真实，而反对形式主义的报告。

(二) 军事问题，分两个问题讨论的。一是今年秋冬作战，决定继续向胡匪军进攻，争取消灭四个旅以上。二是夏季整军工作总结，详情后报。

(三) 总结今年上半年地方工作及今后工作方针，详情后报。

(四) 新区财经政策及本军内供给制度，实行统筹统支，废除首长代审制，坚决实行审计委员会制度，详情另报。

(五) 新区筹粮政策，取消以前地主富农征发征借制，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在我军初到，人民民主政府尚未建立时，实行预借制，在缴获敌粮不够时，首先向大中地主，除留相当于中农口粮外，预借到余粮十分之八，再不够时，向小地主预借到余粮十分之六，还不够时，向富农除留其平常口粮（包括雇工口粮）、种子、畜料等外，预借余粮十分之六，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向富裕中农预借余粮十分之三，并须比国民党一年正附征粮^{〔4〕}轻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惟马草须向富农、中农预借余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在民主政府成立进行合理负担时，预借过多者偿还之，预借过少者补征之。妥否，请示复，其他另报。

西野前委

注释：

(1) 应为十三日开犁。

(2) 指中央关于加强报告制度、克服无纪律无政府指示的指令。指令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倾向提出严肃批评，要求严格执行报告制度。

(3) 去腊，指去年腊月即农历十二月。

(4) 正附征粮，指国民党政府每年正式征粮和附带性征粮。

中央军委关于西北野战军前委 执行报告制度办法的通报

(一九四八年十月九日)

自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讨论了加强纪律性、建立报告制度，并做出八月十八日⁽¹⁾决定下达后，各纵均已传达讨论，三纵直旅直和团为单位召集了排以上干部进行传达讨论。现西野所辖之一、二、三、四、六各纵及一、二两纵所辖之各旅党委已有报告，经西野前委转来中央和军委。在这些报告中，上述各党委对于自己和所辖单位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均有相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中二纵及其所属之三五九旅反省了自己瞒上不瞒下的作风和独立王国的倾向，解决问题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现象，以及在财政供给问题各自为政做生产，违反政策，打埋伏，任意开支，挥霍浪费等错误，及其所以引起的腐蚀作用之危险。三纵亦提出清查家务，检查浪费，建立审计科室的制度。六纵检讨了部队干部中间闹无原则纠纷与无原则地保持和气等倾向。一纵具体规定了团旅党委和司政供卫机关每两月一次的综合报告，及战役的整训报告所应包括的具体项目。这些检讨和规定都是好的，西野及所属各纵在这一问题上认真检讨的态度和办法值

得全军学习。望各前委、各军区转令各纵委、旅委，各中央局、分局转令各区党委、地委及各部门委员会，学习这种办法，根据中央关于报告制度的指示，加以检讨，并成立相当的决议，报告上级，再综合报告中央，以加强工作内的纪律性。地方地委以上、军队旅委以上均应遵照中央指示，于今年秋冬两季检讨完毕，一律作出简明决议，呈报中央及军委，不许有例外。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 八月十八日决定，指西北野战军前委关于执行中央报告制度指令的决定，行文时间为八月二十一日。

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夏季整军 向总政治部、军委的报告^{〔1〕}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

夏季三评整军报告：

（一）去冬的三查整军运动：一般的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弄清了剥削关系，明确了阶级立场，提高了战斗力，并取得了在部队中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运动的工作经验，因而在春季的攻势中，获得了伟大的战绩，解放了黄龙地区。但是三查的重心是战士与下层干部，而不是机关与上层干部，一般说来对整个干部教育并未有系统的来做，干部中的复杂与紊乱思想，并未来一次挖根彻底的清算。由于长期残酷的斗争，加上没有做过深入的思想改造，因之在一部分干部中，隐藏着怕苦疲劳情绪，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等，其基本原因是阶级责任心不强。这些问题当部队在广大群众运动中，或在伟大胜利中，常被暂时的淹没着，不容易暴露出来，但一遇特别艰难困苦或敌情意外紧张，便暴露的非常明显了（西府战役的后期，曾发生了不少问题）。这种政治上软弱性的实质，就是缺乏高度的阶级觉悟，经不起残酷的战争考验。如不克服这种严重的思想倾向，加强部队

的战斗意志，就不能使我军从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就不能取得今后的更大胜利。前委会鉴于此，即于五月下旬召集了扩大会议，检讨了部队中某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斗志不强，阶级责任心不高，自由主义严重倾向，并展开了对于这种倾向的严厉斗争，提出了在夏季整训时开展群众性的整党评斗志运动。

（二）这种整党评斗志运动，各部队问提法不同，有的叫评斗志运动，有的叫整党运动，有的叫三评（评斗志、评智慧、评政策）运动，也有的叫四评、三查运动。且基本上是贯串着以查斗志整党为中心。他们根据各个部门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口号，如斗志特别薄弱的，他们即以查斗志为中心，党的工作薄弱的他们即以整党工作为中心。如指挥上存在严重问题的就提出了评指挥；群众纪律战场纪律存在严重问题的就提出了评纪律；作风上存在严重问题的就提出了评作风；执行政策未贯彻的，就提出了评政策。因而群众说：“查查你的斗志强不强，评评你会不会用脑筋（即指挥问题），看看你会不会贯彻政策”。这个三评整军运动，在进行的过程中，因为有三查运动的经验，一般的都采取了说理斗争的方针，避免了三查中各种左的偏向（捆打等）。虽然某些部队，某些战士开始时还存在着若干不正确的看法说：“去年来了个三查，今年又来了个三评，反正是有（思想）的倒霉”。但在实践中的过程中，首先以反省为主，然后联系到暴露与批评坏的，提高他们的战斗意志和阶级责任心。因此：纠正了他们对于三查存在的不正确认识。在具体评查的方法上，一般采用了由上而下，从评领导到战士，或由下而上，从评战士

到评干部；由典型到一般，从一般到典型，互相结合的方法。对查出问题的处理，又是以思想教育为主，组织处置为次。所以各部队评查出来许多斗志坚强、英勇杀敌的好同志，而受到表扬。战士群众把三评称为“过秤”、“照镜子”、或“评骨头”。二纵队十二团的战士杜小远评斗志坚强的同志时说：“他们一不怕任何强大的敌人，而能打倒他；二不怕敌人任何工事与火器，而能设法摧毁它；三不怕一切自然界所给的任何困难，而能克服它。并能与任何不良分子及不良倾向作斗争，而能改造它；在愈困难的时候，愈活跃，在愈严重的时候愈坚强”。如三纵队四团一营长孙巽成同志在宜川战役中负伤三处不下火线，仍坚持指挥作战，捉住几十个俘虏。三纵队六旅十六团连长傅友楷、在澄城县抗击敌人进攻时，连续打垮敌人数次冲锋，仍坚持着阵地；在荔镇之张村以一个连的兵力抗击了敌人三个团，坚持了一天。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战士尤朝贵同志，责任心提高，不进房子吃饭，拿了几个馒头夹上菜回到工事里去监视敌人。一纵三团三连指挥员孙永年，是个残废（是三等）于岳子镇抗击时，亲自带机枪连续执行了两次掩护任务；恒安州抗击时，带六七个人向敌人反冲锋，把敌人压制在沟里。以及三五八旅七一四团的刺杀英雄刘四虎，独一旅的周黑子班，都是战士一致拥护的战斗英雄，而成为该纵战斗英雄的旗帜。六纵的一个排长张剑龙，在遇马匪骑兵包围时，连投了几个手榴弹，炸死敌人，炸伤自己，爬行了一天才赶上了部队。四纵七团三连马宜生同志在清华镇抗击时，反复三次的掩护部队转移，良平战斗时，虽然几经受伤，仍然坚持战斗，击溃了进攻的敌人。类似这样

的英雄事迹，举不胜举。这证明了我党大多数的指战员有高度的阶级责任心和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的高度觉悟。他们表现了真正坚决勇敢顽强的斗志，忘我与自我牺牲的伟大精神，所以他们创造了英勇的事迹，得到了广大战士群众拥护。

（三）另一方面，那些斗志不强，怕敌怕死，本位主义，骄傲自大，不执行命令或执行不坚决，而失掉共产党员与人民战士应有责任心的分子，在评查的运动中，同样的受到战士群众的批评与军事纪律的应得处分。但是对这些犯错误的同志，采用了“实事求是，耐心说理”，“清事实、清动机、清效果”的方针，没有随便的乱扣帽子，使用压力（捆吊打骂等），追逼其承认错误。对其所犯错误，帮助其深刻反省，分析其犯错误的根源，指出其今后克服的办法。因此，达到了犯错误同志改正错误，转变思想，并教育大家的目的。根据三评中的反映，这种有毛病有错误的同志大体分析起来有以下几种人：

甲、没有从思想改造的地富分子，他们没有完全改变剥削阶级的思想、立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表现了作战应付，工作消沉。

乙、蜕化忘本的自私自利分子，他们有着个人主义的思想，如享乐思想，经受不起艰苦的考验。

丙、阶级觉悟不高的同志，对工作对战斗抱着不负责的态度。

丁、缺乏战斗经验的同志，他们的斗志受到了限制，在严重的关头，就慌乱起来。对于这四种不同的人，在评查中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前两种人评须严格，后两种人着重教育，

帮助提高他们。就是对于前两种人各部队一般的大部采用了批评严组织宽的方针，有些不给予组织处分争取其转变进步。但有些部队对于这一方针执行的不够很好，处分的同志就比较多。如独四旅记功表扬的五百八十八人，受了处分的四百一十八人。又如有些部队在评功查过中奖功批过，功过相抵，忽视了积极教育作用。评查就妨害了群众更大积极性之发挥，使犯过错误的同志，灰心丧气。因此，今后我们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不仅应评他的错误，而且应该发扬他的功绩；对于记功受表扬、奖励的同志，不仅表扬他的优点，而且亦应指明他的缺点，两者取长补短，团结一致。

总之，我们在三评中吸取了三查的经验教训，克服了三查中发生的毛病缺点，因此，三评运动可以说是三查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四）三评运动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以支部为核心，贯彻群众路线，民主方式进行的，同时，又整顿了党的组织，评查了全体党员。一般的部队都召开了各级党委会议检查了党的领导，整顿了党的领导思想，批评了党内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及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然后由上而下的进行整顿支部，评查党员、党的工作。在整顿方法上，有的都是先由团委选择了干部中的好坏典型，在代表大会上作示范的评查（每班选举一个战士代表，每组一党员代表），取得经验，推广全面。有的纵队则先开纵、旅、团、营各级党委扩大会议，进行查领导，然后开支部会议，在党内再召集支委组长开训练班，进行训练。有的部队不分党与非党，先由群众酝酿，提出要查的干部和党员，再开军人大会讨论。总之一般都是以

支部为领导核心，发动群众整党，而不是单纯的由党内少数人去整党。因此，对有毛病有错误的党员，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了检查和批评。这种群众性的整党方法，在这次三评运动中证明不但没有降低领导威信，相反的使党的威信在战士群众中更加提高了。因此在整党的过程中，大批的积极分子被吸收到党内来，有的向党申请入党，有的被群众推举入党，有的人整党中表现积极而被吸收入党。在这次整党中全军被吸收入党的党员约在三千人以上。

而上述三种吸收入党的方法，根据一纵的经验，以自动申请，再经组织批准方法较好。因为其出于自愿申请入党，觉悟程度一般的是比较高的，入党后在工作上的表现也是比较好的。群众推荐入党的，往往有些觉悟程度不高的，被推荐者出于被动，不愿入党，又怕人家说他不识人抬举。至于有些部队，对群众推荐申请入党不经一定组织手续审查批准，即接收为党员，亦是不够妥当的。在整党的同时，各部队均又以民主的方式，进行了群众建议提拔初下级干部工作。其方法，大部是在三评的群众会议上，由群众建议提出应该提拔的人，在群众会议上进行评思想、比条件的讨论评定，认为谁可以作为干部时，再提向组织审查批准。用这种民主方式建议推荐的干部，一般的是比较优秀和群众有联系的分子。个别部队利用投票选举的方式，选举营、团级干部，是违犯了军队中组织原则的。

（五）在三评运动的经验中证明，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要把兵练好，要使部队巩固，要部队自觉的执行纪律和政策，首先必须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确立全体指战员为人民服务

的观点。三纵五旅一个战士说得好：“要把兵练好，首先要确定当兵第一要苦心练”。但是这种认识在某些部队的领导上还没有和那个战士一样去领会。因此，在部队的整训中，急于要提高技术，练好武艺，而没有先去搞思想，结果全搞不起来，又回到搞通思想的工作来走弯路。一纵三五八旅掌握了这个规律，所以他们在每次整训中，首先必须整思想，然后进行练兵。因此，他们的工作就显得比较有步骤，比较有成绩。这一经验在去冬三查和今夏的三评中，都证明了他是部队工作的一个很好的值得我们记取的经验。首先要搞清部队的复杂思想，要确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又必须实行部队中的群众的民主运动。不论干部和战士的种种不正确思想，用群众的力量，群众的意见去批评教育他们，生效就大，就可以得到转变。只有领导者或少数的负责同志，去批评教育（当然个别谈话也是必要的），相反的都收不到应有的效果。这在二评运动中解决了若干干部的思想（个人主义闹不团结等）问题，都是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种部队中的民主运动，又必须是有领导的，有组织的，有秩序的，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领导者必须掌握每一个运动发展的全部过程，随时的指导运动发展的方向，适时的纠正运动中产生的偏差，不致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办，使运动自流的发展下去。发动群众搞通思想，掌握群众运动，这个规律，在三评运动中，凡是掌握得好的，他们的三评工作就成绩大，就少走弯路。反之其成绩就不会很好，就要走些弯路。这就是我们在三评运动中领会的主要经验。

（六）不可否认，三评运动还是有缺点的，这就是由于：

甲、各部队之间的发展还不平衡，有的评的比较深入，有的评的不够深入。由于评的提法不同，因而进行步骤亦各有不同。其次有些部队把政治整训、军事整训同一时间的排列起来，而忽视了中心。也有的上面评了，下面也评了，中间没有评。

乙、在三评运动中，领导上没有总结各部队间的经验，加以交流推广，对于发生了的偏差，也没有适时的纠正。

丙、由于环境的变化，部队多于执行作战任务，故有些部队的三评没有很好的进行，结果其在这进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也没有及时解决，而拖延下来。

这个报告，因有些部队的报告还没有送来，所以就以现有材料写了出来，其中有些问题提的恐不全面，尚待以后再补充。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1〕这个报告经周恩来阅后批示：“此报告甚好，可稍加改编后发表”。

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关于扩大会后 执行报告制度情形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

毛主席并西北局：

(一) 九月前委扩大会议，中心是展开讨论中央八月十四日与九月四日两电指示，经过月余后，证明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各纵旅团党委在会后，均作了检讨，旅委以上均作了决议（四纵尚在检讨中），并于实行中。首先在财经上打埋伏，铺张浪费人为减少，各纵清出黄金六十两交公。开干部会，照前委办法，按原有一般伙食标准，每人每日增加二两米。建立审计制度，取消首长代审制，一般在自觉执行。报告制度，亦开始自上而下的建立起来了，对过去无组织无纪律错误现象的认识是进了一步，但遵守制度、遵守政策还未展开成为全军的群众运动，因此这一基础还不巩固，准备冬季练兵时，展开这一运动，到群众中去，消灭一切可能存在的死角。

(二) 荔北战役后，部队疲劳已恢复，战斗情绪据各纵反映还是很高的，俘虏兵大部已补入部队，粤军俘虏，因言语生活习惯不同，争取时间要久些，逃亡现象仍未断绝，自战役开始（十月六日），一纵十余人，二纵三十余人，三纵有五

十九人之多，原因是将新俘虏补入部队太性急。四、六两纵尚未报来。新提大批干部，指挥能力可能弱些，但有十天战术演习，战力不会比荔北战役时弱多少，故拟本月中开始下一战役行动。

（三）征粮政策改为预借后，据地富反映：“我有粮军队要吃饭，向我预借将来顶公粮，这是应该的”。筹粮人员，亦感觉比过去易筹，甲保长多数未逃走，并替我军办差事者不少。

（四）黄龙区已解放八个月，人民一般表示筹粮负担比国民党轻，人力负担重，解放军纪律好，国军纪律坏，故没有话说，惟群众工作很差，所有县区农会，真有群众基础的没有一个。老区派来干部更多命令作风，新起干部保甲作风，浪费铺张，负担不公，游击队纪律不好，这是群众普遍呼声。最严重的是老区派来的干部，不爱做群众工作，习惯于同级政府内做些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党代替行政，而不是如何去领导政府的现象很严重，有某些区至现在群众中没有一个党员，也没有一个会员，多数时间停止在会议中。

（五）西北局八月会议后，接着地委开了二十余天，黄龙县委开了二十天，其他县委可能也是如此。野战军在六七两月在黄龙区忙于内部整训，未认真去做群众工作是一大损失，歼击三十六师后，八九两月有某些程度注意。六纵已有四十四个村总结（其他各纵尚未总结），取得初步经验。前委已决定今冬野战军两大任务（下一战役结束后），一是大做群众工作，一是大练兵，具体办法另报。

西野前委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 转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关于 处理俘虏军官经验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

各军区各野战军：

兹将西野政治部十月八日关于处理俘官的经验转发仿行。报告原文如下：

总政：

此间处理胡匪三十六师俘虏官工作，由于战前准备较充分，战后时间裕余，物质条件较好，以及各部门认真执行一个不放的原则等原因，比过去瓦子街等次战役俘虏工作有了进步，并取得了些经验教训，兹分述如下：

(一) 管理与警戒。由于过去对俘官管理采取了所谓外宽内严的方针，在管理方法上不愿光明正大的施行警戒，而采取了隐蔽的方式，所谓麻痹人家，实际麻痹了自己，因而造成大批逃亡现象。这次公开宣布纪律要求其遵守，也实行严格的管理和警戒，但并不是在态度上对其故意侮辱或刺激。事实证明，这种管理方法不仅在集中审查的半个月中，三百多个俘虏没有逃跑一人，并且也没有引起反感，反使他们感到

态度和蔼、坦白与生活照顾的温暖。

(二) 检查与俘物保管制度。鉴于过去俘虏官利用财物收买群众，乘机逃跑，以及身藏重要文件未被检查出等缺点，因而此次采取了普遍而严密的检查方法，无论高级官与下级官，都须经过人身检查，并向其说明检查不是搜腰包和侮辱，而是保证他们财物不损失的制度，结果检查出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重要文件和大批款项财物。这一些财物除公款予以没收外，所有私人财物一律登记保管，发给本人三联单收据，本人对其财物有合法的自由处理权力。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俘虏逃跑的机会，而且因持有合法执据，不再担心其财物会受损失，尤其可以避免某些不好工作人员在俘虏中的不良现象。

(三) 审查与教育俘虏官。在前方短期集中期间，审查是主要工作，教育只配合审查，使审查便于进行的一种手段。处理瓦子街战役俘虏时，有些工作人员在审查俘虏时，忘记了主要目的是为了迅速查明俘虏的真象真面目，而是给俘虏上大课，从国际讲到国内，从国内讲到党内，结果半天不能查明一个俘虏。在这一期间，对俘虏的教育除应着重打破顾虑，反复证明我党的宽大政策，以及被俘不是耻辱而是解放外，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工作人员以身作则的影响教育，用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俘虏，比谈长篇大论还有效。这次俘虏中，对我们最受感动，而深信不疑的是我党我军上下一致，人人负责，吃苦耐劳，以及军民亲如一家人的工作作风。他们说：“我们听了你们的讲话后我们是半信半疑，看了你们的行动和事实才真信不疑了”，这便是很好的证明。至于系统的进行教育，必须放在后方的安静环境中去慢慢地进行。审查最有效的办法

是走群众路线，在俘虏官中发现积极分子与使用积极分子，即以俘审俘，这次数百名俘官中的主要分子，绝大部分是从积极分子中逐渐发现的，其他如看举动、查历史、业务等都有一定作用，但只能是补助的办法。

（四）利用俘虏官写材料的经验。过去我们对利用俘虏官写材料不大重视，认为这些人所写的材料，不大实际，即便实际，也是“明日黄花”没有大用处。但根据这次经验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此次利用俘虏官写了十九种材料，其中有价值而真实的很多，如陕西铜川县附近工事配备要图，胡匪三十六师政工组织系统要图、姓名及工作情形等。原因是这次采取了新的方法，即一方面选择有关俘虏，集体座谈，规定他们写材料，并规定必须亲自签名负责，以便今后证明其真实性，于是这些人便都很认真的工作，并且都很认真的签了名。一方面号召所有俘虏为人民立功，要他们大部的写材料，不限于我们需要的范围以内，不局限在西北战场而是大量的、广泛的，谁知道什么写什么，我们所花费的只是几张纸，有用当然更好，无用亦无大损失。如伪国防部视察官马国荣（原二十一师上校团长）所写整二十一师材料，对西北战场上来说，虽没多大用处，但对其他野战军来说，还是有相当参考价值的。又如裴景发（一六五旅四九×团指导员，青海人）所写的青海马家队伍，也有相当参考价值。

（五）从搜俘虏腰包统计中看我军的俘虏政策。我们过去在处俘工作中，粗枝大叶，对某些违犯俘虏政策的现象，未能及时引起重视，也从没有作过详细统计和调查。但根据过去送来重审的俘虏官反映，搜腰包的是相当的多。而这次送来

的俘虏官共计三百六十二名，经详细调查、对证。其中被搜过腰包的仍有二十八名，占百分之七强（其中可能有若干不确实的数字，已通知部队检查纠正），但大体上可看到我军自三查四评^{〔1〕}后在政治上、纪律上的进步。

（六）从释放俘虏官的效果来看，今后释放派遣问题，根据这次在三十六师俘虏中的详细调查研究，我们过去释放和派遣俘虏官是有相当效果的。胡匪虽然用青训队和隔离的办法，不准释放回去的俘虏官与其部队接触或使用，但由于敌匪内部空隙很大，这些释放回去的俘虏官，一般的都起些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和主张的作用。在三十六师一六五旅四九三团、四九四团、四九五团之三个团的俘官中作了调查，其中只有三人（两个报务员一个指导员）没有看见过我们释放回去的俘虏，但间接的也听到我们不杀俘虏的政策，其余俘官都看见过我们释放回去的俘虏亦听过他们说我军的政策和主张，还有部分在沙家店战场上起了作用。如此次反击战役中，一六五旅四九三团卫生队长吕德辉在沙家店战役解放后释放回去的，此次被歼时劝告战斗部队士兵不要跑，缴出轻机枪一挺，冲锋枪二支，步枪十余支。一六五旅四六四团一营里有我沙子坪释放回去的两个战士，平时曾说过我军生活民主自由，此次被围时当即劝告排长唐笋怀不要抵抗放下武器。一六五旅四九五团排长李坭，因他过去曾看见他的连长和副连长是在沙家店战役被俘后释放回去的，因而此次被包围后很快的率领全排放下了武器。因此我们认为，在一个不放原则下凡是老弱残废无劳动力的，和有特殊作用的俘虏，还应有条件的慎重的继续释放和派遣一少部分出去比较有利。

（七）俘虏对我军瓦解敌军标语口号意见，作为了解我方瓦解敌军标语口号在敌军中的效果，我们在二百多俘官中作了详细调查，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标语是：

甲、缴枪不杀，发路费回家。

乙、缴枪不杀，投降有重赏。

丙、蒋军官兵们，不要为四大家族当炮灰。

丁、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愿回家的发路费，愿留解放区的分地种，愿参加工作的欢迎。

缺点是一年多看见我们的标语口号太少、太小，不是没人看而是想看看不到，有的标语写的不具体，如打倒四大家族最好能写成打倒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敌人的真正心情，并发动俘虏根据自己的想法拟了二十多条关于瓦解敌军的标语口号，其中他们多数认为：“你们一年多来哪里打过胜仗。早晚是送命，不如快缴枪。”“蒋胡军官兵们赶快醒醒，绝不要再打糊涂仗”。“蒋军官兵们，自动放下武器，缩短战争，回家安居乐业”等标语口号较好。据说这几种想法在敌人内部相当普遍，这种标语口号最易打动他们的心。

（八）总之，我们认为对俘虏官处理，除应尽量争取留用下级军官及日籍人才，并利用其对敌进行瓦解工作外，应更进一步的把俘官看成了了解敌人并从敌人方面检查我们自己“政策战术上”的宝贵财产，使其人尽其材，材尽其用，而不应该把它看成单纯管理工作。

西野政治部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三查四评，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评作风、评斗志、评智慧、评政策。

关于敌兵力分布及我军战术问题^{〔1〕}

彭德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敌以九个师（旅）为东府^{〔2〕}第一线防御部队，沿白水河南岸夹洛河、大峪河，东起合阳西至罕井（白水南十五里）百里宽正面，以九个师平分为三个防御集团。除一师、七十八师未遭消灭外，其余七个师均被消灭一至三次。第二线之大荔、蒲城为东府两重要据点，只有一二三师、一六七师分守，均曾被歼过。此次荔北又各伤亡千余，并数次被击溃。三军（整六师改）以五个团固守铜川，一个团守耀县（各另附一个保安团），六十五军（富平）、十七军（西安）、三十八军（三原）残部正在补充新兵中。一三五师已回潼关，三十一师回渭南，五十七军（二〇三师改）之二一四师分防麟、永、乾、彬^{〔3〕}，二一五师分守西安、户县，二二五师（新九旅改）分布淳化、三原。在十七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未补整以前，机动兵力比过去已大大减弱，这是很明显的。故我进攻当而敌任何一个防御集团，敌只有放弃其他两个防御集团来增援荔、蒲^{〔4〕}，只有小部出扰能力，其他各部增援，须在两日以后。胡军屡次惨败及全国影响，士气益见低落，虽防守力还不算很弱，但攻击精神一般很差，故利于我阻击分割，集

中主力各个歼击。

(二) 秋季攻势歼敌四个主力军(整编师)大部,取得了进攻平原村落、纵深相当坚固设防的经验。战术技术在这一时期有某种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八二雷、六〇雷、枪榴雷、手雷等的创造与采用逐渐熟练,增加了攻坚的威力与信心。解放战士补充减员,而且使部队稍有扩大。战争环境中的一套军事政治工作,在古田决议的基本精神上,有某些新发展,并逐渐相当成熟与相当普遍起来了(还未到完全成熟与完全普遍时期)。部队阶级觉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表现在官兵间、上下级间、各纵队间相互批评、相互学习与信赖,不推脱而愿意担负最艰难的战斗任务。秋季攻势以来我伤亡虽不小,而战斗情绪一直是在比较巩固的基础上升涨着,这些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正常的现象,值得坚持与发扬。但干部中个别同志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胜利中表现骄傲自满与急躁,仍然是存在的。因此,在秋季攻势中,没有取得完全应有的胜利。如歼击三十六师(军)时,其侧后梁周村之一个团未及时被歼,该军残部沿洛河经澄城向南逃脱。歼击十七军、三十八军时,因永丰镇一点(一个团)亦未攻下,掩护了残敌涉洛水向西逃脱。荔北打援军战役,如大壕营不受阻,依当时情况敌至少有四师至六师被全歼。上述我以三倍至六倍于敌是完全可以及时取得全胜的,这些血的教训是不应忘记的。特别是全军士气旺盛时,干部战士均易产生轻敌、疏忽思想,招致各种各样的损失,以致妨害应得的胜利,值得引起我们高度注意。

(三) 敌大我小,从西北(陕甘)战局全貌来看还暂时存

在，但从放弃延安时来看，从第一次歼灭三十六师时来看，从歼灭刘戡^[5]时来看，从西府^[6]陇东战役时来看，从此次荔北战役前后来看，形势与内容均已起了很大变化。而且一次比一次不同，变得于我有利。全国各解放区胜利更大，益见接近全国胜利。对这一空前巨大的胜利的局势看不清楚，或者看清楚了而产生等待友邻胜利来帮助西北，或者忽视西北当前具体情况，均是不对的。胡、马两军现在还比我多两倍三倍或者还稍多一些吧，这是不可怕的，再多一些也会被我们消灭的。可怕的是在具体行动中，因疏忽而犯错误，尤其是每一战斗发起时，不精细准备，或者忽视或者看不起敌人一个团、一个营的集团工事，致妨害取得应有的胜利。梁周村、永丰镇等的教训就是事实。对敌人一个连，一个排，一个机枪手，单独一个伏地碉，都是不应当轻视疏忽的。一个战役消灭敌人几个师、几个军，首先都是从消灭敌人几个伏地碉，几个连，几个营开始的，尤其胡宗南^[7]几十万军队，首先是从青化砭消灭他一个团和一个旅部开始的。争取大西北解放也要从一村、一区、一县做起。一切只看全局形势有利，而忽视具体情况与具体准备，更不细心研究取得每个胜利应有的手段和步骤，那只是空喊胜利的官僚主义者。我们要把全局有利与一个一个的夺取敌人阵地，一点一点的积蓄革命力量联系起来，去处理问题。其次，敌大我小，就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消灭敌人，就必须求得每个战斗的迅速解决。某些同志把迅速误解成为急躁，把猛攻猛冲误解成为乱打乱冲，这是错误的。迅速须预先有精细准备，严格检查是否完成了各项攻击准备，绝对不是盲目的急躁。急躁是从主观愿

望出发的，是缺乏或者没有实际根据的，把胜利寄托于侥幸。要严密组织火力与具体分工，在两分钟内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火力，掩护步兵有效的冲锋，绝不是浪费弹药乱打。要细心的选择攻击点，见到自己的火力压制了敌人的火力，即时发起冲锋，一股劲的夺取敌人阵地，继续扩张战斗胜利，直到消灭敌人。缩短战争时间，避免反复拉锯，就是减少伤亡最好的办法。这就是猛打与猛冲的正确解释，把猛打猛冲误解为乱打乱冲是错误的。

（四）下一战役是会胜利的。继续全歼敌两三个师（旅），渭北战局即可改变，拉锯与相持将成过去。要争取这一决定性的胜利，关键在正视与克服第三条中所存在的缺点。各纵分驻太散，雨雪高飞无法与会。数日开始行动，可能需要推迟两三天。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 〔1〕这是彭德怀给第四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政治委员张仲良和警备第四旅的指示。
- 〔2〕东府，指今陕西省渭南地区一带。
- 〔3〕麟、永、乾、彬，指陕西麟游、永寿、乾县、彬县。
- 〔4〕荔、蒲，指陕西大荔、蒲城。
- 〔5〕刘戡，原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一九四八年二月在宜川战役中兵败自毙。
- 〔6〕西府，指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
- 〔7〕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关于 冬季群众工作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

各纵旅党委、黄龙地委、各县委：

今年冬季群众工作，应当着重的做好下列几项：

一、领导群众进行反恶霸、反特务、反贪污及反不公等斗争。在领导群众斗争时必须与群众具体利益相结合，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领导群众进行他们愿意进行的斗争，然后逐渐提高觉悟，深入斗争。对于不同斗争对象，应当采取不同的斗争政策，主要斗争对象应当是地主恶霸特务头子；对于农民内部纠纷，应采取调解方针；对犯错误的干部，应根据干部本质和错误性质，分别进行批评教育或清洗斗争。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之后，在相当普遍深入的群众运动过程中，改造坏的乡村政权，组织群众武装，吸收在群众运动中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入党，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

二、发动群众普遍进行减租减息及反对年关逼债等斗争。在宜川、洛川、宜君、中部⁽¹⁾、韩城、黄龙数县中，如具备了平分上地三个条件的地区，即应进行分地，一个乡具备了分地条件，即分一个乡的地；一个区具备了分地条件，即分一

个区的地。在没有具备分地条件的地区，采取下列办法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土地要求：甲、将富农租种之社地、庙地、祠堂地等（这些地租额一般的较低），转租给贫苦农民，上述各项土地以及为群众深恶痛绝的大恶霸罪犯等之土地，如多数农民要求分配时，应即批准农民的要求。乙、规定适当价格，从地主富农手中回赎一部分典当地给农民。

三、组织农民协会。首先应在酝酿斗争中，吸收农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农会小组，在斗争过程扩大农会组织，成立村、乡、县农民协会委员会。农会会员必须个别介绍，不要集体参加造名册，或其他拉夫办法。今冬两三个月各纵委分担的工作区，争取贫雇中农的农户半数参加农会。目前农会主要任务，应是以贫雇农为骨干（雇农组织小组参加村农会），团结中农。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

四、为使群众运动生根，不因部队干部离开而使工作中断，必须十分重视培养当地干部及群众，和他们一起进行各项工作，帮助他们学会做工作的方法，加强他们的思想政策教育，养成处处替劳动人民目前的及长远的利益着想，密切联系群众的良好作风。这是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前委将以此标准检查工作。上述各项工作任务地完成，首先要求各级党委领导思想上必须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同时，发动群众必须放手。对于群众运动中所发生的某些倾向，应当在适当的时机采用适当的办法去纠正，不要过早的过分的批评指责，不要打击群众热情；在运动还没有开展之前，不要空喊“防左勿右”，并反对空喊群众工作重要以及重复多次的过早的土地登记调查，而不具体的帮助群众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这样的

空谈主义与官僚主义的作风，必须加以严格的纠正。关于游击区群众斗争，群众组织，均应适合于游击战争环境。

西野前委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1〕中部，旧县名，即今陕西黄陵。

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 的传达报告（节录）^{〔1〕}

贺 龙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我是在八月离开延安的，本月上旬才回来。九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会议^{〔2〕}，共开了六天。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讨论和确定了今后的任务。今天我把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向大家作传达和说明。共讲十个问题：

一、国际形势（略）

二、国内形势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已从根本上崩溃，特别经过两年零四个月胜利的人民解放战争，已使战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敌人已从长期优势转为劣势，我军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已转为优势。因此，我们就可能在一年左右（原来估计从一九四六年算起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不远了！这一个形势的出现，是党领导人民经过了三十年艰苦斗争的结果，特别是从一九四六年七月以来^{〔3〕}人民解放战争

胜利的结果。下面我从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来具体说明这种形势。

国民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正处于迅速崩溃之中。由于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国民党曾实行的币制的改革，采用金圆券^[4]。我们党早就指出，这种改革不仅不能挽救他的经济危机，反而使其通货膨胀会变本加厉。事实证明，这个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月来，他的金圆券贬值，物价飞涨，上海的米价一周内由每石八十金圆券飞涨到一千八百元，上涨了二十二倍多。在南京，一天内就有一百家米店被抢，其粮食危机情况可见一斑了。

在政治上，中间力量完全倾向了我，蒋介石政府完全处于孤立，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就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内部来说，从蒋介石本人起，都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素来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反动派，在行政院长翁文灏^[5]下台之后，竟没有谁敢去接任，最近由孙科^[6]出面也组织不起班子来；陈布雷^[7]因悲观而自杀，南京要员的家属纷纷搬家；李宗仁^[8]、白崇禧^[9]、何应钦^[10]、宋子文^[11]、张群^[12]等人为了设法保存一点反动力量，准备再来对付人民，正在玩弄“和平”的阴谋。像伪立法委员刘不同、民盟的张申府都公开写文章要蒋介石下野，或呼吁恢复所谓“和平”。所有这些，足可以看出反动派内部的混乱状况。

在军事方面，从一九四六年七月以来，国民党军被歼状况是：第一年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全部军事力量（包括后方机关、学校、海陆空军全部在内）共约四百三十万人，被歼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加上非正规军和逃亡者共被歼一百七

十万人，而只补充了一百万人；在第二年开始时，其兵力为三百七十三万人，被歼正规军九十二个半旅，加上非正规军和逃亡者共被歼一百五十二万人，只补充了一百四十四万人；第三年开始时，其兵力为三百六十五万人，经过头四个月作战，到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时止^[13]，共被歼营以上番号合计为八十三个师（其中包括六十三个整师、旅），合计兵力一百万，其中五十万是十月份被歼灭的，估计他补充三十万人，他现有军队只有二百九十万左右。在十一月份徐州战役^[14]的第一阶段，黄伯韬^[15]兵团的十个师以及其他部队共十八个师被歼或起义，现在黄维兵团也已被歼，邱清泉^[16]、李弥^[17]、孙元良^[18]等三个兵团被围，西北野战军的三战三捷^[19]和张家口一线的军事胜利，对国民党都是沉重的打击。

我们的部队，第一年为一百二十八万人（一百二十三个旅），第二年为一百九十五万人，第三年为二百八十万（一百七十六个旅），现在已增至三百万以上。

在过去两年多的战争中，我们共缴获步枪九十余万支，各种机枪八万八千余挺，各种口径的炮一万五千余门，坦克一百多辆，火车头一百九十九个，汽车三千三百多辆，小型军舰七艘，汽艇二十七艘。

从上面敌我力量的对比证明，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这方面早就超过了国民党），而且在数量上完全超过了国民党，我们已取得了完全的优势。特别是在徐州战役中，如果我们获得全胜，则国民党军队即失去了主力。它原有两个主力：一个在东北，共四十万大军，在十月已全部被我歼灭；另一个在徐州，共八个兵团，六十六个师，如果把这股敌人歼

灭，国民党等于失去了江北，因此他拼命的顽抗，但被彻底消灭之日已为时不远了！

解放区的面积（以战争第三年开始时计算，下同），有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九百五十九万平方公里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现有人口一万万六千八百万，占全国四万万七千万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二；现有县城以上的大、中、小城市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二千零九座城市的百分之二十九。目前，解放区的面积、人口、城市都已大大超过了此数。特别是东北的全部解放，华北内地据点残敌之肃清，对于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有重大的意义。

党员的数量，已由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百二十一万人，发展到现在的三百万（我们共产党员发展状况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前为五万人，这年国民党叛变后，下降到约一万人左右。一九三四年又发展到三十万人，一九三七年又降到四万人左右。一九四五年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现在已达三百万人）。

在解放区中，大约有一万万人口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

克服和正在克服党内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问题，并继续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整党。

九月中央会议，总结了革命战争两年的胜利和时局发展，对敌我力量作了详细的估计。当时毛主席指出，五年左右基本上打倒国民党，而在战争第三年经过了头四个月的伟大胜利之后，又提出一年左右可能基本上打倒国民党。这些估计都是稳健的、谨慎的。

什么叫在一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呢？这并不

是说，把一切反革命力量都扫光，而是说把国民党的主要的军事力量消灭和主要地区占领，其中最主要的是军队。我们通常讲国民党反动政府时，主要是指他的军事力量，把他的军队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即使还剩下百十万人，分守几个孤立的据点或偏僻的省份，也是无能为力了，这就叫做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例如山东只剩下济南，山西只留下太原，是不是可以说在山东基本上打倒了蒋介石，在山西基本上打倒了阎锡山呢？可以这样说，但全部扫光，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因此，我们只要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基本部分，并由于歼灭其军队的结果占领了各个主要的省份和地区，使其政权失去了抵抗的基本力量和依靠，这就使国民党从根本上被打倒了。但是，如果把一切反动力量从各个角落里都扫光，肃清封建势力，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在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的估计胜利前途，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胜利就要到来了，对此我们要有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对于困难也要有足够的估计和清醒的认识，并考虑克服困难的办法。我们有哪些大的困难呢？

首先，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中，如果发生了突然性事变，就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于工作做得不好，未能制止战争，而且战争很快的爆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如果不打仗，对中国革命有利得多，苏联可以养精蓄锐，世界民主力量就能够援助我们，我们一年左右就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再加一段时间，全国胜利就可实现。但是，如果战争打起来怎么办？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大困难，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有什么办法呢！但世界民主力量最终能够压倒反

动力量，并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打仗的党，我们是不怕的，如果敌人要打，我们就坚决打下去，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这种准备，就什么也不怕了。

其次，美国人帮助蒋介石，这也是困难。但是我们不怕，也是能够克服的。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

这两年多的战争，形式上是蒋介石打的，实际上是美蒋合伙打的。美国在后供给金钱、武器、技术装备、派军官团、派兵驻在沿海，帮蒋介石训练部队，但我们都把他们战胜了。据我们所知，在经济上，美国从日本投降以来，采取贷款、租借、援助剩余物资、救济物资等各种形式给蒋介石军火和物资援助，共达四十三亿四千七百万美元；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美给蒋的援助共为十五亿六千七百余万美元，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在印缅战场及滇西对日作战，而绝大部分是留在内战时期打我们的。以上两项共为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但是这些援助，现在差不多用光了，美援并不能挽救蒋介石失败的命运。

在军事上，美国直接装备训练蒋军，蒋介石把他们作为反人民的资本。其中全部美械化的有二十九个军，计六十九个师，加上另外的十四个师，共八十三个正规师；此外，还有五个快速纵队、十八个交警总队（等于师），合计共一百零六个师。半美械化的有四个军，共十一个师。以上全美械化和半美械化师共一百一十七个。经过两年又四个月的战争

(至十一月二日东北沈阳解放为止)，全部美械化师被我整师歼灭（包括起义的在内）共五十九个，整团被歼者为五十五个团，计十八个师，两者共七十七个师；在十八个交警总队中，有四个被全歼过；现有的五个快速纵队中，被歼灭了十一个整团；半美械化部队被我歼灭七个整师、四个整团。从逐年被歼的数量来看，以全部美械化师为例：第一年被歼十五个整师，第二年被歼灭九个整师，第三年头四个月被歼三十五个整师，其中美国和国民党鼓吹为最精锐的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和新七军都是在第三年被歼灭的。在这些被歼的美械师中，有十个师被歼过两次，一个师被歼过三次，一个师被歼过四次。由此可见，美械化部队也并不可怕。此外，蒋介石还接收了日本一百多万军队的武装。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能够挽救蒋介石失败的命运。

今后美国还会继续给蒋介石援助，但要像过去那样给大量援助就很困难了，因为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都反对。美国会不会搞其他阴谋来破坏中国革命运动呢？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美国是否会直接出兵呢？一般说来，可能性不大。因为出兵少了，像现在驻青岛的那么一点美军并不顶事。如果出兵多了，这就成了一个国际问题，美国人民、世界人民、苏联等国都要反对。就是他来了，也并不可怕。我们在八年抗战中，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军队由几万发展到了一百多万。现在我们有三百多万军队，也一定可以战胜美国。

总之，美国要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革命到底，我们的态度：第一是不怕，第二是要提高警惕。我们对美国给蒋介石

的任何帮助，那怕是很少的一点帮助，我们都要反对，都要揭露。

第三、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有的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如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有的是蒋嫡系，如宋子文、张群……，他们为了保持反动力量，在一定的时机出来搞所谓“和平”运动，这也是一种困难。如果他们把蒋介石赶下台，另搞一个政府，要同我们进行“和谈”，怎么办呢？有两种情况，即谈或拒绝谈，这都要依据人民的觉悟程度为标准。如果人民已认识“和谈”是反动派为了保存其力量，准备将来再向人民进攻，因而使革命增加困难，我们就可以拒绝谈判而继续打下去。如果人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派代表去谈，一面谈，一面打，从谈判中去教育人民，使他们认清敌人搞的“和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现在我们是谈判还是打，不要说死，但是应该及时揭露敌人玩弄的种种“和谈”阴谋。人民要的是真正的和平，这种和平已经快要到来了。敌人讲的“和平”则是假和平，是在和平的幌子下，为了保存其反动力量，伺机再向人民发起进攻。现在蒋介石表示不下台，所以这些人的“和平”运动还不敢公开进行，但已通过他们的知识分子，如伪立法委员刘不同等人写文章要蒋介石下野，以“恢复和平”。

总之，这些人看到人民快要取得胜利了，都想要阴谋，搞破坏。为此，由蒋介石的嫡系和非嫡系的反动分子所发动的“和平”运动，以及企图利用既与民主阵营有联系，又与反动阵营有联系的人物，打进民主阵营，从内部来进行破坏，以取得喘息机会，保存残余的力量，再在适当的机会向革命进

攻，这就是目前敌人所进行的阴谋。对于这些阴谋，或者将来还有什么阴谋，我们都要揭露，发动全国人民来坚决反对，采取各种步骤阻止这些阴谋的实现。教育党员、干部、部队，懂得这些阴谋的实质，不要丝毫松懈战斗意志。并教育引导全国人民将战争进行到底，不要半途而废，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特别要对部队说清楚，鼓起这股劲来，把战争进行到底，一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再加一段时间就是全国的胜利。

第四，如果发生大灾荒，也是困难。七大也提过这个问题，太行、晋绥都有对付灾荒的经验，如果灾荒来了，只有全党动员起来加以克服之。

虽然说是快胜利了，但是人还要死、粮还要吃、衣要穿、钱要用，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人力动员已到了相当的程度，通货膨胀，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财政、供给工作方面还缺乏应有的组织性，所有这些困难都很大，我们应该清醒的估计到，但是可以克服的。党曾经过了若干大的困难，如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一九二五年的万里长征，这是两次最大困难。以后的困难就比较不同了，如抗日战争中的困难。这次战争中的困难也不少，第一年有敌人进攻的困难，第二年打到蒋管区去，刘、邓打到大别山去的困难，第三年有大的攻坚战，和几十万人在一个地区大会战的困难。所有这些都克服了，胜利的渡过了。今后的困难，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下，是一定可以克服的，而且必须努力克服之。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努力工作，克服困难，加速胜利的到来。

三、战略任务。

为了在一年左右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就要“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战方式就要从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包括已消灭的在内）。现在，我们有些地区的部队正规化好些，有些则较差。在集中作战这方面来说，就比较正规化，在其他方面还差。如部队供给标准不统一，编制不统一，没有编定统一的番号，几个解放区的部队集中在一块作战就会发生困难。虽然没有一定的条件（如交通运输条件等）对实现正规化有困难。但是我们必须有计划的克服尚存的游击主义，使部队走向正规化。不然，我们就会发生错误，就不能走向全国的胜利。

军队向前进，生产就要长一寸，不然就没饭吃。为了克服部队向前进中的困难，一方面要使物资补给、经费、粮食、人力补充，从歼敌和扩大解放区中来求得部分的解决。另一方面，在解放区加强生产，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较之现有水平要增长若干成分，再加上节约，就可保证使我们不致受到太大的困难。只有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了，才能保证打倒国民党，否则是不可能的。执行这两方面的任务，我们有很多困难，大军进入国民党区进行无后方或半有后方的作战，一切军事需要必须全部或大部的就地解决。而恢复和发展工业、农业生产，则需要有较好的组织工作，很好的领导解放区内部的市场和管理对外贸易，解决某些机器和原料缺乏问题，首先要解决交通运输和修复铁路、公路、河道的问题。目前，解放区的经济和财政困难，虽然比国民党的困难

要小得多，但确实有困难，主要是物资和兵源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通货膨胀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我们的组织工作，特别是财经方面的组织工作不够，则是形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之一。我们相信，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在克服财经困难的斗争中，还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在前方注意缴获归公，爱护武器，节约弹药，保护俘虏。在后方要减少国家机关的开支，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动员，减少开会时间，注意农业季节，不违农时。节省工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全党动员起来，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学会做生意，尽可能将解放区的经济加以适当组织，克服市场上的盲目性，与一切投机和操纵市场活动进行必要的斗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当前暂时的困难。

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召开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临时中央政府。

我们政权的性质，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但不仅仅是工农，而且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大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不要政权，把政权交给国民党。在苏维埃时期，是工农专政，那时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是可以和无产阶级合作的。在后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才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今天，在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资产阶级民主分子是可以与我们合

作的，我们不能排除他们。但是，我们不能同反动派、特务分子合作，如果把这些人也吸收到我们的政权中来，那是错误的。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表示与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区别。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打倒他们的赖以存在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采用人民代表会议制。政权的组织原则，是采用民主集中制。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这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我们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中央人民政府。

五、以华北政府的财经委员会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个区域（现又加上中原、东北）的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交通、军工的行政工作和管理工作，并将逐步走向全国统一。过去由于条件不完全成熟，没有进行统一。不统一，对于支援战争，生产建设，金融贸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困难，统一了，对这些方面都有好处。特别是对支援战争，现在有可能有必要的统一过去，可能而不必要的暂不统，必要而不可能的也不统。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个区域的党、政、军保障统一命令的执行。

但我们应认识到，虽然说财政统一了，但我们仍是困难的。我们这里的财政收入，只有这么多，如由华北供给一部分，他们的财政也很困难。因此，我们仍要保持现在的生产水准。彭总^[29]所规定的生活标准就很好，已经超过中农、富裕中农以上的水平了。中央的同志，仍保持着过去的生活标准，并号召其他解放区，生活向下看齐，就是向我们看齐。就

是将来西安打下了，西北解放了，乃至全国解放了，财政还是困难的。那时还要节约来进行建设，一句话，就是统一了，我们仍要过现在的生活，即节衣缩食的生活。这种生活，至少还要过三、五年。

六、发展党内民主，加强教育工作，提高理论水平，训练干部，准备解放全国后的各方面工作干部。

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不够，需要加强。只有党内民主的发展，才能发挥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够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使我们在政策指导上更加正确，才能更适当地解决群众的问题，团结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我们有不少的机关和同志缺乏民主作风，群众观点很差，强迫命令，包办代替。据说黄龙县的几个区委书记都打人，这种作风必然会脱离党内外的群众，工作也无法做好。在我们的部队中，一般说民主是发展的，比后方机关要好些。但是，部队中的民主发展也不平衡，营以下单位的民主生活，要比团以上好。我们只有放手发扬民主，才能激发广大干部和战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更好的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改善领导。

发展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这比干部会更民主些。干部会议召集迅速、便利，这是好处。代表会议既要保持干部会的好处，又要发挥自己的长处。领导机关要健全党委制。

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不高的，有很多新问题不会解释，如划成份问题就表现了我们理论水平不高。我们的解放区正在迅速扩大，并将解放全国，有很多新问题急需解决，所以，必

须把我们的理论水平再提高一步。我们的党已发展到拥有三百万党员的大党，在全国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在世界人民中的影响也大大的提高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我们如果不提高理论水平，就不能胜任今后的工作。西北发展的前途很大，需要很多各方面的干部，首先要我们这里的许多干部出去担负新的更重要的工作。如果我们今天不注意学习和提高自己，今后就无法挑起这个担子。例如我们最近在临汾招收了几百名学生，他们提出了几百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党的现行政策，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国际形势等问题，我们给他们讲清楚了，他们就跟我们的党走了。工业家、商业家、公务员、戏剧家和音乐家、科学家、自由职业者，都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讲清楚，去争取、团结和吸收他们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并要我们这些老同志去领导他们。毛主席已把解放西北，领导西北建设的任务交给我们了，党赋予我们这样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就要担负起来。

我们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历来都是艰苦朴素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值得大大表扬的。今后西北和西南的发展，有很光明的前途，对全国的建设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还会遇到很多困难，还很艰苦，但是共产党员最光荣的岗位，是在艰苦、最困难的地方。据了解，我们有的同志不太安心现在的工作，不安心在西北工作，有些话也欠妥当。我们参加革命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也不能有其他想法。因此，我希望这些同志要把心安下来，如果在

整风审干中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则由各级领导机关负责把所有问题解决好，使这些同志愉快的到新区去工作。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主要是边区的乡村同志，不愿意到新区去工作。据说去年一年中，关中分区县级的部长、科长不愿去新区的就有近二十名，有的出去后，又开小差回来了。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他们要改造旧中国，改造旧世界，必须有远大志向和伟大的胸怀，绝不能被家乡观念和儿女情长羁绊，应该勇敢地摆脱这一切束缚，走出山沟，去见大世面，担负更加重大的任务，在党的领导下，使现在仍在蒋介石反动派压迫下的同胞早日得到解放。如果他们得不到解放，那么我们这里的胜利也是不巩固的。

我们要求大家在精神上作好到新区去工作的思想准备，但并不是现在就去，因此绝对不能把当前的工作放松了，相反要加紧工作，改进领导作风，健全工作制度，振奋精神，提高工作效率，把工作做得更好，否则我们就不能争取早日的胜利。

要把工作做好，应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在领导上，要研究和改进领导方法。现在我们存在严重的经验主义，不注意总结和吸取新鲜经验，墨守陈规，不容易接受新事物，不注意研究事物的内在联系，只会搞现象罗列。不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所以在政策指导上，就不能制订出与事物发展规律相适应的方针，也不知道按照不同的斗争形式，来决定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工作就抓不住中心，从而陷入事务主义，老是被动应付。这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但是领导机关，而且每一个同志均应坚决克服，不然

就无法做好现在的工作，更无法担负和胜任新的工作。所以，目前反对经验主义，是提高理论、提高思想、提高工作效率的主要环节。此外，目前某些同志在工作上缺乏朝气，缺乏高度的积极性。

其次，在我们工作中走群众路线差，工作作风差。如果说我们的同志都缺乏群众观点，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但的确有一些同志的群众观点比较差。所以，党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每一个同志，都要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要善于团结和领导群众去进行各项工作，不要包办代替，不搞强迫命令，真正贯彻群众路线。对少数同志身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苟安、和平享乐思想、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必须坚决纠正。

总之，为了把目前的工作做好，并准备迎接新的工作，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理论水平，提高思想，改进工作作风，克服各种不良现象，使我们每个同志更加成熟，更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七、学会办工业和做生意。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城市和广大解放区，并将领导全国的工商业，所以现在必须把这个问题当作战略任务在全党提出来。

在前面已经提到，为了赢得全国战争的胜利，我们现在必须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搞好。为此，同时要把商业搞好，把金融工作和贸易工作搞好。

我们现在正处于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阶段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国营经济、小生产者和小商品经济、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几个部分，其

中国营经济为领导成分。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国营经济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一部分经济的质量虽高，但是数量还很少。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阶段还必须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中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相当的发展。现在老解放区已经这样作了，将来在全国胜利之后，还要这样做。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的报告⁽²¹⁾，今年的“二七”社论中，都讲得很清楚了。因此，就是在全国革命胜利之后，在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时期，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它将成为那时主要的矛盾。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在很长时期之内表现为和平的经济竞争。既然叫做斗争，就存在着胜败的问题。如果资本家在竞争中胜利，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就将被推翻。但是，在这个斗争中，我们有很多有利条件：例如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有从土改中建立起来的工农联盟，我们掌握有大矿山、银行、铁路等国营企业，有在我们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合作经济，还有国际无产阶级对我们的援助。当然，我们也有不利条件，最基本的是我们国营经济部分还很少，我们缺乏技术，缺乏管理工厂的经验，以及在社会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还存在着广大的小商品生产者，他们经常动摇于两者之间，还有国际资产阶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想在这竞争中取得胜利，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发展国营经济，就要学会办工业和做生意的本领。在这个竞争中，有决定作用的是农民小生产者的背向，因此，我们对他们要采取谨慎的政策，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以巩固无产

阶级对农民小生产者的领导权。组织小生产者的最好形式是合作社。

总之，学会办工业和做生意，是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过程中，有决定意义的工作，我们决不能忽视或轻视这一部分工作。

八、加强纪律性，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没有这一条，上边所说各项任务就没有保障。中央指出：目前无纪律状态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主要表现是：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游击习气，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随便发表言论，不贯彻党的政策等等。这种状态必须改变，要把一切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和中央的代表机关，以实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

从去春党中央规定报告制度⁽²²⁾，并发起反对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反对把自己管理的地区当作独立王国以来，虽有若干成效，但还没有完全克服，在战争第三年必须完全克服掉。首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起，必须完全把它克服，只有上边搞好了，下边才可以搞得更好。这个会议之后，同志们回去要进行认真的检查，并规定若干制度，以保证今后不再出现无纪律的现象。

现在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党的威信提高，更需要统一集中，更需要加强纪律。首先，过去由于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环境和游击战争环境，因此滋长了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等很多毛病。今天由分散到统一，由乡村到城市，并走向全国胜利的时候，就必须要求统一集中。其次，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大部队的集中行动，庞大的后勤供应机构，也要求更

加集中统一。再就是党的威信提高了，我们每个党员的言论和行动，都会对群众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要求我们加强纪律性。纪律的加强，主要是帮助人家提高理论，提高觉悟，自觉的保证政策的统一执行。因此，我们必须组织人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另外，还必须制订各种规章制度、法令，以便大家共同遵守。

九、厉行节约。

我们后方和部队中都还存在若干浪费现象。例如在人力畜力的动员上，对资材的使用方面，对于装备弹药和使用方面等。一颗八二迫击炮弹要三百斤米，只要一下就完了。对炸药也要节省。又如同样打仗，一个是牺牲几个人打胜了，一个是牺牲几十人没有打胜。对俘虏有的争取了，有的杀了，有的争取得多，我们要保护俘虏，一个也不要杀掉。缴获要归公。例如缴了很多枪支，到底现在还有多少，我主张各纵队要清查一下。节约这个口号是有丰富内容的，与生产配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取得胜利。

十、西北的形势与任务

第一、形势：

(一)对西北过去二十一个月战争的估计：一九四七年三月战争开始时，敌我力量对比是：敌人（胡、二马、邓^[23]）的兵力二十余万人，我西北野战军与地方部队合计约四万人，敌人的兵力比我军大五六倍。敌人兵力最多时，近四十万人。现在，敌我兵力的对比是三比一，敌人在数量上仍占优势。

战绩：到今年十一月止，野战军与地方军共歼敌人二十一万，其中毙伤敌八万多，俘敌十二万多，还有几千人是

投降的。缴获各种炮一千五百余门，各种机枪八千多挺，长短枪八万余支，坦克十六辆（内毁九辆），汽车一百一十九辆（内毁九十四辆），骡马五十余匹。我军由防御转入了进攻，拖住了西北的敌人，对全国的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过去被敌人占领的地区，现在已基本上收复，且有所发展。

取得胜利的原因：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及西北党正确的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陕甘宁晋绥全体人民的积极支援，西北全体党政军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

（二）在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明年西北必有很大很快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发展规模：一是仍以现有力量发展，这可能解决包括西安在内的陕甘宁大部分；二是由其他战场向西北增调兵力，这可能解决陕甘全部以至青宁大部或全部，我们仍以第一种可能为主要方向。

（三）胡宗南可能撤退，目前已在准备进行中，我们的任务是拖住他并尽量消灭之。

（四）二马力量有限，主要是想保守其宁青基本地区。

第二、任务：

西北的基本任务是：消灭胡、马，解放大西北，配合全国其他战场的发展。具体任务是：

（一）加强与扩大西北解放军，老区扩兵，争取俘虏，加强民兵工作，发展地方武装，使野战军能不断得到补充。

（二）恢复与发展老区生产，加强财经工作（政策、机构、制度、统一集中等），实现生产长一寸的号召，这是支前的基础。同时，应改善支前工作，加强支前力量，口号是：一切

为了前线的胜利！

(三) 加强蒋管区的群众工作，使我军进入蒋管区后能处处得到人民的配合。

(四) 加强少数民族的工作。这是西北党担负的特殊光荣的任务，以作到将来解决二马时能有少数民族内部有力的配合。

(五) 继续搞好整党：

1. 加强党的工作，彻底纠正党内存在的组织、思想及作风不纯问题。

2. 坚决反对无政府、无组织状态，加强纪律性。

3. 发展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党员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加强党的团结。

4. 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及政策观念，克服经验主义，反对游击习气。

(六) 大批培养干部。要采用各种方式，培养各种干部，准备到新区开创新的局面，准备进城工作。为此，现在就必须进行积极的、具体的准备。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贺龙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1) 这是贺龙参加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返延安后，向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干部作的传达报告。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西北野战军召开党代表大会，贺龙再次向大会代表作了传达，两次传达报告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

- 〔2〕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的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 〔3〕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我解放区发起大举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于是我党领导人民解放军转入了人民解放战争。战争的第一年，敌人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战争的第二年，我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敌人被迫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战争的第三年，即从一九四八年七月起，我军发动了一系列重大战役，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
- 〔4〕 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货币。
- 〔5〕 翁文灏，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接替张群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职务，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台，遗职由孙科接任。
- 〔6〕 孙科，孙中山之子，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常委。
- 〔7〕 陈布雷，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服安眠药自杀。
- 〔8〕 李宗仁，当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
- 〔9〕 白崇禧，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改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总司令。
- 〔10〕 何应钦，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接替白崇禧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
- 〔11〕 宋子文，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任国民党军广州绥靖公署主任。
- 〔12〕 张群，原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台，由翁文灏接任。
- 〔13〕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十一月二日解放沈阳，辽沈战役结束，历时五十二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四十七万余人。
- 〔14〕 徐州战役，即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发起淮海战役，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历时六十五天，全歼国民党军队五十五点五万人。

- [15] 黄伯韬，当时任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七兵团司令官。
- [16] 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二兵团司令官。
- [17] 李弥，当时任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 [18]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 [19] 指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五月，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中三战三捷，共歼国民党军一万四千余人，给胡宗南集团以严重打击，稳定了西北的战局。
- [20] 彭总，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21] 指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 [22] 指毛泽东《关于建立报告制度》，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 [23] 胡、二马、邓，即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均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

关于新式整军运动经验

甘泗淇⁽¹⁾

(一九四八年)

一、关于部队中几个学习运动的经验教训

自西府⁽²⁾行动归来,直至现在六个月时间,前委会举行过两次扩大会,进行过三次连续的较大的学习运动(即评斗志、亦称三评运动,练兵运动与战术学习运动)。当西府战役结束时,部队中曾发生若干思想上的波动,在该战役的后期,亦暴露过部队在紧急情况下,政治上的脆弱性。为提高干部的阶级责任心与整个部队阶级觉悟,前委决定在全军展开一个评斗志运动。六纵在运动期间内很快就克服了各种不正常的情绪,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战斗力。四纵进步亦快。其他各纵,均在思想上提高了一步。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为着准备新的战役,接着又展开了练兵运动,全军的军事技术,均提高了一步,获得了消灭三十六师大部的战果。此后为了适应新的平原攻坚战的要求,提高干部战术水准,进一步提高攻坚技术,又进行一个月战术学习运动。在最近荔北⁽³⁾歼敌十七师、三十八师大部和打溃六十五师的战役中,证明这次战术学习,也是有效果的。这些教育运动,大体上接受了三查运

动的经验教训（取其长而弃其短），运动的进程一般都是由上而下，又由下回到上，由战士到干部，又由干部回到战士，由搞通思想，进到军事练兵，经过一次战斗后，又回到思想检讨，这样辗转轮番，在领导与群众间，过了多少次来回，确使部队的阶级觉悟与战斗力明显的提高了一步，在这些运动中，我们体会到的经验教训：

（一）每一运动（包括军事学习在内），必须贯彻深厚的阶级教育内容。有了这一中心内容，则在运动中，就可逐渐提高全体军人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能从阶级利益出发，认识这一运动的重要性，自觉地振奋起来，参加这一运动，在互相激励，批评与自我批评，阶级团结的气氛下，将一步一步地引导全军的高度阶级仇恨，觉得做一个阶级战士、人民英雄，感到无限的光荣与愉快，因而在学习中就可真正做到“废寝忘食，乐以忘忧”，在战斗中，就能真正是“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而在内部思想斗争上，就可表现毫无私人情面，所谓“家庭”、“后代”、“金钱”、“享乐”等问题，都会无形消失或被压服到不敢露头了，如果运动中没有贯穿着阶级教育的内容，那末，尽管表现一时的轰轰烈烈，必然是空洞，不深入，命令主义、形式主义随之而生，收效并不大。根据此经验教训，所以在这一时期内三个主要运动，一般都是从提高阶级觉悟入手（即所谓首先打通思想），这一点，已大体成为全军公认的工作规律。为此我们的评斗志运动中，前委会议是号召全体干部与战士，发扬高度的阶级责任心，对某些缺乏阶级责任心的人，甚至高级干部，曾进行了公开严肃的批评，而在整个部队内，则是在一定期间（有十天、半月甚

至一个月）专心致力于“评”“比”各个人的思想、斗志，按其觉悟程度、工作岗位，及其各方表现，分别进行奖励与批评，这样大批的英雄模范，就为群众所公认而选拔出来，而对那些平时讲空话，紧急情况下不负责的人，也就暴露无遗了。一纵的评斗志、评思想、“阶级教育”；二纵的“四评一查”；六纵的评斗志、评指挥、评工作；三、四纵大体一样（都是以评斗志为主），这样整个评斗志运动，实际就是一个阶级教育运动，至于以后的练兵运动，也是贯穿着阶级教育内容的，一纵的刘四虎⁽⁴⁾运动（刘四虎同志是绥远丰镇一个学徒出身的青年，其父被地主逼死，他愤而参加我军，表现高度的阶级仇恨，在瓦子街战斗中，他个人刺死四个敌人，全班伤亡，自己亦负重伤，最后消灭了敌人），一方面为军事学习运动，另一方面却是很生动的阶级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他们发动了全纵学习刘四虎英勇顽强的阶级品质与刘四虎比思想、比斗志、比进步，进而继续学习刘四虎各种形形色色的组织（复仇组、战斗组），不论干部战士、炊事员，饲养员均卷入大运动的浪潮。当练兵时，许多同志早起晚睡，不睡午觉，拼命的练，有的被炎热的太阳，晒得脊背脱了两三层皮，也不甘休；有的因病而劝他休息，他不愿意，有些干部说：“我们不是下命令给战士练，而是下命令给战士停止练。我们不是把战士从屋里督促到操场，而是从操场督促到屋里”。在这一运动中，阶级觉悟很敏感的人，很快就可表现人民英雄的气概，如刚从冯原战役解放过来的李治发（雇工出身）在刘四虎运动中，参加了复仇组，此次荔北战役接连三次负伤，不下火线，刺死两个敌人。最后一次负重伤，还低声说：“……”

我没有完成计划，但我想加入共产党，要求支部审查我……”。而觉悟较迟钝的人，开始常冲不出“落后意识”的圈子，提出不正确的意见，但运动一展开，这些人的思想，便改造过来了。如有一个战士当开始讨论参加刘四虎学习小组时他说：“上次壶梯山上那么多伤兵，打起仗来，还免得了我，母亲讨饭吃，养大我，我一打死，母亲谁管”。大家便反驳说：“你母亲讨吃还不是老财害的，她挨饿挨冻，把你养大，就是要你为她报仇，把地主打倒，你这种思想还能为母亲报仇？只有我们大家勇敢坚决解放了全中国，你母亲才永远有饭吃，有衣穿”。大家的话感动了他的心，结果他学习努力，战斗勇敢，成了英雄模范。在学习战术时，也是一样，如果不首先从阶级利益出发，在干部战士（特别是干部）中，解决学习战术的思想问题，则某些经过长期战斗，但脑筋简单的人，常留恋自己过去指挥的老一套“蛮打”、“蛮冲”，而战术上、指挥上的虚心检讨，就成为不可能。这次战术学习，是进行了思想酝酿的，所以“勇猛与智慧结合”“技术与战术结合”“学战术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口号，获得了大家的拥护，认为战术不好，就不能大量消灭敌人，反要冤枉死了一些自家人，这就“对阶级对人民不负责”，因而干部们专心钻研，战士们纷纷提意见，使战术学习，也成为群众运动。总之，这种群众性阶级教育运动，自去冬的三查运动开其端，今年的评斗志运动步其后，其进程一般是首先从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出发（事实上也只能从此出发），激发其对当地地主恶霸的仇恨。再进而提高到仇恨封建制度与整个蒋介石政权，而激励其为人民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而教育方式，则是不拘

于一定形式，一定场合，而是随时随地引导群众进行自动的“诉苦”、“思想检讨”、“订立立功计划”以至从具体行动中表现出来，这样做就显得较实际、较生动、也较自然，其觉悟程度，也将愈来愈高，反省也愈来愈深刻，对阶级敌人仇恨也愈深。现在部队中普遍流传的口号：“血债要用血偿还，消灭蒋匪报冤仇”，“苦从那里来，仇向那里报”，“蝎子的尾巴，地主的心”，“给老财受苦，给蒋贼当兵，苦处说不清，提起心头痛，若不是被解放，怎能当人民功臣”，这类群众呼声，并配合以戏剧表演，如《穷人恨》、《血泪仇》、《刘胡兰》……。以后，使群众的阶级仇恨，更加自然的流露出来，而具体表现则是大批的要求“立功入党”，“火线入党”，“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喊”，“干部伤亡自动代理”，“本部伤亡重大或失去联络即自动到他部参加战斗”，其他如卫生人员、担架人员，有的自身负数伤，犹复去火线抢救伤员，炊事员亦不怕任何猛烈炮火，自动送水、送饭，不少手无武器的工作人员，杂务人员俘获了不少人马武器，视死如归的人民英雄，今天已经不是少数人，而是群众性的行动了。如果没有深刻的阶级觉悟，这种集体的英雄主义，是没有可能的，自然，在每次战斗中，日常行动中，总还有若干胆怯与缺乏阶级责任心的人，但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是很难偷闲与逃避过去的。

（二）掌握部队中的群众运动，必须领导机关、干部本身，有绝不存丝毫个人主义，彻底的群众观点与工作中采取彻底的群众路线，部队中经过三查及近半年来各个运动，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如果要把领导的意见，变成群众的意志与群众的行动，就非有放手的民主不行，只有领导与群众的结合，

通过大多数人的反复思维、反复讨论，才能使真理为群众所认识，个个心甘情愿的干下去。群众中是有许多特殊的见解与经验的（每一次战役前，战士们根据其自身体验，确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当领导机关能善于诱导、掌握、发扬这些群众的创造时，就能充分发挥有时是意想不到的群众力量，现在部队中流传着的口号：“人人当学生，个个当先生”，“三互运动”（互助、互爱、互尊）表现着战士间、干部间、上下间，相互团结，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去完成各种任务，实际上就是群众力量得到了发挥。为此，当土基休整查斗志时期，部队中是放手发动群众的，当时一般的口号：“什么人都可批评”，“什么意见都可发表”，“不怕报复不准报复”，因而在“评”“比”中，可说是绝大多数人发表了意见，而且对个人意见，又进行了反复辩论，这样评出了为群众公认的大批的英雄模范。而对某些有罪过错缺点的人，则进行了大家帮助说理斗争，“弄清情况”“分别是非”“分清责任”在广大群众评论下，犯错误者一般能心悦诚服，并在大家帮助下，加以改正，而某些思想较懒惰的干部也得到了进步，克服了三查时曾发生过的打、骂、捆，甚至打死人的现象。这种比较仔细公正的“评”、“比”，如果不真正发动了群众，是根本做不到的。当搞通思想告一段落进行练兵时，一般说来，又是经过酝酿，讨论、发动了群众的，因而绝大部分战士，个人订立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后来连排甚至营的干部，也有订自己的工作计划，公开在群众中讨论的，在最近一个时期，发现某些人的立功计划，订的太笼统、太夸张，又进行所谓“评计划”，这样，广大群众就热火朝天的进入了练兵运动，不

仅是连队，而且是机关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在“人人皆练，个个皆兵”口号下，都卷入了练兵热潮（练兵总结多半包含了全体人员）。现在旅团级的战斗姿态是比较森严的（纵队较差，野直更差），总的说来，这次练兵结果各部都不算坏，当我们休整计划大体完成，群情奋发，准备歼灭三十六师，部队的战斗动员，又是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当前委召集纵队干部开会确定了方针以后，各部首先在部队中，仅进行了一般号召“练兵已经一个月应当打出去了，大家很快准备吧”！并未具体提出打哪个敌人，而是将各方情况加以介绍发动部属展开热烈讨论，虽当时也有些人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意见，如有的主张“再打宝鸡，再打马匪”，有的主张“同徐兵团⁽⁵⁾首先一同攻太原，再一同打胡宗南”，但最后一致主张，首先消灭三十六师，并通过群众，确认我们胜利的诸种条件，从而大家紧张的进行各种准备工作，这时“请战书”“保证书”“互勉书”“比功书”，战斗立功计划各部都是纷纷递交上级，要求“给以主攻任务，”要求“在战斗中考验”，并提出“西北战场敌人，西北野战军负责打，不让一个敌人增援到中原与太原去！三十师的四个团，空运到太原，已经是太可惜了！”在这种激昂情绪下，消灭三十六师战役中，前后仅两天时间，攻夺敌人纵深碉堡，前仆后继，表现了群众性的英勇气概。战后，还大部感觉到这仗没有过得瘾。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又一次休整，这里新的问题，是部队作战环境，离开了惯熟的山地，进到完全平坦、开阔村落的攻坚战（特别是梁周村的教训），这时前委决定部队来一个战术学习运动，在休整期间，部队的战术学习热潮，又搞起来了，各级干部在

广大群众的积极帮助下，进行了较深刻的战术检讨与实地的战术演习。整个部队在攻坚的技术、战术，火力与运动配合，群众性（而不是简单工兵或爆炸小组）的爆破运动，在现有武器基础上，提高战斗效能（如各种曲射武器的平射与抛射炸药……）都前进了一步。所以在此次荔北战役开始的两天，即消灭了十七师、三十八师大部，而在敌十个旅以上强大反攻下，亦表现了顽强，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总之在这一整个时期内，部队中的群众斗争热情是激发起来了，干部对自己部属的群众观点认识是加深了，工作中运用群众路线，亦较前熟练了，大家觉得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个人的才能，总是有限的（自然，意识的深刻程度是参差不齐的）。这对某些自高自大，有军阀习气的干部，是一个实际的教育。干部的作风，也改进了一步，而对全体军人来说，则觉得这样的办法，可使大家能“畅所欲言”“非常痛快”“谁也愿意说出自己心里话”，对于提高整个部队的积极性、创造性，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在这一时期连贯的运动中，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不深信群众力量的伟大，就不能有彻底的群众观点；没有彻底的群众观点，就会不敢大胆的发动群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群众运动，但今天我们各部队对这一方针的采用，其深度，还是有相当差别的，干部们的体会运用与所获的成效，也并不是一致的，我们对它的倡导、研究总结，也是很缺乏系统、及时与严密组织工作的。

（三）运动的掌握，要求领导机关有正确的主动性与预见性，即领导机关要根据当前军事政治任务，与本部的具体情况，能提出肯定的主见与工作方针。事实上没有预见性，主

动性，就不可能有领导，就叫做“莽撞”，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根据这一时期的经验，部队各级领导机关，在每一运动中，必须自始至终，起着带头作用，其具体表现，则是（1）负责人在发动运动前，根据部队当前的总任务，有过深思熟虑，提出运动的方针与任务，使运动有其明确的方向，否则会造成自流，反导向紊乱无头绪。为使运动具体化，纵、旅、团领导机关的主动性、预见性很重要，因为它能根据各部本身当时的具体思想、动态、组织状况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订出自己的工作计划，这样才能使运动表现的生动、有内容、有力量。（2）运动的方针确定了，就须毫无顾忌的干下去，不要畏首畏尾，但工作的细致、组织的严密，是非常需要的，这就是所谓“酝酿要成熟”，“暴露要彻底”，“不泼冷水”，“不作尾巴”，根据这时期经验，每一运动开展的过程，大体都是首先经过一般的号召，再进而在部队中普遍进行酝酿（大会、小会、座谈、漫谈），在酝酿中，暴露出各色各种的大小问题来，再进而分析综合，分别主要与次要，现象与本质，抓住最中心的最现实的问题，响亮的提出来，开展群众性运动，如不经过酝酿，群众就没有思想准备，就暴露不出问题来，领导者也不可能占有材料，得出问题的本质，运动也就无从着手。在掌握这点上，我们部队中某些干部，是或多或少发生过偏差的，一种是固守成规，接受新鲜事物不敏感，纠缠于老经验圈子之内，常常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一遇群众意见与自己意见相抵触或涉及批评本身时，便发生不满，呕气，甚至压迫人，或者消极抗拒，发牢骚，有的则是本心上赞成民主，但不会发动群众，因而有强迫群众发言，发

生了相反的结果。另一种则是自己不调查研究不出主意，随波逐流，甚至有怕得罪群众连累自己。“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形成了尾巴主义。虽然这类现象已在日渐减少，但依然是存在着的。(3) 运动中，曾发生过若干偏差，就是显示着干部预见与主动能力的不够，但埋怨这些干部是没有理由的，今天可以说我们干部斗争经验是丰富的（旅团以上干部，大部分是内战时期的，一部分团级和绝大部分营级干部是抗战初期的），但在思想上反经验主义的斗争，是不深入的，因而直至今天，我们还不善于总结经验，使运动继续提高，这一点是野政要负主要责任的。

（四）运动的掌握，一定要集中，要统一，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这一点，在我军中，大体上是做到了的。由于各级党委，都吸取了军政后勤负责同志参加，只要党委一成决议，所有各机关，都能齐心合力的为共同任务而努力。所以这次运动，都能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很快就造成热烈的空气，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样力量就可集中，在一定时期内，大家致全力解决一个主要问题，主要问题解决了，许多其他问题也随之而解决了（如阶级觉悟提高了，违反纪律与政策的现象也减少了……），这样集中领导的结果，使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军政隔膜”，“争时间”，“干部间的不融洽”，都逐渐无形的消失了，而恢复到红军初期党委统一领导的传统，这是值得特别提出的。

最后，根据我们体会，军队中的一切民主运动，可能而且应当，就是一种阶级教育运动，政治民主，实际是其他民主的基础，军事与经济民主实际就是结合政治民主的继续与

发展，日积月累的政治民主与思想建设，将有效的根绝军队中单纯军事观点与军阀主义。并即以此建立起自觉的铁的纪律，但要正确的掌握部队的思想教育运动，进行坚强的思想建设，必须进一步提高干部（首先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与作风。今天我们整个干部的思想水平还是低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养是很浅的，固然今天部队中存在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不能作过高的估计，因为它还包含有表面的，形式的因素，基础还是不巩固的。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不提高，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是不可能的。土基前委会议⁽⁶⁾，提出了高级干部今后学习方针，会后也在部队中开始了反阶级责任心不强，反骄傲，反经验主义。最近一时期，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但今天估计，成绩还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就是今后我们首要努力的方向。

二、关于干部提拔问题

由于战斗的频繁，干部流动是很大的，据今年上半年的统计，班以上干部伤亡共四千零四十一人（其中旅二、团三十八、营一百五十五、连五百八十八、排九百八十九），但在部队连续的群众运动与英勇的战斗中又产生了新的大批的战斗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他们就是干部补充的主要来源，现在我们解决干部的办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由上级提拔培养：如团、旅、纵各级自己均有计划的培养，现各团大都有轮训队，各旅纵有教导队人数不等，学员是从部队抽调出来训练的，一般经党委讨论决定，不管部队伤亡多大，总是要调，再是从伤病痊愈后，归队中选拔较优秀分子来学习，这些主要是解决班、排、连干部，至于营以上干部，则是旅纵来调剂，最

近有些纵队举办了营以上干部训练班或轮训，这样每次战役结束后，总可以解决一部分干部，至于后方军干校毕业生，为数不大，因往返学习，需时近一年，很难应付需要；另一种办法，则是“群众推荐”经过上级批准委任者，这一时期已达数千（主要是班排干部，一部连的干部），如四纵是比较采用较迟者即有四百七十四人。并且绝大部分被推荐的干部是称职的，这种办法的采用，实际是今天战争情况与部队广大群众运动的结果，因为民主运动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发扬，部队中总是要涉及干部问题的，有的干部确暴露出来不能称职，而大批新的称职分子可以胜任，而且必须是提升当干部（因伤亡大），一纵是公开在群众中提出干部标准（1、为人民服务，有高度决心；2、作战勇敢能完成任务；3、工作负责，积极肯干；4、联系群众，虚心学习，有上进心；5、能执行政策纪律）进行讨论，号召干部以此来与自己对照，并要大家以此来评判干部。这样对干部是一个很实际的教育，特别对那些摆老资格埋怨上级不提拔的人，刺激更大，另一方面也教育了群众，使大家知道我们的干部政策是德才兼备，大公无私，对解放战士教育尤大。这样就能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我们认为今天这种办法，可以继续采用，因为它不是简单的组织问题，主要是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教育作用，即是在群众性的思想改造中，解决干部问题，但在领导上必须注意的是：

（1）群众的觉悟程度不齐，看问题有其局限性，常常对那些“运气好”不大得罪人（思想并不健全）的干部表示拥护，而对那些铁面无私，有高度原则性的人（有时态度生硬

些)则表示不满,这在群众运动尚未大开展的连队是发生过的,因此要求领导机关和支部平时对干部对积极分子应有深入的了解,对群众的意见,能有批判的接收,不然就会发生偏差的。

(2) 我们的干部是委任制,“群众推荐”,不过是领导机关在群众中考验干部,获得有关干部材料的一种办法,绝不能成为组织制度,现在部队中发生有所谓“投票选举”是不适合的,至于营以上干部主要应由领导机关在平时,战斗中,工作检讨中去判定,所谓“推荐”,实际上是要流于形式的。

(3) 所提拔的干部热情高,但提拔快,经验少,需要给以非常耐心的教育和帮助(包括军事、政治、行政管理,工作方法等),缺点、错误常是有的,主要是帮助其自觉的改正进步,不应轻易作组织结论,部队中曾发生过某些连排级干部犯错误,而降职当战士,是不妥当的。

三、关于党的工作

三查⁽⁷⁾运动后,党员数量大为增加,并能经常保持到占全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现有党员占全人数百分之三十八点八),主要原因是部队民主运动的展开,党的威信提高。如果前一时期,还流行有“群众推荐”入党,现在则是大批积极分子自动请求入党,因为要经群众评论,甚至有二次三次请求尚须“继续在战斗中工作中考验”者,请求在火线上考验入党或临阵前宣誓准备为人民牺牲,要求追认为党员的在各部队中都可看到。但因对党员尚未进行有系统的教育,政治水平甚低,不仅在群众中,也在党员中存在有对党非常模糊的认识,党组织的领导与作风,尚有许多亟待改进的问题。在

这一期间内，各部队是先后不一，深度不同的进行了一次整党运动，其目的是改善支部的领导作风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其步骤，则一般是首先在干部中，党员中，也在全体军人中，宣传党的主张，入党的条件及入党后的任务，支委的任务等，并号召干部、党员作精神准备，在整党时，按各人职责进行自我批评，并号召全体军人爱护党，提出对党的意见，经过酝酿讨论即公布全体支委及党员名单，由支部召集大会，并邀请全体军人参加，由支委作工作报告，发动大家讨论，暴露各种问题（开始不做解释）。随后由支委进行专门研究各方意见，又进行分组讨论，最后开大会（邀请非党员参加）由支委及有错误、缺点的同志，分别进行自我批评。对群众提出的意见，正确者接受，有偏差者进行解释，有的同志受了斗争，有的得了奖励，这是对党员与非党员一个实际的教育，党与群众的关系，确实改进了一步。整党后，有些单位又进行了党员、支委、组长的轮训，现各部仍在进行中。关于吸收新党员入党问题，根据当今战争情况，一般都是在每次大的运动或战役结束，评功、庆功时，进行吸收党员的工作，这时大批的英雄模范，及其他表示进步的人，总是纷纷要求入党，我们认为这种通过了群众自己的思想认识，自动要求入党的气象是好的，但在党的领导上，必须采取进一步严肃的步骤，现在正逐渐推广的办法：（1）首先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对自动要求入党，采取欢迎的态度；（2）经过群众按其平时战时思想与行动，作公正负责的评论（有些在评论中即评掉了）；（3）每个新党员入党，必须有介绍人（有的单位，正在注意党员平时要分别在群众中进行日常的了解、教

育的工作)；(4) 经过支部讨论通过，经上级党委批准，并举行入党仪式。有了这样一个过程，吸收的党员，一般说是可以保持党的严肃性的。但在大批新党员入党的工作中，有的单位是发生过不合组织原则的，如在群众大会上进行投票选举，或把党邀请群众参加的大会称之为“支部扩大会”、“小组扩大会”，还有所谓“支部与士兵委员会共同领导整党”。这些把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混同的观念，主要是由于过去没有进行深入的党的教育所致，现正在逐渐纠正中。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 甘泗淇，当时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 (2) 西府，指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
- (3) 荔北，指陕西大荔、澄城地区，这里指荔北战役。
- (4) 刘四虎，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四团班长，刺杀英雄。
- (5) 徐兵团，指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
- (6) 上基前委会议，指西北野战军在洛川县上基镇召开的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
- (7) 三查，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一九四八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¹⁾

彭德怀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

一 消灭敌人与扩大解放区

我以六万八千人向优势数倍之敌进攻，全年消灭敌约十六个师十一万余人，收复延安，解放黄龙分区，并一度解放彬县、长武、麟游、宝鸡等十余县，牵制着胡、马⁽²⁾等部。使我中原与华东两大野战军得以减少西顾之忧，顺利的进行淮海大会战，并已获得伟大胜利，使我华北一兵团、晋绥野战军无南顾之忧，顺利肃清晋南阎军，围攻太原。西北野战军经过这一年的战斗锻炼，本身亦有扩大，战斗力更加提高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在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在西北局、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以及后方全体同志全力支援之下，在晋冀鲁豫及其他友区配合之下，特别是在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与人民积极拥护之下所完成的。在这一年的奋战中，也更加证明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目前时局和任务及新区暂行减租减息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在消灭敌人、建设新解放区两个基本

问题上，也证明了西北野战军前委及全军是基本上执行与完成了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所给予的任务。但由于领导上某些轻敌，造成个别部分受挫与失利，否则是可能争取消灭更多敌人的。

二 三查运动

一九四七年冬季整训，采取了诉苦与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运动的方针，启发与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划清了阶级界限，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强固了军队内部的团结，提高了战斗力，加强了工作效率，严肃了纪律，增加了军民团结。由于纪律较好，在蒋管区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等。从这些方面证明，采取这一新式的整军方针是正确的，现在全军是没有任何人怀疑的。但三查运动中不是没有缺点的，而且存在着个别错误。如在发动这一运动开始时，形成了党内党外全军各方面的错综复杂的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这一激烈斗争，解决了一连串的问题。由于领导机关并没有足够的估计到它所起的巨大作用，领导上缺乏这一应有的预见，致未认真掌握这一运动与及时总结经验普及全军，致全军三查运动发展不平衡，并发生了“左”的偏向，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虽时间仅数日即纠正，但全军打死了十余人。还有某些个别“逼供信”的现象，离开了“和平说理”、“治病救人”的基本原则，也就阻碍了思想斗争的继续开展与深入。而这一教训是严重的，值得进一步的检讨。运动中产生这一“左”的偏向，基本原因是：领导机关开始时缺乏对这一运动的明确的认识，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因此

产生了三查运动中“左”的偏向；同时查阶级与查思想、查斗志亦缺乏适当的密切的联系，因而评定阶级成分时忽视划清思想上的阶级界限，而只是单纯的查阶级成分。在掌握三查的群众运动中也是有缺点的。当群众还未发动起来时，应放手启发群众高度的阶级仇恨，划清思想上的阶级界限与加深全体革命军人的阶级观点，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当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到了沸点时，就应逐渐领导群众转入查思想为主，以和平说理的方式，开展思想斗争，区分哪些思想对劳动人民有利，哪些思想是对剥削阶级有利，而对劳动人民是不利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出路，因此就有大批的知识青年学生投向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如“七七”事变前后大批学生投奔延安）。从革命发展方面来看，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参加革命，这是好的现象。同时必须清楚的认识，他们多数不自觉的带进了许多坏的思想，也就是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到我党我军来。这是需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有耐心的认真的展开查思想的教育。如不把他们的从剥削阶级中带来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打垮，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也就是不能接受马、恩、列、斯、毛的思想。至于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应当是以劳动人民（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等）为主体，不准地主与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其他无公民权者参加人民解放军，这是完全必要的。笼统的以贫雇农的思想为建军思想，以为贫雇农思想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这是不对的，也绝不能以单纯查阶级成分（查阶级是必要的）来代替查思想的斗争。如果过

分的不适当的强调查阶级成分，而忽视查思想，必然走向唯成分论，也就否认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进步性，也就掩盖了劳动人民中存在着的某些落后意识。由此可见，查阶级应与查思想联系起来，而且打通思想与进一步的确实掌握毛泽东思想更为重要。同时，为了辨别谁是伪装起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就需要把查阶级、查思想与查斗志联系起来，因为实际行动（包括斗志）常易自然的流露出阶级本性。但了解一个人必须全面的观察与分析，不应从个别问题的好坏，不应从一次打仗不勇敢而轻率的作出片面的结论。对于处理一个犯错误的人，必须把其客观原因与其主观动机两者统一起来，加以认真的分析。如把任何一面强调起来与孤立起来看，都是不对的。

三 推荐干部与党员

西北野战军自去冬采用推荐干部与党员的方法，十一个月来推荐出党员万名以上，干部数千个（多数是班排级，个别连级）。这些被推荐的干部与党员，绝大多数是坚决勇敢称职的优秀分子。解决了连续战争所需要的大批班排级干部，也保证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经常保持了部队中三分之一的党员）。推荐的办法在目前战争环境中是可以继续采用的，特别在西北战场根本无正式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干部，更是必须采用的，否则无法解决干部的恐慌。如单靠领导上从群众中去发现积极分子，挑选干部，在数量上不易发现如此之多，质量上也常有偏差。只有发动与经过群众推荐和反复评论，互相比较，不仅涌现了许多新的可当干部的积极分子，

而且弥补了领导者从上面挑选干部的缺点。事实证明，群众中有许多可以当干部的积极分子。但群众推荐干部的视线也是有限的，比如政治坚定，能力可以胜任某项工作，而方式生硬，爱发脾气等，不易被群众推荐出来。故领导与群众结合起来挑选干部的方法是比较全面的。如认真的解释了干部政策与干部应具备的条件，并在群众中展开讨论干部的一般表现。这样做，增强了干部与战士的团结，教育了摆老资格的干部，也增加了战士对干部的正确认识（干部说现在兵好带了），也就大大减少了打人骂人（工作深入的部队已经肃清）的现象（战士说现在好了，下部的作风改变了）。对俘虏兵教育意义特别大。但采取简单方式，如以不记名投票，或者领导者提出名单在军人大会上举手通过，这种形式主义必须反对。它不仅毫无实际教育意义，而且会把推荐（建议性质）变为选举制了。另一种尾巴主义亦须防止，表现为群众推荐了不适当的人，领导者不去启发群众反复讨论，提高群众觉悟，反说这是多数群众的意见。

其次是推荐党员。公开解释党的政策与入党条件，让群众反复讨论，评判到本单位每个共产党员的品质与作用，并允许群众推荐党员等办法，的确提高了党在部队中的威信，也提高了党员的积极性与模范作用。但某些连队有在军人大会上选举党员者，也有在火线上指导员个人批准入党者，以推荐党员而代替了党员介绍者，有以军人委员会与支部委员会开联席会者，有以党的小组会与班务会排务会混同者。产生上述形式主义与尾巴主义以及忽视正当的入党手续者，各纵、旅党委在开始纠正中。同时，在群众高度热情推荐入党运动

上，有个别人带被动性，他的工作虽然很好，而政治觉悟还未进步到决心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程度。一般的部队目前入党手续是采取群众推荐，自动请求（均须经过党员介绍），个别介绍，群众评判，支委审查，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上级党委批准。今后，拟逐渐停止群众推荐，转为自动申请、党员介绍、群众评判（群众评判是在群众中公开进行共产党教育的最好方式）。自动申请，群众评判的方式，就避免了推荐中的某些被动。

四 巩固解放兵与新兵工作

巩固解放兵工作。二十一个月战争中，约争取了九万俘虏兵补充部队，约占俘虏全数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补到部队中，已出了许多战斗英雄、模范战士，逐渐升充班排干部，以及不少的优秀共产党员；还有为劳动人民事业而光荣负伤牺牲者。他们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对于部队的军事技术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他们在蒋管区遭受豪绅、保甲各种迫害。蒋帮抓兵，反动军官残暴侮辱虐待，每从这些被俘兵士诉苦中使人们闻之惊心动魄。类似于德水之悲惨遭遇者不可数计。这些也教育了我们老解放区补入部队之新兵与干部，增加了对国民党统治的仇恨与本部队的团结。

从俘虏兵成分来看，一般的贫农约占百分之七十，中农、雇农、其他贫民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出身于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分子，只占百分之五（俘虏官与学生军除外）。从上述参加人民解放军数目之大，加入我军后表现之英勇，诉苦中

之悲惨遭遇，以及出身于劳动人民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雇佣观点、兵痞流氓习气一般很少。从这些事实表现来看，对于俘虏兵应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是蒋管区封建制度的被压迫与被剥削者，是劳动人民，是共产党在蒋管区与蒋军中的基本群众，是被强迫武装了的农民；对他们惨痛的遭遇，应寄以深刻的阶级同情。不要因为他们反动军队里所传染的某些不良习惯与受到某些反动欺骗，而改变我们对于俘虏兵的基本观点与态度；也不要因为他们受欺骗而一时顽强抵抗，被俘虏后就给以报复，而应加强我们瓦解敌军工作与被俘虏后提高其阶级觉悟的责任。

对上述认识大体来说是一致的。但仍有个别同志缺乏这样的明确的认识或认识不深刻者，常不自觉的夸大解放兵的过失（如纪律不好），客观上推脱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不自觉的把仇恨国民党军的心情转嫁其士兵，或者把解放区农民与蒋管区农民的统一性分开起来看。这种看法实际是带着不自觉的宗派主义的观点，反映了解放区农民对国民党军的仇恨的一面，而忽视了蒋管区人民遭受残酷压迫的另一面。总之，这些是离开了阶级立场去看问题的观点，必须纠正。隐蔽在俘虏兵中的反动军官、特务分子，必须坚决清洗。当俘虏兵补入部队时，必须殷勤招待，短期内减轻某些勤务，帮助解决可以解决的困难；干部、党员、老战士，特别是补入部队较久的解放兵，要亲切的与之接近谈心，耐心诱导他回忆家庭受压迫，被抓当兵时的痛苦，启发其了解国民党卖国情形；有计划的演出《抓壮丁》、《见面》、《穷人恨》、《血泪仇》、《白毛女》、《刘胡兰》等反映部队生活和解放战士当了英雄模

范事迹的剧本。总之，应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自动诉苦是很好的方法。

对老解放区补入部队的新兵，某些同志在认识上也是有缺点的。如说解放区农民在反封建压迫斗争中平分了土地，因此他们的政治觉悟提高了，这些新兵就是我们军队中的骨干。这是一方面，大体说来也是对的，但不完全对。因为他忽视了另一方面。农民的革命，就是推翻地主阶级封建压迫的革命，推翻了封建压迫，平分了土地之后，他们认为革命就算完成了任务，他们就要回家耕种土地。如要继续把革命战争推向全国胜利，就需要军队党与地方党各方面进一步的工作，继续提高其政治觉悟，有效的解决其家庭顾虑。在动员入伍及长期解决其家庭顾虑方面，主要的属于当地共产党的责任。在入伍后排除其对军队生活的恐惧，继续提高其政治觉悟，这应当属于军队党的政治工作，并须两者——军队党与地方党相互联系起来，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此外，还有认为解放区农民的政治觉悟一般的都高，而把这一概念套在每一个具体对象上，这不仅忽视了新兵中某些落后分子的争取，也就必然忽视对解放区新兵政治觉悟的继续提高与巩固。这就是部队中巩固新兵工作较差的原因之一。如不从巩固新兵工作上找出原因，新兵逃跑时，片面的埋怨地方党，或者说解放区新兵不可靠，这都是不对的。另有某些同志一遇到俘虏兵开小差时，就说子弟兵好，一遇到子弟兵开小差时，又说俘虏兵好。这种片面的看问题的方法不克服，巩固部队工作仍然要受到损失的。但部队巩固新兵工作是有成绩的，并有许多好的工作方法应加以总结并普及之。

从上述说明，一切看问题的方法要从阶级观点出发，要从全面去看。一切政治工作要从实际出发，要从政策与策略观点出发，要从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出发，反对一切形式主义。一九四八年政治工作有许多新的方法，是很好的，应继续采用与发扬；也有某些形式主义必须加以克服。

五 结 语

一九四八年，从消灭敌人、扩大解放区以及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均未全面总结）各方面来看，均有许多新的经验。特别是建军问题上继续了红四军“古田会议”的精神，并且接受了“整风运动”中打通思想，“领导方法决定”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心环节，土地改革中以诉苦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办法，以及在放手走群众路线，坚持民主作风的领导原则下，打破了以前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旧的公式。特别是各级党委制的建立，使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得以统一的民主讨论，便于贯彻，使下级易于了解上级意图，下级情况亦易向上反映，加强了部队内部团结，使部队中的阶级觉悟与战斗力迅速提高了一步。我们决不能满足现有成绩，应继续坚持与发展，并须冷静的来检讨领导上的经验教训。西野前委与全军全体同志在这一年的工作上是有成绩的，但同时在领导上是有缺点的，也有个别错误的，主要的表现在一般号召与具体联系不够，必须改正与加强。这一问题不仅前委本身存在着，各级党委几乎相当普遍的或多或少的也存在着，如不深刻警惕，工作上仍可遭受损失。因为只有号召而不与具体密切联系的领导，下面执行时不“左”即

“右”，这是过去一再反复证明的，不应重复这一教训。同时领导机关在工作中缺乏预见（三查运动开始时是一例），并存在着的某些偏见，以及缺乏应有的工作总结。因为没有很好的工作总结，就不能积累工作中的更多的经验，也就不会更快的提高与普及，使群众流血、流汗、劳心、劳力创造出来的经验得不到及时的集中与推广。产生上述这些缺陷的基本原因，是领导同志缺乏马列主义应有的水准。克服此种缺点只有加强马、恩、列、斯、毛著作的学习，尤其是毛泽东选集。此外，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的习惯亦必须无情肃清。

同志们，增加一点马列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去掉一点官僚主义，我们的工作就会作得更好一些。全体同志一九四九年应向这一方向努力！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1〕 这是彭德怀在第一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马，指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均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关于一九四九年西北的形势与任务^{〔1〕}

彭德怀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

总的形势与国际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是根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毛主席对时局的分析，及四八年九月会议对时局的分析，这些分析都是正确的。从七大到四七年十二月五日，四八年九月会议及四九年一月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等对时局的分析看来，都证明我党的成熟，对国际间大的问题的分析都是一贯的精神，有坚决的方针，明确的见解。毛主席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已经谈到苏联力量的强大，及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没有提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的问题。四七年十二月五日发表的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四八年九月会议，四九年一月的决议，也都如此分析，可见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了。

贺龙同志未来以前，我们对九月会议的决议还不完全详细的知道，只看到简单的电报，前委联系到讨论了一下，前委对时局也作了估计。因为没有方针，就不好开步走，没有共同的认识，就没有统一的步伐。为了求得共同的认识，统一的步调，作适当的估计还是必要的。中央四八年九月会议

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及四九年一月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案，使我们对好多事物的认识更加明确，对胜利更有信心，对西北人民解放的胜利和信心更有帮助，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很少。

关于敌人日前的军事方针：日前胡宗南是依靠巴山，扼守长江，作防御的姿态，对西安是不轻易放弃的。目前蒋介石的军事方针也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以保守江南及西南各省。胡宗南在几种情况下也有可能撤出西安，守汉中、宝鸡，这样可能增加我们一些困难。

我们对过去的胜利，要有足够的估计。但蒋介石在军事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也是促成我们胜利的原因。蒋介石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是一九四六年的进攻，是贪得无厌，兵力分散，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各个歼灭。而他并没有消灭到解放军一个团一个营。蒋介石军事方针主要的错误不是稳步前进，进攻一开始就一直进到东北的松花江、沈阳、长春等地，西北一直进到陕北的佳县。这样的情况，蒋介石的战线就延长到三千多里宽（我们中央目前提出到江南去要稳步前进是很重要的）。蒋介石在防御和退却时期，对城市的守弃没有决心，常常动摇的，这也是由于贪得无厌，想要固守又怕被歼灭，其结果还是被歼灭。如对长春、济南、沈阳、锦州、徐州等城市，开始是想守，实在不能守时就下命令撤退，可是常是撤退不出就被歼灭。守的决心不大，到处要守，可是到处的力量也不强。蒋介石所犯的错误，对我们来说很好，我们可以少死些人，可以加速革命的胜利。我们过去的胜利由于解放军主观力量的加强，同时客观方面敌人的错误也帮助了我们。蒋介石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他很害怕我们进军四

川、贵州、云南，其后方不保。蒋介石对四川是不轻易放弃，要是我们进军四川、则蒋将失去退路。四川有巴山，蒋介石胡宗南还是认为天险，可以依托，敌人是如此看法，则我们就不是那样认识，巴山是天险，过去张国焘还不是已经入川。巴山是他们依托的地方，所以蒋介石对西北还是不会轻易送给我们的，如此西北还有几个大战要打。从整个战略来看，是在西北消灭胡匪为好，到了西南不好打，而胡匪就是跑到西南甚至到西藏，我们还是要去消灭的。敌人不会轻易放弃西北，我们也希望在西北消灭敌人，对敌人我们要清楚的分析，胡宗南不会那样轻易放弃西北。情报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但是我们不要为一般情报所迷惑，对敌人应有充分的认识。现在胡宗南不是很快就会跑掉。这几天有消息，一军和六十五军都开始跑，这样对我们打仗更有好处。敌人在渭北还有二十几个师，跑了一些，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利。胡宗南现在要是调去武汉五六个师，对刘邓大军将不算是什么威胁，而减去我们五六个师的负担，就有很大的好处，使我们会很快取得胜利而更进一步威胁四川。那时敌人又可能从武汉调兵防守巴山，即等于更大帮助了中原的刘邓大军。我们现在开会作充分的准备，消灭敌人是万分必要的。如无准备则会犯错误。我们去年五、六月间的任务是个关键，去年西府行动时，刘邓在中原是很困难的，假使没西府战役，敌人会调兵东进，会使去年会师增加困难。蒋介石本来对胡宗南的任务是向东而不是向西，现在增加几个师到中原对刘邓是没有多大关系。去年西府战役以后更加担忧，敌人将我们赶到黄龙以北，要是洛阳丢掉会增加中原的困难，去年九月一战，把

胡宗南的军队牵制住，使刘邓大军能站稳在中原。我们的责任是四七年十月到四八年九月，以后的责任是小些，现在调去中原几个师没有多大妨害。

关于四八年的工作总结已经讲过，今天只谈谈四九年西北的形势任务问题。

西北包括陕、甘、宁、青四省，任务规定了我们今年要解放陕甘两省。全国形势对敌不利的情况下，马匪的行动不会很积极，由任务规定今年先搞掉陕甘两省看来，也暗示今年要先集中力量搞掉胡宗南，估计今年是可以搞下陕甘两省的。胡宗南的军队有部分会调走，马匪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自保，但马回了是不打不会垮的，明年要打马回子。过去曾两次向中央建议，要求徐陈^[2]对西北的配合，两次中央都肯定答复，西北要我们完全负责。而四九年一月八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提出在淮海、平津、大同、太原各战役结束后，各兵团需要休整，以向江南进军，而没有提到西北。估计晋绥五个旅是可以到西北的。

西北敌人还有六十一个师，但由于蒋介石的失败，全国形势的变化，西北形势也会有变化。胡宗南可能被调走，目前一军和六十五军是可能被调，调往何处，还不确知。胡宗南最害怕我们出西府，假使一军、六十五军不走，我们打同、耀^[3]，敌人还可以调兵增援，敌不准备在渭北作战，要是我们一打，敌人也有在渭北决战的可能，这说明胡宗南是没有远见的，看不到问题的中心，常常被现象所迷惑，敌人最好是该守咸阳、宝鸡，以三原为依托，以此保守西安。由于淮海战役我军的大胜利，平津打下，大军南下，估计蒋介石可能

将一军、三十六军、九军、六十五军调走，这四个军是胡宗南的嫡系，也是蒋介石的嫡系。如此，四个军十个师调走，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则西北形势很快好转，对我们有利。西北战场的敌人主要是胡匪而不是马匪，马回子的某些军队有战斗力，但是很小，不足为怕，但是我们还是不应该轻视具体的敌人。在战略上看，只要消灭了胡匪，西北形势就会有大的开展。去年西府战役后曾有一度动摇，准备先打马匪，从壶梯山、荔北等战役以后，造成有利条件先坚决消灭胡宗南，胡宗南并不会因调走四个军则西安就不守，胡宗南还是要守西安的，西安、咸阳、宝鸡、天水……等城，我们要以战斗准备去夺取。我们今年要打下西安、咸阳、宝鸡、平凉，尽可能取得兰州、汉中，对全国胜利的配合作用大。

关于今后的任务：（一）在西北形势没有起变化以前，我们的方针是消灭敌人为主，采取稳步前进，在战略上不要轻敌，轻敌是会犯错误的，不要采取冒进，不要急躁，不要因为胜利而轻敌，轻敌可能受到挫折。去年瓦子街战斗消灭刘戡时，我们提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因为后退就没有饭吃。瓦子街一战，打掉了敌人的主力，不仅挽救了自己的危急，也减少了中原的困难。总之，今年敌人没大变化以前，还是要稳步前进，采取稳步进攻的方针，采取有阵地的逐步前进，消灭敌人为主，不要跳跃的前进，要巩固地向前推进。至于战术的包围迂回那是需要的。

（二）我们今年要占领一连串的城市，如西安、天水、平凉、宝鸡……等城市，我们必须要有的一套城市政策，如工商业政策等，以保护城市工商业，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经济，民

族资本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所以要保护工商业，必须要有政策。同时，事先要进行城市政策的教育和学习。

（三）要更进一步提高自觉的纪律，更进一步地加强纪律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从新式整军以后，自觉纪律的建立是有了基础。我们现在有的三大纪律：①一切行动听指挥；②一切缴获归公；③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钱。这三条原则是包括各方面的，至于纪律性的问题还包括党内军内各种制度。我们各方面违犯了纪律，要以三大纪律为标准去检查我们的纪律，这些纪律使我们更统一，更集中，同时遵守纪律，也是联系群众最重要的步骤，联系群众的第一步。因为刚解放的地区群众，一开始也不会马上就看到我们各项政策的正确，很快能看到的就是军队的纪律好，就认为共产党很好，老百姓认为解放军就是共产党。军队是党的旗帜，这也表现军队在群众中地位之高，所以我们军队更要很好遵守纪律，特别是干部还要以身作则。各级组织并不是一些小家庭，而是分工，军队和地方，都是一个大家庭。全党，各地区，各部门都是一个整体，所以不要只照顾局部利益，要是只照顾局部利益，则是思想不纯，是小生产者思想意识的反映。在未进城以前，要提高纪律，进城以后有了吃的东西应该先照顾战士，将缴获的东西都交物资管理委员会统一分配，先给战士，后再照顾干部。

（四）黄龙分区的工作很重要，这个分区在过去各种战勤负担都很重，而以后这个区域还有几个大仗要打，还要增加这个分区群众的负担。黄龙分区在过去对战勤的支援上是有

成绩的，假使去年没有黄龙分区，军队是有很大的困难。黄龙分区去年肃清了土匪，及财经政策对敌币的斗争，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执行了西北局和前委的决定和指示。但是在执行中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方式，在执行中有违犯政策的非阶级观点和过左的现象，比如去年慰劳军队的洋瓷碗是不分贫富，按人口每人五千元这样摊派下去的，这是要引起注意的，宁可不要慰劳，以免引起贫苦群众的怨声。黄龙分区在发动群众的认识和步骤是不明确的。关于黄龙分区的群众工作，去年四月我曾在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中，提到黄龙分区没有一个县区是真正的发动了群众，没有一个县区是建立了完整的群众组织，同时也检讨了军队在去年四月前也只照顾了自己军队的工作，而放松了地方工作，放松了发动群众（略）。

（五）克服胜利途中的困难。西北解放在全国胜利形势下，今后比任何一个时期的胜利都会大，但在胜利途中有很多困难估计到。①干部的困难。陕甘两省今年要解放，明年还有青海、宁夏及西南各省。要解放是需要大批的干部。甘、陕、晋绥等地区是处在全国文化落后的地区，人口也比较稀少，所以在干部方面客观上是会增加一些困难，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目前，我们缺乏各方面的干部，也需要各方面的干部，军队要扩大，也需要干部，同时还要抽出一批干部，去搞地方武装，甘主任准备讲这个问题。现在谈谈关于培养干部的基本方针（这个代表会议也可以说是培养干部）：A、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军事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包括各种政策。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总路线，在这总路线下还有各项政策。目前打击的对象是官僚资本，要没收，对农

村中各个阶层要有各种不同的正确的政策，把以上的政治路线学习好就可以培养干部。对军事路线学习，把战略战术一套能了解熟悉，培养地方武装，从发动群众中去发展武装。干部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军事路线下产生出来的，能在此方针下把原有的干部提高一步。有了群众，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干部。B、要有正确的工作作风才能出干部。必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一般号召和具体结合，有大纲没有细则就不是好的作风。一切工作都要有分析，有综合，才能培养干部。工作作风好，就有好干部。比如有个连，作风好，死了很多干部，又有很多新的干部产生，作风不好，就会常叫干部不够。路线正确而有官僚主义的作风，也不能产生和培养干部。C、要有正确的干部政策。从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培养干部，不是以拉拉扯扯、逢迎等一套不正派的方法去对干部，这样不会产生干部的。对干部只有经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提高干部的觉悟程度，也才会有阶级观点，才能培养好干部。否则，不会产生干部的。以上三个问题，要很好的结合起来，很熟练的结合起来，就能产生很多干部。在四八年工作总结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总结起来，假如前委是歪风，不能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能培养干部。另外要解决干部的困难，就是要加强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的五大名著，联共⁵⁰党史。旅级以上的干部抽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看以上的几种书，团级干部可看毛主席的著作，一般的干部看毛主席的东西，容易看懂。

②财政经济的困难也要估计到。这不是短时期的事，而是五年十年的事，就是战后，财经问题，也还会有困难，有

困难必须要克服，克服的办法是不要铺张浪费，要统一收支，缴获归公，厉行节约，要从人民的利益着想，真正的群众观点，就是在节约中减轻群众的负担，这就是具体问题中的表现。

③解放军的物质待遇问题也就是解放军的生活标准。解放军的生活要和中农、富裕中农的水平一样（等于长江流域中农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一斤肉，可能条件下增加到两斤肉，这样可以保持每星期八两肉，每日有一两多肉（北方的中农可能一年才能吃一餐肉），每人每日四钱油，五钱盐，团以上干部按士兵标准增加两斤肉，能保持这个标准就是了不起的事。中国一般人民能每月四斤肉是二十年以后的事。人家应以此为满足，这是人民对我们的优待，再不该要求提高。

④全国胜利即将到头的今天，在我们队伍中还有某些个别分子，只计划到个人的享受，个人的打算，这种思想是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我们要反对。这种反映，在延安收复后就表现出来。有部分干部不愿出来干工作了，他们认为收复了延安，敌人再也不会到延安，所以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不须再出去革命。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结论，错误的估计，自己企图偏安。我们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敌人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消灭敌人，要把敌人完全消灭，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可能这次战争是中国最后一次战争。在我们这一代就消灭了战争，以后就再没有战争，为后代奠下了和平的基础。我们要将中央毛主席的精神灌输到每个同志的脑里。四九年、五〇年，要争取西北的胜利及全国的胜利。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 这是彭德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 (2) 徐陈，指徐向前、陈赓，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副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 (3) 同、耀，指同官（今铜川）、耀县。
- (4) 这里指流氓无产阶级。
- (5) 联共，指原苏联共产党。

关于接管城市工作⁽¹⁾

习仲勋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

这次第一野战军党代表会议，把如何接管城市问题提出来讨论，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

去年以来，我军解放了不少的小城市，并曾经解放过个别较大的城市。随着革命战争胜利发展，我军此后将继续解放更多的城市，其中包括若干中等城市和较大的城市。我们必须准备接管这些城市。过去我们在接管新解放的城市中，执行了中央关于城市的各项政策和去年一月前委扩大会议决议，一般均获得成功。如迅速建立了秩序，正确处理敌方人员和物资设备，保护了工商业，在短期内恢复市面营业和工业生产，保护了学校，及早地依据可能和需要继续开学，妥善地对待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各种职员，并在群众中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工作等等，因而团结了广大工人、学生和其他城市人民，并得到许多工商业者、公教人员的赞同，在陕甘⁽²⁾许多城市和广大地区中扩大我党政策的影响和威信。但我们也曾经有过或多或少的缺点和错误，如在宝鸡不分公私地查封所有钱行，没收邮包中的洋磁碗，在凤翔乱动教堂的罐头、

咖啡等等，这些在经验缺少和准备不足的当时也是难免的。虽然如此，毕竟我们从此学到了接管城市的一些经验，如像前委所总结的，必须有统一的接管机构，由部队上级指挥机关指派专人协同城防部队首长和当地党政策负责干部组织之，统一管理接管城市的一切工作；其下配备各项必要工作的干部和组织，分别办理各项事情；这个组织应事先组织好，随同攻城部队进城，从准备攻城到入城都要有周密的准备和布置；战斗结束后，除城防部队外，其余部队均应迅即撤到城外，并禁止游击队、民兵和民夫等进入城市；凡入城机关部队人员，必须完全接受统一接管机构的管理和执行其一切命令；缴获的武器、物资，均应由统一接管机构统一接收、封存、转运或分配；严禁各部队机关入城抢购物资，指定一定的组织统一采办……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现在我们又得到中央关于城市政策的许多指示和规定以及其他解放区接管城市的许多经验介绍，必须认真加以研究，以便正确掌握和执行中央这些政策。以下，我依据中央指示，提出接管城市的一些问题。

我们已经解放的和将要解放的一切城市，均是人民的或将是人民的城市，必须严格保护，不许破坏。旧的反动政治机构，如各级政府机关、保甲^[3]、军队、警察、法庭以及反动党派等组织，必须彻底粉碎，不能利用，而代之以人民的政治机构；但其设备则要保护和保存，接收过来，其人员除首恶分子、破坏分子，必须惩办外，对于一般旧的政府公务员也不是一律排斥，而是经过必要的改造后，可以酌量使用。这叫做“拆散机构，利用材料”。对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

制度，必须加以适当的改组，使之适合于人民的需要。但在接管初期，先禁止其属于反动的课程教材，撤换其中反动特务分子，而对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则必须保护。至于工厂、企业、银行、邮电、铁路、医院等，不但其设备要利用，而且其机构都不能“粉碎”，不能破坏，必须保存起来，好好利用。对一切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不要打乱，不要忙于去改组，更不能“粉碎”，而要它继续生产。是不是要改革？从官僚资本手中转到人民手中就是一个革命。原有官僚制度必须废除。旧的企业组织也有许多是不合理的，也要改革。但不要急，一定要慎重，不妨慢一点，必须首先了解，熟悉，精通以后，才根据一定可能的条件，逐渐地合理地去改革。这就是我们接管城市的基本方针。

我们入城之初，主要有三大工作，即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这时发动组织群众，仍是为的更好地接收和建立秩序，不要急于进行各项社会改革，不要急于发动群众斗争。在秩序未很好稳定，情况未很好弄清之前，鲁莽地发动群众斗争，就会搞糟，反而被反革命分子钻进来利用。对某些人民生活改善问题，只有秩序已经稳定，群众组织已经有相当基础，经过调查研究，确须解决而又有妥善解决办法时，才可以按情况酌量解决。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等都要逐渐组织起来，又防止被暗藏反革命分子和流氓分子钻入操纵。但对工人、职员、学生、知识分子、城市贫民和其他城市人民群众中间做宣传组织工作，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尤其是对工人，必须无限关心，很好地确实地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工人是我们的本队，不能忘掉本队。职工是管理和建设

城市的基本力量，我们要发动和组织他们认识自己的主人地位，协助接收国家财产，保护工厂商店；继续并加紧生产和恢复城市各项经济生活的工作。我们要依靠工人、职员、学生和劳动人民的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的可靠群众基础，还要从工人、职员和其他劳动群众中选拔一大批优秀分子来做管理城市、工厂、企业等等的干部。同时，对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开明士绅等，也要进行宣传，向他们说明、解释我党政策，要他们安心继续从事各自的业务，不要停顿或破坏生产，遵守法令，协助建设城市。只注意在资本家和上层人士中做工作，忘了或疏忽了在工人群众中工作，那就是轻重倒置。

接收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上，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这个“各按系统”，是按人家原来的系统，不是我们各单位“各按系统”大家乱抓，必须由统一组织统一接收，原封接过来再说分配。接收第一步是点收武器、弹药、资产、机器、设备、档案、卷宗等，第二步才是整理人事。我们入城即应立即命令原有一切机构、旧有人员均照旧按原职上班，负责保管所有档案、卷宗、资产、设备，开列清册，办理点交，一切不准移走或破坏，听候我方派人接收处理。这样就有可能有秩序而完整地接收，并且来得快。接收后，旧有政治机关即宣布解散，由我们重新建立的国家机关进行工作，旧有敌方国家机关人员则分别处理。至于经济机构，如工矿、铁路、邮电等，还可先派军事代表进去监督，领导生产继续进行，防止怠工和破坏，其他一切（组织、人员、制度、待遇等）暂时一律照旧，继续开工。原来的负责人如非破坏分子

应令其继续负责，受军代表监督，发布命令要有军事代表共同签署。如原来的负责人已跑掉或不愿继续服务或不能令其继续负责，则由原来职工中挑选适当的人员代理职务，使企业能继续生产或营业。重说一句，不要急于改组或改革，这是为了生产、交通和各项经济活动不至停顿，使已中止的也迅速恢复起来。经济活动停顿一分钟都是人民的损失。以上指的是官僚资本企业，应由人民政府接收。但国民党员私人经营的工商业，除重要反动首领经西北局或前委批准没收其所有财产外，其余则不要去没收，而要允许和保护其所有权，对于有官僚资本股份的企业，接收其官股归为人民政府所有，承认私人股本的所有权。这些企业接收之初，不要一般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但必须保障职工原来的实际工资水准，不能降低，企业中原有对职工有利的一切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必须照旧保持，不得取消。这点对于一般私营企业也是适用的。

一进城市必须采取有效步骤迅速建立秩序，尽力缩短混乱时间，安定市面，恢复人民正常生活。有了秩序，一切才好办。建立城市秩序首要一项是收缴反动武装，肃清持枪抵抗和进行破坏的反动分子，收容散兵，处理俘虏，布置城防、市面治安和防空警戒，清理战时工事障碍物。公共机关以及邮电、铁路、工厂、库房和所有公共建筑设备都要派部队看守。俘虏散兵要迅速集中。战斗结束后，非卫戍部队迅速撤出城外。卫戍部队应依城市大小和情况需要，配备足够的兵力，这个部队短期内不要调动，并须事先经过挑选训练。城市治安机关亦须迅即建立起来。在我们力量还不及时，原有

普通警察尤其是交通警察，仍可暂时令其徒手服务，维护交通秩序，但必须一律收缴武器。消防队等亦各守原职，听从指挥。其他所有警察均不宜过早遣散，先集中整训，然后分别处理。敌方人员，凡武装抵抗或有破坏行动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必须立即逮捕，其余除战争罪犯和首要特务分子必须紧急逮捕，均令其到人民政府登记，静候处理，不可多捉人。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等反动党派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和第二厅所属的一切反动特务组织和其他反动党派、团体的组织和机关以及其他特务组织，应一律解散、封闭并没收其产业、设备、档案和文件。一切反动党派和特务组织的工作人员必须向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登记，呈缴证件，但普通党员、团员则免做登记手续，而由其所属组织负责人交出全部名单，送由人民政府审查，不得隐瞒。对反动党派团体和特务组织和重要人员，还须规定办法加以管制。但这些办法在秩序未安定前不要忙于宣布，只在秩序已定，情况大体明了和我们已有相当准备时，才由军管会或市政府宣布之。肃清反动特务组织，是一个复杂的工作，要有准备，要有公开治安工作和秘密侦察工作结合，要抓紧时间，又不可性急，草率从事是有害的。对敌方监狱中的犯人，除先将革命的政治犯接出安置外，其余不要立即一律释放，等秩序安定后再分别处理。一般民事犯和普通刑事犯那时可以释放，惯匪却必须改造后才能放，汉奸尤不得宽赦。否则会增加治安上的困难和引起人民不满。

建立城市秩序另一要项是迅速恢复电力供应以及邮电、

铁路、汽车交通，尤其是要迅速解决粮食、煤炭的需要。这些供应停了，城市人民一切生产和生活都难维持。前者，在保护利用原来机构继续开工外，还要很好发动和组织职工，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加紧修复机器，迅速开工。后者，则采取组织运输、组织市场（适当处理城乡间粮价物价）、组织农村粮食、煤炭准备等办法，务使供应不断。这里，事前准备是十分重要的。

在恢复城市经济生活的同时，必须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先要准备足够的货币，供给市场需要，迅即禁止敌币使用。在初期，可依据情况规定适当牌价，限期收兑市民小量的敌币，并组织商人的大批敌币出口换回必需品。对私营银钱业，暂准其存在，但应严格管理，只准经营存款、放款、内地汇兑等正当营业，不准买卖金银、外汇和作投机买卖。入城后可通过原有商会和行业会召集商人开会，宣布我们的政策，通告速即开市。国家贸易机关和公营商店要起带头和组织调剂市场、稳定物价的作用。必须严格保护工商业，又必须严格取缔奸商投机操纵、囤积居奇，违者法办。

对学校必须一律保护，使其继续开学。公立学校，除确有证据的反动特务分子应加撤换外，其教职员一律欢迎照旧供职，照发原薪。私立学校则查明其政治背景，如确系反动党派团体所办，可接收过来，其余学校均令其依法向人民政府登记，遵守法令，继续开办，其教职员也依上述办法处理。反共反人民的课程应禁止讲授，一般课程暂仍可用旧教材，其中反共反人民部分则须删去。先继续开学，然后逐渐改造。

对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出版事业，应分别

处理。属于反动政府和其下各机关、反动军队各级组织以及反动党派、团体和特务机关所办的，一律查封接收。属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民团体所办的，则要保护，令其向人民政府依法登记。属于私人经营的，又分反动的、进步的和中间性的几种形式分别处理：进步的，保护登记；有反动背景的，没收；一时无法查明的，查明后经法庭判处；中间性的，令其依法申请登记听候审查。所有报刊都必须实行登记和事后审查制度。外国通讯社和外国人办的报纸刊物，非经中央许可不得发稿和出版。对全国性的报刊、通讯社、出版机关的处理也要请示中央。对旧有新闻工作者，撤换其反动者和特务分子，其余均采取争取改造方针，但不轻易使其担任编辑和外勤记者工作。最主要的还是办好我们自己的报纸、通讯社。我们要在入城前就准备好人员和入城后几天的稿件，一进城即可在一两天或两三天内发稿出报，广播。

对与外国有关系的问题，中央已有方针规定，必须严格遵守。凡处理这类问题必须向中央请示。谨慎、守纪律是最重要的。在西北各城市还必须严格注意少数民族问题，严格尊重其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喇嘛寺等。

所有城市解放后，都必须实行军事管制。其目的是在军事情况下有效地达成上述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的任务。军事管制机关即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军区或野战军司令部委派之，其下可成立临时市政府和卫戍司令部或城防司令部，并在会内依据情况需要分设若干处，在军管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办理各项接收、处理、管理等事务。这个军管会就是军事管制时期的统一领导机关。

凡带紧急性临时性或试验性的处理，均可以军管会的命令行之，有效者将来以法令手续肯定之，不妥者则以军管会命令修改或取消之，这样就能适应新接管的复杂的城市情况。此种军管时期愈到大城市愈因其复杂愈要延长。一般军管时期的长短，主要看实行军管的各项目的的是否达到而定，不要以为取消得愈早愈好。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和前线附近城市取消军管制必须经中央批准。一些小县城，接管初期也还应实行军事管制，但组织形式可依据当时当地具体条件而定。比如当地原有党的组织基础较强，县政府便可即入城办公，可以不另组军管会，但开始仍是军事管制性质。

军管会必须在入城前及早组织好，周密准备，配备必要的各项工作干部，调查研究城内情况和工作办法。入城前还要广泛张贴、散发和连续广播我方约法八章（野战军布告），并由军管会出布告宣告就职开始工作，宣布必要的措施，使城市各界人民及敌方人员明了我方政策，安守秩序和遵从命令，保护设备，准备移交。但入城后，我们的布告和宣传，必须谨慎，不可在条件未成熟前即宣布各种处理办法，也不可空喊各种在当时当地无实际意义的口号，尤不可轻发一时不可能实现的诺言，致陷自己于被动地位。

为了广泛联系群众，除组织工会、学生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外，在军管时期内，还可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由军管会和临时市政府出面邀请若干人为各界代表，成为联系群众、传达政策的协议机关。这些代表应具有团体代表性，并应以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占多数；要多请原来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人，但拒绝反动分子参加。代表会每月

开会一两次，军管会和市政府可向它作各项施政报告，请代表讨论和建议，再由军管会和市政府作出最后决定。各界代表会的职权是军管会和市政府付与的。这是正式产生人民代表大会前的过渡形式。不过，在城市解放之初，情况尚未了解清楚，群众对我们也未有相当具体认识和初步组织起来之前，还不可能即行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时只能召集工人座谈会、学生座谈会、各界座谈会等等，宣传解释政策，联系群众，协助群众组织起来，并物色可以邀请参加各界代表会的代表。

以上说的就是我们接管城市的一些必需遵守执行的政策和工作的，这些，前委已写出系统的详细的草案。但是，这里还只提到接管城市初期的一些问题，至于管理和建设城市中的许多政策和工作的则不能详及，仍有待我们今后在工作中不断研究和补充。在此，学习精神与谨慎态度又是最要紧的。

最后，我们提到干部问题，这是对政策贯彻与否的有决定性的问题。党的有关城市的政策，必须向所有部队和地方工作的干部深入传达，组织他们讨论，使他们充分明了。对所有部队战士，也须作必要的教育。西北野战军政治部所发的入城纪律守则十七条，必须为一切入城部队机关人员无例外地严格遵守。一切到城市工作的干部，必须高度自觉地提高责任心，积极奉公，勇敢而谨慎地进行工作。必须虚心学习，善于向各个方面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管理和建设城市的各种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必须更加团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坚定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十分警

惕和防止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侵蚀，十分警惕和击破人民敌人的各种阴谋蛊惑，严格保持严肃、切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各级党的组织经常有系统地检查自己和所有党员干部的工作，加强纪律性，就是保持党在城市的领导的严肃性的保证。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习仲勋文集》刊印

注释：

- (1) 这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在第一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 (2) 陕甘，指陕西，甘肃两省。
- (3) 保甲，是国民党政府通过户籍编制来统治人民的制度，若干户编一甲，若干甲为一保，甲设甲长，保设保长，对人民实行层层管制。

第一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总决议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通过)

代表会听了贺龙同志关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传达,彭德怀同志关于中央一月八日的指示,以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对时局的声明,和本野战军一九四八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与一九四九年任务的报告,大会一致认为完全是正确的。全体代表一致以兴奋愉快的心情接受中央给本野战军党所规定的任务,并坚决完成这些任务。

正当会议进行之际,伟大的淮海战役刚胜利结束。天津塘沽又相继解放。时局的发展证明中央去年十一月声明“一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今年的一年将是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西北也将是解放陕甘的一年。

大会检讨了过去一年的军事、政治、地方工作,和部队的纪律,认为对于一九四八年中央军委所给本野战军的消灭敌人扩大解放区的两个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还存在着许多的缺点和某些错误:新式整军运动发展的还不够平衡:炮兵工兵的建设与攻坚战术技术的素养都还不能适应新情况的需要,部队政策纪律教育不够,破坏政策违犯纪律的现象还不时发生。做群众工作不够,无政府无纪律

现象尚未完全克服,干部中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等等。上述缺点和某些错误必须坚决克服,以便完成一九四九年党中央所给了我们的任务。

为了完成今年消灭胡马^①匪军解放陕甘的伟大任务,大会一致认为今后必须要继续坚持普及和发展新式的整军方针,发扬坚决勇敢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顽强的战斗作风。加强学习战术技术,熟练迂迴、包围、割裂消灭敌人的战法与注重建设炮兵和工兵。把全军的战斗力,特别是攻坚能力从现有的基础上大大的提高一步。必须坚决遵守各项政策与群众纪律,坚决执行会议通过的习仲勋同志关于城市政策与工作的报告,甘泗淇同志关于自觉纪律的报告与大会关于纪律的决议,以及张德生同志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与大会关于地方工作的决议。必须认真协助地方党政作好新区的群众工作,发动与组织群众,建设新解放的城市与乡村,支持解放战争。必须大量的培养干部,加强营团以上干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认真的总结军事、政治、地方各项工作经验,克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与肃清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必须确实健全党委制度,各军师今年至少召开一次党代表会议,团今年争取召开一次团党代表大会,正式选举团党委,扩大与健全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上述工作的完成,必须要加强全党全军的统一性与纪律性,坚决克服一切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反对可能产生的偏安和平享乐思想,团结全党全军克服困难,为完成今年解放陕甘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胡马，指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第一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 关于地方群众工作决议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通过)

一、黄龙分区解放后肃清了反动武装，安定了社会秩序；摧毁了保甲⁽¹⁾机构；建立了民主政权，初步的整顿了地方武装等；特别是动员了广大群众的人力物力，支援了解放战争的庞大需要，是有很大成绩的。但在进行这些工作中，初步的发动了群众，由于对新区农村情况了解的不够；对群众工作的重要的意义缺少深刻认识与新区工作经验的不足；发动群众步骤上不大明确，以及干部中某些束手束足的现象；尤其领导上还存在着某些官僚主义的作风，使黄龙分区群众没有能够比较普遍深入的发动起来。这是许多工作没有做得更好的根本原因，而前委是有责任的。

二、大会认为：目前黄龙分区群众工作必须继续用大力发动群众，首先进行反恶霸、反贪污、反特务、反不公，以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等斗争。在这一斗争过程中，组织农会，改造村乡政权，建立群众武装，领导群众生产，吸收在运动中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这样逐步的提高群众的自觉性与组织性，才能更有效的建设黄龙分区，支援解放战

争。

三、根据中央去年五月指示，必须坚决实行减租减息及酌量调剂种粮吃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但为了取得在新区实行土改的经验，以及按照黄龙分区的具体情况，大会认为毗连老解放区（宜川、济川、中部⁽²⁾、黄龙等县）而又具备了土改三个条件的地区，即应进行土改试办工作。至于其他地区，则不应急于进行土改。否则在整个地区尚不具备土改条件，而只在其中个别村乡进行土改，必然会影响到周围地区，发生急性冒险的倾向。此外对于目前少数地主富农自动“献地”“勾账”的行为，是可以允许的。但是不要鼓励和宣传他们，并应向群众进行教育说明道理不是地主的“恩德”而是人民斗争的结果。在解放前农民欠地主富农的陈租旧债，在大多数农民坚决要求废除的情况下，可个别进行解决，批准农民要求，不必作出一般规定。总之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均必须有利于暂时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

四、为了普及与深入群众运动，使之生根发展起见，必须改变孤立的“典型试办”的做法，而应随时总结典型经验，及时推广起来；必须耐心启发农民的觉悟，使运动成为自觉自愿的运动；必须培养贫雇农领导骨干切实依靠贫雇农巩固的团结中农；必须十分重视培养当地干部及群众领袖，反对包办代替与命令群众。

五、大会认为，本决议的基本精神，是可以适用于行将解放的陕甘新区。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1〕保甲，是国民党政府通过户籍编制来统治人民的制度，若干户编一甲，若干甲为一保，甲设甲长，保设保长，对人民实行层层管制。

〔2〕中部，旧县名，即今陕西黄陵。

第一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 关于提高自觉纪律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通过)

(一)会议一致认为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关于整顿纪律的指示完全正确。并保证坚决贯彻执行之。

(二)会议检讨了本野战军的各项纪律,认为由于部队阶级觉悟的提高,对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行,有了很大的进步。如在作战上是坚决的,对于战场纪律的遵守与对于武器弹药物资的缴获归公上是比较认真的,在部队互相配合作战上,一般是协调的,在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以及新区的各项政策执行上,没有发生过人的错误行为,特别在群众纪律方面,自一九四八年进入蒋管区作战以来,一般的连队机关都建立了纪律检查组与纪律值班员制度,进行居民访问实行“三不走”、“四不进”,帮助房东看家,帮助贫苦人民生产,上述这些指明着我们在执行各项纪律上,已逐渐走上了自觉的道路。

(三)同时,会议上检讨了违犯政策和破坏纪律的各种行为,如个别部分,在作战上有擅离职守者;缴获物资有以多报少,瞒上不瞒下者;军事演习时有打死打伤群众者,有个别人员搜俘虏腰包、枪杀俘虏者;执行城市政策时有没收邮局包

裹,乱没收国民党政府下级公务人员衣物者;在宝鸡不经调查而发生一律查封公私银行,在筹粮时有把中农当作富农;有个别人打骂群众,甚至打死群众者;随便进入居民内室,引起群众不满。不按手续不分阶级随便要粮要草;请向导不给工钱;又不注意保护致有被敌打死打伤者;损坏群众东西不按价赔偿,甚至不赔偿等。会议认为产生此种违犯纪律的严重行为的基本原因,是由于领导上对纪律教育不深入,检查不严格,纠正不及时等,今后必须有效的彻底纠正之。

(四)为了贯彻自觉纪律的执行,更加巩固内部的团结与军民联系,彻底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使我军能够承当人民军队的光荣称号,党代表会议特作如下决定:

1. 全军每一战斗单位与司政后卫各部门,每一伙食单位,必须利用休整间隙进行一次严格的各项纪律检查,各军、师、团党委并须作出整顿纪律的决定报告前委。

2. 在进行纪律检查中深入的进行阶级教育,更加提高阶级觉悟,建立全体指战员强烈的群众观点与为人民服务的深刻思想,对部队违犯纪律的行为必须从它的阶级立场上追究根源与适当的纪律制裁,以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

3. 经常加强全军的政策教育使全体指战员懂得政策是我党我军的生命线,破坏了政策就是危害了党和军队的生命,就是危害了人民利益,客观上也就是帮助了反革命,今后对每一政策必须在全军中反复进行教育引起全体军人,全体党员,特别是干部,深刻认识政策的重要,每次战前动员,战斗计划、评功查过、及干部选拔上,要把执行政策与遵守纪律的好坏作为评判的重要条件之一。

4. 反对本位主义,建立统一思想,坚决服从上级命令,缴获归公,反对以多报少,瞒上不瞒下的、打埋伏的恶劣现象,并严格的执行供给制度。

5. 全军指战员必须经常进行群众工作,每到一地必须进行对居民宣传、访问、调查贫苦人民的生活情形,了解他们的疾苦,并以此在部队中进行教育与纪律检查。

(五)为了确实执行上述各项纪律之规定,必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各级党委支部领导下建立纪律执行的

加紧战斗 迎接胜利年

贺 龙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以无限的喜悦和兴奋来迎接一九四九年。由于人民解放战争不断的胜利前进，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来，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及西北各战场上空前伟大的胜利，大大地缩短了人民解放战争到达最后胜利的进程。全党同志团结全国人民，在英明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垂死的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行着最后胜利的进军，这就是目前形势的特点。一九四九年将是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上获得全国胜利的一年，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了。

西北战场是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的二十二个月，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彭副总司令^[1]直接指挥之下，在党中央和西北局正确领导之下，依靠着陕甘宁晋绥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援，依靠着全军将士团结一致奋勇杀敌的精神，迅速的由防御转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获得了极大的胜利，消灭胡马^[2]匪军二十余万，基本上恢复了陕甘宁边区，包括民主圣地延安在内，开辟了黄龙西府广大新区，并

且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各战场的胜利进攻。在这时间，敌人是大大的削弱了，我军是大大的加强了，已经造成全歼胡马匪军解放大西北更好的条件。我后方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战胜了严重的灾荒，进行了彻底的土改，发动与组织全体人民的力量，支援前线，基本上完成了对前线的供应任务，西北战场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一九四九年的西北形势和全国形势一样，将是大发展、大胜利的一年，西北两千多万人民将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基本的解放，也是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了。

然而胜利不会自己到来，我们要用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去发动和团结广大人民，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向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绝不能自满，绝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要以冷静的态度，来观察事物，高举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检查我们的实际工作。过去的二十二个月，对西北党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我们军事上虽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虽然这些胜利是和后方党政军民一致努力支前工作不可分离，但我们在支前工作中，还缺乏应有的组织性与统一性，因而产生了许多不应有的迟延和浪费。虽然我们战胜了严重的灾荒，开始恢复生产，但我们对全部国民经济的组织与领导，还很不够，因而在这方面未能取得应有的成绩。虽然我们进行了彻底的土改，进一步解决了广大无地及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我们在运动初期，曾犯了脱离群众的某些“左”的错误，因而产生了某些不良后果，后来虽坚决进行纠偏，使土改纳入正轨，但贯彻纠偏及正确的结束土地问题，还有许多实际工作要作，而这些工作到现在还未普遍的

系统的进行起来，若干地方对实现党的政策还缺乏适当的步骤和方法。虽然我们进行了整党，使党内各种不纯现象已大大减少，使党在布尔什维克化建设中，继续前进了一步，但党的思想不纯与作风不纯现象仍然存在，尚须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我们其他工作中，只要严格的冷静的去检讨，几乎无例外的都可以发现各种程度与性质不同的特点。有些甚至是带原则性的错误。所以不能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胜利和成绩，而且将取得更大胜利和成绩，就感觉不到我们的缺点，或感觉到有缺点而认为不要紧，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取得了很多胜利和成绩，特别要争取更大的胜利和成绩，我们就必须更加冷静和虚心，更严格的检讨和正视我们的缺点。只有纠正一切缺点，才能取得胜利并巩固胜利。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在胜利和成功的基础上前进，同时也是在不断发现与克服我们工作的缺点中前进。

为了加速胜利与巩固胜利，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应当做些什么呢？

第一、必须用一切力量来扩大与加强西北人民解放军，动员解放区人民为争取最后胜利而积极参军参战。用一切力量瓦解敌军，并尽量争取解放战士参加我军，动员与组织西北解放区全体人民努力支援前线，为消灭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匪军，解放全西北而战！

第二、必须动员全党和各级政府，认真的切实的加强对解放区生产及全部国民经济的领导，加强金融、贸易、工矿、交通各方面的工作。特别应学会管理工业及作生意，有计划、

有步骤的实现毛主席“生产长一寸”⁽³³⁾的号召，为解放大西北的人民战争与改善人民生活，建立更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必须大大地提倡厉行节约，以克服我们在胜利中所遇到的一切物质困难。

第三、必须大大加强群众工作。不论新区老区，一切任务的完成，都必须依靠群众，而我们在发动与组织群众方面还作得很不够，这是应该深刻检讨的。今后应经过土改、生产、整党各项实际工作，去进一步发动老区群众，加强其政治教育与组织工作，使他们成为更觉悟、更有组织性的新型人民的榜样。在解放不久的新区，更应把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打破一切不必要的顾虑和缩手缩脚的现象，大胆的、放手的、但又是谨慎的、适当的去发动与领导群众，开展并深入进行反封建、反贪污、反恶霸、反特务的斗争，同时把这些斗争与生产建设、民主建设、合理负担、参军参战等以及各种社会改革密切结合起来，以便更充分的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四、必须用大力加强蒋管区城市及乡村广大人民中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使我军所到之处，都能取得广大人民密切的配合与援助，彻底的消灭胡马匪军，解放蒋区人民。

第五、必须在回、蒙、藏等少数民族中，努力宣传我党民族政策。并进行实际的组织工作，提高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觉悟与阶级觉悟，使他们能进一步起来配合我军作战，消灭胡马匪军及其反动统治，争取自己民族的真正解放。

第六、必须加强党的组织性与提高党的政治理论水平，为着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民主生活，以发挥全党同志

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必须坚决贯彻反对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以增强党的组织性。为着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提高党的政治水平与理论水平，坚决克服经验主义与一切机会主义思想，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手工业方式。为着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改进我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大大提高工作效能，以保证革命的彻底胜利。

第七、必须大批的培养干部，提高老干部，教育新干部，注意大批培养城市产业工人干部来负担许多新的重要工作。并要改造与使用蒋区各方面的各种人员，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总之，我们采用适应目前形势和需要的正确的干部政策来完成刻不容缓的培养干部这一重大任务。

以上七项，我认为就是一九四九年我们迎接胜利的中心工作；如果能把这些工作都作好，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贺龙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 (1) 彭副总司令，指彭德怀同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2) 胡马，指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 (3)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

关于冬季军事教育总结

张宗逊 阎揆要⁽¹⁾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

军委、联司⁽²⁾：

第一、技术教育：

(一) 爆炸训练引起了全军重视，成绩最大。全体步兵、战士、及下级干部一般的都会装制手雷、捆绑炸药、安置雷管、爆炸，在新战士及新解放战士中，消除了对爆炸恐惧和不相信爆炸威力的想法，现各部队除了坑道爆破需工兵之外，一般的爆破任务步兵可担任，而对各种较复杂的障碍物的爆破或连环爆破，则由各步兵连队之基本爆炸组（或班排）即可担任。

(二) 一师首创之推杆上墙（用一根长杆子可将两个全副武装之战士推送到墙头上），现在全军中演习平均五点三分钟内可将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排送上两丈五尺高的堡墙上（个别部队可送到三丈高），如果先上去的人带上软梯那就更快。

(三) 投手榴弹教育都较重视，平均投掷距离都在三十米到三十五米（只六军二十九米半），但有的部队只注意投远，没注意练投准及适合战斗的要求（如投一定目标带上武装

等)。步枪射击教育，普遍的重视不够，说：“很多战斗步枪一枪都没有放就解决战斗了”。实弹射击命中弹数，平均都在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个别的师达到百分之八十四，也有个别的营只命中百分之四十四。刺杀动作着重基本动作，没精确测验。

(四) 轻重机枪、六〇炮都是以营、团，个别单位是以师为单位集训，着重射击技术、排除故障、培养新射手，这方面成绩大，对这些兵器的战术训练，如阵地选择，各种情况之下射击目标的选择与步兵动作的结合等作得不够，有些部队则从来没进行这些科目的教育。

(五) 迫击炮普遍的学会了平射(三百米左右较准确)。以补平射炮之不足，特别在村落巷战中迫击炮平射较山炮轻便，一、二、三军炮工团内，各成立了一个迫击炮连，专门训练抛射炸药。此外一军还成立了一个抛射筒连(三十五公分筒六个)，抛射炸药一般技术都解决了，惟距离之精度还不够，仍在继续研究。

(六) 山炮都是以军为单位集训。一、二、三军将各师之炮工部队集中各组成炮工团，四、六军各组成炮兵营改为团，这样对目前炮兵不足的条件之下，无论集中使用、训练均有好处，过去炮兵长于近距离的射击，在训练的重点是中等距离射击及观察通讯联络与配合步兵等动作。

第二战术教育：

(一) 全军都注重积极歼灭敌人的战术思想教育。由于部队阶级觉悟的提高，积极作战的思想也提高了，无论在总结战斗评功查过中，以及在战术的演习当中，一般的都能掌握

住这一战术的基本原则，这是冬季练兵中一个最大特点，同时有的部队还联系到对于匪军之消极保守的战术思想，互不策应、互不援助作了批判，对解放兵的战术思想教育意义很大。

（二）战术动作上都着重了分割包围敌人的战术，有的部队着重了班组的战术，有的则进行到连排的战术，但战术比技术收获小。技术训练都着重攻坚技术，而战术教育中攻坚演习少（驻地附近无工事，大雪、地冻也是客观原因），干部抓得不紧是主要原因。

（三）干部的战术教育，在冬训中已开始注意也获得了一些成绩。野司办了一期营以上干部的轮训班（另有报告）。一、二、三军将原有的教导队扩编为教导团，培养排连营的军政干部、参谋干部，此外各师团都进行了班排连的干部轮训，只四军冬训期中就开办各种训练班四十一个，参加过轮训的干部三千四百九十六人（包括军政供卫文书等干部）。这种轮训是在目前条件下提高干部的很重要的办法，但有些师里既没有进行轮训，也没有抓紧在职干部训练。

第三、几点总结：

（一）冬季整训从十二月上旬开始到现在将近两个半月，这期间总结了冬初战役，评功庆功，先后补充了一批新战士和解放战士（有的连队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经过了诉苦阶级教育，及准备进城市的政策纪律教育。正因为这些教育作得比较深入，虽然正式练兵的时间不到一个月，有的只练到十几天，就在大雪严寒之下也始终保持了很高的练兵情绪，早起晚睡不怕寒冷，这就是这次练兵获得成绩的主要原因。

(二) 技术比战术进步快, 技术教育历来各级干部都比较重视, 无论在内容上以及教授方法上都积累了一些经验, 加之军事民主、群众路线的开展, 进一步的启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许多技术问题都是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解决了。在此基础上, 对技术训练还存在的若干弱点, 只要各级领导干部认识了, 这些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战术教育虽已经引起了许多干部的重视, 但在冬训中进步还是较慢的, 个别的部队中甚至是忽略了部队特别是干部的战术教育。对于干部战术教育不够, 表现在干部的战术素养普遍的较低, 特别是中下级干部, 很多连营甚至以上的干部不能领导部队的战术教育, 不能上课, 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经验还不能够有系统的总结, 对许多战斗经验及群众的练兵创造, 干部不能加以批判推广发扬, 放弃了战术原则上的指导。在实战中还存在许多战术问题, 如战术结合、组织火力、纵深战斗、第二梯队使用等, 在这次练兵中有些干部还没有认真的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提高干部的战术素养, 以便进一步的推进部队的军事学习, 还是今后军事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1) 张宗逊、阎揆要, 当时分别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2) 联司, 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联防军区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改为西北军区。

去冬农村群众工作基本总结⁽¹⁾

张德生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一、成绩与缺点

去冬整训期间，野战军在洛川、宜君、铜川、韩城、合阳、澄县、黄龙、白水、蒲城、富平、朝邑⁽²⁾县的部分地区，配合地方党政进行了两个月左右的群众工作，（基本有六十九个整乡又九个自然村，是派了五百余干部，专门进行的）。在这些地区，大都比较深入的发动了群众，普遍的组织了农会（约有百分之四十二左右的农户都有人参加农会）。农民在农会领导下，向豪绅恶霸及最坏的敌伪人员等进行了说理斗争。过去一些横行霸道、谋财害命、强占民妻、讹诈财产、借势压人、贪污致富的等等家伙们，现在在农民面前，有的低头认错，有的赔偿损失，有的吐出赃物。有些地方向地主富农进行了减租减息，以及废除了一部分恶霸高利贷者放给农民多年的“子孙账”；个别地方分配了反革命头子、大恶霸和宜君大地主韦半县的土地财产，使过去被这些家伙剥削压迫，有苦无处诉，敢怒不敢言的农民，现在透了一口气，开始站起来了。农民说：“天晴了，世事成咱们的了！”“若不是共产

党这个救命的政策，咱爬在地上一辈子也起不来，没有农会的话，一百条牛也拉不出咱的文约来。”

在运动深入的地区群众起来之后大都改造了被坏人掌握的村乡政权，积极交粮交草，参加担架运输；有的并收缴了反动分子暗藏的枪支，组织自卫军及参加游击队；有的地方，还进行了办农会、办学校、修桥补路、严禁烟赌等工作；有些参加“一贯道”、“青洪帮”的人也自动退出了；进一步安定了社会秩序，提高了生产情绪。总之，农民在农会领导下解决了多年来解决不了的许多问题，推动了农村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在群众运动中涌现了不少的积极分子，有的成为农会领导骨干，有的成为村乡政府干部，其中有些并被吸收加入了我党。

上述一切，就是去冬群众运动重要收获的一个方面。它提高了农民的觉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其次去冬群众运动也教育了所有参加群众工作的干部和战士，提高了干部和战士的阶级觉悟。经验证明：做好群众工作，教育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反过来又教育了部队，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因而更加增强了军民团结，表现出许多拥军爱民的生动事例。同时使许多干部摸到了一些新区群众工作的经验。各级领导机关，有了去冬的群众工作经验，对今后开展新区群众工作，也是有很大好处的。

但是必须指出，整个运动还是不够深入，各地工作发展的深度也不一样，更没有普及。因此有些农会工作很好，多数比较平常，也有少数不起作用的，特别是在去冬工作中，也

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就是：有的包办代替群众斗争，恩赐群众解放；有的忽视贫雇农的作用；有的过分加重中农负担；拒绝富裕中农加入农会；有的把清债变成了倒算；有的将农会只限制在调解农民内部纠纷或使农会成为阶级调和组织，而忽视领导反封建斗争的任务；有的强制组织群众和强迫群众斗争；有的组织打人甚至动手打人。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是些个别现象，但都是原则问题。产生上述缺点和错误的基本原因，是由于有些同志群众观点模糊，对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这一重要观点认识不够，因此工作起来，便发生强迫命令群众行动，包办代替群众解放的现象。同时也由于有些干部政策思想不强，在掌握政策时产生了或左或右的毛病。因此加强干部的群众观点和政策学习，是开展今后新区工作的关键。

二、提高群众阶级觉悟

去冬农村群众工作经验证明：发动群众的中心关键，在于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发动群众的过程，亦即不断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过程，启发群众觉悟再觉悟的过程。

各地经验反复证明：当群众尚未觉悟的时候，对参加斗争，往往认为命穷不能翻身或害怕变天、报复、杀人等等。对解放战争认为是：“国共两家争天下，与老百姓无关”；对公粮战勤负担避尖溜滑；对新政权建设袖手旁观；对参加游击队“恐惧逃避”；对坏人造谣轻信恐慌。但群众觉悟一经提高，便了解自己的穷苦不是“命穷”、“没本事”等，而是地主恶霸国民党剥削压迫的结果，便懂得了“解放军打仗为百姓”；便认识了担架运输、交粮交草、改造政权、组织自卫军

参加游击队等等都是自己的事情；坏人的造谣恐吓也很少发生作用了；坏人威胁说：“谁要斗争，小心镰刀挂到谁的脖项上。”群众毫不介意的回答：“镰刀挂满我的脖项，我也不怕。”

如何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呢？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开展群众诉苦运动（部队中的诉苦运动经验，基本上是可以适用于地方群众工作的），群众的苦是普遍而深重的，有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之苦；有国民党军队烧、杀、抢、奸、抓丁、搜粮之苦；有恶霸特务欺压霸占之苦；有地主富农剥削压迫之苦；有敌伪人员敲诈勒索之苦；以及其他说不完诉不尽的苦，不但贫雇农有苦，中农一样也有苦；男人有苦，女人更有苦，所有劳动人民都有苦。所以只要我们的同志能对群众的苦痛，寄以无限的同情，自己的感情与群众的感情融结在一起深入的访贫问苦，亲切的诉苦引苦，启发群众自觉自愿的、个别的、小型的、大型的或军民联合的诉苦，便能推动诉苦运动的开展。但是“只会诉苦，不会说理”，只痛哭流涕，还不能说就是阶级觉悟提高了，要使群众觉悟再觉悟，还必须要用通俗的语言，具体的事实向群众进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因此在诉苦中更重要的是要和群众“翻道理”，启发和教育群众认识苦从何处来（例如用算细帐的办法搞清剥削关系，说明苦不是命该如此，而是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结果），把每个人的苦痛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苦痛联系起来，变个人苦痛为阶级仇恨，然后再启发群众懂得如何不苦（例如启发群众认识只有自己行动起来，进行翻身斗争，努力支援战争消灭敌人等）。这样把阶级仇恨变为革命行动（只有把个人苦痛变为阶级仇恨，把阶级仇恨变为革命行动），诉

苦运动才算达到了提高阶级觉悟的目的，此外还必须在实际斗争过程中抓住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方法（例如进行比苦、比心、比进步等和划分阶级成份等等办法），继续不断地进行教育，不断地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

各地经验反复证明：只有广大群众阶级觉悟提高了，他们才会积极的起来支援战争，解放区的一切工作才有可能做好。

三、群众组织与群众斗争

当群众有了某种觉悟的时候，便要启发领导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翻身而斗争，

经验证明：群众觉悟到要进行斗争时自然就感到“势单力薄”，便产生了组织起来的要求，在斗争过程中，又有扩大组织的要求。去冬群众运动中，农会的发展规律，大体上是：为了进行斗争，先在酝酿斗争中，将积极分子加以组织，形成群众组织的最初形式，在斗争过程中及斗争之后，群众组织便自然而然扩大，个别坏分子，也就自然而然被洗刷淘汰。这说明群众组织建立与发展，必须建筑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之上，而且必须与群众斗争相结合。这样的组织才能成斗争的有力工具。

在初建立组织时，工作干部慎重的挑选几个真正积极分子，吸收为贫雇农小组组员或农会会员是完全必要的。但群众组织的继续发展和扩大，必须交给会员自己去进行，工作干部的任务只是从旁指导，不能代替发展。

去冬个别地区在农会建立起来以后，没有领导群众进行斗争，而只将农会限制在调解一些农民内部的纠纷，（解决农

民内部纠纷是十分必要的，但更应教育农民团结一致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甚至在处理农民与地主富农之间的问题时，也一律采取了调解办法，使农会变成阶级调和组织，因此群众便批评农会是“和事会”，群众说：“如果光为和事，我不参加。”可见农会必须成为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工具，否则便要脱离群众，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

去冬工作说明：新区群众在开始组织农会时，常顾虑有无“根子”，害怕“组织农会，政府不承认”。而组织起来之后，工作组离开，又往往成为“三不管”，所以在新区首先建立县区农会筹委会是很需要的，这不但可以消除群众顾虑和县区没有专人经常负责领导农会工作，而且也便于群众运动普及，今后工作中可以试行。

去冬工作以前，我们工作中的最大毛病，有的是一些同志如同照像机一样在农村一张一张的摄取问题，却不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不少地方的群众，对我们工作人员重复多次的调查访问，而不具体解决一个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实际问题，感到厌烦。群众说：这是“只打雷不下雨”。有的是不管群众的觉悟程度如何，也不管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硬要群众去斗争他们暂时还不敢或不愿斗争的对象，结果群众还是发动不起来。因此各地经验反复证明：要使群众斗争开展起来，必须在诉苦中“集中苦水”、“集中仇恨”，然后提出斗争口号确定斗争对象。这就是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需要，先从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着手，然后逐渐使斗争推广和深入。

为了使群众斗争取得胜利，事先必须了解敌我情况并和

群众充分酝酿，初步研究出处理问题的意见，以便于掌握运动，这也就是群众所说的“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去冬不少斗争在这方面有缺点，因此一到群众斗开了，领导上便乱了步子，没有主意，成了“有人打锣，无人定音”，失去了领导作用。在分配斗争果实时，除一般的应多分一点给当事人外，亦应注意适当的扩大分配面。

根据去冬经验：“说理会”是一种很好的斗争形式，它一方面不拒绝对方说话，另一方面愈是经过群众说理愈能揭发对方的罪恶，对方罪恶愈揭发得深，愈能提高群众阶级觉悟。因此说理斗争，既可使对方理屈词穷，向群众低头，又可使群众“理直气壮”，增强斗争勇气和提高阶级觉悟。群众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种形式今后应当大大提倡。

经验证明：有重点的进行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不论在组织群众与领导群众斗争时，均应由市镇到乡村，由大村到小村，只有如此，运动才易于开展和普及。

四、斗争方针与斗争策略

要使群众自觉的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更必须要有一条正确的方针作指导，不然就是“一满糊里糊涂，不知该咋弄”或者是胡碰乱干。根据去冬各地工作报告，新区群众普遍而迫切的要求是：清算和斗争恶霸特务的欺压霸占行为；清算和斗争敌伪乡保人员的敲诈、贪污案件、要求负担公平合理，要求减租减息等等。因此前委所规定的在新区农村首先领导群众进行反恶霸、反特务、反贪污、反不公以及减租减息等斗争的方针，它不但正确的反映了群众上述要求，而且对于联

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以争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这一群众长远利益，也是完全有利的，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

在执行这一方针时，还必须是有步骤有分别的，亦即是有策略的，否则胡干乱干，就会发生急性冒险的错误。所谓有步骤即是说要分巩固区与接敌区，在巩固区应当集中力量领导群众反恶霸、反特务、反贪污、反不公以及减租减息等斗争；在接敌区进行这些工作时，打击面更要小些，主要打击敌人抢粮抓丁以及敌探特务等活动。所谓有分别，即是对不同的对象分别给以不同程度的对待，如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与非恶霸分子，分别地主与富农，分别恶霸本人与恶霸的家庭或狗腿子，分别特务头子与普通特务分子等等。对农民内部问题采取理解方针，不能与豪绅恶霸、地主富农问题一样看待。根据去冬经验，在执行减租减息时，可以适当的调剂部分土地给贫苦农民，例如可以分配为群众深恶痛绝的反革命头子及大恶霸的土地；可以将富农租种的社地、闲地、祠堂地等转租给贫苦农民；可以接收地主富农的“献地”。但必须交由农会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向群众说明这不是地主富农的“恩德”，而是群众斗争的结果。在清债时，可以批准农民废除在解放以前欠恶霸高利贷者多年的旧债要求，也可以允许地主富农“自动勾账”。至于解放后，政府已明令宣布减租减息，而一些不法地主富农仍暗中照旧收租收帐，这些长收的租子和利息，在群众发动起来后，完全应当着其退给农民，此外在清算恶霸分子和贪污分子退出霸占贪污的财产时，也可以适当的着其加些利息。这样做，既不违犯我党

目前在新区的政策，又对广大农民，特别是对贫苦农民有利。但是在减息时提出“解放前长欠的租子顶新租”；在减息时采取倒算，在转租公地时，侵害中农甚至贫农利益的办法都不是对的。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和策略，必须克服某些干部借口其他工作任务繁重，而不把发动群众，向农村反动封建势力作斗争，看作是发展新区工作的中心环节的观点；必须克服某些干部只看到群众眼前利益，不顾群众长远利益，或片面强调群众长远利益，而忽视可能和应当解决的群众迫切要求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但要在工作同志中加以克服，而且也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例如召开乡农会主任联席会），以此教育农会干部。只有这样，群众运动才能健全的开展起来，其他工作也才能做好。

五、建立贫雇农领导骨干与团结中农

要使运动能够坚持发展，取得彻底胜利，还必须十分重视贫雇农，建立贫雇农领导骨干，与巩固团结中农，贫雇农说：“农会是一把镰刀，贫雇农是镰刀上的钢，中农是铁，钢用上铁，就跟上了。”正是说明了这个道理。

去冬工作中，有的干部由于对贫雇农的看法不正确，对建立贫雇农领导骨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觉得“贫雇农没本事”，“贫雇农没威信”，并且认为在中农比较居多的地区、建立贫雇农领导似乎不十分重要。因此要建立贫雇农领导骨干，干部必须首先认识贫雇农是农村中最穷最苦的人，是豪绅恶霸的死对头，是农会中的中坚力量。去冬工作证明，在反不公反贪污问题上中农和贫雇农是一样积极的，但由于贫雇农

没有形成领导骨干，因此在减租减息等斗争深入时，有些中农也就持观望态度，有些中农甚至给地主富农帮腔，影响运动的深入。所以不能因为某些贫雇农有些小毛病（这些毛病是可以教育改正的），也不能因为有些地方土地较分散，贫雇农比例较之土地集中地区稍小，而忽视贫雇农领导的重要。

去冬工作中也有些干部由于觉得一些中农不直接受人剥削，甚至还有剥削人的，便对团结中农注意不够，于是有排斥中农（主要是富裕中农）参加农会的事；也有个别地方过分加重中农负担的情形，因此要巩固的团结中农，必须首先不要侵害中农利益，不要排斥中农参加农会。去冬工作证明：不把中农和地主富农严格区别开来，就会引起中农不满，地主富农必然乘机拉拢中农，贫雇农看见中农不和他们一起参加斗争，就感到孤立，觉得“威胁很大”，斗争起来，也就有些畏缩。所以不能因为一些中农不直接受人剥削，也不能因为富裕中农还对别人有些轻微剥削，而忽视团结全体中农的重要。

建立贫雇农领导骨干与巩固的团结中农，必须首先用大力提高贫雇农阶级觉悟，特别要认真培养贫雇农积极分子，使之真正成为农会的领导骨干，而不至流为形式，同时必须向全体农民进行“天下农民一家人”的团结教育，一方面使贫雇农懂得：如果不团结中农，使中农被地主富农拉拢过去，自己便要孤立起来，和豪绅恶霸进行斗争时，便不容易取得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是不容易巩固的。另一方面使中农认识：如果不同贫雇农团结一起参加斗争，“只顾自己利益，不管别人死活”，自己的某些胜利（例如反恶霸、反贪污、反不公

等）也是不可能取得的，即使取得某些胜利，也是难以巩固的。这就要反复向中农说明：封建势力也是中农的凶恶敌人等道理，以提高中农觉悟，而对某些中农的动摇性，还需要进行适当的批评。当然批评的目的，绝不是排斥中农，而正是为了更好的团结中农。此外则要建立贫雇农小组与保证各级农会委员中贫雇农委员占多数，只有贫雇农形成坚强的力量，就能更好的团结中农。只有全体农民团结一致，才能取得和巩固农村反封建斗争的胜利。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 这是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在政治部召开的第三次民运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 (2) 朝邑，旧县名，一九五八年撤销后，并入陕西大荔县。

彭德怀等关于与华北兄弟 兵团^{〔1〕}会师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

（一）自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朱总司令给全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奋勇前进，消灭敢于抵抗的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命令后，第二、第三野战军即飞渡长江，横扫江南残敌一直捣蒋匪老巢，二十三日解放了南京；我华北兵团、晋绥部队亦以雷霆万钧之势，二十四日即一举解放太原，全歼守城顽敌，华北已全部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国已宣告灭亡。为肃清西北战局敌人残存兵力，华北兄弟兵团，即将入陕与我们会师，彻底消灭胡马匪帮，解放大西北而战斗。

（二）华北兄弟兵团从其前身——红军直至今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从内战、抗战直至今天伟大的解放战争中，都有着光辉灿烂历史，他们具有坚强的斗志，优良的作风、非常丰富的战斗与工作的经验，特别是近年来中经石家庄、新保安、临汾、运城以至最近解放太原大规模攻坚的范例及模范的入城纪律，他们一切军事政治工作、管理城市工作等宝贵经验，我们必须虚心的向他们学习，求得在与之并肩作战，共同工作中，把自己提高一步。

（三）我们在西北已打了几年仗，而他们初入西北，则将是人地生疏，因此我们应尽自己的力量，竭诚的给他们以可能的帮助，发扬人民军队传统的阶级互助，与华北兄弟部队团结的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一样，为迅速完成毛主席朱总司令给予我们解放全西北的光荣任务。

（四）兹宣布与兄弟部队团结的守则八条如下：

一、虚心学习兄弟部队的各种工作经验。

二、诚恳给兄弟部队以各种可能的帮助。

三、态度和蔼，谦虚真挚，不得骄傲。

四、一同作战时，要密切联络积极主动配合，不争夺俘虏，不争夺缴获。

五、行军相遇，要主动让路，驻军一起，要主动让房不借家具，不争购用品，不争用粮食。

六、倾听兄弟部队的建议和规劝。

七、对兄弟部队个别人员有意见，须经过组织提出，不得背地议论。

八、对兄弟部队的伤病人员，失联络人员，要妥为救护招待送回原部。

上述各项，望各部在干部与战士中，进行普遍深入的教育一俟与兄弟兵团会师即贯彻执行之。

司令员兼政委 彭德怀

副 司 令 员 张宗逊

赵寿山

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

副 主 任 张德生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 华北兄弟兵团，指当时在华北地区准备加入西北作战的第十八、十九兵团。一九四九年四月划归第一野战军。

第十九兵团政治部关于进军 大西北的政治工作要点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为胜利完成此次大进军任务全党全军必须集中力量做好下列三项工作：

一、深入政治动员，充分解释挺进大西北作战的伟大意义，鼓舞全军奋勇前进，掀起进军立功的大浪潮。整训教育进入誓师出征的最后阶段后，各部队应在现有的觉悟基础上进行充分的宣传鼓动。展开进军大西北广泛的政治动员。务使全体同志认识我二、三、四三大野战军横渡长江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所造成的空前有利的形势。反动派江南阵地正在加速崩溃，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宣告灭亡。依据这一形势政治动员应向全军说明下列三个问题：

第一，要说明胜利形势急剧发展，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立刻打出去，配合江南我军痛灭残敌，不给任何敌人以喘气逃跑的机会。我军早一日出动，敌人早一日消灭，全国胜利也就会早一日实现。

第二，要说明我军进军西北和解放大西北的重要意义，指出要解放全国就必须解放西北，如果不消灭西北残敌不解放

西北辽阔的土地和广大人民，就无法取得最后胜利，就不能得到全国的解放，因此我军进军西北是争取全国胜利不可缺少的作战步骤，应该批驳那种“宁肯南下不愿西进”的错误论调。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把最艰苦的任务愉快的担在自己的肩上是最高贵的品质，完成最艰巨的任务才是最光荣的。

第三、要说明进军西北与解放西北作战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充分存在着的有利条件。炎热、天雨、泥泞、交通困难、供应不便、敌情地形不熟、新区群众条件差，这都是可能遇到的困难，我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西安已告解放，西北胡马⁽¹⁾匪军防线已开始崩溃，我军上气高涨，与西野会合后兵力更加强，西北敌人统治薄弱，内部动摇混乱，外部孤立无援，而我军既有西野有力配合，又有广大人民热烈拥护支援，一旦我军进入西北发动攻势后，胡马匪军和江南残匪一样将会迅速的土崩瓦解，一般的说来严重的战争已经过去，这些充分的有利条件不仅使我军有必胜信念，而且有迅速完成解放大西北的必胜把握。为了有计划有步骤的在全军掀起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四月二十一日进军命令的热潮，开展奋勇挺进大西北的立功运动，各部队应切实进行下列几件工作：

(1) 依据进军命令，兵团大进军立功号召、进军誓词和进军口号，在全体干部和战士中广泛动员，把此次整训中启发和提高的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组织起来，使进军誓词口号和立功号召成为鼓舞前进的无限力量。

(2) 依据兵团进军立功号召，开展奋勇前进的立功运动，普遍订立立功计划，发动进军立功竞赛。

(3) 认真组织庆功奖功进军誓师工作。

二、集中一切力量，保证完成长途远征的行军工作。此次进军必须足够估计行军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可能发生的问题。保证完成行军任务，应成为全部政治工作的中心，主要有三项任务：

1. 做好巩固部队工作（使非战斗减员减少到最低限度）。

2. 遵守好政策纪律。

3. 做好与沿途群众、地方机关、兄弟部队的团结工作。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做好下列工作：

1. 做好行军管理工作。尽可能减少部队疲劳，想法恢复疲劳，保证给养，加强医疗卫生工作。

2. 做好日常教育工作。在整训基础上继续不断的深入奋勇前进的思想教育，运用“事事是教材处处是课堂”的实际教育方法，通过沿途群众欢送欢迎激励部队坚决西进。

3. 做好纪律检查工作。组织纪律检查组，建立驻村检查制度，做到手续清楚，买卖公平，借物送还，损物赔偿，特别注意节约民力，不许乱动员大车、拉牲口、找向导。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4. 做好行军鼓动工作。各级宣传队组织若干鼓动组开展群众性的鼓动工作。并与沿途地方党政军民准备的文娱活动结合鼓舞部队。各师小报力求在行军中及时出版，成为保证行军任务完成的重要工具。

5. 做好友爱互助工作。身体强的帮助身体弱的，老战士帮助新战士，党员帮助群众。克服形式主义，克服某些干部军阀主义倾向，干部以身作则推动大家。

6. 做好军队与地方、本部与兄弟部队间的团结工作。完成此次大进军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全党全军必须集中力量实行不断的检查及时的领导，除深入动员提高全军自觉做好行军工作的思想准备而外，还必须用一切办法实行有力的组织保证。各部队应根据过去经验组织收容队、设营组，配合地方组织拦阻队，以保证行军任务胜利完成。

三、认真做好与西北野战军兄弟部队的大团结。部队进入西北与西野会师后，全军应进行展开学习老大哥和老大哥团结斗争团结立功的群众运动，要在部队内进行团结的教育，防止任何骄傲情绪。虚心学习西野英勇善战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学习西野熟练的战术技术和消灭胡马匪军的经验，主动与西野联系，了解敌情、民情便能帮助我们迅速的熟习西北情况。对于西北人民也必须报以最大的热情，任何破坏团结有碍团结的行为，必须严格注意防止与纠正。

第十九兵团政治部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 胡马，指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和副长官。

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关于 春季攻势作战总结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

第一、战前情况及我军部署：

(甲) 蒋^[1]匪军经我东北、华北、淮海诸战场巨大胜利打击后，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起，胡^[2]匪之伪西安绥署眷属、物资、机关、学校陆续沿川陕公路南迁汉中、广元线，迄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胡匪军除三十师（欠八十九团太原）驻兴市、蒲城间地区，十七军之十二师位美原、党睦、倒贤，陕保四旅（指挥保二十六团、蒲城自卫团）驻蒲城，骑二旅之四团位贾曲及其以南，七十六军之二十师（对外称三十三师系陕保一旅改编）及一三五师之四〇五团驻铜川五里铺、军台岭、陈炉镇地区，六十九军位耀县，三十六军之二十八师位大荔任守备外，其主力均向西南收缩于富平（十八兵团部及六十五军），阎良镇（九十军），西羊镇、鲁桥、三原（一军），永乐镇、泾阳城三十八军），及渭、华^[3]（三十六军）地区，加其五十七军彬、永、乾、礼^[4]线，沿泾河布防，十四师之四十团位淳化、口头线。

(乙) 我以歼灭蒲城守敌完全解放蒲城县并相机歼铜、耀、

富、淳^[5]敌之目的，以四军出铜、耀，攻击铜、耀、淳之敌，牵敌主力西顾，集中一军、二军、三军、六军攻歼蒲城之敌，具体部署如下：

四军取道宜君、哭泉、马鞍桥，于二月十九日进至铜、耀地区，首先攻歼铜川之敌，得手后继续南进威逼耀县，该军之十二师进到陈炉以东之潘家河附近，以一部监视陈炉敌，主力由东向西夹攻铜川。

一军、三军、六军于二月二十日隐蔽进至大孔寨、郑家、石槽、六井（一军附骑二旅），龙山、韦村、雷村（三军）、罕井、白水城（六军）地区，完成攻击之准备，于二十一日拂晓开始攻击。一军首先分割围歼蒲城、兴市间之敌三十师，截断蒲富公路，如三十师退入蒲城，则向城西南角及西门攻击。骑二旅向富、耀侦察。六军沿蒲、白^[6]公路前进，首先歼灭蒲城以北之敌（三十师一部）然后与二军会攻蒲城。

二军于二月二十日隐蔽集结孙镇及其以东，二十一日战斗开始后进至蒲城西南之贾曲镇地区，准备打援。

第二、战斗经过：

1. 铜、耀、蒲战斗：

四军十六日拂晓出发，经宜君、哭泉，十八日午进至马桥、党家原、龙家原地区，侦悉敌二十师部及其特务营驻王益沟，五十八团驻五里铺及东原，五十九团驻陈炉，六十团驻铜川城及其附近，该敌战斗力较弱。我四军遂于十九日夜，以一个团布置于黄堡镇地区，阻击由耀可能北援之敌，主力（十师十一师五个团）向田家原、五里铺、王益沟之敌攻击，十二师以一部监视陈炉敌，主力向军台岭攻击。另着关中区

之二十一团围歼小邱团匪，渭总⁽²⁾向鲁桥活动。

二十日午时十一师扫清铜川西原敌外围据点，并攻占白家原，十师同时亦占高家原歼敌一部，敌大部南逃。军台岭、陈炉镇之敌与我略事接触亦南窜，我追击至上店一带，俘敌二百余。

二十日下午铜川敌逃至耀县，并与原驻耀县之敌六十九军等相继南逃三原，二十一日晨我四军一部进占耀县城。小邱团匪向我投诚。

我一军、二军、三军、六军二十日晚进至东加禄、滩尖子、石槽、东党（一军）、盘头山、南凹、桥西、白水城（六军）、武宜、高石、韦村、马湖、附原（三军）、孙镇及其以东（二军）地区。

原驻墙村、十里铺、兴市、美原、倒贤之敌三十师及十二师於十八、十九两日相继西逃，敌陕保四旅等反动武装（千余人）据守蒲城。

二十一日黄昏一军进至兴市、美原、鸿雁村地区，当晚三军、六军向蒲城攻击，二十二时三军之九师、七师由东南两门爆破攻城，迄二十二日二时将守敌完全歼灭，俘敌保四旅旅长赵国珍以下千余人。

六军二十一日晚扫清城北城西外围据点后，集结于县西坡头、尧山府地区。

二军二十二日晨进至贾曲、璋宝村、西张家、内府村地区。驻贾曲龙阳地区之敌骑二旅先我南逃。

东府分区⁽³⁾部队为配合野战军作战，亦于同时进至双泉地区，并向大荔、朝邑游击活动。

2. 淳化、富平、口头战斗：

当我向铜、耀、蒲⁽⁹⁾进军之际，敌三十八军十九日由泾阳退乾县，一军退泾河西之北社、阡东、马庄地区，十八兵团部及六十五军退泾阳地区，九十军退永乐镇附近，二十师残部，六十九军及十二师退守三原、鲁桥、楼底、西羊镇地区，二十师退至富平及其以西地区。

我军以继续歼灭富平守敌之目的，主力于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向富平挺进，以三军、六军围歼富平之敌，一军、二军进至石川河西之都村、淡村（一军）、王家庄、南北济王、阎良镇（二军）地区，阻三原可能来援之敌，和切断富平敌之退路，四军向淳化、通润推进，骑二旅进至固市、下邽地区活动。

二十四日晨我四军之十师，以一个团首先攻占石桥（敌一个连逃往口头），师主力向淳化攻击，守敌一经与我接触即弃城向泾河逃窜，我即跟踪猛追，直追至八里桥、同平地区，将逃敌全部歼灭，俘敌营长及伪县长以下四百余人。

二十四日敌九十军由永乐镇移高陵，并获悉敌有于瓦窑头地区与我决战企图。我为争取主动，遂改变原部署，除以三军、六军各一部仍继续攻歼富平城守敌外，主力集结于庄里、大小杨村（一军）、留古镇、康桥镇（二军）及梁家庄、刘家庄、齐村（六军）、焦家、军寨、张白庙（三军）地区待机。

二十五日晚我三军之九师进至富平城附近，即展开对该城之攻击，于二十二时由东、北两门突破，二十三时全部占领该城，复继续向南关车站及连城堡攻击，迄二十六日二时

结束战斗，全歼敌富平自卫团，俘团长以下四百余。六军十七师之五十一团亦于同时在富平以西歼敌一部。

我四军占领淳化后，二十六日敌急调其由铜川地区南逃之二十师残部至马窑、朱家庄、崔黄家、西凤山地区布防，堵我南进，并以一部接替四十团（十四师属）口头以西高地防务。

为查明三原、泾阳敌情，四军提议向口头镇及其两侧高地之敌攻击，经野司同意后，该军于二十八日夜以十师向铁瓦殿攻击，十一师首先攻歼北于池，刘家岭地区之敌，继向口头镇攻击。十二师除以一部控制嵯峨山向东警戒外，主力向九顷原、三里村地区攻击，尔后以一部配合十一师攻歼口头之敌，另以一部进至吊庄、官道畔，向云阳镇方向警戒和截歼口头敌之归路。

三月一日二时，十师、十一师先后攻占铁瓦殿山、北钟山、刘家岭线阵地，敌不支南逃，我十师、十一师两师即跟踪追击，五时十二师主力攻占九顷原，歼敌四十团两个连，同时十一师攻占口头镇，守敌四十团一部向东南逃窜，该师主力即继向马窑、西凤山地区敌侧后迂回于马窑、朱家寨地区，全歼二十师师部及其六十团。十师于西凤山及崔黄家地区全歼五十八团、五十九团，口头战斗胜利结束，歼敌二十师全部及四十团大部，除毙伤外，俘敌二十师师长褚静亚以下一千五百余。

3. 大荔战斗：

蒲、富、铜、耀、淳^[10]全部被我解放后，敌以十一个师（六十九军、九十军、六十五军各二个师，一军三个师及三十

师，十二师、骑四团等）兵力麇集于三原、高陵、泾阳及咸阳以北地区，另三十六军除以一个团配合地方团队守大荔、马坊头地区外，主力守备渭河南岸临潼、渭南、华县、敷水镇之线，八十四师驻潼头。

我主力决在战备姿态下集结于淳化、方里、小邱（四军）、庄里镇、觅子镇（一军）、富平至王潦镇（三军）、张桥、关山、康桥、田市（二军）地区整训，并协同地方政府进行开展新区群众工作。六军附骑二旅东进，协同东府分区部队攻歼大荔、朝邑、平民地区之敌，以解放东府地区。

三月三日我六军进至凭信、孝同地区，当晚即以十六师经伍家、官子池，十七师经羌白向马坊、石槽线攻击，敌八十四师二五二团之第二营（二十八师二日全部逃渭河南，该敌五日接大荔防，当晚撤至马坊、石槽）一发现我军即向南逃窜，当被我歼其大部，一部逃至东西海棠亦被我骑二旅追击歼灭。

四日拂晓六军之十七师渡过洛河攻克大荔城，守敌大荔自卫团及八专署突击大队（三个中队）等全部被歼，俘副团长以下二百余。十二时东府部队攻占朝邑，守敌南逃。平民敌二百余由伪县长王子献率部起义，并扣俘伪县长、自卫团长及二十八师便衣等四十余人。

同日我二军四师一个营攻占高陵东之栎阳镇，六师一部攻占交口镇，敌均西窜，至此石川河以东、渭河以北地区全部为我解放。

4. 胡马匪军纠合北犯：

胡匪集中主力于泾阳、三原地区后，得青马匪军之增援，

于三月五日开始向我反扑，首先以六十九军、三十八军于五日攻占口头镇，我四军除以一个团配合关中地方武装位方里地区游击迷惑敌人外，主力移耀县西南高塄、任家庄、阿堡寨、庙沟湾地区。

八日敌由三原地区分三路（一经鲁桥，一经西羊镇，一经陂西镇、许家桥）大举北犯，当日先头进至双槐树、大堡董家、庙张线（据悉中路敌为九十军，左为六十五军，右为三十八军），另一军于七日晚进至永乐镇地区，八日一部陷栎阳，三十六军七日一部北渡渭河，八日以一团陷交口镇。

九日三十八军陷富平，十日六十五军进至马额、华里坊，九十军进至文家、袁家，同日青马八十二军骑兵四个团（由马德胜统一指挥）陷淳化，一部进至爷台山地区，十一日续经铁王、凤凰山向东急进，当日上午于墓塄、让牛村地区与我四军之十师接触，战至黄昏毙伤敌二四八师师长兼骑兵纵队指挥官马德胜以下千余，俘十余人，我因准备不足亦稍有损失。

十二日胡马匪军会陷耀县，胡敌九十军及一三五师继北进，十六日陷陈炉、军台岭、铜川，十七日一军陷蒲城。十九日进至白水以南，三十六军进至蒲城东南地区，十九日一二三师一度陷大荔、朝邑，二十二日又为我收复。

我因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机会暂少，乃节节向北转移。为争取整训，迄十八日敌占上述城镇停止前进后，我军即转到七里镇、中部⁽¹¹⁾、偏桥（四军）、林皋、新耀（一军）、王庄镇、窑头（三军）、澄城、交道（六军）、韦庄、寺前（二军）、平定、刘家凹（野直）地区进行整训，春季战

役遂告一段落。

第三、战后态势：

陷蒲城之敌十九日进至白水河，三十六军之一二三师十九日晚陷我大荔，另一部陷朝邑、平民，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平、朝、大⁽¹²⁾三城又为我二军一部及东府部队收复，敌南逃，从此敌我相持于洛河、白水河之线。

第四、伤亡消耗及战绩（如附表）（略）。

第五、经验教训：

（甲）由于胡匪过去采取守点增援战法，均受我歼灭性的打击，此次战役则变为后退集中，进行反扑，当我进军时一发现我军即向后逃，仅留地方武装孤守城垣据点。

（乙）我军进攻采取大胆深入，插入纵深，割裂敌人，迂回截击其退路者，则收歼敌之效（如四军口头战斗当突破敌前沿后即迅速插入敌纵深截断敌逃路，全歼二十师一例），未适应此具体情况而采取过去攻敌据点阵地之进攻态度者，则攻击扑空（如四军攻铜川未能将敌逃路截断致敌大部逃跑）。

（丙）攻击敌人弱小地方武装守备之城镇，只要事先有充分准备采取突击均收成效（如三军攻蒲城富平接近敌后即猛然发起攻击，均迅速消灭了敌人），如准备不周，又按攻击敌有强大兵力守备之据点，则均误事失时（如六军攻蒲城西门时突击部队未带足够的炸药及动作迟缓，待准备好时三军已将敌大部歼灭）。

（丁）攻城突击队与爆破组必须统一指挥，切取联系，否则会遭不必要的损失及误事（如三军攻富平东门时，指挥不统一，爆破组与突击队联系不密切，第一爆炸组将城门炸开

未及时报告突击队，又继续进行两次爆炸，致将前派去之两爆炸组遭到自己的杀伤，迟延了一点多钟突击时间）。

第一野战军司令部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蒋，指蒋介石。
- 〔2〕胡，指胡宗南。
- 〔3〕渭、华，指陕西渭南、华县。
- 〔4〕彬、永、乾、礼，指陕西彬县、永寿、乾县、礼泉。
- 〔5〕铜、耀、富、淳，指陕西铜川、耀县、富平、淳化。
- 〔6〕蒲、白，指陕西蒲城、白水。
- 〔7〕渭总，指渭北总队。
- 〔8〕东府分区，一九四九年二月，在陕西合阳县成立东府军分区，同月改名为大荔军分区，隶属西北军区建制。
- 〔9〕铜、耀、蒲，指陕西铜川、耀县、蒲城。
- 〔10〕蒲、富、铜、耀、淳，指陕西蒲城、富平、铜川、耀县、淳化。
- 〔11〕中部，即陕西黄陵。
- 〔12〕平、朝、大，指陕西平民、朝邑、大荔。

张宗逊关于四个月工作 情况向毛泽东主席的报告^{〔1〕}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

毛主席：

自二月十六日至五月二十五日彭德怀同志离开西野^{〔2〕}时期部队工作摘要报告如下：

（一）进行了两个战役。第一战役二月十八日起至三月十八日止整一个月，歼敌七千人，解放大荔、朝邑、平民^{〔3〕}及一度解放蒲城、富平、宝鸡、耀县。战役特点：前期为胡敌撤退我追击，后期为胡马^{〔4〕}联合反击，我相机歼敌转移到白水河以北、洛河以东地区。第二战役自五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五日止共十天，歼敌二万余，解放西安、三原、凤翔及全部渭北及虢镇、潼关间陇海路沿线广大地区。战役特点为追击战，由于胡马兵力依然强大，击溃须待二梯队（华北兵团）到达。二十二日占领凤翔后即停止追击，二十五日部队分别集结岐山蔡家坡以东及乾县、西安地区待机休整。

（二）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五日有计划的整训了一个月，此外因情况变动及就粮断续整训半个月。整训内容为攻坚、对骑兵战术与政策、纪律教育。攻坚战术以步炮工协同、

纵深巷战为主。政策纪律教育除根据中央历次政策指示与各战场经验总结进行会议传达、讨论上课外，并组织作业演习。各军均抽调干部组织了接收五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工作队，以一军最强，有一百三十〔名〕干部。

（三）部队情绪。两次战役中均保持了高度的士气。第一战役，四、六军由于歼敌制胜士气特别高，一、二军则由于未进行战斗，埋怨领导，讲怪话，如说“示威游行”、“我的杀敌计划什么时候完成”。第二次战役中，三军为预备队未进行战斗，也表现不满，如说“二军追，四军截，一军堵，六军进西安，三军吃干饭”等。这一时期全军逃亡约一千五百人，进攻时子弟兵逃亡（占逃亡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怕离家太远，如说“在陕北打十年也愿意”，向北移动时颇多逃亡。当解放西安及关中广大地区后，又有少数“甘肃苦”，“无水吃”，“打马家油水不大”的思想，现正在克服中。

（四）地方工作。在每一战役与整训开始均同时布置地方工作。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强调城市工作（农村仍未忽视），由于经验不足，在第一战役中把重点放在铜川、蒲城、大荔等城市，目的在取得初步经验以便以后接收大中城市。因此在第二战役接管城市中比较有进步，如第一战役中接收铜川、蒲城的忙乱，武装撤来撤去，不按系统，不懂军事代表的职责等。在二次收复上述地区与接管三原时均较有头绪，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也较好些。如第一战役时四军与三原分区在铜川成立军管会不经任何上级批准，各县随便出布告不请示上级，甚至蒲城游击大队以个人名义张贴布告，耀县保安科自行决定拘押所有敌伪情报人员（大部是挂名的）。四军三十四

团政委在错字的电文上自己猜测，命令工作队破坏铜川煤矿（工作队未执行）。各部队招生混乱，经过纠正在第二战役中较好。

（五）进入新区工作第一件事与急需解决的问题是金融与物价问题。伪券，我军未到前市面已停止流通，仅敌军与伪机关暗藏使用，市面上较流通的为白洋、铜板。我们的方针对伪币禁止，对白洋采默认态度，既不承认其合法，也不认为其非法。对于物价（人民币购买力）则按当地白洋购买力与老区白洋实际价格折合，定出几种主要物价（不是限价），可能时着贸易公司与军队财经处开设门市部，起物价领导作用，因此市集迅速恢复。

（六）关中^⑤地区反动地方武装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大体分为敌伪保甲武装、土匪武装、退伍军人、恶霸武装及民间散枪，总数十万以上。这些武装按其政治态度大体分为左中右三种。我们的方针是抵抗者坚决消灭之；与我有长期关系或为党员领导或对人民事业有功者用改造方针，使其成为人民武装并帮助其发展；对接洽投降者，按我力量所主动的程度，或集训收缴武器，或令其维持武装同意暂时保持原有力量；对民间武装除自动缴献者外暂时不收缴。总之是彻底消灭的方针。第一次战役包括地方共收缴枪近万支，二次战役尚未统计。以上请示。

张宗逊

三十日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毛泽东复电张宗逊：“三十日报告收到，阅悉甚慰。”
- (2) 西野，指西北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起改称第一野战军。
- (3) 朝邑、平民，均旧县名，一九五八年撤销后，并入陕西大荔县。
-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马，指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均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 (5) 关中，泛指陕西中部地区。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 入城注意事项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

我军前进，业已解放西安及渭北各城，并将继续解放西北各大小城市。特规定入城注意事项于下，所有入城机关、部队、团体和一切人员务须切实执行。

(一) 一切机关、部队和所有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第一野战军“入城守则”。

(二) 一切入城机关、部队、团体和所有人员，必须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坚决执行军管会的命令，不得违抗。未设立军管会的县城，则应服从当地县人民政府的管理。

(三) 一切部队，在战斗结束后，除担任警备任务者外，一律迅即撤出市区和工厂区。任何机关部队人员。在戒严期间，凡未持有军管会所发之通行证者，一律不得入城。

(四) 不得无故打枪，违者严办。军事演习及试枪，必须事前得到警备司令部批准，并预先通告，然后在市郊指定地点施行之。

（五）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除通缉在案的战犯和主要反动分子、持枪抵抗的敌军及正在进行抢劫、行凶、放火、破坏等现行犯必须立即拘送警备部队和治安机关外，任何部队、机关、团体均不得擅自捕人。

（六）保护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工厂、矿井、银行、商店、铁路、车辆、邮政、电灯、电报、医院、学校、图书馆、广播电台等和名胜古迹以及一切建筑物、公共场所、公共设备，严防破坏。

（七）所有公共机关、企业和公共场所、设备、物资以及军用品等的接管权，统属于军管会。任何机关、部队、团体都只有帮助清查、收集和保护之责，而无单独接管处理之权。由各单位抽调派出之接管人员，只受军管会统一指挥，与原派出单位不发生任何关系。非得军管会命令，任何单位和人员不得分配、占据、拆卸、搬运、动用任何公共企业、仓库、建筑、机器、物资和武器、弹药。禁止拆走轮带、器材、零件，乱拉车辆、牲口，损坏设备、家具等。违者必须彻底追究，严厉处罚。在军管会接管人员未曾到达前，入城部队应负责保持一切公共机关、企业之完整无缺，等候军管会派人接管。

（八）没收官僚资本之权属于当地军管会。市营以上公共机关、企业及官僚资本企业之处理，必须由军管会请示西北局或总前委决定。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擅自没收分配。所有接管的企业，凡机构制度上必须作必要的改革者，均须事先请示。未经边区政府批准，不得擅自办理。

（九）所有公私企业劳资问题，均须经过总工会和市政府

劳动局审查处理，重要者经军管会解决。党的区委、支部和其他机关不得任意处理劳资问题。

(十) 所有公私立大、中、小学，除国民党党校、军校、特务训练班等必须封闭外，一律暂时维持现状，逐步改造。非经西北局或总前委批准，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擅自开办学校，招收学生。

(十一) 对一切守法的外侨与其住宅以及他们经营的医院、教堂、工商业等，必须负责保护，防止特务匪徒借机生事。非经军管会批准，任何机关、部队人员不得进入外侨住所，不得占用外侨房屋和学校、教堂。没有军管会命令，不得对外侨施行室内检查和人身检查。外侨有违法或破坏行为者，除现行犯非即加拘捕不可外，必须报告上级请示，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交事务，不论大小，均由军管会办理，各机关、部队无权擅处。

(十二) 保护清真寺，遵守回民宗教习惯。

(十三) 所有机关、部队人员，除经军管会或西北局或总前委批准者外，不得接见中外新闻记者，或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

(十四) 一切口号标语，必须经过西北局或总前委批准。

(十五) 所有机关、部队、团体人员，必须一律遵守城市公共规则，如交通规则、公共场所规则及卫生规则等，听从警备司令部和公安机关的指挥和规定，不许例外。进入戏院、电影院及公共娱乐场所，乘坐公共汽车、火车，须照章购票，不得强入或要求半价。

(十六) 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和入城人员，一律按照军

管会指定房舍居住，不得自由占用公共的和私人的房屋，不要占住工厂、医院、学校和教堂、清真寺。不要借用私人家具。入城部队不要借住民房，应当住在兵营、公共机关和祠堂、公所等公共场所中。一切人员必须确实爱护房舍家具，不许移走或损坏任何设备。

（十七）骡马大车不许走汽车路。严禁在树上拴牲口。

（十八）一切机关、部队人员，非经请假，不准自由出外。

（十九）行走市区，必须服装整齐，讲究礼貌。

（二十）未经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不准接受私人送礼和宴会，不许私设小公馆，私占小汽车。力戒铺张，反对腐化，保持艰苦朴素作风。

西北局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关于聚歼 胡马两军的政治动员令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西北战场上空前规模的聚歼胡马⁽¹⁾匪军的战役就要开始了，全野战军的大会师，胡马匪军正投入我预布的天罗地网，我们诱敌深入，聚歼敌人的各种条件均已安排好了。

在伟大胜利的前面，我们需要提出些什么问题呢？

一、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

西安解放胡匪南逃，我军当时是没有立即穷追的，为什么？固然当时西北部队需要短期休息，并待华北兵团⁽²⁾的全部到来，但最主要的，是我们统帅机关深知胡马匪帮，为了垂死挣扎，必将互相利用作狂妄的反扑，果如此，则敌人远离巢穴，我则以逸待劳，将造成西北空前聚歼敌人的良机，今天一切正如我们所意想的摆布，敌人诱来了，而且短短的期间内，马匪在乾县、咸阳、泾阳、淳化诸战斗中，已消耗了七八千人马，胡匪之三十六军也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其一六五师师长也俘来了，敌人残存的气焰逐渐被消磨了，而我军则人强马壮，准备周全，人民拥护，士气高昂，只待命令一发，即将以排山倒海之势聚歼敌人。同志们！这就是我们

采取诱敌深入的道理。

二、我们一定要胜利！

拿敌人来讲，号称拥有四十万匪军的胡宗南，经过两年多来歼灭性的打击，今天东凑西拉全部也不过十多万人了，而青、宁马匪凑合起来也不过七、八万，在全国国民党匪军整个覆灭的前面，他们已成强弩之末，而我部不仅原西北部队空前壮大，更重要的是华北强大兵团的到来，今天西北战场不仅质量上远胜敌人，而在数量装备上也大大超过了敌人；我占据了西北军事、政治、经济中心——西安，拥有铁路、公路、河流，特别是千百万群众热诚的拥护，而敌则损兵折将，弃城失地，人民痛恨，众叛亲离，正如丧家之犬，已走上日暮穷途。全军指战员同志们！聚歼敌人的良机到了，让我们团结一致，奋勇前进，彻底、干脆、全部消灭胡马匪军！

三、全军动员，争取胜利。

这一战役的完全胜利，就意味着西北匪军主力的被消灭，也就意味着全西北的解放即将迅速到来与西南人民提早解放，它所具的历史意义非常伟大。为此，全军必须以深刻的认识，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这一战役的完全胜利。

第一、不要骄，不要躁，临死的敌人是必然顽强挣扎的，任何轻敌思想，疏忽松懈均须坚决反对，为此，全军指战员、工作人员都要按自己的职责，进行充分的准备，而在战斗中、工作中则坚决完成自己的任务。

第二、当对敌人进攻时，必须发扬高度的英勇机智的战斗作风，大胆分割包围与聚歼敌人，实行互助立功与集体的英雄主义。

第三、当担任守备任务时，则发扬果敢、顽强的战斗作风，以一当十，坚守自己的岗位，达到消耗、钳制、吸引敌人，配合主攻方向聚歼敌人的目的。

第四、当敌人退却逃跑，我军发起追击时，则须忍耐一切疲劳艰苦，跟踪追击，使敌人得不着片刻喘息直至歼灭为止。

第五、我们要贯彻诱敌深入，聚歼敌人的方针，必须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没有广大人民的热诚支持，彻底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为此，各部在整个战役中，应进行深入的居民工作（在西安还须特别注意进行回民工作），使广大群众了解我们诱敌深入的方针而积极动员起来，支援消灭胡马匪帮的战争，这一点，全军必须明确认识到。

全军指战员、工作人员同志们！西北空前的大规模的歼灭战就要开始了，全西北的解放，快将实现了，全军动员起来，奋勇前进，聚歼胡马匪军，我们一定要胜利。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1〕胡马，指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

〔2〕华北兵团，指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

张宗逊在第十八兵团 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对胡马匪作战几个问题：

一、目前概况：

西北战场敌人总数为三十五、六万人，分布在陕、甘、宁、青、新五省地区。计陕西胡^[1]匪十五、六万，另到川接新兵训练的三个军，约四万五千人。宁马^[2]五、六万，青马^[3]四万余，新疆、甘肃共约六万人。而我也接近四十万人，按总兵力来说敌我力量大体相等，但我集中敌分散，故敌我力量在战场上实际对比，我已形成相对的优势。

在敌进攻延安时，胡匪有精锐三十二万人。而我军则仅两万余人，故西北野战军当时只能对胡或对马，而不能对其同时作战。当时作战方针主要是对胡宗南，经过二年解放战争，胡匪迭遭我军歼灭或歼灭性打击，其残余部队现只有二十万左右。

二、胡匪作战特点：

(一) 一般情况：

1. 胡宗南作战指挥很冲动，无固定的方针计划。彭老

总^{〔4〕}说：“胡宗南是志大才疏”。确是如此，如此次退出西安，原计划于五月十五日撤退完毕，但又不退，等我军进攻才退，撤至宝鸡本应入川，但到宝鸡后又停止了。因受青马刺激，而又反击；但反击劲头亦不大，进不进，退不退，犹豫不决，这就是胡匪的指挥特点。因此他的部队得不到休息，训练。两年来，时而陇东，时而榆林。在陕北第一年的战争，与其说把他打垮，不如说是把他拖垮。如敌三十六师为较强之部队，原每旅九千余人，但拖至榆林每旅只剩二千余人。

2. 军队装备不错，且能吃苦，通常带一周之粮食，行军力较强，每到一地先构筑工事，然后进入宿营地。做工能力顽强，宿营时多露营山顶。

3. 部队团结在反动军队中是较好的。二年作战中，敌没有整连的向我投诚，如此次俘其一六五师师长，但其仍很顽固。

4. 胡之干部全为军校学生，作战经验不多，书本知识较卡。故胡匪长于防御，用防御补其干部经验不足，因防御可事先争取主动。同时由于常打败仗，以防御可弥补其低落的士气。

（二）作战特点：

1. 防御的特点，防御时火力组织较好，构筑工事较巧妙，多为低碉，不接近不易发现。

防御必有增援，不死守，以往在西北战场尚未发现单纯防御。防御必争取余裕时间构筑坚强工事，否则即不死守。但虽有坚强工事的据点，如增援困难时也不守。如被我包围，不能增援时，多突围。

2. 进攻的特点：敌攻击力不强，士气低落。过去敌炮火与西野比较是强的，但其炮火发射距离远（因其攻击力不强接近会丢掉），命中差，而且是面的射击，不是一点一点的摧毁。

进攻必采取绝对优势兵力，如进攻延安时三十二万人，全部出动，两年来只有一次敌攻是分散的，如瓦子街战役前后。

由于敌官兵间之矛盾及干部经验差，故进攻队形是相当密集的，增援被围部队的动作很迅速，但一接近战场即慢了，进至冲锋出发地即停止了，攻击遇我阻击时，即停止正面攻击向侧翼发展，所谓钻隙战术。由于历次失败，敌人未发现我主力的确实位置时，其前进行军很谨慎，搜索很周到，怕我伏击，每日行程不超过四十里。

（三）我们应注意事项：

1. 攻坚要有充分准备，即敌主动的临时配备的防御也应注意。敌到达宿营地二小时后，一般的可完成野战工事，切不可轻敌大意。

2. 遭遇战应猛打猛冲，争取先机之利。敌虽占领阵地，但因不是主动的，也就不能发挥其防御的特长，火力工事的配备漏洞很多，我只要稍为组织好火力，勇猛进攻定能奏效。

敌最近也学我们某些战术动作，如说我后方空虚，派独立部队到我侧后袭扰。最近南山边缘的活动就是例子，这样更便于我歼灭。我们只要侦察好敌人位置，有计划的充分准备乘夜奔袭，则代价必小，缴获必大。

3. 追击战，今后此种情况会更多，敌人退的特点是很快，根据过去西野⁽⁶⁵⁾追击敌人的特点有以下三个问题：

甲、追击意志必须坚定。常因部队疲劳而停止或因看不见敌人而动摇追击决心，实际上当你看不见敌人时往往也正是敌人在你跟前，一旦打响，即可歼灭。

乙、由进攻转为追击，敌我双方常易混乱，特别夜间更易发生误会，根据过去的经验，是边追边组织调整，由战斗队形变为行军队形，前后左右加强联络。

丙、追击战上下级易脱离指挥掌握。过去野司曾有过规定，不同建制部队应服从不同建制的上级指挥员指挥。如为同级，后面部队应服从前面部队指挥或当面协商，尤其重要的是自动的援助与配合。

三、青马作战特点：

（一）一般特点：

落后、顽强，部队中有阿訇编制，政治动员是“保卫宗教，保卫民族”，冲锋时，喊“天门开了”，认为死是光荣的，死后可成神。官兵间多用亲戚叔伯爷之称，形成封建团结，现在的口号是“民族生存”、“战败了回族即会灭种”，因此作战较顽强。它不看全国政治形势，没有远见，好像是自己力量可解决一切。

战术知识落后，不善运用队形、组织火力。完全依靠人冲，对外壕及围墙无法克服，但士气旺盛，善于野战攻击，当其未遭受歼灭性的打击前，一般不易缴枪。

步骑配合灵活，进攻时骑兵先接近，步兵随后，有时步兵在前面，骑兵在侧后，如正面地形狭小，即步兵在前，骑兵在后，以备扩张战果。退却时步兵先退，骑兵在侧后掩护。

（二）作战特点：

1. 骑兵主要是奔袭奇袭我薄弱之处。骑兵每日可行一百二、三十里，可乘马用刀冲锋，其马可在一般山地活动，其弱点是火力不强，受地形限制。

我们对骑兵应时刻注意，丝毫不应疏忽，养成任何时候都能战胜骑兵之心理与措置。随时作好工事，组织好火力就地开火。而尤其是沉着应战，切忌混乱。如去年四军一个团在不利的条件下执行掩护任务，敌骑兵紧随，我停敌停，我动敌来，由于该部沉着，采取周围式抗击与转移的方法，结果将敌击退，完成任务。

2. 敌进攻特点：无攻坚经验，尚凭袭击。进攻准备仓促，一发现我军就攻，故野战时要特别注意。

敌不会组织火力，对防御障碍不会克服。但冲锋顽强，特别是开始几次进攻队形密集，一连一营不断地冲。

我防御时注意加强侧后侦察警戒，防敌骑兵袭来，但不应派出太远，派出侦察要有运动工具，如脚踏车、骑兵。步兵要注意利用围墙壕沟，加强火力组织，注意纵深配备沉着应战。

3. 敌防御特点：经常组织反冲锋，增援亦较迅速。如合水战斗，敌一千余人防守，我两个师进攻，敌最后只剩一百八十二人，仍组织向我反扑。

4. 我在进攻时应注意：

甲、组织火力，集中于一点，行毁灭性的射击，消灭其有生力量。

乙、进攻队形应成纵深配备，防敌反扑与突围，加强侧后警戒，防敌增援与迂回。

5. 追击时应注意：如敌步骑联合作战，则以追步兵为主，打骑兵先打马群。青马如系有计划的撤退，我们追击应谨慎，不要混乱，防敌反扑，如确实敌被我打垮，应大胆迅速追击。

6. 部队一般注意：

甲、青马射击准确，故我应注意利用地形地物。

乙、冲锋善用刀，故在白刃战中应注意利用抵近射击及冲锋枪。

丙、防止敌假投降，当我未给以严重的打击前，敌喊缴枪不要相信，否则要吃亏。

丁、敌战术陈旧落后，最怕我用手榴弹及炸药，故我应多注意使用。

根据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 (2) 宁马，指宁夏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 (3) 青马，指青海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
- (4) 彭老总，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5) 西野，即西北野战军。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一野战军政治部 通 令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各兵团、军、师、团政治部
各 级 政 府

近来各地在战勤动员中，发现某部队与后方留守人员，有不按战勤制度规定，不经军政首长批准，擅向各地政府动员人力畜力，影响战勤工作之统一计划，并浪费民力，妨碍生产。某些地方政府，亦发生对于战勤动员表现迟缓、推诿、影响战争需要之及时供应。为改进此种情况，并进一步加强支前工作，特统一决定战勤动员制度如下：

一、凡随军常备担架运输，及完成一个战役之临时担架运输，按规定统由野战军提出计划，由边府统一动员之，部队不得白行动员。

二、在紧急情况下，原动员常备及临时担架运输不敷应用时，部队得以作战单位，根据作战地区群众战勤负担能力和战争需要，依下列规定，协同当地政府，就地动员之。

甲、团为单位，动员不得超过担架十副，大车五辆，由团政治处通知当地区乡政府协同动员之。团以下不得动员。

乙、师为单位，动员不得超过担架三十副，大车十五辆，由师政治部通知当地县政府协同动员之。师以下即不再动员。

丙、如以军为单位，动员不超过担架一百副，大车五十辆，由军政治部通知专署或县政府动员之。军以下不得再行动员。

丁、如以兵团为作战单位，动员不超过担架三百副，大车二百五十辆，由兵团政治部通知当地专署（如专署距离较远，可通知临近地区县政府）动员之。兵团以下不得再行动员。

戊、野战军后勤部在作战地区转运伤员及弹药、物资，需要动员担架运输时，得按实际需要，提出动员计划，经野政通知所在地行署或专署动员。

所有临时紧急动员之人畜、车辆数量，动员地区及使用时间，皆得各按系统，逐级呈报野政及边府备查，各部队政治部，各级政府，并应经常检查此项工作之进行情形。

三、野战军在尚未建立政权之新解放区作战，需要动员担架运输时，得由野政根据部队使用担架运输之数量，划分地区，统一动员之。事后报告边府备查。

四、后方弹药转运，除部队自己携带者外，统由联勤运输部负责，粮食转运，由边府粮食局负责；皆须事先提出运输计划及需用动员人畜、车辆数日，经由边府审核后，统一动员之。后方医院之伤员及医药物品之转运，得按实际需要，提请边府动员之。一般临时动员，如拉柴炭，短距离转运，洗补衣服等，得商由当地县政府动员之。

五、除上述规定外，任何部队机关，皆不得随便动员民、

畜力。如有不按规定，强行动员者，政府及人民皆有权拒绝，并得分别报告各该上级，予以纪律惩处。

以上各项，希即传达讨论，并切实遵照执行为要！
此令。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林伯渠
代主席	刘景范
副主席	杨明轩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
副主任	张德生

根据档案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陕
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十三集刊印

对西北军区地方部队 建军计划的意见^{〔1〕}

贺 龙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在今天这个会议上，我先谈一点个人意见，然后整理出一个材料，发给大家补充修改，再提交下一次会议讨论决定。我今天主要讲两个问题。

一、关于军区机关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仲勋^{〔2〕}同志提出，军区机关首先要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意见很好。我认为，检讨军区机关过去的工作，主要有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不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彭老总曾讲过：没有督促检查总结，就是没有群众观点。我们军区机关各部门，在过去黑天白日忙，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工作方法，就是没有及时地、系统地把它总结起来。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西北军区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如军队建设、发展生产、屯兵开荒、整风审干、新式整军、拥政爱民、贸易政策、金融政策、供给政策以及处理大公小公等方面，都是按照中央的路线方针做的。这不仅

改变了历史形成的“当兵吃粮”的制度，而且除了自给自足外，还向上面交公粮。一九四七年投资农业生产达九十万现洋。

在军队建设上，我们坚决贯彻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发展的方针。因此，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小的游击队，升级为地方兵团，再由地方军，升级为野战军，有了一套完整的做法。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根据中央指示，我们晋绥向东北输送了一万多人，西北局去了两个书记^[3]，军区政治部、卫生部差不多走光了，晋绥几条川的骡马也拉走了，兵站一直设到阳高，还让谭政同志^[4]带去了一大笔经费。对这些，我们只做不讲，始终没有进行很好的总结，写出一个有价值的材料来。军区司令部在部队组建、作战训练和保障前方野战军作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都没有进行系统检讨和总结经验教训。不是没有总结报告，就是报告中没有具体数字，这样使领导对一些单位有成绩的没有根据表彰鼓励，有缺点的无法批评，有错误的不能及时进行纠正。政治部也作了许多工作，如召开了政工会议，对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地方军起了很好作用，但也没有很好总结经验。后勤部在保障部队日常的被服、粮秣供应、战时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的保障上，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从一九四七年至今，我始终没有看到一份这方面的总结报告。卫生部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医药用于保障西北野战军的作战，为抢救伤病员，日以继夜的工作，也未见到反映这方面的情况。

总之，我们过去做了大量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对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有比较完整的一套，如现在西北野战军的新

式整军运动，就是过去河东的那一套作法。我军每打一仗，对俘虏兵先进行教育，再补充到自己的部队，五六天就能拿枪同敌人打仗，在运城、灵石、临汾等战役中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这个经验，在全国各战场都在应用。所以，今后军区司、政、后、卫各部门每做完一件工作，部队每打完一仗，就要及时进行总结。只有及时总结工作和战斗中的经验教训，才能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和错误，使自己提高一步。

第二、工作中缺乏组织计划性。军区机关各部门有科长、参谋、干事，工作要有分工，要把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既是个组织工作问题，也是个工作作风问题。工作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在力量分配上，就会出现忙闲不均，有的人忙死，有的人没事做。在工作上，就会出现脱离实际。有计划没有检查，有检查没有总结，许多事情就做不好。比如今天这个会议，就是缺乏组织计划性的证明，开会之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司令部和政治部对建军计划也没有共同研究，拟定出一个全面的规划供开会时讨论，这种没有经过组织准备的会议，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希望要从中吸取教训。今后对任何工作，都必须加强组织计划性。

第三、有计划的培养干部做得不够。我们的党和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是干部问题。现在要打倒蒋介石，改变社会制度，也是干部问题。苏联从第三个五年计划，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恢复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很注意干部的培养。所以，我们今后取得政权，转入经济建设，仍然也是干部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我们计划的培养干部虽然也做过一些工作，军校前后毕业

了两千多人，但从总的方面来看，与战争形势发展需要相比，还是做得很不够的。其他解放区培养了两三万干部，我们才两千多，实在太少了。如果我们从日本投降开始，就注意有计划的培养干部，那么这几年就会培养出很多干部来，就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到处喊干部不够的现象。

现在各个区域都说我们这里干部老，老干部多。说干部老是正确的，而要说干部多，只是表面现象，实际只是一层皮，揭去了就没有了，因为下面接不上来。我们过去在土改和其他运动中，对培养干部做得很不够。为了提拔新干部，培养新知识分子，甚至还斗争了一些同志。把知识分子派到连队当指导员，几天就被送回来了，说他们只能做文化工作。但工震同志注意培养干部，他搞了两千多名知识分子，悄悄地对我说：“他犯了个小纪律。”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也未能有计划地把地方干部向部队调，再把地方下级干部和新知识分子补充上来。因为当时晋察冀正在搞精简退役，有的军分区把电话员都减掉了，司令员自己守电话。所以，我们认为，大家在精简，我们搞补充，就会发生矛盾，于是就没有搞。党的“七大”召开以后，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特别像东北、华北条件好，搞游击队、地方兵团，部队很快扩大了好多。而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条件，地区小，人口少，粮食有限，地方上总共不到十万名党员，所以也无法一下子培养出大批干部来。

现在我们办了两个党校：文党校由西北局领导，主要培养党政干部，同时培养一部分军事干部。武党校是军政干部学校，主要是培养军事干部。同时，机关各部门也要注意有

计划地在工作中培养干部，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机关中培养一个参谋人员是不容易的。武参谋和文参谋都要有战略战术思想，懂得技术，会作操场动作，作战参谋还要能打仗。一九三七年，我在庄里镇同关政委^[5]商量之后，曾招了一批学生进来培养，有的当小参谋，有的分配到“战斗剧社”、《战斗报》，后勤部也办了会计训练班。因为当时供给制度比较严格，接着机关精简，在执行中变了样，把好多干部精简掉了，留在部队的多数成了骨干。抗日战争中，对吸收知识分子做得不够。我在检查晋南工委工作时曾提议炮校、艺专要招生，但搞了几次没搞起来，后来贺彪^[6]招了一千多人。一九三九年，我们在冀中把张荫梧^[7]那个训练班接了过来，分配到各部门，现在成了一批高干。但总的来说，我们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干部工作做得不够好，所以现在到处叫喊缺少干部。

二、关于今年下半年的建军方针和计划

第一、加强干部的培养。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对干部的培养应区别对待，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情况：

第一类，从机关中抽调一部分年青、有发展前途的副科长、参谋、干事和老通信员、老警卫员进行短期训练。学习内容：一是军事，包括组织训练和使用部队，利用地形地物和战术技术；二是政治，包括党政工作、党的方针政策，如供给、金融、贸易等政策，法令、军纪、党纪、群众观点等。

第二类，对优秀的地方党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训练。学习内容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主要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第一批先培训千把人，以后继续补充。

第三类，对地方游击队和民兵，按老、中、青成员不同情况，分别进行训练。学习内容，也是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

上述三类人员的情况不同，训练的要求不同，通过培训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也不同。从思想上说，对机关人员，要求克服平均主义、自由散漫现象。对地方军和民兵，要求克服游击习气。对学生、农民，要求克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意识。这三类人员都是我们的骨干。

第四类，对在乡军人进行训练。有多少就训练多少，训练后能用多少就是多少。西北军在历史上与我们有联系，有的到我们这边来了。

对干部的培养由政治部进行安排，先交军大培训，之后再由政治部审查分配。对一批年大体弱的干部，去野战军干不了的要妥善安置。对技术干部、后勤干部也要进行训练。同时，还要招收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加以培养。

第二、搞好地方军的建设。建设地方军的方针是：稳扎稳打，逐步发展。先打下基础，再逐步发展，发展一定要慎重。首先要解决组织问题，建设好党团组织。党是领导核心，有了党的工作，就有了基础，部队的建设，组织纪律和其他工作才能搞好。比如，这次地方大华纱厂的复工、宝鸡工厂的复工，都是因为有党组织的领导才搞好的。今年，全军区要发展地方部队三个师九个团，配备好营、团、师的全套干部。为此，军区政治部对建设地方军要有一个通盘的计划。明确规定各分区的发展任务，如何发展，学员从什么地方来，怎样培训，训练的内容等。这个计划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再训

令各分区执行。

发展地方部队，首先要发动群众，吸收积极分子参军，由各分区办教导队进行培训，要反对招兵买马式的扩兵方法。

建设地方军需要武器，各分区对现有的枪支和其他武器装备，要进行认真的清理和统计，包括有多少在民间，把数量和品种搞清楚，并订出装备计划，使班、排、连装备的武器尽可能统一。

第三、分区对敌伪武装的处理。军区政治部要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对土匪、保安队、乡保和地主武装等敌伪人员如何处理，哪些是要消灭和瓦解的，哪些是应该争取和改造的，要制订出一个具体的规定，发到各分区贯彻执行，使下面有个遵循的依据。现在，虽然也有些规定，但是不够明确、具体，下面执行时比较困难。

第四、甘宁青问题。除调回民支队去青海外，现有的回民团、三边的回汉支队，加上另外四个大团，就可以解决宁夏问题。甘肃问题，交野战军负责解决。

第五、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我们各部门的工作，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所以必须彼此通气，加强协调。比如，我们的军事工作，都有政策的内容，都要有政治工作来保证，因此，司令部和政治部必须保持密切联系。司令部组织部队训练，执行作战任务，就要有后勤部的物资保障。打仗会有伤亡和病号，就要有卫生部门保障。所以司、政、后、卫各部门要加强联系，必要时，司令部、政治部可以请后勤、卫生部首长来汇报研究工作。

各级领导对工作要抓住中心。不仅搞好日常工作，还要

深入部队，深入基层，亲自下去看看，在上面光看报告是不行的。

各部门要加强请示报告，部门领导外出要请假。比如前方部队对后勤工作有意见，后勤部就召集下面后勤部长来开会，事先也不请示，开会后作出什么决定也不汇报，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召开会议应作好准备。要预先把会议内容通知大家，把文件准备好，或提前发给大家征求意见，然后再开会讨论，这样参加会议的人员就能根据会议的内容和要求，准备好自己的意见，会议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过去大家整天讲要学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实际并没有真正学到。彭老总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学会的。当时，他对毛主席说要开个会。毛主席问他开会的内容，要解决什么问题？并向彭总要材料。彭总说没有材料。毛主席就让彭总写一个材料送给他修改后才正式开会。可见，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就是每做一件事，预先要有计划、有准备。像我们今天开会研究的这个建军计划，事先应准备好材料，发给大家征求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再拿到会上来讨论，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方案，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毛主席领导书记处，要把每个人的意见都集中起来，这样就能使大家对工作做到明确、合拍。这种民主集中制的方法不是为了争你大我小，你的威信高，我的威信低的问题，而是要看谁对问题解决得正确不正确。毛主席说过，一百个问题解决的都正确，人家都会信任你，如果有一个问题解决的不正确，就应当作自我批评。这次李卓然^[8]同志在去东北以前，毛主席找他谈了四个钟头，讲了两个内容：“要靠自己的

进步，靠司令员老资格都不行。”我们西北军区是个兄弟班子，要进行集体领导，互相学习，不能说我是司令员就比大家高明，谁的意见正确，就按谁的意见办，不对就推翻，这是个民主集中制问题。今天我们开这个会，事先没有给人家通气，这种工作方法，今后应改变。

现在这个建军计划要重搞，计划中要明确规定老区、新区各发展多少人。对晋绥地区可先和李井泉同志^{〔9〕}商量一下，我看不是发展，而是要结束的问题。宁夏、甘肃、青海怎么搞，搞多少部队？请大家研究。这个计划由王维舟和马明方^{〔10〕}同志抽时间抓一下，作为对外向民主人士谈话的内容。具体做法可以分头搞，司令部由张参谋长^{〔11〕}组织座谈，政治部由杨尚高、谭生彬^{〔12〕}同志负责；后勤部由陈、周部长^{〔13〕}负责。去年，毛主席就对我说搞一个材料，任弼时同志对材料要求也很迫切，我们把材料整理好后，就上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贺龙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 〔1〕这是贺龙在西北军区党委会上的总结发言（要点）。
- 〔2〕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 〔3〕两个书记，指原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在日本投降后先后被调往东北。
- 〔4〕谭政，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日本投降后调往东北，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 〔5〕关政委，指关向应，原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政委。
- 〔6〕贺彪，当时任晋绥军区卫生部部长。

- 〔7〕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参及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指导员。
- 〔8〕李卓然，原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后调往东北工作。
- 〔9〕李井泉，当时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 〔10〕王维舟和马明方，当时分别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
- 〔11〕张参谋长，指西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
- 〔12〕杨尚高、谭生彬，当时分别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组织部部长。
- 〔13〕陈、周部长，指陈希云、周子植，当时分别任西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和副部长。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向甘肃 进军中对新区群众宣传工作指示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这次歼灭胡⁽¹⁾匪四个军的重大胜利后，我军即要进军甘肃，执行歼灭青、宁两马⁽²⁾匪军，扫荡西北国民党残余武装的任务。为了很好的完成这一战斗任务，争取新区广大回汉群众来支援战争。故我军所到之处，必须大力地展开群众宣传工作，广泛的宣扬全国革命的胜利形势和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解释我党的少数民族和现行的各项社会政策，特别是减租政策、负担政策、金融政策等。以揭破敌伪的一切欺骗宣传，打消群众的一切怀疑顾虑，安定群众情绪提高群众支援战争的积极性。这对于消灭马匪有着很大的作用。故对于新区群众宣传工作，兹提出如下各点，望予讨论执行：

一、我们要认识甘肃的广大乡村，地区辽阔，人烟稀少，村落分散，回汉杂居，这给予我们的宣传工作增加了困难，使我们的政策不易家喻户晓。故在这些地区中，应多采取个别的宣传方式。即：到一村，宣传一村，住一户，宣传一户，遇一人，宣传一人。召集大的集会，是比较困难的。尤应着重口头讲解，拉话访问。要求全军的每一个同志，都能宣传一

个群众，使其初步了解我党的政策。要求全军切实的执行住一院做一院的群众工作，即所谓“房院包工制”的群众工作制度。经常的检查连队中民宣组的宣传情形，求得把二中全会指出我们军队同时为“工作队”任务，确实的执行起来。

二、甘肃各地，是回汉杂居的地区，这些回回民族，因为受当时统治阶级的挑拨，曾经和汉人有过历史的流血斗争，所以目前回汉之间，尚存在着若干的民族隔阂。因而在这些地区中，汉族势众，则有汉人欺压回民的现象，反之，则回民来欺压汉人，形成了回汉民族互相以强欺弱的状态，而在我军中，则由于和回马匪军从内战到解放战争，都有过残酷的战斗，全体指战员对回马匪军普遍的存在着深刻的仇恨，在歼灭马匪的战斗中，发扬这种深恶痛绝的仇恨思想，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被压迫的广大回回人民，则应与汉族人民同样看待。对部队进行教育时，应该明确的把压迫人民的马匪军和被压迫的回回人民区别开来，不要把全体回民群众和少数回马匪军混淆起来，不要把马军中少数反动分子，和广大士兵混淆起来。我们宣传人员宣传时，应该尽量的揭露回马匪军对于回回人民的横征暴敛，抓丁抢粮的罪恶行为，启发回民的阶级觉悟，把回汉之间的民族界限，化为回汉被压迫阶级，对于回汉民族反动阶级的界限。团结回汉人民，共同起来帮助我军消灭青宁马匪。反对宣传时把回马匪军与回回人民不加区别，禁止讲话时对于回民的轻蔑语句（如叫“回子”等）。广泛的宣传我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主张民族平等，实行民族自治，信教自由。帮助回回人民解放，使回民群众知道共产党，同样是回回人民的救星，解放军是回回人

民的好朋友。现在我们对于回民地区的宣传工作，还没有经验，取得这些经验，对于今后开展西北广大地区的回民工作，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三、这一战役的行动地区，估计多为广大的分散农村环境，由于文化的落后，交通的不便，群众对于全国革命胜利形势，和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以及我党我军的现行政策（社会政策、负担政策、金融政策、工商农牧业政策等），都不了解。因此我们在宣传时，除照顾民族问题宣传外，首先在这些地区，是要广泛的宣扬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说明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已打垮了国民党的军队，在西北的敌我力量对比上，我军亦已超过了西北的国民党所有匪军，我们完全有把握的在短时期内消灭西北的胡马匪军，解放全西北的主要城市和广大乡村。依此增强群众对于我军解放后的“长治久安”信心。其次，则应广泛的宣传我党我军的社会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应该讲解我军预借军粮军草的办法，把野政发布的“预借粮草暂行办法，”在全军中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使每一个人员，都能讲述这一预借办法，特别是随军的地方工作队，更应熟悉掌握借粮政策，不使宣传解释与实际征借发生脱节，第三，要广泛的宣传人民币的流通，说明人民币是全国解放区人民政权的法币，它有雄厚的国家资产作基础，它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城市以及全国各解放区都可以买到货物，它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北的广大解放区，都可以流通使用，它不同于国民党的“法币”和金元券，它的腿是很长的。对于白洋必须宣传，全国解放区，均已禁止

使用白洋，以扩大人民币的流通市场。要知道对于人民币的宣传推行，是我们经济战线上的瓦解敌人，我们要争取在新解放地区的这一战线上也打胜仗。

四、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行军宿营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要求全军都能够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使我们的宣传工作和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来影响群众。这样，才能使我军的宣传工作和行动不至脱节。才能使宣传工作收到实际效果。故要求各部队健全纪律值班员的工作制度，并经常检查其工作情况，真正作到不打、不骂、借物归还，损坏赔偿，不拿人民一针一线的群众纪律，特别要严格遵守回民风俗习惯，给新区的回汉人民以良好的印象。

五、上述各点，望各级党委，即予讨论布置，并报告野政。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 (2) 青宁两马，指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当时分别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和副长官。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关于 对西北回民及国民党军的宣传口号

(一九四九年七月)

对敌一般标语口号

- 一、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发路费回家。
- 二、当了胡马兵，死了没人埋，伤了没人抬。
- 三、优待俘虏，不论官兵。
- 四、欢迎胡马军弟兄们携械来归，参加人民解放军。
- 五、欢迎胡马军官兵们组织起义，率部来归，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 六、欢迎胡马军中的爱国分子，接受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
- 七、优待俘虏，不分回汉。

对西北回民及马匪军的口号

- 一、国民党政府是屠杀回民的刽子手！
- 二、国民党政府是压迫和污辱回民的罪魁！
- 三、蒋介石匪首是出卖祖国的大汉奸！

四、回汉人民团结起来，继续努力，肃清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

五、回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回汉人民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

六、被压迫的回族同胞团结起来，打倒出卖回民利益的公敌马步芳、马鸿逵！

七、中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八、解除回民痛苦，帮助回民解放，实行回民自治！

九、实行民族平等，回汉平等，信教自由！

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

十一、团结阿訇满拉及回民知识分子！

十二、保护回民工农商牧业！

十三、兴办回民教育，发扬回民文化！

十四、保护清真寺拱北及回民一切文化古迹！

十五、欢迎马部回民弟兄反正参加解放军！

十六、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不打、不杀、不侮辱、不搜腰包！

十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回族同胞的救星！

十八、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回族同胞的好朋友！

十九、人民解放军是回族同胞的好朋友！

二十、回民要解放，拥护共产党！

二十一、回民要翻身，帮助解放军！

二十二、回民要自治，消灭胡马匪！

二十三、回族解放万岁！

二十四、西北回、汉、蒙、藏各民族联合起来，打倒共

同敌人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

二十五、中国各民族大联合万岁！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综合册》刊印

关中新区的工作方向⁽¹⁾

习仲勋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由于我军英勇善战大量歼敌的结果，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将关中四十二县全部解放，这样广大城乡的接管工作，有的已经完成，有的尚在进行中。这种迅速解放大块大块地区的情况在西北还是空前的。为了支援数十万大军继续胜利前进，和更迅速、更健全地开展广大新区各项民主改革和建设的工作，要求我们在新解放地区的接管初期，把工作方向集中到消灭反动地方武装，安定秩序，恢复生产，支援前线这几项主要目标上面去。要做好这几件事，大概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是我们到达新区工作的第一步。

两个多月来，我们在关中地区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任务。第一，迅速和比较有秩序地、自上而下地接管了几十个城市和广大乡村，保护了铁路、邮电和工厂等国家财产，积极努力地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第二，消灭和收编了地方反动团队和土匪将近两万人枪，初步开展了肃特工作，使境内成股的反动武装已近绝迹，零散土匪和潜伏敌特更加孤立。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努力地建立人民地方武装。这样，就使整个

关中地区在新解放初期就保持了大体安定的社会秩序。第三，因此，就有可能筹借军粮一百三十万石，发动做军鞋五十万双，动员人车二万七千辆，担架四千余副、运输牲口数千头等，支援我野战军取得扶眉战役的胜利和迅速西进，造成解放整个西北的有利形势。这些成绩，是由于党在关中地区有长时期的工作和影响，当前大革命胜利形势下，广大群众革命热情的空前高涨，再加上全体干部党员的积极努力而得来的。各分区、各县工作的发展，都充分证明：我们一到新区，必须掌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步骤。第一步不是不适当地、过早地去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改革，这样做，就会脱离实际，增加自己困难。而是首先力求大块大块的地区迅速稳定下来，以安定人心，团结群众，支援战争。然后再去稳当地迈出第二步和第三步。这样做，于解放战争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有利。这就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主要经验。这个经验，对关中适用，对其他地方也会适用的。当然，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中，也还存在不少缺点，如：负担中的“抓大头”或平均摊派；收编反动地方武装未抓紧教育改造；有些地方存在坏人进入政权的现象，以及城市工作中未用最大力量去进行恢复与发展生产等。这些，都必须在今后工作中切实纠正。

经过这一时期的工作，我们对新区情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关中地区，除西安、宝鸡有些现代工业外，余均为商业性的消费城市，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十分微小。其次，关中农村土地不很集中，地主占农村户口不到百分之二，加上富农共占百分之六左右，共占土地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占农村户口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占土地百分之五十

至百分之六十。但广大农村还是在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势力的统治下，这些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严重地压迫着农民，把许多赋税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并经过种种方式去残酷地掠夺和剥削农民。再是日前战争尚在继续，西北各省全部解放，尚需一个时期，以及向西南进军，支援战争的任务，仍然是很繁重的。综合这三种情况：工业经济的微弱和商业性的消费城市，面对封建统治的农村，处于战争环境，这就是目前新区情况的基本特点，就是我们决定方针、政策和工作步骤所必须依据的出发点。从这种情况出发，我们在西北广大新区如何正确执行党中央二中全会决议，“把工作重心从乡村移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总方针呢？这就必须学习华中局实事求是的精神。华中局所提出的如下的工作步骤，即“第一步要把城乡接管好，特别要把城市接管好，同时以极大力量散布在必要地区，解决支援前线及城市必需的原料与供应问题。这一步结束之后，就立即将全党的工作重心在一定时间内先放在农村，肃清土匪特务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各种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革，同时兼顾城市。当封建的农村改变成民主的农村以后，发展城市的条件具备了，再将工作重心移向城市，用最大力量发展城市，同时兼顾农村。在各个时期，都绝不能放松城市工作，更不能放松对战争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援，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忽视，忽视了就要犯严重的错误”等等，在我们这里是全部适用的。关中地区，除宝鸡、彬县两分区解放稍迟外，大部地区，第一步接管城乡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就要转入第二步，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同时兼顾城市。完成这一阶段的工作，是要几年的时间，

实行中又须划分若干具体步骤。依据关中地区实际情况，我们决定从现在起明年夏收以前近十个月的时间内，首先有步骤地开展反霸、剿匪、肃特等反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打倒农村里的主要敌人，树立农民的优势力量。其他一切工作，均围绕在开展这一斗争的群众基础上去进行，以达到削弱农村封建势力的目的，为将来进行土改即彻底实行农村民主改革准备条件。这一时期的几项重要工作，分述如下：

（一）正确掌握政策，实行合理负担，用大力继续支援前线。战争越到最后，支援工作越加艰巨，以为战争推远了，支援任务就可减轻或放松的看法是不对的。我们要进一步组织和教育群众，建立各种合理制度与加强领导，以克服困难，做好支援前线的工作。征粮要坚决按《条例》办事，以前借粮中所发生的不合理现象必须在正式征粮中予以改正。战勤动员应由政府颁布条例遵照执行，力求公平合理，节省民力，尽可能地做到战争和生产两利。

（二）积极建立人民武装，继续肃清反动武装。大量收编敌伪反动武装的时期，在关中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中心工作是整训改造。像吃饭一样，吃了要消化，光吃不消化，会得胃病，现在已经发生肠胃病象征，要注意治疗。同时光靠改造旧部队还不够，必须在发动群众中建立党直接创造和领导起来的军队。地方部队要在加强剿匪中提高战斗力，首先要求成为战斗队，然后再逐渐训练成为工作队。剿匪是当务之急。剿匪要有重点地追剿股匪，普遍清剿散匪，收缴反动武装，两者结合进行。剿匪要讲究战术，不要打击溃战，而要打歼灭战。要严密侦查，充分准备，长途奔袭，包围聚歼，已

击溃者，要追歼搜捕，务求消灭干净。同时剿匪还必须军政结合，剿抚兼施，并与发动广大群众的反霸反匪反特的斗争结合起来。

（三）开展普遍的群众斗争，反对恶霸，反对土匪，反对特务。与特务、团队、土匪相结合的恶霸分子，仍然是农村的土皇帝，即地主阶级的当权派。而布置特务活动，繁殖土匪武装，进行反革命骚动，又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的一种重要阴谋。这样互相结合的恶霸、特务、土匪，就组成了农村中最主要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亦即农村人民的主要敌人，只有打倒这一恶势力，才能建立农村人民优势力量。反霸、反匪、反特斗争，可能而且必须组成农村中广泛的统一战线，依靠贫雇农，团结全体中农，争取和中立一切可能争取和中立的社会力量，有步骤、有秩序、有领导地开展这一斗争。必须分别具体对象，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应当把那些政治上坚决依附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和那些愿意向人民低头的分子区别开来，以及其他各种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待。关键在于，必须动员全体干部党员，深入到农村中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有重点地波浪式地开展斗争，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由点到面，面面生根。这是改变新区封建农村的第一个主要战斗，必须准备好，组织好，有把握地取得胜利。

（四）摧毁保甲，清理国民党人员，初步建立乡村人民政权，就是让农民当政。在关中地区利用旧保甲阶段，应很快结束。在发动群众反霸、反匪、反特斗争中，配合进行清理敌方人员，初步建政。这样做，不是要把目标搞乱，把打击

面放宽，而正是为了把那些在敌人统治时期，被强迫服役，或劣迹较小，愿向人民悔过自新的分子，经过群众适当处理，以安其心，而使少数怙恶不悛的罪大恶极分子更加孤立。如果硬把这一工作与反霸、反匪、反特斗争分开，就会使自己陷于被动，使反霸、反匪、反特斗争没有力量。农村敌方人员在清理后，一般令其回家生产，将农民群众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大批地选举到政权机关中来，并加强教育，使整个农村工作面貌焕然一新。县级政权，可先采取召开各界代表的形式，加强与群众的联系。

（五）组织农会，建党、建团。各县自上而下地组织农会筹备会，发动各地成立农会。乡村农会要先有重点地组织，逐步发展，然后按发展情况及农民群众觉悟程度召开乡、区、县各级农民代表会，并在农会中注意培养贫雇农领导骨干，以加强领导。青年妇女群众都要组织在农会里边。地下党和青年团的组织要进行整理，加强阶级教育。老区派去的干部要积极主动地与地方干部很好团结，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全心全意做好工作。各地都要把党、团的工作委员会建立起来，有计划地开展建党、建团工作。

（六）以上各项工作，都要在发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去完成。八九两月正值农忙，必须积极领导群众种冬麦，收棉花，完成夏征和必要的支前任务。十月后，转入以反霸、反匪、反特的群众运动为中心，配合进行建军、建政、建党及其他工作。依此精神，各地再根据当地情况制订自己的工作计划。

从现在起的一定时期内党的工作重心放到农村，但要同时兼顾城市工作。城市党委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在城

市工作中，必须清醒地掌握工作方向，在一定时期内努力做好下列工作：（1）继续团结全体职工，恢复与发展生产，并以此为一切工作的中心。（2）加强肃特、清匪工作，巩固革命秩序。（3）用大力解决失业问题，抓紧改造与适当安置原有公教人员，组织无业劳动人民参加各种生产或到农村垦荒。（4）发展交通，稳定金融，发展合作，鼓励城乡物资交流。（5）动员大批共产党员、青年学生、进步分子到农村去，加强农村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目前时期有力地配合农村完成民主改革和进行支前，并使城市生产事业得到恢复，还争取再有一些发展，逐渐治疗城市中旧有的懒惰臃肿的病态现象，为下一步全力发展城市，建设人民的生产新城市打好基础。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习仲勋文集》刊印

注释：

〔1〕这是习仲勋在关中新解放区中共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全歼残匪 解放西北边疆的政治动员令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

我军继扶眉大捷，给胡匪以致命的歼击后，空前强大的攻势即指向青宁两马匪军巢穴——甘肃前进，仅十一天的胜利进军中，即解放了县城十四座。北路我军沿西兰公路，已一鼓直下陇东军事政治经济重镇——平凉，并乘胜攻占固原，隆德，俘敌千余，迫使宁马匪军狼狈北逃；南路我军神速猛进，于陇县固关镇歼灭青马匪军骑十四旅大部后，即直捣陇南名城，川陕孔道——天水，长驱西进，迫使马匪继援^[1]，周匪嘉彬^[2]率青陇匪部向西逃窜。我军所到之处，匪军或则望风披靡，或则即遭包围歼灭，人民对我军夹道欢迎，热诚爱戴，而对匪军则怨声载道，愤恨极深。从此青宁两马匪帮，不论其为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或则落荒而逃，企图残喘一时，均即将被我全部干净歼灭，整个大西北的完全解放，已为期不远。

本野战军荣任歼灭全部西北残存匪军，解放整个西北边疆之任务，今天青宁两马^[3]匪军，正全线崩溃，我军决乘胜追击，直捣匪军巢穴——兰州，西宁，宁夏。在此伟大历史进

军的当前，特号召全党同志及全军指战员、战斗英雄、模范工作者、全军一致，勇往前进，为干净、全部消灭甘、青、宁三省匪军，解放整个大西北而奋斗，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一、匪军逃到哪里，我们必须追到哪里，不给敌人以片刻喘息机会，并即包围干净全部歼灭之。二、困难是无可避免的，但困难的性质及时间与过去有着基本的区别，是可以迅速而顺利克服的，全党全军应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命令，不讲价钱，不折不扣，充分表现其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忍受任何困难，歼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三、我军即将进到广大的回民区，与马匪军作战，全军应坚决执行回民政策与回民俘虏政策，对惨遭马步芳与马鸿逵蹂躏而灾难重重的回民群众应给予深刻的阶级同情，帮助其彻底解放。全军对城市政策，各种社会政策，群众纪律，必须认真执行，各级领导机关应严格检查，每十天或半月须向所属上级作报告，如有疏忽职责或破坏政策违犯纪律者，即应按情节轻重，给予应得之处分。

全体同志们！大家努力，打到兰州、西宁、宁夏去，解放大西北！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

八月五日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 马继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二军军长。
- 〔2〕 周嘉彬，当时任国民党军驻甘肃第一二〇军军长。
- 〔3〕 青宁两马，指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当时分别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和副长官。

王震在第一兵团党委会上的讲话大纲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于临洮城)

甲、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十七日行动的总结。七月二十四日奉命由宝鸡出发，在向青、甘匪军的二十五天进军中，表现了英勇艰苦顽强的战斗精神，获得了全歼青马骑十四旅的大胜利，冒红日暴雨，越过陕甘交界的崇山峻岭，露营淋雨，忍受了寒暑变化无常的袭击，我军奋勇追击前进，匪军闻风狼狈而逃，总计我俘敌三千四百八十八人，毙敌一千四百人，匪军起义投降者四千一百六十人，总计歼敌九千零四十人，解放城市十三座，甘肃匪军除被歼、投降、起义者，残余均溃不成军，正接洽起义投降中。我军行程平均约达一千三百里，军行所至，群众表示热烈欢迎与支援，这是我全体指战员在完成野战军首长所给予的任务中，证明了对于毛主席、朱总司令号召奋勇前进，消灭任何敢于抵抗的敌人，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战争事业，是高度忠诚的保持与发扬了人民解放军英勇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这千余里的长途远征中，我军战斗减员牺牲××人，负伤××人，非战斗减员逃跑、落伍者××人，因病离队者××人，这个数目是大的，如果我们军事、政治、后勤各项保证做的更好一些，则还可以减少。我们应该说胜利是大的，而代价是小的。

乙、打到马匪巢穴——兰州、西宁去全歼马匪反革命军队，捕捉战争罪犯马步芳，解放大西北，解放回、藏、蒙、维、哈等一切少数民族人民，运用马列主义，执行毛主席政策，建立新民主主义各民族和睦的大家庭。我野战军首长在为全歼青马匪军解放甘肃青海省城的正确部署是：我十九兵团为右兵团，第二兵团为中兵团，我中右两兵团正奋勇跟踪向企图退守兰州的青马匪军主力，执行包围攻歼。我第一军、二军、第六十二军为左兵团，西渡洮河攻取临夏（青宁马匪老巢），首先歼灭青马匪军新编军韩奇恭^[1]部之两个师，并准备消灭来援匪军，得手后渡黄河直捣青海省会西宁。配合我围攻兰州的二兵团全歼马步芳匪军。这是一个艰苦而光荣的任务。

丙、在攻夺兰州、西宁战役中的敌我力量对比，就主要的说有如下几点：（一）我军除对宁匪^[2]、胡^[3]匪拥有足够的钳制力量外，在攻歼兰州、西宁战役中我军优势于敌十倍以上。（二）人民解放军向全国最后胜利的目标大进军，打到“天涯海角”的口号鼓舞着群众的革命的英雄主义，我军所向无敌，而反革命的残余军队则是面临最后被消灭的命运，虽企图作垂死的挣扎，但其阵营业已烂败、混乱、恐慌、互相猜疑、向革命找出路，投城起义者不断增多，反革命匪首对于它的统治区域的人民，实行野蛮残暴的高压手段以及利用宗教迷信，欺骗宣传。这种麻醉剂，只能在它还有力量时起某种控制作用。（三）我们也有困难，深入敌人巢穴，准备敌人在作困兽犹斗时胁迫人民实行游击、埋伏、袭击、坚壁清野等。自然界的困难、霜雨、高原寒冷、人烟稀少、山地平道路少，有不能徒涉的河流，短时间不能与后方交通联络等

等。这是我们胜利前进中，须要认识与能够战胜的困难。

丁、我们打到马匪巢穴去的军事行动时期的几项政策：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宣传，证明给回教人民看，我们不是过去一切征西、平回的野蛮掠夺报复的战争，也不是二十年前回民亲身遭受过的国民党×××军队曾经实行的野蛮屠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要证明给回民看看人民解放军真正是回民的解放者与救星。（一）马步芳反革命军队的一切军需、物资、被服及其反动政府的银行仓库、粮食均属战利品，实行统一没收，分配供给军队。马步芳、马鸿逵两个头等战犯的家产，为我军必须供应者，由兵团党委决策处理，其他不许有捣毁与破坏的举动。马匪军及其他各级官长及反动政府官员的私人财产一概禁止没收。（二）清真寺、拱北，禁止住兵，禁止进去游玩参观。在进入回汉杂居的地方，禁止杀猪吃。严格尊重其宗教习惯，不许鄙视信教的人民群众。（三）对回民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在与我作对时，尽可能先礼后兵，用和平方式，诚恳亲切，劝告投诚解散回家。人民解放军在迫不得已时，不许杀伤群众性的武装人民。（四）对于正规的地方保安团的俘虏，大部给以宣传立即释放。凡一切不持枪抵抗的伪政警人员，均不加俘虏。凡正规军及保安部队的排连长由师长政委主任亲自招待宣传释放，营级军官由军的首长招待宣传释放。团以上官长送兵团处理，原则迅速释放。打开西宁后，当可集中训练。（五）尽可能广泛宣传，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打倒人民公敌战争罪犯马步芳、马鸿逵，这是青、甘人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公事，信奉宗教，这是人民的私事，各有自

由，人民解放军概予尊重。(六)我军在与敌作遭遇战与运动战时，应力求先机之利，给敌以突然、迅速、猛烈的火力与英勇顽强的突袭相配合来歼灭敌人。在凡能包围而情况许可条件下，便应尽可能先礼后兵，劝其投诚。(七)小结论：由于回汉民族隔阂与仇视和宗教麻醉的成见，由于回族的反动统治者的野蛮残暴，封建压迫剥削的深重，与回族的封建军阀专制魔王马步芳、马鸿逵等的封建割据，蒋介石国民党匪帮近二十年来没有来得及直接侵略回族等等原因，根据上述三个原因，在我军胜利铁军声威下，实行政治分化，瓦解匪军。根据青海的具体情况，领导组织回族人民，反封建的广泛统一战线，争取分化旧统治中的一部分，争取广大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团结与动员其全体劳动人民起来参加打倒为回教人民自己深切痛恨的回奸马步芳、马鸿逵等，提高回教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有步骤有准备的领导群众进入阶级斗争，我们遇到少数民族的实际问题时，来学习马列主义、斯大林和毛泽东民族政策的思想武器，来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克服各少数民族间的成见。我们不要提前反对其麻醉人民的鸦片烟——宗教迷信。人民宗教迷信，有待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提高后使之自然衰亡。一切少数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彻底解放，解放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一部分。

戊、由临洮出发，打到西宁，计有七百余里路，争取从八月二十五日起到九月四日，准备迎接大规模的激烈的痛歼马匪战斗胜利，完成占领西宁的任务。同志们！我们在军、师

宣传部（科）长的会议上，听了讲述部队指战员同志们许多令人奋兴的生动例子，敌人逃到哪里，就追歼在哪里，这种英雄主义的胆量，忍苦耐劳的模范与宣传教育群众的具体办法等相结合的工作作风。如一军在行军中组织向人民群众的访苦、评苦运动，使战士们听说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下所受的残酷压迫，与严重的人为灾情，刺激了战士们的阶级同情心，人民群众对解放军歌颂感谢，激发了战士们的高度斗志。第四团有几次准备打敌人没打上，在会川^{〔4〕}县前进时，以八个钟头行军一百二十里，一小时内，攻破会川县，全歼敌人一个旅部一个整团，俘敌旅长以下一千五百余人。在部队占统一思想的，不是因为没打到仗受了辛苦，不愿走了要休息，而是要追上敌人，消灭敌人，不怕到天涯海角，不怕深入敌人老巢的胆量，这是一种兴奋的力量，推动前进的力量，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无敌的。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 韩奇恭，指韩起功，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骑兵军中将军长，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只身在张掖向解放军投降。
- 〔2〕 宁匪，指宁夏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
- 〔3〕 胡，指胡宗南。
- 〔4〕 会川，旧县名，一九五八年并入渭源县。

贺龙在西北军区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目前形势

国际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还有个暂时的稳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打败了德、日、意三个帝国主义国家，英法帝国主义大大削弱了，美帝国主义也是外强中干，今天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面临重重的困难，而世界人民的力量空前的增长，人民民主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

苏联坚持世界和平的政策，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拥护，帝国主义估计苏联战后不能以自己的力量恢复经济建设，而必须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实际上相反，苏联不要任何帝国主义的援助，五年计划很快完成了，恢复了战争毁坏的一切工厂，并重新建筑了五千座大工厂，军备上已非常强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只有一个苏联，而且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出现了好几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现在全世界上一共有二十万万人口，苏联有二万万五千万人，中国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加上东欧、蒙古、朝鲜各人民民主国家，总共将近八万万左右，占全世界二分之

一弱，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大大不同了。据去年的统计，全世界一共有三千万共产党员，各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目标和行动都是一致的，这个力量相当强大。美、英内部的民主势力也发展了，各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正在发展。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没有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援助，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大大加强了世界民主阵营的力量。现在我们的国家东与朝鲜接壤，西北、东北、北部与苏联毗邻，国际形势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国内的形势也很好，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和官僚买办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蒋介石的五百多万军队，基本上被我们消灭了，只剩下最后一点残余了，也将很快被消灭。

国际国内形势都对我们有利，但我们却不能认为一切太平无事了，可以高枕无忧整天睡起觉来。拿枪的敌人消灭了，不拿枪的敌人还多得很，把背枪的敌人打倒了，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要把不背枪的暗藏敌人、封建残余全部消灭，还要相当长的时间。由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还存在着，国内各党派还要长期存在，所以今后这一段路，更比以前的路复杂、艰苦。要走这一段很长的艰苦复杂的道路，就要提高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阶级觉悟、政治水平，而且要把党的政策策略在各方面运用的很好，如果有一点做不好，便会犯“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错误。

我们还要建设军队，要建设一支强有力的空军和海军，陆军也要机械化，干部都要重新训练培养，要有科学知识和文

化理论水平。我们各分区所领导的——游击队、保安队、地方兵团还是最低级的陆军，我们必须向正规化的目标迈进。

二、建设地方军的任务

我们地方军的任务：第一是消灭封建；第二是升级为正规军。地方军是土地革命的武装，保卫国防，消灭帝国主义，保护人民的利益。要建设这样的武装不是容易的事情，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政治质量：工人、贫农、中农、革命的知识分子，才有资格参加这个武装，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真正完成土改，才能保护人民的利益，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土改时，有个别地主、富农出身的战士、干部，拿上枪保护自己家庭的利益，甚至发生流血事件，因此，我们的枪拿在谁的手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一支好的人民武装，土改后农民的利益也是保不住的。所以，我们对于干部的成分、质量要很好注意，否则就会出乱子。

2. 领导骨干：建立地方军，首先要有骨干。工人、农民出身经过战争、土改考验的干部，虽然不太会讲话，认字少，但总是跟党一条心，有错误一批评就会改正。学生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训练，不断在斗争中考验。成分好，有领导骨干，这两条是组织地方军的基本条件。

3. 党团组织应成为领导中心与团结核心。连队里要建立党团组织，有了党团组织就有了堡垒，由党团员对群众进行教育，这样连队就巩固了。没有党的组织，这个连队还是不巩固。支部要成为连队的领导与团结核心，要给支部书记、支委、党员一些特殊教育，如开办短期训练班，给他们讲政策、

策略，进行各种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政治水平。在行政上，连长、指导员是上级；在党内，指导员、连长要受党支部书记领导。连长、指导员当不了支书，就应该检讨自己：党员为什么不选我？一定我有缺点毛病。连长、指导员要向支书作工作汇报。连队里的问题要经过支部讨论，连长、指导员事先要把问题谈清楚，拿出材料供支书研究，看怎样处理，再召集支部会议，这样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很好。支部是民主的，人家讨论就是民主，民主以后进行集中，由支书作结论，某一个问题交给连长或指导员去办，支部动员党员群众执行这个决议。这样做，连队工作一定能做好。机关支部也是一样。但今天支部就不一定能管得了我们的干部，在场的司令员、政委，你们可以检讨一下：过支部组织生活没有？你们去参加会，不但会开不好，反而会妨碍会议进行，这我们就应该考虑，为什么我去了，支部会议开不好，一定是我们这些大党员、首长党员没有民主作风，起码民主作风不够、摆了架子，这都是我们很好的检讨，这是政治民主。

还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我们的干部一般的政治水平不高，军事技术、战术水平也不高，所以军事民主非常需要。每进行一次战斗，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大家民主讨论，看仗怎样打，讨论后就定下决心，下命令坚决执行。经济民主就是要经济公开，连队建立伙食委员会，一切帐目、一切开支要公开（党内特别费不公开），让大家讨论，哪一笔需开支，哪一笔不需开支。部队的文化和政治水平提高了，民主精神建立的差不多了，就应该实行评干、评功。党的工作做的差不多了，就评党。这样一步步的扎扎实实的去做，就不会发

生偏向。

4. 政治工作：今天我们的政治工作，有点一般化。连队工作与机关、工厂、医院等部门的工作都要有区别：如医务部门，主要教育全体工作人员为伤病员服务，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政治觉悟提高后，技术水平也会不断提高。供给运输交通部门，主要教育他们不贪污腐化，要树立为士兵服务的思想，按期供给运输。

政治工作还要掌握一定的时机，要无孔不入，不停留一分，停一分就会落后。所以各机关要建立工作制度，派干部下去检查工作，调查研究，发现新的事物，及时推广出去。这样政治工作就会做的活泼、生动、深入。我们的文工团要深入到工人和士兵中去实际锻炼，体验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只有与士兵、工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才能演出好戏来。

我们的领导机关也同样必须和下面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如果上下间有了感情，使下面同志感到亲切，就敢讲话，有几分讲几分。宣传工作要靠大家，每个共产党员都是宣传者与组织者，要时时刻刻向群众进行宣传。我们党的活动就要靠党员起模范作用，党的政策也靠每个学员来带头贯彻执行。政治工作单靠几个政治干部是做不好的，必须全党动员起来才能做好。

5. 军事教育工作：司令部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和管理教育部队，建立部队的各种制度。所谓组织部队，就是把部队按团、营、连组织起来，把司令部本身一、二、三科组织起来，把工作制度，如请假、会客、报告制度建立起来。司令部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要联合办公，因他们的工作有密切联

系。政治部要经常了解下面的工作，制定工作计划，保障行政任务的完成，司令员要下命令执行。

要建立民兵和自卫队，这是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把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必须加以组织，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组织起来之后，必须武装他们。这样的武装，由村支部领导，它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自己的家乡。如果能把这一个武装建立起来，各个分区打上匪、侦察敌情就有基础了。再把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工作都做好了。也为扩大地方部队创造了条件。

6. 领导问题：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领导上对工作不要事无巨细的乱抓，乱抓不仅会把上边忙坏了，而且会使下边没有工作做，结果工作反而作不好。对工作一定要检查督促和总结，经常向上级请示报告。检查工作一定要派强有力的能发现问题的干部去，不要随便派一个什么问题也不懂、还装钦差大臣的人去。司令部、政治部除练兵剿匪外，要好好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群众发动不起来，一切工作都很难做。

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反马列主义的，只凭经验办事，不能很好的去研究上边的指示，比如这次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西北局发了电报，叫各分区准备材料，然而他们并没有很好的研究电报精神，也没有召集地委委员及县长开会研究，到西北局后才准备发言提纲，以自己的意见代表地委。这次司令员会议也是这样的情形，下次要注意这些问题。各级领导对上级决议一定要很好的三番五次的研究，确定哪些马上执行，哪些应该缓期执行，哪些需要提出修改意见；对下边的指示，同样也要三番五次的研究。下边来了请示报告，

一定要马上答复，正确的意见给以鼓励，有毛病、有缺点的给以纠正。对下级作的指示一定要经过慎重的研究，否则有了错误不能及时纠正，下级就会把错误的决定当成正确的指示来贯彻执行，结果错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上级一定要负责。

现在我们对下面很多请示没有答复，这是因为各部门的职责不明确，制度不健全。今后要实行分工负责制，对下面的请示报告，属于哪个部门的工作范围，就由该部门答复，这样既做好了本职工作，又避免了同级单位之间的矛盾，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完成。

三、军事政策

对反动武装一定要彻底改造，不能有丝毫的姑息迁就。如果对反动武装姑息，我们就要犯错误，甚至发生流血惨案。在渭南有几个区长、区委书记叫人家杀的杀了，部队也被拉走了，就是血的教训。对反动武装一定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彻底教育、改造；对群众所痛恨的人可以集训，成立训练班、训练队，甚至公开的调动他们的工作，有的可送到分区，有的还可送到军区来。为什么关中^①的反动武装向我们投诚起义呢？为什么去年黄龙的反动武装不投降、不起义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力量问题，二是形势问题。如果没有全国的形势和我们占领西安，反动武装是不会起义、投降的。他们投降、起义，有的是出于投机，有的是大势所迫。当然，反动武装里面兵痞、流氓、地富等坏家伙是少数，而最多的还是农民，所以要进行彻底改造。首先要发动争取士兵群众，把士兵发动起来，组织积极分子进行诉苦，向反动

军官和坏家伙进行说理斗争，开群众大会把他们的功过讲清楚，按照情形分别处理。在改造中，要有区别、有步骤的进行，首先，要看我们的工作做的怎么样，群众发动的怎么样。如果群众发动组织起来了，就可以着手做。还要掌握各种情况，是进步分子多，还是中间分子多，还是坏家伙多，一定要有群众的条件。要很好的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策略，并与实际相结合，这样反动武装才能改造。

对在乡军人⁽²⁾，各分区要作调查研究；对他们的出身状况，特别是对群众的恶迹搞清楚，我们再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要给他们出路，对有错误的要批评教育，使他们好好改正，改进一分，我们用一分，我们把他当在乡军人用，不是当我们的党员干部用。通过进行批评教育，逼着他前进，不多给他工作，给他一项做了再给，不是一下子给他许多工作，否则，他们就骄傲起来，气势汹汹感到了不起了。

把封建的农村变成民主的农村，要经过很多工作，各级政治部要做这一工作。各分区对难民、散兵游勇的工作也要注意。关中现在有几十万难民，要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对起义部队我们要作调查研究，掌握全部材料，掌握干部的思想动态，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力量，还怕什么！

部队和军事机关都要实行精简。司、政、供、卫都应按司令部规定的编制实行精简紧缩。地方部队的扩大重心，应放在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上面，有重点的组织这种武装，在地区较大的分区、县、交通要道和仓库可以多搞一点。

要注意节约。动员人力、物力要节约；办公开会的时间

也要节约；严格供给标准，不能铺张浪费。

各分区还要搞生产，但不准搞商业和金融投机，主要搞农业，可以种菜，但不准占群众的土地。同时有计划的搞手工业，如磨豆腐、养猪、织布、纺纱等……，改善生活。机关还可用公马组织运输。

同志们回去后要很好学习，至少每天要学习两个钟头，并且要指定看的书，指定人作报告，大家讨论。学习要有制度，因为只有学习搞得好的，工作才能搞好，学习搞不好，工作也不可能做好。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贺龙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1〕 关中，指陕西中部地区。

〔2〕 在乡军人，指农村的原国民党旧军人。

西北军区关于建军会议 给中央军委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

谨将关中六个分区五、六、七三个月工作总结与今后建军计划报告如下：

(一) 随着第一野战军的胜利进军，关中^①广大地区全部解放。在五六七三个月中，我们以少量的干部与有限的部队，开辟与建立了六个新分区（渭南、咸阳、宝鸡、彬县、三原大荔），消灭了敌伪地方反动武装，壮大了自己。各分区在此期间收编敌伪与掌握政策上一方面获得了很大成绩，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不少的倾向。为了很好的检讨与总结经验，并明确规定今后建军方针与任务起见，军区特于八月十一日集六个新分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并军区各部处负责同志，汇报检讨三个月来的新区工作，并研究讨论确定今后建军方针，于八月二十六日结束，历时十六日，一般问题均获得了比较完满的解决。

(二) 五、六、七三个月来对六个分区工作的基本估计：
甲、进入关中新区前的准备工作：

由于第一野战军的胜利进军，大关中四十二县（除凤县

未解放外)迅速全部解放。在进入新区前后,五月中旬西北局曾根据关中具体情况对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发布了指示,指出进入新区后的首要任务是肃清反动武装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并要在全部工作过程中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肃清反动武装,建立人民武装,并指示对敌伪武装应采取政治争取改造与军事打击并进,而以政治争取改造为主的方针,以达到彻底消灭敌伪反动武装的目的。军区在三月份也发布了关于关中新区处理投诚起义敌伪反动武装的办法,主要的指出对投诚与起义应如何分别对待,并抓紧在政治上积极的改造,军事上整编的方针。西北局还发布入城纪律守则,在去新区工作人员中进行了教育与动员。

在组织上,我们在各分区与军干校调配了渭南、咸阳、宝鸡、彬县四个分区的干部与部队,并在供给上、经费上、器材上,亦作了必要的配备。但准备尚不充分,还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乙、成绩:

由于全国胜利形势的发展,我第一野战军获得了十八、十九兵团的增援,向胡马⁽²⁾匪军开展了巨大攻势,继打退了胡马匪军向西安的反扑后,扶眉一役一举歼胡匪四个军。随着胡匪主力的垮台,伪匪地方反动武装亦即土崩瓦解。我各分区在此情况下带少数武装进入新区与敌伪反动武装进行斗争,三个月以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1、配合主力作战,基本上消灭了敌伪反动武装,在我主力西进之际,我地方武装积极的对残余伪匪作战,很快的解放了渭南、华阴、华县、潼关、临潼等县,迎接了十八、十

九兵团过河，配合主力南山作战，并在击退胡马匪反扑西安的战争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正确的执行了政策，在消灭敌伪反动武装上收到了很大成绩。关中区原有敌伪反动武装四万七千余人，枪支四万二千五百支，被我地方武装消灭与投诚起义过来者一万五千余人，枪一万九千八百支，被野战军消灭一万六千人，枪一万五千八百支，合计共消灭三万一千四百人，收枪三万五千六百支，还剩下一万多人枪，除一部跟胡匪逃跑，一部还在山上外，现分散在我内地区或边沿区者还有四十六股，六千人，五千支枪。

我们消灭敌伪的方式主要是从政治上争取与瓦解，如地方军在消灭敌人一万五千人中用战斗方式解决者仅二千八百五十三人，用政治争取瓦解的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我们所以采取这种方针，是由于胡匪十余年残酷统治造成群众对于我党我军的拥护与慑于我军声威及匪伪内部矛盾所决定的。

2、壮大了自己，六个分区部队，开始进入新区不过是九千六百八十八人，到八月上旬止，收编改造敌伪武装与剿匪中发动群众中个别吸收农民参军已扩大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七人，现六个分区共有二万四千六百二十人，扩大数占现有数的百分之六十，原来的与新扩大的相比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对于这些收编投诚起义的反动武装一般均进行了初步的改编与改造，编成了支队、中队，审查清洗部分极坏分子了，抽调了老部队一些干部与战士，适当的配备进去，以加强改造工作。咸阳分区连原有部队合编成六个支队，渭南分区组成三个支队及六个大队。在改造工作上，一般地是进行时事教育，政

治教育，有的还经过诉苦，启发战士阶级觉悟。除开始逃跑一部外，已基本上稳定了。但要使其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还须大力的改造与教育。

其中在农村中经过宣传用个别吸收方式扩大人民武装，长安县共扩大一千人编了十二个中队。宝鸡县在剿匪中扩大了一百九十人，凤翔由七十人扩大到五百四十人，这些都是较纯洁的农民武装，是我们建军的基础。

3. 协助政府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维护交通、保证支前任务的完成。由于敌特股匪到处活动，社会秩序未能很快恢复，三个月来的部队与政府密切配合发动群众建立了区乡政权，完成了征粮担架运输支前任务。在某些地区与火车上虽有几次抢案发生，但经过各分区武装清剿与警备，现在抢案大大的减少了。

4. 各分区在工作中培养了和大胆提拔了一批干部，如咸阳分区带去的一个警备营大部都提拔干部，而这个警备营是去年才由洛川、黄陵游击队编成的。现各分区都办有教导队，训练干部共有一千二百七十多人，作为今后部队的骨干。

丙、上述成绩得来的原因：

第一、全国政治军事的胜利影响及第一野战军勇敢善战歼灭了胡匪主力，解放了广大地区，敌伪地方反动武装的迅速瓦解，在客观上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第二、我党领导的正确，西北局对于消灭反动武装的方针政策与原则的领导作了明确的指示。

第三、关中地区人民长期在胡匪压榨下，加上我党地下党员艰苦工作，我党我军对关中广大人民的政治影响，造成

群众仇恨胡匪而倾向我们热望解放心情，我军所到之处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援助。

第四、各分区干部与全体人员的努力，抓紧时机克服困难的精神，积极进行剿匪收编与改造敌伪武装教育部队。

丁、经验教训：（略）1、真正体会与掌握政策原则，抓住有利时机，又灵活运用策略，在军事上、政治上坚决勇敢的向敌人进攻，就能得到胜利……，2、对于敌伪武装，争取与改造必须相结合……，3、宽大与镇压相结合……，4、在思想领导上，能够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部队就易于巩固，进步就快。

（三）今后建军与剿匪工作：

在全国胜利与总的政治任务下，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具体任务应是剿匪反霸、肃清封建势力，执行减租减息、继续消灭敌人，将来保证土地改革的人民军队目前建军应与剿匪相结合，发展武装为了剿匪，剿匪中发展武装。

1、部队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普遍的整编，彻底的改造，洗刷坏分子，从质量上提高一步，在剿匪反霸中个别吸收雇农参加我军，以加强部队骨干作用，但要防止无限制无计划的扩大。

2、以精简为原则统一规定部队的编制，建立组织，加强领导，分区机关与直属队应不超过五百人，团不超过二千人。

第一、各分区发展武装的基数：

军分区	现有	基数	扩大数
三原	2894	3500	606

彬县	2274	3000	723
大荔	2834	3000	4166 (补野战军 4000 人)
宝鸡	3808	5000	1192
咸阳	5100	5500	400
渭南	7332	7000	332 (洗刷数)
合计	21212	27000	7419

大荔扩大四千一百六十六人中有去年欠野战军四千人，新兵在内，渭南不再扩大，在现在的基础上洗刷整编为七千人。

第二、六个分区首先整好三个团担任警备部队（二十二团、路东总队、渭总和警卫团共整编为三个团），其他的整好三个营待后编团。

第三、政府之警卫队，公安局之保安队警察，由政府规定应与分区部队分开（供给问题在内）。

第四、建设地方部队与民兵必须坚持一元化领导，过去有些新区县委书记、县长不注意掌握武装，不注意民兵工作与改造敌伪武装。今后党政军有分工，又要密切联系，党是掌握方针原则和督促，不是什么都管，也不是只管党政，不管建军。新区民兵应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有重点有计划的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

3、培养干部

培养干部要有训练干部的干部，要求达到什么程度，应很好依此方针选择学员。

第一、军干校抽调部队干部（连排级）训练以上的干部，军训练一般知识分子及吸收一部分进步青年的下级解放军

官。

第二、分区办好教导队，训练班排级干部，已吸收的青年知识分子一律送军大训练。

第三、加强在职干部学习，尽可能普遍配备副职，在工作中培养。

剿匪工作：

1、思想上应明确的认识剿匪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组织群众发动生产，以提高人民生活才能消灭产生土匪的社会根源，剿匪本身又是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具体工作。我们在发动组织群众过程中必须把一切可能争取的社会力量，组织到剿匪反霸统一战线中来，才能彻底消灭匪特，剿匪中必须掌握军政结合，剿抚兼施的方针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

2、对敌斗争形式，剿匪就是一种对敌斗争。随着敌人全面的失败大股匪特也将要被全部消灭或击散。由于我们军力的强大，政权的建立，群众的发动，大股匪特很难立足，但敌人是不会甘心的，他会到处组织旧势力，派遣特务，进行分散的隐蔽的活动，因此我们将遇到的不是大股敌人，而是小股的隐蔽的匪特，我们应认识到小股敌人比大股难剿，应很好的学会摸着他们的规律消灭他们。

3、加强侦察工作，组织情报同城乡工作应相配合互通情报。

4、研究剿匪战术和方针，要打歼灭战，消灭反动武装与剿匪结合，消灭大股与清剿散匪并重，消灭小股土匪应采取奔袭、围剿、追剿、驻剿集中进攻与分散清剿等战术。

5、剿匪要有准备，要有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要有信心，坚决、勇敢、积极、不急躁、也不能等待，军事上由侦察到作战；要有周密的研究与计划，行动秘密迅速，政治上首先整顿动员自己内部，宣传群众，揭露土匪罪恶，孤立土匪。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1〕 关中，指陕西中部地区。

〔2〕 胡马，指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所部。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关于继续前进 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政治动员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二日)

本军继扶眉大胜，给胡匪以致命的聚歼后，即乘胜长驱西进追敌二千余里，直捣马⁽¹⁾匪巢穴，兰州一役，即已全歼马匪主力，又复横渡黄河大险，解放西宁，青马漏网残匪，溃不成军，土崩瓦解，纷纷投降，马匪继援⁽²⁾，仅以身免，宁马匪帮则龟缩窘困，已成瓮中之鳖，除投诚自赎外，别无他途，新疆残匪，远距边陲，交通隔绝，孤立无援，已濒死亡绝境；而我军军行所至，敌人莫不望风披靡，人民则无论回、藏、蒙、汉同胞，都是欢欣鼓舞，夹道相迎，众口同声，痛诉马匪残酷暴行。这一切，都指明着西北解放大局，已根本奠定，今天我军的任务，是不顾一切疲劳，忍受一时困难，穷追残匪，直入宁夏、玉门、新疆、为彻底解放大西北而战斗。

整个西北各省，特别是新疆，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石油煤铁，铀钨诸矿，蕴藏特丰，为我将来国防工业重镇，而玉门油矿，则为我国现已开采之最大油田，迅速解放这些宝藏地区，并建设这些宝库，这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给予我们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任务，全军同志们，应发挥无限的革命热情

以最高的毅力来圆满的完成它。

全体英勇的指挥员同志们：

敌人已经全线崩溃了！我们继续奋勇前进！不失有利战机，穷追到底，不予残敌以任何喘息机会！解放宁夏、解放玉门，一鼓解放新疆！那里有敌人，就到那里去消灭他，那里是中国的领上，有中国被压迫的同胞，我们强大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就必须去解放！困难是会有的一—天气已经秋凉了，行进途中，有些是人烟稀少的地带，但这类自然条件的限制，过去是久经考验过的，今天则是一瞬就会过去的！祝全军奋勇前进！

功上加功！

红旗插在边疆上！

光荣是无尚的！

第一野战军政治部

九月十二日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1〕马，指马步芳。

〔2〕马继援，国民党军第八十二军军长。

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兰州 扩大会议⁽¹⁾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西北五省已基本解放，西北战场经过两年多伟大而艰苦的战争，已基本上胜利地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任务。这是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西北局和一野前委及各级党委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全体指战员、工作人员的英勇顽强；后方支前工作的努力；战区和解放区人民的拥护，以及各解放区胜利的配合，所获得的成果。尤其是党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是取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党在当前时期的迫切任务，是发动群众，完成接管，进行各种民主改革，恢复与发展生产，并继续努力完成支援进军西南的任务。关于当前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决议如下：

一、关于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为适应目前新形势的需要，决议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²⁾，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的职权，统一领导西北五省军政工作。西北军政委员会，应包括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民主人士及代

表人物在内，拟以三十九人组成之。所提名单，待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即行成立。其内部组织机构和人事配备，另行决定。

二、关于部队今冬整训工作。一野自扶眉战役后，连续前进千余里至数千里，未能很好休整，并补进了大部解放战士以及起义投诚部队十余万，地方部队大部分也是新成立的，没有进行过系统的阶级教育。又加胜利形势下，有些干部产生居功、自满、轻敌、麻痹、松懈、享乐、甚至想离队等不正常情绪；有些干部不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不认真学习和执行党的政策等情况，决定今年冬季整训，应以政治整训为主，军事整训为辅，着重提高阶级觉悟，提高自觉纪律，总结战斗经验，提高战术技术，确立建设正规国防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永远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思想，普遍深入地进行诉苦与反省，展开集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解放官兵及投诚起义官兵中，着重诉苦。在老战士老干部中，着重总结战斗和工作经验，进行自我检讨，反省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的缺点错误，有无瞒上不瞒下，党外宗派主义，党内山头主义等不纯思想意识，以及在工作中获得成绩的主客观原因。干部必须学习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联系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党章总纲、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二中全会决议^{〔3〕}、论人民民主专政、八项二十四款的和平条件、约法八章等文件，以达到系统地了解党的路线和政策。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基础上，以执行政策、遵守纪律、虚心学习、努力工作为鉴定每个同志的基本标准，展开评功评过运动，选举模范英雄，推荐干部、党员等，以进一步提高全军的政治质量。在进行

冬季整训中，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均应依驻地具体情况，加紧剿匪，积极参加做地方群众工作，并做好明年生产的准备工作。明年须召开全军的党代表大会，后勤工作会议，政治工作会议，参谋工作会议。各兵团、军、师分别开办短期军官训练班或轮训队，以加强今后建军工作。

三、关于地方工作。西北有三种地区，在老区（原陕甘宁边区）当前中心是发展生产，恢复战争创伤。半老区（黄龙地区）是发动群众完成土地改革。在新区今后一定时期内，除注意做好城市工作外，须将工作重心放在乡村，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及一切乡村人民，进行民主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进一步发展城市工业创造条件。在新区进行农村民主改革，须分作两个步骤，即先进行剿匪、反对恶霸、减租等，以削弱农村封建势力为第一步。然后再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第二步。目前在一切已完成接管的地区，须先以剿匪为中心，联系进行有重点的反对恶霸减租清债，其他如征粮、建政、建党、组织民兵等，都要在开展这些斗争、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去进行。待大股土匪已消灭，秩序已安定，群众已有初步发动之后，再普遍开展彻底消灭恶霸减租等斗争，并继续深入清匪和肃特。然后再依情况发展进到实行土地改革。在进行上述斗争中，须要十分注意掌握政策，运用策略，在封建势力越强大地区，策略的运用越要灵活。完成农村民主改革，须准备再花费两三年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必须戒骄戒躁，免走弯路。各级领导机关，须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教育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发扬民主作风，学习新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善于经过县、区、

乡农民代表会, 各界各族人民代表会等会议去传达党的政策, 组织群众力量进行工作。

以上农村工作的方针、任务、步骤等在汉族地区, 一般适用。在各民族杂居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有的须采取更稳妥的步骤, 有的则须依具体情况另行规定。

四、关于民族政策。西北是多民族地区, 各民族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过去反动统治阶级其汉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的统治, 造成了各族人民间普遍存在的戒备猜忌, 甚至互相仇恨的心理。我们必须广泛宣传并坚决执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平等政策, 并准备经过长期艰苦工作, 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 建立起各民族人民间互助友爱合作的新关系, 以利巩固我们的胜利和建设新西北的伟大事业。为此必须实行以下六条:

(一) 坚决按照民族平等原则, 在各族杂居或某一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分别实行区域自治或成立各族联合政权。省级以上政府注意吸收各族优秀分子和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

(二) 提升部分民族军为人民解放军, 有重点地建立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地方公安部队, 派强的少数民族干部去工作。

(三) 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性的武装骚乱, 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 以招抚为主, 不轻易使用武力, 必须用武装清剿时, 要多做群众工作, 使反动顽抗分子在其本民族群众中完全孤立时, 再行打击之。

(四) 各民族间的纠纷 (如疆界土地问题), 在有利于各族人民团结的原则下, 经各族代表协议或由上级政府调处解决之。不同民族间的阶级矛盾, 避免采取清算方式, 而尽量

采取法律手段协议方式解决之。禁止各民族群众中的仇杀报复行为。

（五）发展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首先是发展各民族所固有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并实行国内自由贸易，组织消费合作社，进行等价交换，举办必要与可能的社会福利事业。各民族的语言、文字、艺术和科学应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交流和提高。

（六）积极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各省委、地委开办训练班、学校等培养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的关键。

五、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政策是我党在领导革命运动中，带决定意义的政策。没有统一战线政策，就不会取得今天的胜利，不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就不能巩固我们的胜利。我们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必须联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党内干部思想中一般的已解决了的。但是还必须联合自反动阶级反动阵营分化出来的一切愿与我们合作的人物，那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路人，我们必须在各级政府中吸收一定数量的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担任职务，作为联合和领导这些阶级的必须条件。这一点在许多干部思想中则还没有解决或没有明确的解决。目前干部中有的不愿与党外人士来往怕麻烦，有的认为胜利了，统一战线可以缩小，有的甚至与党外人士比地位比资格，有的说：“老子打天下，让这些人来做官”，这都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是不了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领导作用，不知道团结党外人士，提高党外人士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今天各地党

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方面的基本缺点，是圈子太小，联合不够。目前必须从各方面检讨这一工作，并结合学习文件教育干部，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克服某些关门主义倾向，学会争取和提高党外人士和他们相处合作的艺术，健全各级党的统一战线部门，加强领导，以便切实展开统一战线工作。

六、关于财经建设工作。经济建设即将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但由于西北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周密的计划经济，须要逐步的去做。一九五〇年除由国家投资，大力发展玉门油矿和修通天水至兰州段铁路外，西北地方生产事业，仍应以农业为主，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公私工矿业以恢复为主。有些部门（如纺织）并力求改进与发展，畜牧业应引起重视。其具体计划，由西北局财委会，详加研究，提出通盘的计划纲要，呈请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批准后实行。

明年将有数十万部队投入生产战线，这是建设新西北的一支生力军。部队生产的原则，是公私兼顾，生产所得公私各半。生产对象，应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禁止作生意或与民争现象。具体计划，由各部因地制宜。在提高阶级觉悟，增强军民团结的思想基础上，民主讨论，自下而上地提出意见，再由各兵团各军统一拟定计划，呈报西北军区。

七、关于干部教育。由于革命事业的发展，新干部成份大大增加，党的领导责任更加重大，必须将干部教育提到最重要位置，由西北局、前委制定一九五〇年全盘的干部教育计划。其中一般干部着重政策学习，高级干部须认真学习理论，有些干部须进行文化学习，学习必须联系实际与实际结合。特别着重克服不断发生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提高干部

的思想政治水平，是完成一切工作任务的中心环节，只要我们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会永远的胜利前进。

根据兰州军区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兰州扩大会议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开会，二十二日结束。
- 〔2〕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在西安成立，彭德怀为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王震等四十一人为委员。
- 〔3〕二中全会决议，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1〕}

彭德怀

（一九五〇年一月七日）

我今天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向中央人民政府作简单的工作报告，觉得异常高兴！

（一）西北已经全部解放了，半年来军事胜利的发展是超过我们预料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胡宗南^{〔2〕}匪军失去了巢穴。七月十三日扶（风）眉（县）战役胜利，消灭胡匪四个军，迫使胡匪残部退守汉中。八月二十六日攻占兰州，歼灭了青海马步芳^{〔3〕}匪军主力，乘胜迅速占领西宁，并全部歼灭青马匪军。九月十九日进占宁夏，马鸿逵^{〔4〕}匪军大部歼灭，一部投诚。至此，青、宁两省全部解放。伪西北长官公署及所辖残部于武威、张掖相继被歼灭后，九月二十四日解放酒泉。在新疆方面之陶峙岳^{〔5〕}将军，鲍尔汉^{〔6〕}主席，领导所属于九月二十五日先后通电，宣布脱离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解放军于十一月十二日进入新疆之哈密，现已进驻新疆全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插至祖国最远的边疆帕米尔高原。陶部共约六万余人，现已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辖第九军及骑兵第七第八两师。改

编时，除极少数叛变缴械外，其余绝大部分在陶峙岳将军领导下进行尚称顺利。新疆之伊犁、塔城、阿山（承化）地区，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黑暗统治而英勇奋斗多年的民族军，现已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分布全疆各要地，与我第一兵团相驻一起，相互交换各项工作经验，亲如和睦的兄弟。十二月初，十八兵团南下入川，顺扫陕甘南部残敌。至此，西北五省获得全部解放。在半年中彻底消灭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进军近万里，在天寒地冻时，缺少鞋袜棉衣，越过雪山草地，戈壁沙漠，这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只有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军队，才能如此迅速地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许多战斗员、指挥员在战斗中，为了完成他们自己的任务，身负重伤，隐瞒不报，不下火线，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伟大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人民解放军严守群众纪律，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因此所到之处，各族人民群众扶老携幼，热烈欢迎。我们所以能迅速解放西北，就是由于这种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西北人民的热烈拥护，也由于后方支援前线工作的努力，各友邻战略区胜利的配合；特别是毛主席领导的正确，更是迅速胜利的决定关键。

（二）现在新疆、宁夏两省人民政府已经正式成立了；甘、陕、青各省人民政府，正在筹备成立中；省以下的各级人民政府都已建立，各级政府的组成，都包括了各民族各党派各民主阶层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各省多数市县举行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不少的地区已经召开了两次，讨论了人民政府的纲领，各界人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有善意的批评和良好的建议。政府执行了人民的意见，人民从自己

切身经验中认识了自己的政府。

(三) 西北是一个土地辽阔的地区，面积三百一十方平方公里，占全国领土三分之一弱⁽⁷⁾。可是人口稀少，仅二千三百余万，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弱。但蕴藏石油占全国第一，除玉门油矿已经开发外，尚有永昌、柴达木、享堂、乌苏、喀什、库车、阿克苏等地蕴藏着的大量的石油及各地的煤、铁、盐与其他贵重金属正待开发。还有广大的可耕土地，只要兴修水利就可变为肥沃的良田。有一望无边的草原，可供牧畜。黄河水势可供发电。正由于这些条件，西北是建设新中国工业基地之一，不可忽视。从地理环境看，西北距海岸最远，但与世界和平堡垒苏联相接，所以把西北建设为巩固的国防基地，客观条件是具备的，意义是重大的。可是西北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西北经济条件远较中国其他各地落后，国民经济中大约农业占百分之七十五，牧畜业占百分之二十以上，近代工业及手工业不到百分之五。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剥削下，人民的经济生活陷于极端贫困的状态，许多地方人民冬天都没有裤子穿。去年陕甘一带又遭受了水灾，使棉粮生产大减。而西北目前军政人员数目百万以上，约占西北五省人口百分之四点五，这就使西北的财政状况发生很大的困难。按照目前西北可能的收入，大体只能解决西北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五（包括若干必需建设事业费），其余百分之七十五是赤字，需由中央政府在统一筹划中补贴。西北财政经济的困难，尤以新疆为甚。因为新疆国民党反动派连年推行反苏政策，断绝对苏贸易，并进行镇压新疆民族民主运动的结果，已使新疆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于

极困难状态。加以新疆地区辽阔，交通不便，且距内地甚远，西安至迪化即达三千余公里，由迪化至南疆的和田还有二千三百公里，供应更感困难。因此必须大力从事生产建设，迅速恢复新疆对苏贸易，在半等互惠的原则下，实行中苏经济合作，取得苏联友邦的帮助，才能逐渐克服困难，繁荣经济，并使新疆成为我国重工业基地之一。

（四）西北又是个多民族的地区，仅新疆即有十四个民族。全西北维吾尔族人口约三百余万，回族约二百五十余万，藏族约五十余万，哈萨克族约四十余万，蒙族约十余万，塔兰其族⁽⁸⁾约九万，此外还有吉尔吉斯族、锡伯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索伦族、塔塔尔族、满族等。反动统治阶级遗留给我们的交通、经济、文化等条件是落后的（除陕西外，一般地比内地更加落后）甚至是完全的封建统治，某些地区还存在着奴隶制度，再加上各民族间存在着宗教风俗习惯的不同，语言文字的隔阂。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复杂的，必须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五）西北目前工作计划是按照不同情况的地区，分别给以不同的工作任务。在老解放区是发展生产，恢复战争创伤；在半老解放区是发动群众，完成土地改革；在新解放区除注意做好城市工作外，须用大力在乡村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首先第一步进行剿匪肃清特务反对土豪劣绅，削弱封建势力。国民党反动派土匪有计划地在我解放区内，组织所谓“游击队”，进行烧杀、抢掠，人民痛恨已极。自我军解放西安后，半年以来，此种土匪已被消灭约六万左右。现残存之土匪约万人，流窜西宁以西之都兰、共和地区和甘肃

省之临夏以西山地，还有德王、李守信^[9]残部在宁夏以北，估计在今春三、四月间，即可全部肃清。然后第二步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与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西北又是一个多民族区，各民族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过去黑暗的统治，造成了各民族间相互仇恨的心理，必须坚持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平等政策，进行长期艰苦工作，培养各少数民族自己的优秀干部，建立各民族间友爱合作的新关系，为建设大西北而共同奋斗。

军队方面目前正在进行冬季整训和部分地区的剿匪，并积极准备一九五〇年大生产。新疆方面今年准备垦荒，六十万亩种粮食，五万亩种棉花。陕甘宁青各省驻军亦正在积极筹划生产中（具体计划待送到再行报告）。我们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使西北的人民解放军继承已往艰苦奋斗的作风，成为建设新西北的重要力量之一。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多给以指示及各方面的帮助，尤其希望于一九五〇年修建天水兰州铁路，以利西北的建设。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注释：

到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 〔5〕陶峙岳，曾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九月率部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 〔6〕鲍尔汉，原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一九四九年九月起义。后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
- 〔7〕西北全境面积三百四十二万五千多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以上。
- 〔8〕塔兰其族，即维吾尔族。解放前和解放初期误认为单一民族，后来不再用这一名称。
- 〔9〕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世袭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今属乌兰察布盟）札萨克郡王。长期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抗日战争爆发后公开投靠日本侵略者。李守信，蒙古族，曾任伪蒙古军总司令。

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1〕}

彭德怀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

西北五省业已全部解放，这是人民解放军、西北人民和全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得到的光荣结果，也是伟大的英明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路线的胜利。今后西北五省即进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全西北各民族人民应亲密地团结起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兹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西北情况，提出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如下：

（一）西北地区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胜利结束。我们新的任务，应是彻底消灭土匪，肃清特务，实行民主改革，动员一切力量，节衣缩食，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在老解放区，即原来的陕甘宁边区，已经解决了土地问题，应用全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半老解放区，如黄龙分区，继续发动群众，完成分配上地的工作。在新解放区，除了注意做好城市工作外，须用大力在乡村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第一步进行消灭土匪，肃清特务，反对恶霸，进行减租，削弱封建势力；然后第二步，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和群众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

（二）一九五〇年秋收后至一九五一年春耕前，应在陕西大部地区，甘肃宁夏两省部分地区，青海个别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取得经验，普遍地教育干部与群众，准备于一九五一年秋收后至一九五二年春耕前，全部完成陕、甘、宁三省及基本上完成青海省的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各民族杂居的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²⁾，何时进行，要看各民族人民的觉悟程度和当地实际情况发展而定。但在甘肃、宁夏、青海回族与汉族的农业区域内条件成熟时亦可斟酌情形同时进行土地改革。在进行分配土地以前，地主富农所有的土地仍归地主富农所有；农民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依照政府颁布的减租条例，按原有地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进行减租和交租。在分配土地时，中农土地完全不动，没收地主和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耕畜、农具以及和土地相连的乡村房屋，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有追逼底财、扫地出门等行为。对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应加以保护，不得以任何借口没收或损害。地主亦须分得与农民同样数量与质量的土地。在执行上述工作中，必须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宣布政府的政策法令，教育人民群众，严格遵照政府的政策法令办事，使乡村土地改革工作能够在农民群众觉悟的基础上热烈地有秩序地进行。处理罪犯时，一律按照法律手续，交由人民司法机关，或由上级政府指定专人组织临时人民法庭，依法裁判。如判处死刑时，必须经过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坚决废止刑讯及其他侮辱犯人的行为。为了准备分配土地工作，必须有计划地十分认真地培养和训练干部。必须发动与组织好农民群众和开好区乡农民代表会

议，有系统地介绍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经验教训，重新翻印与反复讨论“怎样分析阶级”。此项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由各村所有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开群众大会推选代表组成之，代行区人民代表会职权，为乡村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区乡一切应兴应革的重大工作与合理负担等，均应经过农民代表会议讨论。各区乡行政人员如有不法行为，经批评教育不改者，农民代表会有权呈报上级人民政府撤换之，以确立乡村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

(三)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应以农业和牧畜业为主。在农业方面，必须提高农民生产热情，改良种子和农作法，恢复和发展水利，并注意森林草原的保护与培植，防治灾害，以达到中央人民政府给我们一九五〇年的任务：增产粗粮三亿三千万斤，增产皮棉十二万担。甘、宁、青、新等省，牧畜生产不应低于一九四九年的水平。为此，必须注意培养兽医干部，在牧畜区应有重点地设置兽医站及巡回防疫队等，并积极进行改良畜种。

在工业和交通事业方面，必须建筑天兰段^[3]，整修大宝段^[4]铁道，及修复被敌破坏之主要公路，注重玉门油厂及恢复乌苏油厂的生产。尽可能地开发享堂油矿，增加动力，发展棉毛纺织皮革工业，并加强生产中的计划性和组织性，提高产量、质量，爱护机器，节省原料，以达到减低成本，推广销路。改进这些工作，必须首先依靠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团结技术人员，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实现。对有益于人民的私营企业应予保护，并促进其发展。在金融贸易方面，促进物资交流，力争平稳物价，一切措施均须为恢复与发展生

产而服务。在克服财政困难方面，必须完成中央人民政府所规定的各项税收任务，努力推销公债；严格建立各项财政收支制度，整编机构，核实人数，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开展全面的大生产运动，机关学校人员亦应实行业余生产；厉行节约，严禁贪污，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就是克服战后财政经济困难的有效办法。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应有具体计划逐步实现。同时必须切实注意救灾工作。由于去年天灾歉收，战争破坏，国民党匪军抢劫，人民负担一时未能减轻，致使春荒严重地存在着，个别地区且已发生冬荒。各级政府必须立即发动与组织人民生产自救互助互济，提倡农村公平自由借贷，保证有借有还。组织运销生产合作事业，奖励土产出口，换取粮食及日用必需品，在缺粮地区应禁止酿酒制糖。号召军政全体工作人员，每天节省一两粮食，救济春荒，并应采用一切有效办法，做到不要饿死一个人。

（四）人民解放军在长期奋斗中，除消灭敌人外，并进行地方工作，建设革命根据地，积极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克服战争中的财政经济困难，这是人民解放军特有的优良传统。现在西北五省已全部解放，他们正在进行冬季整训、剿匪和做地方工作，并积极准备生产。按各地不同条件，准备垦荒，兴修水利，建筑铁路公路等。禁止从事商业。遵照毛主席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实行公私兼顾，生产红利百分之四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其余归该生产单位及国家所有。驻新疆的部队有十余万人参加生产，准备开荒六十万亩，每亩产粮以五斗计，可获粮三十万石；种棉五万亩，每亩产棉以二十斤计，可获棉花一百万斤。陕、甘、宁、青各省驻

军估计将有四十万人以上参加生产。这一支生产大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过去的生产经验，相信他们一定会同完成战斗任务一样地坚决勇敢胜利地完成生产任务。在这一大生产运动中将会出现许多劳动英雄，在生产中起带头作用，他们也和战斗英雄一样的光荣。

（五）一九五〇年，必须依照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开好各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是动员和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民族人民的最好组织形式。经过代表会议，把政策传播到广大人民中去，使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密切连（联）系起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以利各项工作任务地完成，使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组织上更加巩固和完备起来。各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应逐步代行市、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陕、甘、宁、青、新五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应在本年召开。西北大行政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准备在一九五一年召开。当各界人民代表会开会时，应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入检查工作，加强纪律，以求达到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

（六）西北五省除小学外，现有大学专科学校共九个，学生五千多人，中等学校约二百八十多个，学生七万余人。在经济建设尚未得到适当的恢复和发展以前，一九五〇年应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整顿和改革，在有条件的地区得到部分发展。各级政府对工人教育、社会教育及少数民族的教育工作，均应予以足够的重视。为适应各种必须的社会改革和建设事业，应有计划地轮流训练大量的在职干部和培养技术干部。人民

解放军中，应普遍展开文化学习运动，以军为单位，设立五百人左右的速成中学，以提高久经战斗锻炼的指战员文化水平，使之有学习各项专门知识的初步基础，将来成为人民祖国各项建设事业的骨干。

在卫生工作方面，应积极地预防疾病瘟疫的产生，推广医药卫生宣传教育工作，添置必要与可能的卫生设备，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医务干部，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儿童的健康。在各种妇女干部训练中必须学习妇婴卫生的知识与技能。卫生工作应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必须逐步建立和健全社会卫生工作。

在文艺工作方面，应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发展新的大众文艺，改造旧的形式和内容，培养和奖励新的文艺工作者，并帮助各少数民族文艺工作的开展，使文艺工作真正能为广大人民服务。

（七）本平等团结互助原则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杂居地区之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政权机关内，各民族均应有其相当名额的代表。各民族间的纠纷，应本共同纲领⁽⁶⁾中所规定的政策，经过各民族人民协商或由政府调处解决之；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应举办各少数民族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培养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必须发展各民族的经济，改善贫苦人民生活，实行贸易自由，等价交换，组织供销合作社，举办必要与可能的社会福利事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以

促进各民族间的友爱团结。

我们相信只要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以谨慎虚心学习的态度，我们一定能团结，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办好西北人民的事情。

根据兰州军区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这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 〔2〕土地改革，指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的运动，我国土改运动的基本方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农民群众没收地主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 〔3〕天兰段，指陇海铁路天水到兰州段。
- 〔4〕天宝段，指陇海铁路天水到宝鸡段。
- 〔5〕共同纲领，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西北军区关于现有兵力及军队 生产等情况向毛泽东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日)

毛主席：

(一) 西北现有兵力：野战军四十四万零八百余人（辖第一、第二、第十九、第二十二兵团、五军、第十九军），骡马七万五千四百余匹。地方军十八万六千余人（包括马鸿宾、王治岐、蒋云台、左协中⁽¹⁾等投诚部队），骡马一万三千一百余匹。两项总计人数六十二万六千九百余人，骡马八万八千五百四十余匹。这是根据十二月一日统计。西北五省人口二千三百七十万左右，以兵与民比将近百分之三，加上党、政、民约二十五万（此数可能估计多些），总之脱离生产人数不会少于百分之四。在西北，农业、牧业经济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工业与手工业约占百分之五，经济落后，决难养活如此庞大军队。现已禁止扩大与停止归队，不适军用骡马，送一批给无牲畜的贫苦群众和烈属，以及组织运输，劳力减少三分之一，并计划大点验一次人、马，五月底完毕。

(二) 垦种生产布置：新疆开垦六十万亩（内五万亩种棉），青海一军约八万亩，平凉、甘肃三军七万亩，宁夏六十

五军十五万亩，马栏镇黄龙山六十三军十万亩，十九军（刘金轩部）等未统计。约计野战军与地方军省军区、军分区本年垦种不会少于一百五十万亩，兴修水渠掘井灌溉不会少于一百万亩。修铁道布置：以六十四军四万人继修宝鸡、天水段三月十五日部分开工，月底全开工。天水至陇西段由七军一部分人负责，四月一日开工。陇西至兰州尚未测量好，拟五月一日开工。此段由四军两个师二万人担任。按照铁道部定价：土方每方小米四斤，软石小米八斤，硬石每方小米二十四斤，拟以百分之四十缴国税，百分之四十归劳动者所有，百分之二十归小公作为修补营房、增补建立工具等费开支。

（三）军队学习问题：战争结束后，指战员多数迫切要求学习，但在学习态度上有的好高骛远，什么都想学，甚至要求到远处学，有的学习无恒心，时热时冷，亦有少数自暴自弃。这些现象表现了领导上对组织学习不严肃不经常，对于战争结束后的正规学习制度亦未建立起来，检查督促考试等制度缺乏经常性。二中全会规定高级干部要读十二本书，我自己还亦未认真学习。据说师以上干部多数对十二本书亦未学习，今后必须造成学习高潮，使全军高级干部在两三年内学完十二本书及毛泽东著作，打下马列主义一点理论基础。在政策方面学习了以共同纲领⁽²⁾为中心及其有关文件，在文化学习方面，拟每军办一个五百人左右的速成中学，时间年半到二年，目的在提高一批经过考验的工农分子出身的干部文化水准，使之有学习军事、社会科学及其他技术知识的基础。准备将来一部分转为工农业、卫生、文教干部，一部分继续职业军人。在业务学习方面各兵团、军办教导团队，轮训排

以上各级干部，师训练班级干部。对投诚军官改造问题，新疆军办有军事政治学校，接收陶部^[3]编余军官二千余人，拟三月在西安办一同样学校轮训甘、宁、青投诚部队军官，估计亦将有二千余人。

（四）军队转业问题：过去多次裁减人员，不是东裁西补，就是流落他乡，散布不良影响。鉴于此种教训，故今后拟取转业办法如下：

1、军队党、地方党和政府各个部门对于军队转业就业问题要有统一的认识，即地方各项建设事业及公安警察等所需要的大量干部招收新生培养时，应尽先由军队调出。以前战争时期一切服从战争服从前方的胜利，地方人员动员起来参军。和平建设时期应采取精兵主义，节约人力、财力、用于建设。军队变为学校，有责任培养地方各种干部，不应保守不调。地方方面要求所调人员之条件亦不宜过高，更不宜离开政治条件专求年轻力壮文化水平。

2、转为工矿业。国家投资、官兵集股开办工矿生产合作社。

3、转为铁道公路职员。修筑铁道公路，修成后即可部分转为该路职员。

4、转为农牧业。西北农业牧畜大有发展前途。六十五军在宁夏三年内可完成一条大水渠，灌溉良田一百五十万亩，种棉、稻、麦均宜。青海柴达木盆地沃野千里比关中平原尤广大，天山南北地方广阔，土地肥沃，更不可估计，仅焉耆一处（现六师所在地）明年即可完成一大水渠，灌溉百万亩以上。牧场亦可发展。如此六十余万军队，采取公私兼顾，集

体劳动三年后转为农牧工矿业，及其他社会事业，可免除国家巨大退伍费，亦可使之成家立业。

5、转业官兵应保存军籍变为后备，后勤严格登记，有二十余年战斗经验是可宝贵的，一旦国家有战事即可征调。

(五) 迫切需要修铁路，甘、宁、青、新广大人民在反动统治残酷剥削下，生活极苦，许多赤贫人民冬天没有裤子穿，见之十分可怜。因交通不便，农村中大量皮、毛土产价贱运不出去。工业品昂贵形成极端严重剪刀差。石油蕴藏甚富，青海之柴达木咀堂，甘肃之玉门、永昌均藏大量石油，特别是新疆已发现二十余处油源，迪化与七角井之油页岩取之不尽，三斤油石可抵一斤煤。我入迪之六军无钱买煤，赖此石取暖煮饭，惜藏于地。在全国经济建设与海空军建设上，节约外汇上，均急需开发改变西北经济面貌，建设国防后方，移民西北等大计，其关键均在建筑甘新铁路^[4]。我以为全国铁道建设重点三五年内应放在西北，请于一九五〇年内拨给西北四百二十公里铁轨，以便修通天水到兰州三百七十六公里铁道，明一九五一年拨九百公里铁轨，以便修通兰州至酒泉八百数十公里铁路，增产石油运销，请列财政预算。上述意见妥否盼核示。

(六) 灾情问题：去年陕中区因涝歉收，安康匪抢，宁夏马鸿逵决堤，临夏因当地干部执行民族政策偏差，造成回汉互杀破坏甚重，新疆叛军烧杀，汉回灾民据不完全统计约九十万，豫鲁逃陕难民约五万，春荒相当严重仍未过去。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宣传公平自由借贷，保证有借的有还的实行减租交租，保护地富所经营之工商业，分地时中农土地完全不

动，借贷关系停滞已久的乡村，最近开始在富裕中农阶层间有放贷者，救灾工作已开始引起注意，估计可能不致大饿死人。

（七）军政委员会某些重要干部铺张浪费相当严重，并有个别贪污者，现正在纠正中。军队中本位主义，去年秋季有一度发展，当经纠正，最近情况不大明了。政治工作会议正在兰州开，由张、甘⁽⁵⁾主持检查与讨论生产建军各项工作，其具体过程待后报。

西北军区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 马鸿宾、王治岐、蒋云台、左协中，均为原国民党军起义高级将领。
- 〔2〕 共同纲领，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 〔3〕 陶部，指陶峙岳起义部队。
- 〔4〕 甘新铁路，指甘肃至新疆的铁路。
- 〔5〕 张、甘，指张宗逊、甘泗洪，当时分别任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 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议（节录）

（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通过）

（一）大会听了习仲勋^[1]同志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张宗逊^[2]同志三年解放战争简要总结，一九五〇年工作基本总结及目前任务的报告，甘泗淇^[3]同志解放战争以来党建工作总结报告，经大会讨论后一致认为是正确的。并在今后工作中，坚决彻底完成之。

（二）大会认为目前的国内外形势，对于我们是有利的（略）。

（三）大会根据目前形势，在加强国防建设的总方针下，必须大力整训部队，培养国防军的干部，开展全军的军事、政治大练兵，熟练现有技术，学习联合兵种作战，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必须彻底改造起义部队，必须迅速肃清西北全境土匪，巩固社会秩序，巩固祖国的大后方，积极地配合解放西藏。必须加强各级领导机关，充实机构，建立正规的工作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必须有效地加强民兵工作与地方武装的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决清查与严惩隐藏在部队内部的敌探奸细，

纯洁与巩固组织。必须积极参加地方工作，贯彻民族政策，参加土改，确保劳动人民的斗争果实，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必须加强全军的后勤建设，培养训练后勤工作干部，以适应现代作战的需要，组织以改善部队生活为目的的生产建设，并厉行节约。

新疆部队由于地区条件的不同，一方面必须致力于国防建设，大量培养国防军干部，另一方面必须以大力进行农、牧、工业生产建设，以及参加地方工作，巩固祖国边防。

（四）大会认为，上述任务是繁重的、光荣的，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健全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加强党的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继续反对各种不良的思想作风，健全报告请示制度，严密党的组织纪律，在中央、军委、西北局领导下，发扬英勇艰苦的传统，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贯彻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奋斗。

根据兰州军区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2〕 张宗逊，当时任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3〕 甘泗淇，当时任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习仲勋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我们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热烈庆祝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能够经过三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现在这样的伟大胜利，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新发展，它创造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典型。自从有了这个理论，中国革命便大放光彩，中国人民革命的车轮便一直沿着胜利的道路前进。这个理论，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也教育了全国人民。

了很大发展。当时，我们曾与国民党进步势力结成统一战线，在军队、政权、文化教育和群众运动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党员发展到几千人。但是，当时的领导者，不懂得国民党右派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没有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郑州会议一开，西北的国民党公开反革命了，对共产党人杀的杀、赶的赶，共产党和革命人民遭受了极严重的损失。

共产党人并不灰心丧气，重新集合起来与敌人战斗。而且以刘志丹⁽²⁾、谢子长⁽³⁾为首，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的八个年头内，在与敌人斗争中，在与地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在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号召下，使我们在摸索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锻炼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

与敌人斗争，主要的是要采用什么方式？我们制定了主要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拿起枪杆子。为着长期地进行武装斗争，就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这种根据地，又必须是在乡村，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开始是在陕、甘边的桥山中段建立了一处根据地，以后，为了在敌人优势兵力面前获得高度的回旋余地，便在陕北、关中建立了几处根据地。在根据地里，建立了革命政权，发动了农民，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财产及富农的出租土地，加以分配；发动了农民斗争，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了红军和赤卫队（即民兵），采取游击战争的战术，与敌人作战，不断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取得胜利。但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打游击战是“逃跑上山”，认为创造游击根据地是“梢山

主义”，要红军打正规战，向城市和平川出击，把陕、甘根据地和四川、青海、新疆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打通国际路线。这在当时红军只有几千人，显然占劣势的情况下，简直是荒谬绝伦的。

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用最大力量，去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来往，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都很有成效。但“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说这是“勾结军阀”。连在根据地内分配土地时，对待地主与富农加以区别的政策，也被他们认作是“富农路线”。他们是何等愚蠢，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绝大多数同志是团结在刘志丹领导的正确路线下，进行了英勇的胜利斗争。其结果，是聚集了革命力量，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的大块革命根据地，成为西北人民解放斗争的旗帜。可是当时是紧张的战斗环境，还没有可能把这些经验都系统地总结起来，并用以教育全党。这就使“左”倾机会主义者钻了空子，他们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外衣，几度占据了党内的领导地位，并采取极端宗派主义的作风，给了革命事业极严重的损害。

一九三五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了陕北。立即停止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罪恶活动，挽救了西北的革命，并领导着我们继续胜利前进，扩大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再次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原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们不仅

听任国民党反动派把根据地的许多边沿地区劫去，而且提倡“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即一切经过国民党、蒋介石，把自己束缚起来。毛泽东早就指出这个错误，领导我们把它彻底纠正了。随后毛泽东总结了全国的也包括西北的革命经验，在一九三九年给《共产党人》写了一篇发刊词，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又领导我们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实现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并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是中国第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具体的施政纲领。此后，经过了必要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于一九四二年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下，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过去的历史，作出了系统的结论。做得对的，给西北人民立了功的，当然是由刘志丹所领导的正确路线。而反对这个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个会议，把西北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从一九三五年秋季到一九四八年春季，这十三个年头内，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驻在陕甘宁边区。领导着我们，在这不足二百万人口的地区，教育人民，依靠人民，打破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使人民的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都获得发展，支援了全国的革命。延安，成为世界闻名的民主圣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了一个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又指挥了一个人民解放战争走向胜利。毛泽东那些丰富的理论著作，关于政治的、军事的、财政经济的、文化思想的以及哲学问题的，其大部分是在这里写出的。毛泽东热爱边区人民，当胡、马匪军进攻边区的困难时期，毛

泽东坚持留在陕北，常是在行军转移中指挥西北和全国的战斗。这是当时全体军民经常有着旺盛斗志和胜利信心的源泉，直到一九四八年延安光复，胡、马匪军全线溃退之后，毛泽东才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国工作，离开了陕北^④。毛泽东给我们西北地区党和人民的教育，真是太广阔了，太深刻了。

我国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胡、马匪军进攻延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十月新疆和平解放，共两年半的时间，是由彭德怀同志领导的，是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的，其中大部分的战役如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清涧、瓦子街、荔北等战役，都是在陕甘宁边区内部或边沿打的。进入西安后，打了一个扶眉战役、再一个兰州战役，便基本上解决了西北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由彭德怀同志亲自主持，在兰州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扩大会议，对西北的胜利，是这样估计的：“西北五省已基本解放，西北战场经过两年多伟大而艰苦的战争，已基本胜利地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任务。这是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前委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全体指战员工作人员的英勇顽强，后方支前工作的努力，战区和解放区人民的拥护，以及各解放区部队的配合所获得的成果。尤其是党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是取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样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试想，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没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没有十大军事原则，没有历次重大战役中毛泽东的亲切指导，我们能够胜利吗？是绝对不能的。我们曾有个别部分、个别的战役打得不好，不就是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

会不深，掌握不紧的缘故吗？

解放后，我们按照毛泽东的理论，按照《共同纲领》⁽⁵⁾，在西北地区实施了人民民主专政。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我们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了各民族、各革命阶级，以及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他们一道，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人民政权建设方面，推行各项民主改革方面，剿匪和镇压反革命方面，以及文化教育工作等方面，都开展了切实的有效的的工作，巩固了人民的胜利。今天，西北地区团结、进步的气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西北的面貌是大大的改变了。各民族、各革命阶级和各方面的人们都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的确，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群众起来了，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很多工作都进行得非常顺利。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一经和群众结合，掌握了群众，就必然变成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任何工作，凡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把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任务拿到群众中去，广泛宣传，细心听取群众的呼声，相信群众力量，动员群众一块去做的，都胜利了，而和上面所说相反，采取强迫命令办法的，十个就有十个都走了弯路，跌了跟头。这些经验，教育了我们许多工作干部，思想作风有了进步。现在，工作向前发展，群众进步很快，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求我们解决。党的领导责任更加重了。但是，我们大多数干部没有经过系统的理论教育，对毛泽东思想领会不深。思想方法上，经验主义倾向极为普遍。工作上官僚主义、命

令主义的毛病时常出现。此种状态，是与客观工作的需要十分不相称的。并不是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事情都做好了，要求我们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是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好，有很多重要问题没有及时地加以解决。

最重要的，首先，是城市工人工作方面。毛泽东一再指示我们，要重视城市工作，要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我们在工人群众中，也做过不少工作，但成绩不大，主要的就是没有经过一个扎实的民主改革运动。现在必须补上这一课，才有可能在工厂企业管理工作中，在工会工作中，贯彻民主作风，逐步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不断提高工人思想觉悟，搞好生产，并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适当改善工人生活。

其次，是乡村农民工作方面。要领导农民获得解放，就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全西北的一切农业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区在内），都要在一二年内，完成土地改革。这是确定的。但是，农村的工作，决不止于土地改革。一切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方，要立即转到领导农民发展生产上，以保证城市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给，并改善农民自己的生活。这就要做好一系列的复杂的细致的具体工作。同时，也要一刻不停止地向农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逐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一个长期的细心的工作，一点也放松不得。陕北老区，我们进步慢了些，群众就批评了我们。

只有切实做好团结和教育工人、农民的工作，不断提高工人阶级觉悟，领导农民继续前进；同时，又切实做好其他工作，才能使我们的工农联盟获得前进，从而使人民民主统

一战线获得前进。

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是有其特点的。这就是，必须大量培养当地干部，依靠本民族的干部，去教育和发动本民族的人民；一切的工作，都要采用适合当地环境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要组织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一切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的人都要团结，不能轻易脱离一个不应脱离的人。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最基本的工作，在城市及有工业经济的地区，必须是做好工人工作，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在农业经济地区，必须是发动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在游牧区，也要积极改善牧民生活，向劳动群众进行长期的教育组织工作。经过这些工作，才能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事业。这都是很明白的。

要使我们的工作不断地前进和提高，时刻认清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就必须努力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的办法，就是学习，就是组织全党干部和所有革命积极分子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学习的敌人是自满，首先要认真清除党内已经存在的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唤醒大家，认识学习的重要性。按照中央的规定，动员大家开始有计划地学习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和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学习的基本方法，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要大力提倡具体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解决实际问题，肯定正确的东西，否定错误的东西。要针对工作中的缺点，开展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机关必须重视总结工作。要勤于总结，善于总结，经常用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生动经验教育和提高全体党员。

各级党委应立即加强对干部教育工作的领导。规定制度，指示办法，勤督促，勤检查，多多研究和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推动全党的理论学习迅速高涨起来。

我们相信，只要全党政治理论水平不断地提高起来，党的干部和其他的革命积极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领会程度不断地加深起来，就一定能够团结西北各族人民，继续做好西北地区的工作，与全国人民一起，向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道路前进，向我们的远大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习仲勋文集》刊印

注释：

- [1] 关中，指陕西中部地区。
- [2] 刘志丹，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初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和谢子长等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一九三二年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一九三六年参加东征，同年四月十四日在晋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
- [3] 谢子长，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领导渭华起义，曾和刘志丹分别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副总指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四年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一九三五年被选为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二月因战伤久治不愈逝世。

〔4〕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开陕北吴堡去山西临县。

〔5〕 共同纲领，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内外政策，起临时宪法作用。

西北地区的土改工作^{〔1〕}

习仲勋

（一九五二年五月四日）

西北地区关内四省的土地改革现已基本完成。去冬今春计划进行土改的地区，除陕西有九十八个乡，甘肃有三十八个乡要待麦收后再办外，其余陕西（主要是陕南）二千一百一十七个乡，甘肃三千一百八十六个乡，宁夏二百二十八个乡，青海二百三十一个乡，共五千八百六十二个乡，分含于一百零六个县、八个市，人口一千五百万，五月中即可全部做好土改工作。青海化隆、循化、贵德、门源四县有六十九个乡已经过减租，原拟今年五月继续进行土改，现推迟秋收后去办，年内即可办好。新疆减租斗争也已按计划完成，决定于今冬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土改，计有六十二个县、二百八十二个区、一千六百个乡，总计人口约四百万。这样办了，到明年全西北土改就全部完成了。

去冬今春土改最大的成就，乃是成功地在少数民族多的地区进行了这样一个大改革。这也是去冬今春的特点。约有半数土改地区是有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的。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使我们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更深刻了，更丰富了。摘其

要有以下三点：

（一）所谓在民族团结基础上去进行土改，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第一，要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自觉；第二，要有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第三，向少数民族地主进行斗争要由其本民族群众为主去做；第四，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第五，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去发动群众，不可颠倒过来。民族问题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里？就在这些上层。联合这一部分封建来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可以说是那里的矛盾的特殊性，这一部分封建要用赞助土改或不反对土改，来换取“改得和平些”，以及在宗教方面、在关系他们自身某些方面我们的某种妥协。我们呢，就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协，去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不换是什么也得不着的。一切可以争取来帮助土改（至少不反对土改）的力量，都务必争取联合过来。用各种办法，如开代表会、座谈会、组织参观土改成果等，讲明政策，给以出路，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方面的人物出来赞助土改，至少保持中立，这是甘、宁、青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

（二）一定要严格控制。必须筑几道防线：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牧区暂不土改，靠近牧区的小块农业区也不土改以至不减租；严格保护畜牧业，牲畜一定不动，分别不清的也都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也不提减租，极力避免牧区震动，两面都动是很不利的；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

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甘肃坚决保护了马辅臣、马全饮⁽²⁾等人，作用都很好。而对马良⁽³⁾等安置不到，结果给匪特拉过去了。只要今天确实靠拢过来的都要照顾、保护，集中打击现在还做反革命活动的，其余都不算旧账。那些有代表性而又和我们合作的人，即使历史上有恶迹，有血债，都不要去算。只要按照土地改革法把土地拿出来分了就好，不要硬性去搞面对面斗争，背靠背的办法同样可以发动群众。上层高级人物甚至不必叫他写检讨书。不但各省要有大名单，各分区、各县还要有小名单。甘肃省上有了几十个人的保护名单，平凉下面却没有，便出了漏洞。

(三) 仍然是放手发动群众。甘肃临夏和青海很多地方，当群众提起民族间历史问题时，引导他们去找阶级根子，诉统治阶级之苦，结果很好，回、汉农民互相打招呼共同参与本庄分地。民族团结更好了，这是成功的。凡经过土改的地方，都团结了各民族群众，巩固了民族团结。但是，这些地区发动群众的工作，必须作为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要准备多少年时间去逐步深入。以为一经土改便万事大吉的想法是错误的。领导上必须不为群众一时的表现（特别是少数积极分子的过激意见）所迷惑，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回族地区“男女一齐发动”的口号不要提，宗教问题不要干涉。暂时行不通的事情都不要勉强去做，无益之举办了就是有害。这点在群众发动起来时十分重要。在汉族地区，同样也是如此，群众起来了，乱斗、乱算、报复、多搞点东西等倾向都必然要发生，凡是领导思想上不够清醒的都走了些弯路。

从整体来看，去冬今春各地土改一开始都强调了发动群

众，并且是在去年减租、反恶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基础上衔接进行的，群众发动都较深。但是，地区大了，干部情况也复杂，领导力量往往兼顾不过来，初期经验不足，后期又有赶急图快的情绪，工作粗糙的不在少数，还有空白点，某些地方工作组一走地主便反攻了。今年秋后复查还要花人的力量去办好。

新疆今年土改计划分局已有报告，并在积极准备中。当地与内地情况有很大不同，有很多的特殊问题，已请分局具体研究，订出必要的实施办法。并借张邦英^{〔4〕}在西安之便，西北局专门讨论了一次，把一些具体方针明确肯定了下来，并报中央审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习仲勋文集》刊印

注释：

- 〔1〕这是习仲勋关于中共西北局工作向中央报告的一部分，习仲勋当时任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 〔2〕马辅臣、马全钦，均为回族，甘肃地方开明绅士。
- 〔3〕马良，原国民党军马步芳部军官，青海解放时投诚，后组织第一〇三路军叛乱，自任司令，一九五三年被人民解放军俘获。
- 〔4〕张邦英，当时任中共新疆分局副书记。

在西北军区剿匪会议上的总结（摘录）

廖汉生⁽¹⁾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剿匪会议开了三天，总结了甘、青、川边剿匪的经验教训。除了原则同意大会上各位同志的报告、总结以外，我的结论主要讲下列四个问题：

第一，军区对甘、青、川边政治上匪的认识及进剿决心、部署以及对剿匪成绩的估计。

西北军区决心歼灭甘、青、川边以马良、马元祥⁽²⁾为首的政治土匪，开始于一九五二年之秋季，经过中央军委、西北局的批准并在中央军委、西北局直接领导之下来进行的。

甘、青、川边以马良、马元祥为首的这支政治土匪，是以台湾蒋介石匪帮为其政治背景并直接接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支持和扶植的反革命武装。这支反革命武装，以反动军官、特务、惯匪、恶霸、兵痞、流氓为其骨干，而匪首马良、马元祥等则是怙恶不悛、屡次组织暴乱、始终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死心塌地地甘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妄想扩大实力，等待时机，以配合蒋匪“反攻大陆”，重新恢复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基于以上认识，西北军区部队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进歼盘踞甘、青、川边以马良、马元祥为首的政治土匪，以便解救广大藏区同胞，使广大藏区同胞回到毛主席的光辉下，回到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来。因此，西北军区的决心是：彻底剿灭土匪，以开展甘、青、川边的藏族地区工作，为帮助藏族人民取得彻底解放，取得幸福和发展而斗争。

为着实现上述决心，我们自去年十二月剿匪会议开始，即开始了政治、军事、后勤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我们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了进剿。

我们采用三个步骤来实现全歼土匪的决心，这三个步骤是：

第一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土匪采用奔袭、围歼、追歼等军事清剿手段为主，并不放松政治争取瓦解及继续深入做民族统战工作及群众工作。唐昆战斗首歼马良股匪大部，对剿匪进展起了重大作用；又经过崩坝战斗及追歼马虎山股匪战斗，即基本歼灭马良股匪主力及敏海峰、刘华初、边仙桥⁽³⁾等股匪大部，以至于得苦乎沟附近全歼马元祥股匪后，成股土匪已被全歼，漏网之主要匪首及残匪即逃窜潜伏，企图隐蔽待机。

第二步，以政治瓦解争取为主，辅之以军事搜剿，以达彻底肃清残匪，捕尽匪首之目的。在我军大胜的声威下，群众积极向我靠拢，纷纷与匪特断绝联系，造成了从政治上争取瓦解残匪及搜捕潜藏匪首的有利形势。军队武工队（六百八十余人）、随军工作团、当地有威望之中、上层人物及部落头人、寺院管家等共同组成了工作委员会，各部依据剿指党

委指示，又先后召开驻地部落头人、寺院管家座谈会，群众大会，团结了广大群众，揭穿匪特反动宣传，进一步交代政策，助我剿匪者日多。经过拉勒山、黄卜浪沟、江缠等战斗，活捉了匪首马良、马硕卿及空降特务游觉云、林文喜，争取了匪首敏海峰投降，击毙匪首边仙桥、马子扬等。至此即将土匪全歼。

第三步，抓紧深入群众工作，以便提高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各部队展开了宣传工作和救济工作，给群众治病、放映电影、开展贸易、帮助修理寺院或帮助群众生产及劳作，这就使得藏区广大同胞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才能翻身，才能过幸福日子。

第二，我们取得胜利的来源：

首先是由于我们自上而下重视与正确认真地贯彻了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全体参加剿匪人员，包括党、政、军系统，都兢兢业业地正确认真地执行着民族政策，把民族政策，贯穿一切工作之中，取得了广大藏族人民的积极拥护。

其次，是剿指与全体参战部队的上下思想一致，万众一心，发挥了战斗积极性，全体同志英勇顽强，战胜一切困难，奋勇歼敌。

还有西南兄弟部队的积极配合。

再次，在西北军区各个业务部门中，均以大力参加和支援了剿匪行动，其中尤其是后勤部门，更付出了重大努力。

地方党政的大力协助，黄正清副司令员积极工作，在团结藏族同胞支援剿匪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中央军委、西北局的正确而及时的指示、督促与

鼓励，保证了我们剿匪能够循着正确的道路走向全部胜利。

第三，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我们的作战对象是受着美蒋匪帮接济的残存的政治股匪；作战地区是在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气候变化无常的牧区；群众条件是解放后我军尚未到达，我党的政策尚未与广大群众见面，藏族人民由于受敌人的欺骗宣传，一开始对我们尚不了解。

在这种地区，这种群众条件，与这种敌人作战并取得胜利，我们的基本经验是：充分准备，党、政、军协同一致，在政治上，坚持贯彻执行和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军事上，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发扬坚决勇猛的作风，采取奔袭、围歼、追歼战术，并随时根据敌情变化来改换战术；在组织上，坚持统一领导与密切配合；这是我们用之有效的经验。

但是我们同样不应该忽视我们尚存在着的若干缺点。

第四，继续剿匪肃特仍是我们今后的任务。

我们此次全歼甘、青、川边以马良、马元祥为首的政治股匪，其胜利是重大的，但如以为从此西北地区就用不着剿匪了，这则是不对的。今后主要由各地公安部队为骨干，组织广大民兵做好群众性的捕捉匪特，加强反空降斗争，并在情况复杂地区驻守适当兵力。至于今天留驻藏区的部队和工作干部，他们则仍须继续担负艰苦的而且是光荣的为藏族人民彻底解放的任务，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等五个方面来帮助藏族人民，以便支援藏族同胞，推进藏区的建设。

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

根据兰州军区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刊印

注释：

- (1) 廖汉生，当时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 (2) 马良、马元祥，均为土匪首领。马良于一九五三年被我俘获，马元祥于同年被我击毙于青海加扎隆湃山。
- (3) 敏海峰、刘华初、边仙桥，均为流窜土匪首领。